

5

Sun Yat-sen & Soong Ching Ling:

Archives & Research 2014/8

孙中山宋庆龄 文献与研究

● 关于宋氏家族研究的几点思考
● 孙中山与20世纪中国启蒙运动

● 《孙中山评传》的出版与孙中山研究的未来

● 宋庆龄在近代中国历史关键时刻的几次重大抉择

● 宋庆龄等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恢复孙中山「三

大政策」案之提出

● 宋庆龄与美国友人浦爱德：浦爱德档案对研究宋

庆龄的意义

● 英国国家档案馆藏关于邀请宋庆龄访英的英国外

交部档案

● 宋庆龄致牛恩美国（1962—1980）

● 「孙文发信债票案」档案文献及相关资料选编

● 天津《大公报》载孙中山北上史料汇编（下）

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
文物管理委员会 编





上架建议：学术研

ISBN 978-7-5458-



9 787545 809411 >

定价：40.00元

易文网：www.ewen.cc

Sun Yat-sen & Soong Ching Ling:
Archives & Research

第五辑

孙中山宋庆龄 文献与研究

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 编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5辑 / 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编.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4.8

ISBN 978-7-5458-0941-1

I. ①孙... II. ①孙... III. ①孙中山 (1866~1925) —人物研究—文集 ②宋庆龄 (1893~1981) —人物研究—文集 IV. ①K827=6 ②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95187号

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 (第五辑)

主 编 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

责任编辑 沈佳茹

技术编辑 丁 多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地 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www.shsd.com.cn

经 销 全国各地书店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 × 965mm 1/16

印 张 25

版 次 2014年8月第一版

印 次 2014年8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8-0941-1/K.160

定 价 40.00元

《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编审委员会

顾问：鲁平 金冲及 许德馨 张磊 姜义华 林家有
沈渭滨 熊月之 吴景平 盛永华

编委会主任：匡成鸣

副主任：李竞业

编委：黄亚平 朱玖琳 宋时娟
廖大伟（特邀） 邵雍（特邀）
王锡荣（特邀） 沈海平（特邀） 邢建榕（特邀）

主编：黄亚平

副主编：朱玖琳 宋时娟

本辑执编：朱玖琳

目 录

学术论坛

- 001 关于宋氏家族研究的几点思考 / 姜义华

专题研究

- 005 孙中山与20世纪中国启蒙运动 / 姜义华
017 关于孙中山《挽刘道一》诗的几个问题 / 周兴樑
033 郭泰祺与孙中山伦敦蒙难纪念室的创建——兼论孙中山伦敦蒙难事件在不同时期的政治意义 / 蒋 耘
055 宋庆龄在近代中国历史关键时刻的几次重大抉择 / 盛永华
073 宋庆龄等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案之提出 / 朱玖琳
091 宋庆龄在中国救济福利领域的贡献与作用 / 沈海平
106 宋庆龄对孙中山民生主义的理解、阐释与实践 / 邵 雍

学术述评

- 118 《孙中山评传》的出版与孙中山研究的未来 / 林家有

读档札记

- 126 宋庆龄与美国友人浦爱德：浦爱德档案对研究宋庆龄的意义 / 王成志

回忆口述

- 140 永远的怀念 / 史美芬
148 二姑宋庆龄和我家 / 牛恩美口述 李纯涛整理
155 我所知道的宋庆龄 / 黄浣碧口述 沈海平整理

档案选编

- 162 英国国家档案馆藏关于邀请宋庆龄访英的英国外交部档案
/ 郑培燕 译注

- 179 上海市档案馆藏虹口宋氏老宅档案选录 / 邢建榕 董婷婷 整理
227 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法租界公董局警务处关于纪念孙中山活动情况的报告 / 朱玖琳 徐世熙 译注
257 宋庆龄致牛恩美函(1962—1980) / 郑培燕 李纯涛 译注
289 “孙文发售债票案”档案文献及相关资料选编 / 刘 杰 编注

海外译文

- 300 一位华人洋基佬的脚注
——牛尚周1913至1917年的书信 / 牛康民 著 朱玖琳 译
316 《最后的女皇——蒋介石夫人和现代中国的诞生》选译
/ 宫洁菁 译注

史料辑存

- 327 天津《大公报》载孙中山北上史料汇编(下) / 葛培林 辑录
378 《申报》载宋母倪珪贞葬仪史料汇编 / 朱玖琳 辑录

Contents

Academic Forum

- 001 Jiangyihua, *Reflections on the Studies of the Soong Family*

Monograph

- 005 Jiangyihua, *Sun Yat-sen and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in the 20th Century*
017 Zhouxingliang, *Issues of the poem MOURNING LIU DAO-YI by Sun Yat-sen*
033 Jiangyun, *Quo Tai-chi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un Yat-sen Memorial Hall in London—And comments on the political meaning of the Sun Yat-sen's Kidnapped Event in London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055 Shengyonghua, *Significant Choices made by Soong Ching Ling at the Vital Moments in Modern China History*
073 Zhujiulin, *On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Proposal of Re-establishment of Sun Yat-sen's Three Great Policies to the 3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5th Central Committee of KMT by Soong Ching-ling etc*
091 Shenhaiping, *Soong Ching Ling's Contributions and Role in Modern China's Relief and Welfare Causes*
106 Shaoyong, *Soong Ching Ling's Understanding,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Sun Yat-sen's Thoughts of People's Livelihood to Practice*

Review of Academic Activities

- 118 Linjiayou, *Publication of THE COMMENTARY BIOGRAPHY OF SUN YAT-SEN and the Prospects of the Studies on Sun Yat-sen*

Reading Notes on Archives

- 126 Wangchengzhi, *Soong Ching Ling and Her American Friend Ida Pruitt: The Significance of Ida Pruitt Papers to the Studies of Soong Ching Ling*

Oral History

- 140 Shimeifen, *My Fond Remembrances*
148 Niuenmei, *Aunt Soong Ching Ling and My family*
155 Huanghuanbi, *All I know about Soong Ching Ling*

Selected Archival Materials

- 162 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Invitation to Mme. Sun Yat-sen to Visit the United

Kingdom owned by The National Archives

- 179 Selected Records on Old House of the Soong Family in Hongkou owned by 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s
- 227 Records on the Police Department of the Shanghai French Concession to Commemorate Sun Yat-Sen's Activities owned by 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s
- 257 The Letters from Soong Ching Ling to Niu Enmei (1962—1980)
- 289 Selected Archival Documents and Information Related to Securities Issued by Sun Yat-Sen in 1917

Overseas Works in Translation

- 300 Footnote on a Yankee Chinese: Letters of Shang-chow New, 1913—1917/Peter Kong-ming
- 316 Selected Translation of THE LAST EMPRESS: MADAME CHIANG KAI-SHEK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A

Historical Data Collection

- 327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from the Tianjin "Da Kung Pao" on Sun Yat-sen's way to Peking(Part II)
- 378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from the "Shun Pao Daily News" on the Funeral Ceremony of Soong Family's Mother Ni Guizhen

关于宋氏家族研究的几点思考*

姜义华

今年6月上海文史馆的一次会议上,我向参加会议的杨雄市长提出,上海要成为一个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必须要打造自己的历史名片,有自己特色鲜明的城市文化。上海文化的积淀,文化的历史资源,在上海现代化的大都市建设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以为,宋氏家族以及这一家族的众多成员,就是上海非常珍贵的历史名片。宋氏家族在上海,应当算是上海的骄傲,也是上海一笔非常宝贵的历史财富。当然宋氏家族不只属于上海,它也属于中国。

非常高兴的就是这些年来宋氏家族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步。宋子文档案的整理、公布,我想现在已有了条件,由吴景平博士把他先前的《宋子文评传》做一个大幅度的改写,而且可以编出来更为详尽的《宋子文年谱长编》。

我最感兴趣的是宋庆龄的研究,这几年真的有很大的突破。在以往多少年里,宋庆龄,在我们印象中,还是一个相当平面的人物,一个线性的甚至概念化的人物。随着宋庆龄大量的书信,包括她的英文书信的收集、整理、出版,使得我们开始对于宋庆龄有了一个立体的了解。她的内心,她的真实感受,她一生中间许多重大的关键性事件的真实情况,关于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包括文化大革命中的真实情况,我们有了比较具体的了解。我觉得这方面可能还有很多工作等着我们去做。但是,我觉得宋庆龄的研究确实是有了非常好的、过去所没有的新的进展。我们期待着更多、更丰富,至今还没有开放的

* 本文为姜义华教授于2013年11月1日在“宋氏家族与近代中国的变迁”学术研讨会上的主旨演讲,该研讨会由上海宋庆龄研究会同复旦大学近代中国人物与档案文献研究中心、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联合主办。

相关的档案、相关的文献的公开、公布。

相比之下,我觉得宋氏家族中间宋蔼龄和孔祥熙的研究还没有多少突破,我们期待着胡佛研究院更快地把这一部分档案全部开放整理,因为这一领域的研究现在还相对比较薄弱。

随着蒋介石日记的公布,蒋介石的研究有了相当大的进展,而宋美龄的研究,现在基本上还是停留在原来一些概念化的东西上。一个活生生的宋美龄究竟怎么样,我们了解的非常少。昨天我看到台湾“国史馆”要搞一个宋美龄的图片展,我1993年在台湾的时候看到宋美龄的照片整整一个大房间,所有抽屉里都是她的照片,里边大部分大概都没有拿出来。

宋氏家族的整个研究,我觉得现在还有非常大的空间,有非常多的工作等待我们去做,有太多的问题值得我们去深入思考。

我想要进一步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次会议所出的一个这么大的题目:“宋氏家族与近代中国的变迁”。宋氏家族实在是对近代中国影响太大,从宋耀如开始,三个女儿、三个儿子,还有三个女婿,都在中国政治上,特别在民国政治,包含到台湾以后,包括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宋庆龄,对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的影响都非常大。会议用“近代中国的变迁”这样一个大题目来涵盖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非常大地开阔我们的视野,重新构建我们对问题进行思考和研究的角度。

宋氏家族为什么它能够在近代中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宋氏家族的不同成员为什么后来走了不同的道路?这个问题更值得我们思考。因为时间关系,我只想谈一点。

我觉得在考虑近代中国宋氏家族命运的时候,不能不考虑到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一个最基本的东西。我有一点很简单的想法,就是近代中国的社会大变动实际上由三个大部分构成。一个大部分,实际上就是中国的,根植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农民运动。近代以来,它形成一个大的高潮,这构成中国近代社会大变迁中间一个最基本的东西。第二个大部分,是近代中国开始产生了一场中国历史上、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没有过的运动,这就是现代化的运动,包含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包含知识化、大众化、世界化,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上过去没有过的、新的历史性的巨大变化。能够把这两个运动结合在一起的,是我们近代中国的民族运动、民

族解放运动,或者说民族斗争,面对西方的列强,特别是日本发动的旨在灭亡中国的全面的战争,中国的民族运动高涨。这是第三大部分。这种民族运动会把农民运动和现代化运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三个大运动相互关系来看宋氏家族的命运,以及宋氏家族主要成员不同道路的选择,我觉得可能提供一点我们进一步思考的思路。

我觉得,在中国民族运动中间,在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和农民运动中间,宋氏家族不同的成员处于怎样不同的地位,这和他们的命运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非常值得我们认真而深入地加以思考。

宋氏家族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影响,我觉得重要的一点,就是从宋耀如开始,他们一家在中国是比较最早、比较最系统地接触到西方教育、西方文化影响的。他们对于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相当的熟悉。尤其从宋耀如先生开始,包括他的所有子女,都深受基督教的影响。基督教徒那样的信仰,他们的责任意识,以及他们的献身精神,应当说在宋氏家族主要成员身上表现得相当突出。他的子女,从上海受教育开始,后来又到美国留学,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应当说比较系统,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是相当深的,但是,他们都是回到中国,投身建设和改变中国的这一事业。这是他们的一大特点。但是,回过头来看,这又未尝不是他们一个非常大的弱点。就是对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民缺乏足够的了解,不清楚怎样真正解决中国农民问题,怎样将现代化运动和农民运动连接起来。这个可能在宋氏家族大多数成员身上一个弱点所在。

今年是宋庆龄女士诞生120周年,也是毛泽东诞生120周年,他们都诞生于1893年。我在来开会的时候就想,纪念毛泽东诞生120周年,应当认真思考毛泽东的成功在什么地方,失误在什么地方。我以为,他的最大成功,就是他能够把占据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分散的农民组织成我们这样一个巨大的政党,通过党把农民集结起来,并组织起一支现代的农民军队,指挥一场现代农民战争,这是他成功的地方。他后来的失误,根源于他对现代化特别是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知识化、世界化可能带来的新的异化,可能带来的新的矛盾、新的冲突,有太多的担忧,在这方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在搞建设的时候,表现得相当明显。相比之下,我觉得宋氏家族在现代化方面,结合

吴景平博士现在做民国的财政史、金融史,从宋子文、从孔祥熙身上,可以看到他们在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等方面的发展中间有其长处,但是很大的问题就是在解决不了农民问题,相反,剥夺了农民,大大激化了同广大农民的矛盾冲突。当然,蒋介石到了台湾以后,很大的程度上,改变了在大陆的作风,在台湾搞了农地改革,后来国民党能在台湾生下根,一直延续到今天,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接了农民这个地气。国民党的票源,它的最大的票仓,首先来自农民。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怎样深入研究宋氏家族和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一点启示。

第二点,我觉得就是怎么样处理好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从宋氏家族发展上可以看到,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关系,特别是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的关系,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部分,这就是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从孙中山晚年倡导“以俄为师”开始,后来包含蒋介石,包含宋子文,当然宋庆龄更是,跟苏联关系千丝万缕,非常复杂。怎么样处理好中国和西方世界、中国与苏联长期的关系,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变动中间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中国怎么走自己的路,其实我觉得这可能是所有的宋氏家族的成员,包括三位男性的女婿,都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所以,宋氏家族的研究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的问题,我觉得对今天中国现代化的建设,对今天中国发展怎样既广泛吸收国外各种有益的资源,又坚定不移地走中国自己的路,仍然可以提供很多启示。因为这三个运动,民族主义运动,现代化运动,农民运动,相互关系怎么处理,外国成功的经验能否适用于中国,这些问题至今仍然继续困扰着我们。一代又一代新的中国人,仍然要面对这些问题。中国能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问题能否及时地成功地解决。在这两大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敢于直面,一定要敢于排除各种障碍,认真去解决,我觉得只有这样做了,我们的目标才能够真正的实现。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孙中山与20世纪中国启蒙运动

姜义华

〔内容提要〕

孙中山是20世纪中国学习西方的一位先行者,又是20世纪中国倡导社会主义及“以俄为师”的一位先行者,更是恢复中国“固有道德、知识和能力”同时积极“学欧美之所长”这一启蒙新路径的开创者。孙中山之所以先是批评性地学习西方,后来有选择地师法苏俄,再后更明确地坚持中国必须走自己的道路,都根源于他始终不渝地努力寻求真正能够使中华得到振兴的正确途径。20世纪中国启蒙运动的全部历史充分证明,启蒙的内涵和历史使命,绝不是机械地模仿或移植他者,而是通过真正的自我反省,深刻而全面地认识自我,在此基础上,由自发的或然王国上升到自由的必然王国。自省,自知,自觉,自由,这才是启蒙的最高境界。

〔关键词〕

孙中山 中国启蒙运动

一、既依次递进而又互相重叠的三重启蒙

20世纪中国启蒙运动,是既依次递进而又互相重叠的三重启蒙。

中国启蒙运动发端于西方文明的挑战。最初,是西方的坚船利炮,西方的声光化电、机器工业,震动了中国;随后,西方以市场为中心的经济制度,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思想、言论、出版自由的文化制度,震动了中国;再后,西方个人本位、利益最大化、生存斗争优胜劣汰等核心价值观念,震动了中国。中国以西方这些成就为坐标,对自己重新加以审视和检讨。

中国启蒙运动开始之际,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已日益暴露,以批判和推翻资本主义为己任的社会主义思潮和社会运动已经勃兴。这样,当中国充满期待学习西方时,饱受西方殖民主义奴役之痛的中国志士仁人更容易敏锐地注意到西方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社会及文化种种问题的揭露和批判,并天然认同这些揭露和批判。于是,中国又开始了以西方社会主义为坐标的启蒙。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这一启蒙更集中表现为“以俄为师”。

中华民族是一个巨型民族,中华文明是一个历史悠久有着强固文化与制度传统的巨型文明,中国又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巨型国家,师法他者,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完全抛却自己原有的根柢。师法他者时,曾一度产生过“万事不如人”的悲观情怀,但更多智者早早就发现,师法他者任何一种现成的模式,都无法全面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各种真实问题。中国的启蒙必须是中华民族的自我觉醒,是中华文明的自我反省、自我扬弃、自我更新。因此,在整个启蒙运动发展过程中,中国如何走符合中国实际的自己的路,一直是一个极为强劲的诉求,并最终取代前二者成为中国启蒙运动的主流。

考察一下孙中山与上述三重启蒙运动的关系,便不难了解他在20世纪中国启蒙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民治、民有、民享:批判性地学习西方

孙中山是20世纪中国学习西方的一位先行者。

孙中山最初对于西方的认知,清楚表现在他1894年1月的《上李鸿章书》中。他在信中介绍自己时说:“窃文籍隶粤东,世居香邑,曾于香港考授英国医士。幼尝游学外洋,于泰西之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与夫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而尤留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至于时局变迁之故,睦邻交际之宜,辄能洞其阃奥。”这封上书的主题就是强调:“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对此,他逐一作了疏解:“所谓人能尽其才者,在教养有道,鼓励有方,任使得法也。”“人

既尽其才，则百事俱举；百事举矣，则富强不足谋也。”“所谓地能尽其利者，在农政有官，农务有学，耕耨有器也。”“农政有官则百姓劝〔勤〕，农务有学则树畜精，耕耨有器则人力省。”“所谓物能尽其用，在穷理日精，机器日巧，不作无益以害有益也。”“穷理日精则物用呈，机器日巧则成物多，不作无益则物力节。”“所谓货能畅其流者，在关卡之无阻碍，保商之有善法，多轮船铁道之载运也。”“无关卡之阻碍，则商贾愿出于其市；有保商之善法，则殷富亦乐于贸迁；多轮船铁路之载运，则货物之盘费轻。如此，而货有不畅其流者乎？”“货流既畅，则财源自足矣。筹富国者，当以商务收其效也。”孙中山由此作出结论：“夫人能尽其才则百事兴，地能尽其利则民食足，物能尽其用则材力丰，货能畅其流则财源裕。故曰：此四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四者既得，然后修我政理，宏我规模，治我军实，保我藩邦，欧洲其能匹哉！”^[1]

这些论述表明，孙中山这一时期所期待的学习西方，基本上还没有超越要像西方那样重视发展教育、发展实业、发展商务这样一些技术性、工具性层面。

从创建兴中会到创建同盟会再到建立中华民国，孙中山对西方的认知，有了很大的飞跃。最具代表性的论述，是他1905年10月发表的《〈民报〉发刊词》，其中说：“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洲各国以独立。洎自帝其国，威行专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则民权主义起。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是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递嬗变易，而欧美之人种胥冶化焉。其他旋维于小己大群之间而成为故说者，皆此三者之充满发挥而旁及者耳。”^[2]

孙中山特别认同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在盖茨堡演说时所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一再申明：“我们的三民主义就是民有，民治，民享。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

[1]《上李鸿章书》（1894年6月），《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8—18页。

[2]《〈民报〉发刊词》（1895年10月20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8页。

共享!”^[1]新生的中华民国,就是要“建设一世界上最富强最快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2]在《〈民权初步〉序》中,他写道:

何为民国?美国总统林肯氏有言曰:“民之所有,民之所治,民之所享。”此之谓民国也。何谓民权?即近来瑞士国所行之制:民有选举官吏之权,民有罢免官吏之权,民有创制法案之权,民有复决法案之权,此之谓四大民权也。必具有此四大民权,方得谓为纯粹之民国也。革命党之誓约曰:“恢复中华,创立民国。”盖欲以此世界至大至优之民族,而造一世界至进步、至庄严、至富强、至安乐之国家,而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3]

民族、民权、民生,一步步递进,民有、民治、民享,一环环相扣,孙中山认为,这方才是欧美各国活力本源之所在。他依据这一标准评判欧美各国经济、政治、社会制度之得失,确定中国革命之目标,规划中国发展之路径。它表明,较之《上李鸿章书》,孙中山所倡导的学习西方,这时有了个很大的飞跃,可以说,这时已从先前的技术层面、工具层面上升到理性层面。

1920年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反思欧洲近代以来发展时谈到,欧洲从“提倡自由放任主义”,推动了“百年来政制的革新和产业的发达”,然而,“社会上的祸根,就从兹而起:现在贫富阶级的大鸿沟,一方面固由机器发明,生产力集中变化,一方面也因为生计上自由主义,成了金科玉律,自由竞争的结果,这种恶现象自然会演变出来呀。”他认为,除此之外,“到十九世纪中叶,更发生两种极有力的学说来推波助澜:一个就是生物进化论,一个就是自己本位的个人主义。”“自达尔文发明生物学大原则,……归结到‘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八个大字。这个原则,和穆勒的功利主义、边沁的幸福主义相结合,成了当时英国学派的中坚。同时士梯尼(Max Stirner)、卞夏加(Sören Kierkegaard)盛倡自己本位说,其敝极于德之尼采,谓爱他主义为奴隶的道德,谓剿绝弱者为强者之天职,且为世运进化所必要。这种怪

[1]《三民主义》(1924年1月至8月),《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94页。

[2]《〈建设〉杂志发刊词》(1919年8月1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90页。

[3]《建国方略》(1917至1919年),《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12—413页。

论,就是借达尔文的生物学做个基础,恰好投合当代人的心理。所以就私人方面论,崇拜势力,崇拜黄金,成了天经地义。就国家方面论,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变了最时髦的政治方针。这回全世界国际大战争,其起源实由于此;将来各国内阶级大战争,其起源也实由于此。”^[1] 自由放任主义也好,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和穆勒的功利主义、边沁的幸福主义也好,自己本位的个人主义也好,这些欧西文明的核心价值,梁启超在十多年以前都曾大力鼓吹过,现在,他对这些核心价值逐一提出了质疑。

而孙中山早在1917至1919年撰写的《建国方略》中,对西方文明的这些核心价值已经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后来又在1924年所发表的《三民主义》系列演讲中,又作了更为中肯的检讨。对此,笔者在《论孙中山的自由平等观》、《论〈孙文学说〉人文精神的新构建》、《孙中山晚年对生存斗争社会哲学的批判——孙中山褒扬儒家政治哲学的思想基础试析》等文章中(俱见《天下为公:孙中山思想家剪影》一书)曾做过专门论析。

孙中山1912年在许多演讲中已指出:“物竞争存之意已成旧说,今则人类进化,非相匡相助,无以自存。”^[2] “天演淘汰为野蛮物质之进化,公理良知实道德文明之进化。”^[3] 在《孙文学说》中,他更明确地指出:“物种由微而显,由简而繁,本物竞天择之原则,经几许优胜劣败,生存淘汰,新陈代谢,千百万年,而人类乃成。人类初出之时,亦与禽兽无异;再经几许万年之进化,而始长成人性。而人类之进化,于是乎起源。此期之进化原则,则与物种之进化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人类顺此原则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4]

既然社会国家为互助之体,道德仁义为互助之用,那么,人就不可能作为孤立的个人而存在,人与人的关系更不可能只是利益追求与利益交换关系。基于此,孙中山批评了自由放任主义,批评了个人本位,批评了

[1]《五四风云人物文萃 梁启超 张东荪》,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36—37页。

[2]《在广州岭南学堂的演说》(1912年5月7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60页。

[3]《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1912年10月14日至16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08页。

[4]《建国方略》(1917至1919年),《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95—196页。

以功利主义取代人包括公理、良知、道德在内的人文追求。他指出,自由放任主义恰恰会导致整个社会一盘散沙,会导致纵容人性中恶的一面因得不到必要的制约而无限膨胀,会导致放任性恶的人践踏国家的道德、法律、正义、秩序,结果,不是变成暴民政治,就是走到无政府。

《孙文学说》副标题为“心理建设”,而且被置于《建国方略》第一篇,并以“心理建设”或“心性文明建设”冠以“孙文学说”之名,充分说明孙中山将这一“心理建设”放在何等重要的地位。孙中山这时对西方的认知,毫无疑问已上升到价值理性层面。对近代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的批判性审视,直接推动了他重新思考中国应当确立什么样的合乎中国国情又具有充分时代特征的核心价值。

三、有选择的“以俄为师”

孙中山是20世纪初中国人中最早确定应该用社会主义模式实现中国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变的。1903年12月他在檀香山致函国内时,便明确表示:“所询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1]1905年5月他在布鲁塞尔访问社会党国家局,会见该局主席王德威尔德和书记胡斯曼,要求第二国际接纳他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党为正式成员。1912年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及其后一再表示,在完成民族独立自主和建立共和制度之后,将致力于民生主义、社会革命,通过实施平均地权和国家社会主义政策,这就是对于土地随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而获得的巨额利益通过照价增税的办法,使其利益为全体民众所共享,同时,将铁道、电气、水道等一切大实业收归国家,不使私人独享其利,这样可使社会免受经济阶级压迫之痛苦。1915年11月他又写信给社会党国际局,呼吁他们支持“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2]。他说:“我当选中华民国总统时,原计划以社会主义的理想来建设中国”;“我坚信,只有中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人民才能更幸福,他们的苦痛也才能减轻。社会主义将治愈中国

[1]《复某友人函》(1903年12月17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8页。

[2]《致社会党国际局函》(1914年5月),《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64—365页。

的疾苦。”^[1]1917年2月开始,他着手撰写《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该年6月19日在上海用英文发表了其中第一计划。该计划拟定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方针、大政策,主旨就是广泛引进欧美发达国家资金、技术、人才,发展中国实业,“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这一计划绘就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更为具体的蓝图。

孙中山1912年10月14日至16日连续三天在上海中国社会党本部所作的系统演说中指出:“社会主义之主张,实欲使世界同立于平等之地位,富则同富,乐则同乐,不宜于贫富苦乐之不同,而陷社会于竞争悲苦之境。”社会主义“原欲推翻弱肉强食、优胜劣败之学说,而以和平慈善、消灭贫富之阶级于无形。”他站在马克思主义“新经济学家”立场上对亚当·斯密论证资本主义与地主剥削合理的旧经济学理论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亨利·乔治所主张的“土地公有”,马克思所主张的“资本公有”,“其学说得社会主义之真髓”。孙中山还特别强调了社会主义方才能够使“人民平等”,人们“虽有劳心劳力之不同,然其为劳动则同也。官吏与工人,不过以分业之关系,各执一业,并无尊卑贵贱之差也。”^[2]

孙中山在中国倡导建立社会主义,努力号召以社会主义理想建设中国,尽管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但关于中国不应重复欧美先发展资本主义然后再实现社会主义,而应直接选择社会主义以走向现代文明的现代化道路的判断;关于中国应通过建立民主国家发展国营经济和土地公有,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构想;关于中国应有效防止资本家与大地主攫取巨额财富,而切实做到人们通过劳动,按劳取酬的设计;关于中国资产阶级力量很弱,中国有可能用和平方式解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设想;关于国家利用所掌握的土地、大资本、大企业所获得的财富,发展教育、养老、医疗等公共事业,以使人们得以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的制度安排;关于和各国社会主义运动互相支援,以及实行对外开放,利用资本主义国家资本、技术、人才以成就中国社

[1]《致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函》(1915年11月10日),《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5页。

[2]《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1912年10月14日至16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17、508、518、524页。

会主义事业的战略,等等,都极有见地。

俄国十月革命后,师法苏俄,仿效苏俄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模式改造中国,一段时间成为中国启蒙运动中特别强劲的呼声,后来,一度演进为“全面学习苏联”。

孙中山十分重视俄国革命与建设的经验,主张要认真学习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党建设,党的组织工作、党的宣传工作以及发展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学生运动的经验,尤其是党创建自己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的经验。为此,他热忱接受共产国际的帮助,改组了国民党,建立了国民党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提出“以俄为师”的口号。

但是,孙中山由于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早已进行了相当系统的研究和思考,他所倡导的“以俄为师”,从一开始就有明确的限制。1923年1月26日发表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第一项就说:“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党主义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可使此项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实施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最重要最迫切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向孙博士保证,中国当得到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1]这里所说的“共产党主义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指的是俄国十月革命后消灭全部资本主义和全部小生产者的私有制、立即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与分配的“军事共产主义”,以及和大规模清洗与镇压、阶级斗争绝对化与扩大化相联系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对于中国如何通过国营与民营相结合、国内资本与国际资本相结合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更多著作中对于如何通过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互相制约,以及人民行使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以选举和罢免官吏、创制和复决法律的“权能区分”制度,保障人民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而国家又能有效地运作,都有过系统的研究,并在实践过程中反复修改和补充,因此,不同意将苏俄当时所实行的制度移植于中国。事实上,苏俄自身,当时也已认识到立即

[1]《孙文越飞联合宣言》(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51—52页。

实行“共产主义生产与分配”的错误,改行新经济政策。

1924年11月23日在《与长崎新闻记者的谈话》中,他坦诚说明:“中国革命的目的和俄国相同,俄国革命的目的也是和中国相同,中国同俄国革命都是走一条路。所以中国同俄国不只是亲善,照革命的关系,实在是一家。至于说到国家制度,中国有中国的制度,俄国有俄国的制度,因为中国同俄国的国情彼此向来不相同,所以制度也不能相同。”^[1]这并不影响他对俄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高度评价和充分尊重,以及联俄政策的坚定不移。1924年1月24日,列宁逝世。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称颂俄国革命的“奇功伟绩是世界革命史上前所未有”,其缘由“实全由其首领列宁先生个人之奋斗及条理与组织之完善。故其为人,由革命观察点看起来,是一个革命之大成功者,是一个革命中之圣人,是一个革命中之最好的模范”^[2]。在2月24日举行的“中国国民党追悼列宁会”上,他亲自主祭,祭文称颂列宁,并清楚说明愿与苏俄“同轨并辙”：“茫茫五洲,芸芸众生。孰为先觉,以福齐民。伊古迄今,学者千百。空言无施,谁行其实?惟君特立,万夫之雄。建此新国,跻我大同。并世而生,同洲而国,相望有年,左提右挈。君遭千艰,我丁百厄。所冀与君,同轨并辙。敌则不乐,民乃大欢。邈焉万里,精神往还。天不假年,于君何说?亘古如生,永怀贤哲。”^[3]1925年3月11日在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遗书中,他说:“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取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4]

这些都说明,孙中山师法俄国是真诚的,但对借鉴俄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不同意全盘照搬,采取了相当理性的态度。这不仅因为他对于各派社会主义学说原就有较多的了解,更因为他在领导中国革命长时期奋

[1]《与长崎新闻记者的谈话》(1924年11月23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65页。

[2]《关于列宁逝世的演说》(1924年1月25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36页。

[3]《追悼列宁祭文》(1924年2月24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509页。

[4]《致苏联遗书》(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641页。

斗过程中,对中国国情、中国革命所面临的各种独特的挑战,有着深切的认识。这就使他在“中国启蒙运动师法苏联”这一层面上能够独树一帜。

四、启蒙新路径:恢复“固有道德、知识和能力” 并“学欧美之所长”

当孙中山倡导“以俄为师”时,对中国启蒙运动的前行,已经提出了一条新的路径,这就是在恢复我们固有的道德、知识和能力的基础上,学欧美之所长,通过迎头赶上去,以“后来者居上”。

恢复中国固有的道德,孙中山提出,首先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他说:“我们在民国之内,照道理上说,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讲到孝字,我们中国尤为特长,尤其比各国进步得多。“国民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除忠孝外,中国固有的道德,还有仁爱、信义、和平。孙中山批评说:“那些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1]

关于恢复中国固有的知识,孙中山说道:“中国有什么固有的知识呢?就人生对于国家的观念,中国古时有很好的政治哲学。我们以为欧美的国家近来很进步,但是说到他们的新文化,还不如我们政治哲学的完全。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的,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话。把一个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象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他还强调指出:“中国从前讲修身,推到正心、诚意、格物、致知,这是很精密的知识,是一贯的道理。象这样很精密的知识和一贯的道理,都是中国所固有的。我们现在要能够齐家、治国,不受外国的压迫,根本上便要从修身起,把中国

[1]《三民主义》(1924年1月至8月),《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4、244、243页。

固有知识一贯的道理先恢复起来,然后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地位才都可以恢复。”^[1]

关于中国固有的能力,指的是发明创造的能力。他指出,中国发明了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这些重要的东西,外国今日知道利用他,所以他们能够有今日的强盛。至若人类所享衣食住行的种种设备,也是我们从前发明的。因为后来失了那种能力,所以我们民族的地位也逐渐退化,现在要恢复固有的地位,便先要把我们固有的能力一齐都恢复起来。在谈到中国学习欧美之所长时,孙中山指出:“几千年以来,中国人有了很好的根底和文化,所以去学外国人,无论什么事都可以学得到。用我们的本能,很可以学外国人的长处。”^[2]这其实也是基于中国固有的能力。

孙中山对于中国启蒙运动路径选择的新思考、新建议,是对他本人先前所经历和所致力之启蒙主义认真反思的结果,也是对中国近代以来整个启蒙主义、启蒙运动认真反思的结果。

学习西方也好,学习苏俄也好,反过来求诸自身也好,所涉及的并非单纯的地域、民族、国家或话语表现形式问题,更为根本的问题是,究竟有没有一个普遍适应于所有地域、所有民族、所有国家的启蒙模本。按照康德的说法,“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3]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可见,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因此,启蒙运动的口号就是“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世界上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原先成熟程度、成熟状态不同,内外现实环境不同,运用自己的理智摆脱自己不成熟状态的基础与条件不同,启蒙的任务和路径就必然不同。孙中山关于启蒙路径的新结论,正是他清末以来在启蒙运动中不断实践、反复探索、认真总结的成果。

孙中山关于恢复自己固有道德、智能、能力的论述,其意义或价值主要表现于以下三个方面:

[1]《三民主义》(1924年1月至8月),《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7、249—250页。

[2]《三民主义》(1924年1月至8月),《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51页。

[3][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2页。

其一,它直面欧美启蒙与苏俄启蒙极为强势的功利主义,强调了人所特具的人文本质,人于现实的个人功利之外,还有对家庭、社会、国家、天下无法推卸的责任,精神的、文化的追求;

其二,它直面欧美启蒙与苏俄启蒙在绝对理性、普遍真理的名义下,否定世界上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个别性、差异性、特殊性,成为一种独断主义,而强调了必须坦诚承认世界的多样性、多元性,以及发展的多种可能、多种选择的现实性;

其三,它直面欧美启蒙与苏俄启蒙隔断现实与历史的自然联系,企图在一片精神的、文化的废墟上构建自己理想王国的政治的、社会的浪漫主义情怀及实践,而强调不能隔断现实和历史的联系,必须从历史传统中吸取营养,结合大众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传统思想文化遗产开辟启蒙价值的维护之路。

仔细抽绎一下,不难发现,这三点其实贯穿于孙中山所作的整个《三民主义》讲演。这也是后来中国启蒙运动发展到新阶段以后所凸显的主要精神。

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专门讨论了轴心时代的意义,他说:“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1]雅斯贝斯的这段话,应当有助于理解身处中国这样一个巨型国家、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巨型民族、中华文明这样一个巨型文明之中的孙中山关于启蒙路径的这番新思考。

事实证明,启蒙的内涵和历史使命,不是机械地模仿或移植他者,而是通过真正的自我反省,深刻而全面地认识自我,在此基础上,由自发的或然王国上升到自由的必然王国。自省,自知,自觉,自由,这才是启蒙的最高境界。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1][德]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

关于孙中山《挽刘道一》诗的几个问题

周兴樑

〔内容提要〕

孙中山在其鸿篇巨制中,留下了唯一的一首诗《挽刘道一》,由此而引发了他是不是诗人之争议。为彻底弄清此问题,有必要考察该诗的来龙去脉。1897年在与日本友人宫崎滔天之笔谈中自谓“弟不能为诗”^[1]的孙先生,为何要请人代撰挽诗哀悼刘道一?该七律诗之代笔者又是何人?他与孙中山和刘烈士有着怎样的关系?这首挽诗在流传转抄和公开出版过程中,出现了哪几种不同的版本?本文从考察刘道一、汤增璧两人与孙领导的革命事业之关系入手,对以上几个问题略抒管见,以使读者了解孙诗的原委及其历史真相。

〔关键词〕

孙中山 刘道一 汤增璧 挽刘道一

由孙中山署名的《挽刘道一》诗,毫无疑问应属于其著述之一。故国民党人先后编辑出版的《总理全集》与《国父全集》,及大陆学者编辑(撰)出版的《孙中山全集》与《孙中山年谱长编》,都收入了这首诗。一些人据此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称孙中山是位诗人。如有说:“世人皆知孙是革命家和政治家”,但却“很少人知道他善诗”;或谓“我记得柳亚子生前亦认为孙先生是一位诗人”——他在1944年5月5日写于桂林的一篇文章中说过:“孙先生能做诗(指《吊刘道一》——引者),而且还喜欢谈诗,难道还不能算一个诗人吗?”也有人持相反的看法——指出孙中山不善诗,其一生未曾写过诗。如毕生追随孙的胡汉民曾说:“余生平未睹先生所为诗”^[2];美籍华人学者薛君度(黄兴的

[1]《与宫崎寅藏笔谈》(1892年8月至1898年8月间),《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79页。

[2]参见杨伟群:《孙中山的两首诗》,徐文烈:《柳亚子谈孙中山的诗》,载《羊城晚报》1982年3月5日(3版)、4月2日(3版)。

遗腹女婿)也指出:“吟诗填词,是中国文人的传统习惯,孙中山是不搞这一套的。”^[1]在上述这场争论中,显然后一种意见才符合史实,因而是对的。孙中山在留给后人的大量文字宝库中,仅有一首诗这件事本身,就证明了其亲自对宫崎所说的“不能为诗”并非谦语,而是事实。现有资料充分证明,他的这首挽诗是请人代撰而由其署名的。

一、刘道一是同盟会之头位烈士

刘道一是刘揆一胞弟,在结识孙中山之前,是华兴会会长黄兴手下的一员战将;其当时曾追随黄不自觉地投身于孙中山开创的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不善诗也从写诗的孙中山,独独送一首挽诗哀祭刘道一,这说明刘烈士在他心目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事实也的确是这样:刘道一为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之参加者,又是该会湘赣边萍浏醴反清大起义的主要组织领导人,并因此而成了同盟会会员中为武装斗争而流血牺牲之第一人。此乃孙中山为他写哀诗的原因。台湾国民党党史会在所撰《刘道一传》中写道:“刘烈士是留学界为中国革命而牺牲的第一人,也是中国同盟会会员为中国革命而牺牲的第一人,所以国父对他的牺牲,哀悼特深!”^[2]

1905年冬,中国留日学生掀起了反对日本政府颁行《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之斗争;刘道一实为奋起反抗该规则的“一热血喷薄、勤劳任事者”^[3]。这是其入会后参加的第一次战斗。此间他奔走呼号,积极投身于留日学生的反日宣传与罢课示威等活动。通过这场反帝斗争的洗礼后,刘道一“誓清胡虏(的)……革命之志益切矣”:他当时身在日本而心怀祖国,尝对人谓“大丈夫不当流亡终身”,恚愤之思,溢于言表;其尤“勾践舐胆,未曾忘仇,陶侃运甓,因以励志”,认为武装

[1] [美] 薛君度著,杨慎之译:《黄兴与中国革命》之《附录》:“纪念黄公克强并论辛亥革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3页。

[2] 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编,黄季陆主编:《革命人物志》第6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2年版,第435页。

[3] 揆郑:《刘道一》,载《民报》第25号,“附录”第5页;又见《民报》影印合订本第5册,总第4003页。

反清之事“再举可图”。^[1]为了通过武装斗争的手段来推翻清政府的残暴统治,刘道一于1906年秋奉黄兴等之命,与蔡绍南、覃振诸人一起由日本返回湖南,准备“运动湘军,重振会党”,重举义旗。黄在道一离日本前叮嘱他说:“今之倡义为国民革命,而非古代之英雄革命。洪会中人犹以推翻满清,为袭取汉高祖、明太祖、洪天王之故智,而有帝制自为之心,未悉共和其理。……望时以民族主义、国民主义,多方指导为宜。”刘遵嘱回抵湘潭后,正值老父患半身不遂症,但其只在家中侍奉了几天即赶赴长沙。他至省城后,马上邀集军学界之党人和会党首领蒋翊武、刘承烈、成邦杰、蔡绍南、龚春台、张尧卿等30多人,在水陆洲附近的一只木船上开会,并谓:“奉黄公克强面嘱,革命军发难,以军队与会党同时并举为上策,否则亦必会党发难,军队急为响应之。……今欲规取省城,宜集合会党于省城附近之萍浏醴各县,与运动成熟之军队联合,方可举事。……姑就次策言之:使以会党万人,组成整齐军队,发难于浏醴,而直扑长沙,各军队能反戈相应,占领省垣重地;军械局既为我有,党军得补充而训练之,并择精明强干之会党为便衣敢死队,以手枪炸弹扰害外来敌军后方。而黄公及吾兄等,又正在运动鄂赣宁各省乘时响应,届时自必归来主持一切,可无失败之虞。”^[2]由此可知,刘道一在这次筹划萍浏醴起义的首次会议上,实已强调了以下两大问题:其一,他本人是奉了同盟会主要领导人黄兴之“面嘱”,衔命回国来筹划与主持发动此次起义的;其二,他传达了黄兴关于武装起义的策略思想——分上、次两法,并主张此次谋划起义取其“次策”而行,即须集合萍浏醴等县之各会党组成起义队伍发难,并使这支起义军与运动成熟的军队相联合,一举攻占长沙。与会者经过协商后对此均无异议,遂决定于当年年底湖南清吏封印时起义。为保证这次起义的顺利发动与最后成功,长沙水陆洲会议还对与会者分头运动新军与防营,及联络发动各地会党之事责,作出了明确分工:刘道一于会后留驻长沙掌握全局工作,且负责与同盟会东京本部联系,及

[1] 寄生:《刘道一碑文》,载《民报》第22号,“撰录”第3页;参见《民报》影印合订本第6册,第3259页。

[2] 转见饶怀民编:《刘揆一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69—170页。

与其他一些人运动新军防营届时响应义举；蔡绍南、龚春台等则回家乡萍浏等地联络与组织会党队伍，负责发动此次反清起义，并领义军攻打长沙。

我们从以上所述不难看出：刘道一奉命归国召开主持的水陆洲会议，基本上确定了萍浏醴起义之整个计划和具体部署，他实为这次起义的具体策划者，及发动长沙地区新军防营继起响应之主要负责人。刘当时的行动，系听命于同盟会本部领导人黄兴之安排。众所周知，黄那时任同盟会执行部庶务，“庶务实居协理职。总理缺席时有全权主持会务”。^[1]他指派刘道一等归国时，同盟会总理孙中山正在南洋各地活动，“惟克强先生常川驻同盟会本部”，完全有权代表该会行事；况且水陆洲会又议决了按黄兴主张之第二种办法来组织起义。因此我们应当承认，萍浏醴起义是奉同盟会本部之命发动的第一次反清武装起义。

1906年12月4日，萍浏醴起义提前爆发了。这次起义的仓卒发难，令刘道一措手不及。其因父亲中风，在筹划起义之过程中常将躬亲侍父疾与联络策动军界两事结合进行，以致运动军队的工作尚未完全就绪。起义爆发时刘道一尚在湘潭；其“以萍浏醴之事机迫促，不洩旬即折而之长沙，结好新军以相策应”。然而他回到省城后，才发现“各处未有准备，省城被运动之新军官佐，多有请假与出差而离省者”。面对这种情况，刘只好“一面使同志促其归，一面希望党军来攻长沙，先筹开城响应之策”。由于他先前给东京同盟会本部“所发密电，已为鄂省电局扣留”；清廷湘省当局之“侦者”早就探知了其在长沙“日夜奔忙”联络军界的行踪。“游击熊得寿且误以道一为揆一而逮捕之”，“后知其非是，亦以其所佩章署曰‘锄非’，实与革命之名实相符也，下之臬司狱中”，此为起义爆发后第5天之事也。

刘道一入狱后“知必死”，故有“不如即冒兄名”代兄一死，以使“兄亦得展其志”的想法。他在敌人之公堂上，一次次面对法司的严刑拷问逼供，先后“对薄共九次，……始终无一辞”；只在堂上厉

[1] 参见毛注青：《黄兴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90页。

声呼曰：“士可杀，不可辱，死即死耳！”“至肌肤尽裂，流血遍地”，仍“坚不肯吐”，直至挫败了清吏“欲连多人，兴大狱”的阴谋。最后，其于供词中挥笔“书写满族之残暴，中国之危亡，古今世界政治改革之要略，致数千字。鞠吏皆为咋舌”。^[1]敌人于无奈之下，将烈士“系狱半月，舆之浏阳门杀焉”！^[2]刘揆一在弟弟就义一个多月后写的哀文中说：“丙午十月二十四日（阳历12月9日——笔者注，下同），吾弟炳（秉）生被捕于长沙，系臬司狱”；“吾弟之被戮也，在十一月十六日（阳历12月31日）”，“闻被四刀，始落其首云，……死时年才二十二。”^[3]

孙中山、黄兴和同盟会东京本部同仁，虽较迟才得知萍浏醴起义爆发的消息，但他们却及时采取了积极措施以期能促成它取得胜利。1906年12月12日，当日本东京之报纸披露“萍乡革命党蜂起，已围县城”之消息后，宋教仁即认识到“此当系马福益之同类”，刘揆一也指出起义“是前岁旧同志”所为。在以后的10多天里，宋在日记里曾六七次记录了萍浏醴起义军“占领醴陵、浏阳”的战报，并称赞“湖南革命党益盛”，“革命军接战毫无屈色者”；刘揆一此间则向黄兴请缨——“欲归国起事，或往助湖南之事”，结果是“庆午不劝其去”^[4]。在东京的其他同盟会员，皆“莫不激昂慷慨，怒发冲冠，亟思飞渡内地，身临前敌，与虏拼命，每日到机关部请命投军者甚众”^[5]。孙中山睹此情形也“谓机不可失”；他和黄兴先后派遣梁钟汉、朱子龙、谭人凤，及“宁调元、胡瑛、杨卓林、孙毓筠、段云书、权道涵、廖德璠、李发根诸人，分赴湘、鄂、苏、皖、赣各省，联络军队急图响应”。然而，这些受派归国之党人“远水难救近火”，结果不仅于事无补，还因此行“事机不密，各种计划均为虏督端方所破”，导致“诸人相继就擒，鲜有幸

[1] 饶怀民编：《刘揆一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24、171页。

[2] 饶怀民编：《刘揆一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38、290页。

[3] 饶怀民编：《刘揆一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文集”第3—4页。

[4] 参见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近代史研究室校注：《宋教仁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09—312页。

[5] 黄彦校订：《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2页。

免者”^[1]。

刘道一等策动的萍浏醴起义虽以失败告终,其本人也为此含恨于九泉,但我们对这次起义的重要地位与影响,及刘烈士殉国就义之历史意义,却不可小视。其一,这次声势浩大的起义发生在中国内地,给了清廷当局乃至列强在华势力一次沉重的打击。萍浏醴起义军纪律严明,“专烧杀向来办匪出力士绅人家”,及“只要官吏、当权人物和满洲人的性命。”^[2]他们“蔓延至醴陵、北溪、衡山、宜春、万载等地,令湘、鄂、赣、苏各省督抚为之震动。”面对此种形势,清政府下谕惊呼:“江西、湖南交界地方匪党声势猖獗,着端方、张之洞、岑春蓂速派得力营队,飞飭会剿”;以至各省所出防军之“总数不下四五万人,分赴萍浏醴数县围攻。自洪、杨以来,清军出兵之众,以是役为最”^[3]。而“美、英、日、德等帝国主义各国的军舰,这期间也驶至岳州,为清廷的反革命军事围剿助威壮胆”^[4],此乃受到惊吓后的为虎作伥之举。其二,萍浏醴之役作为同盟会揭开武装反清序幕的首次起义,最早以武装斗争之方式宣示了本党革命政纲,并切实展现出党人勇于为国捐躯的牺牲精神。它不仅因此而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而且还在战略与策略方面,直接影响到同盟会本部日后的武装斗争部署。孙中山和黄兴等鉴于萍浏醴起义之重大影响,正“刺激”着“人心……不可止”,而“长江各省一时不足有为,注重两广首义愈益坚定”^[5]，“故定计南行，……以谋起义。”^[6]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萍浏醴起义是整个辛亥革命运动发展，乃至走向最后胜利的第一块奠基石。刘道一对这场革命之贡献于此可见一斑。

刘道一殉难之凶耗，迟至1907年1月22日才传到日本东京——当日刘揆一收到一封“家信”，内“言刘秉生已被杀云”。而孙中山应

[1] 参见湖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页；又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第6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1、115、108—110、112页。

[2] 参见林家主编：《辛亥革命运动史》，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51页。

[3] 转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第6集，第91、97页。

[4] 参见林家主编：《辛亥革命运动史》，第252页。

[5] 转见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4），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8页。

[6]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21页。

是在往后数日才知此事的。他与同盟会本部同仁对刘烈士之遇害同声悲悼,并为萍浏醴起义的失败而备感痛惜,于是遂决定,以同盟会本部名义召开有会员和留日学生参加的“追悼刘道一烈士大会”。开会前一天的2月2日上午,刘揆一在宋教仁陪同下,专门“至孙逸仙(寓)”。这很可能是为了商量次日为刘道一开悼念会等事。2月3日上午10时,东京党人和留学生的“追悼刘秉生(道一)会”,择定在“南路会场”举行。^[1]孙中山为表达对刘烈士的哀悼,题署了《挽刘道一》诗一首:

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

尚余遗业艰难堪,谁与斯人慷慨同?

塞上秋风嘶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

何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2]

孙中山这首七律诗的首联,借用“五代时长沙马殷,江陵季高兴,武陵周兴逢,皆占据楚地称王,称为三楚”之典^[3],来说明湘赣边此次威震东南起义的失利,及湖南党人刘道一之为国捐躯,导致了这次推倒清廷的计划无法实施,是为中国民主革命一大损失。接下来之颌、颈两联诗句,一方面指出腐朽专制的清廷封建势力尚存在,光复汉业与创建共和民国之事业,因此还任重道远与极显艰难;另一方面则称颂刘烈士奋不顾身和慷慨赴义的践行,已为后继者建树了榜样和楷模,期勉广大党人和志士们应像他那样,将泣哀鸿之情怀化为嘶战马的举动,积极投入反清战斗。末联号召革命者应有岳飞抗金时“直抵黄龙府”(金国之都城,今为吉林省农安县古城)的决心,并以努力奋起之行动去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待到大家痛饮庆功喜酒之日,我们再来挹取江流或洒酒于地,祭祀刘烈士的在天之灵。这整首诗的内容意境

[1] 湖南省哲学社科研究所古近代史研究室校注:《宋教仁日记》,第331—332页。

[2] 转见汤钟琰:《斯诺〈西行漫记〉唐某姓氏事迹考略》,载《青海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3期,第72页。文中所引诗句原未标点,现标点是笔者酌加的。

[3] 参见湖南省湘潭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刘道一烈士——纪念刘道一烈士牺牲八十周年》,湖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151页。另也有说“三楚”,是指《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说的“西楚”、“东楚”和“南楚”三地,“约指今江苏西至湖北、湖南地区”。参见民革武汉市委员会编:《辛亥志士诗词选》,鄂内部图书准印证029号,1991年印行,书内《孙中山诗二首·挽刘道一》页下之注文②。

涵浑辽阔、悲而不伤,由哀惋而转向奋进;作者在诗中既寄托了对刘道一烈士之哀缅思绪,又洋溢出一位革命家激昂的壮志豪情。它的确是一首读后令人化悲哀为力量的好诗。

在辛亥革命胜利之后,孙中山并未忘记刘道一烈士在辛亥革命中的建树,及自己在该挽诗末尾所作过的承诺。他于1912年3月27日,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名义,发布了《命黄兴优恤刘道一令》。其令称:湖南烈士刘道一,岁丙午起义于萍浏醴等处,尽瘁革命,厥功甚伟,“自应准予列入大汉忠烈祠,同享祀典,并将事实宣付国史院立传。应得恤典,仰陆军部查照恤典章程,从优核办,以顺輿情而慰忠魂为要。”^[1]事隔许多年后,孙中山在忆及自己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经历时,还称颂刘烈士为“革命同盟会第一次之流血”者^[2]。

二、孙中山《挽刘道一》诗稿的代撰人为汤增璧

《挽刘道一》诗的著作权属于孙中山,此早已为人们所认同。不过,该诗为孙请人代笔也是事实。我们在承认前者之同时,有必要弄清楚挽诗的撰稿者是何人——唯如此才能还史实的真貌。大陆学界的孙中山全集及其年谱长编之编辑(撰)者,早已关注到了这问题:如果说1981年版《孙中山全集》之编者,在收入《挽刘道一诗》时已在页下注里指出:“一说该诗为他人执笔,待考”的话^[3],那么在10年后出版《孙中山年谱长编》时,其编撰者就在1907年2月3日条目的注中明确说明:“据汤钟琰记述,此诗为乃父汤增璧(揆邦)代拟。”^[4]从目前所见资料与论著来看,年谱长编之撰稿者取汤说,是与史实相符的正确做法。

其一,汤钟琰在介绍其父之生平行谊时谓:“父亲汤增璧,字公介,1881年生于江西萍乡,出身逊清秀才”,为清末“应童子试……的最后一届”,“这一点是很明确的”。因此“他诗文……写得很好”。他还指出:家父“弱冠入南京两江师范,旋以官费留学日本,入早稻田大

[1] 《命黄兴优恤刘道一令》(1912年3月27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86页。

[2] 黄彦校订:《孙中山选集》,第203页。

[3] 参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34页(页下第1个注文)。

[4] 参见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393页(页下注文)。

学攻法律”，“留日时期为1904至1910年间，当不致有误”；他“1905年得黄兴、宋教仁介绍，参加中国同盟会，并佐章太炎氏主编该会会刊《民报》”——“及《民报》出至二十三期，主编人又归章枚叔（即章太炎——琰注），而以汤介公副之。”^[1]汤教授以上的这些文字旨在说明，无论是由汤增璧深厚的国学功底与文字能力方面观之，还是从他与同盟会领导者的公交私谊关系上来看，他都能为孙中山代撰挽诗哀悼刘道一烈士。

其二，汤钟琰在论文中提出了其父增璧代孙中山撰《挽刘道一》诗稿的两项证据：一为实物证据，一为文字证据。其文在叙及实物证据时谓：父亲自辛亥前一年由日本归国后，先后在北京、长沙、萍乡、南昌、南京等地工作过，半生漂泊之境遇均不佳。直到上个世纪30年代，他通过《民报》早期负责人、时任南京国民政府要职之胡汉民的关系，才以“党国元老”（老同盟会会员）身份，在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内任编纂，从而使生活得以安定下来并有了保障。“大概也正是由于有了这个闲职，父亲勿来雅兴，把几幅旧得发霉的名人字画重新裱糊一下，使（家里）那个小客厅顿时装璜得焕然一新。”在这些被裱之字画中，有一幅是老同盟会会员、《民报》前期负责人张继的“手写行书横幅，内容是父亲代撰的孙中山先生挽刘道一诗乙首”；他在横幅中书写完这首七律诗后（诗文前已引用过——引者），“落款为‘右公介仁兄代总理挽刘道一诗，沧州溥泉张继敬书’”等字。该文在谈到该字幅之由来时还指出：“因此诗系中山先生署名，故当时流传颇广。大概先严担心埋没了自己代撰的功绩，故请知情人如张继者书此条幅以证之。”汤教授又在文中叙及其父代孙撰诗的文字证据：“1941年我在重庆教书时，见到官办的正中书局出了一本《革命诗文选》，其中属于孙中山先生名下的，亦列有此诗。父亲看了后找出张继的条幅，叫人拍了照，写了一封信给正中书局转给编者，但似乎没有下文。”他还说道：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由渝返宁，其父曾任职于南京中华民国国史馆，“1948年

[1] 参见汤钟琰：《斯诺〈西行漫记〉唐某姓氏事迹考略》，载《青海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3期，第74、71页。

5月歿于伪国史馆纂修任内”；国史馆在发出的《讣告》及其所附“行状”中，也讲到了其父为孙中山代撰《挽刘道一》诗之事，内有“‘塞上秋风嘶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句，一时传诵士林……。所指本此。”^[1]

笔者相信汤教授上述文字叙事之真实性，因为从汤增璧后以“揆掷”笔名写的、发表在《民报》第25号上之《刘道一》传里，不仅可以了解到他与刘道一的密切关系，及其代孙撰挽刘烈士诗之思想动因，而且更从中读到了该诗的意境内容，并发现传与诗这两者间在遣词造句之手法上，也颇多似同。^[2]我们从该传记中，既可以读到孙先生《挽刘道一》诗中的思想内容，又能见到该诗里所用的一些词语，如“三楚”、“慷慨”、“谁与”、“斯人”、“马嘶北风”、“东南半壁”等。显然，无论从叙事内容之意境还是遣词造句的手法来看，皆可断定《挽刘道一》诗与《刘道一》传，是同出自汤增璧之手。

有些人称孙的《挽刘道一》诗乃为黄兴代笔。^[3]这种说法错就错在此臆想与史实不合。这可从两方面来说明之：第一，从刘道一在长沙被捕遇害，到东京同盟会为他举行追悼会这段时间，黄兴一直在香港公干，根本不在东京，他不可能代孙中山写诗哀悼刘烈士。第二，黄兴稍后为刘道一所写之哀悼诗，与孙中山这首挽诗的意境和风格迥异，两诗不可能出自一人之手。黄兴于1907年2月15日返抵东京后，得知刘道一在萍浏醴起义中为党牺牲之事，曾与揆一“相抱痛哭曰：‘吾每计议革命，惟伊独能周详；且精通英语，辩才无碍，又为将来外交之绝好人才，奈何即死是役耶！’”他旋为刘烈士补作“七律一首哀挽之。诗云：‘英雄无命哭刘郎，惨澹中原侠骨香。我未吞胡恢汉业，君先悬首看吴荒。啾啾赤子天何意，猎猎黄旗日有光。眼底人才思国士，万方多难立苍茫。’”^[4]此诗与孙挽刘诗的意蕴格调完全不同，它们

[1] 参见汤钟琰：《斯诺〈西行漫记〉唐某姓氏事迹考略》，载《青海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3期，第72—73页。

[2] 详见揆郑：《刘道一》，载《民报》第25号，“附录”第1—11页；又见《民报》影印合订本第6册，总第3999—4009页。

[3] 参见〔美〕薛君度著，杨慎之译：《黄兴与中国革命》，第293页；徐文烈：《柳亚子谈孙中山的诗》文后的《编者附言》，《羊城晚报》1982年4月2日（第3版）。

[4] 转见毛注青：《黄兴年谱长编》，第114页。

绝非一人所撰。

另外,汤钟琰在文中称其父代笔写此挽诗,是“黄兴奉孙中山之命属先严代撰的。”^[1] 这种说法也无法成立。汤增璧曾在同盟会的宣传部门中任过重要职务,又在东京一度与黄兴同居一室,彼此之关系的确甚密切。不过诚如上述,汤代孙中山撰挽刘诗时,黄兴根本就不在东京,孙中山绝不可能要远在香港的他去请汤代笔写诗。如果说当时有人请汤为孙中山代笔的话,笔者推断那这个人应是刘揆一。因为揆一当时为悼念为国捐躯的胞弟,一方面积极筹划开个追悼会纪念他,另一方面则一心想留下些缅怀亡弟的文字——他本人为此写下了一些悼念胞弟的诗与文,其又先后两三次找过湖南老乡、曾是华兴会发起人之一的章士钊,“言欲为其弟秉生作传”事,期间还托好友宋教仁去过章寓说项,结果章氏之回答是“不诺作”和“仍不应”;宋最后不想在刘为弟立传这件事上“重违其意,遂允之”。在刘揆一的催促下,宋教仁虽于1907年2月21日“与之同拟定”了写刘道一传之“题目章法”,但一个月后他却受黄兴之命前“往满洲”联络“马贼”去了。这令其先前“允诺”为刘道一作传一事,终未兑现完成。^[2] 从刘揆一为替弟立传事多方奔劳,及其在开追悼会前曾与宋教仁一起去拜访过孙中山,再加上他兄弟俩又与汤增璧稔熟且颇有交情等种种迹象来看,笔者认为揆一找汤为孙中山代撰《挽刘道一》诗一首,是完全有可能且为顺理成章的事。

汤增璧为何乐意接受代孙中山撰挽诗,及为刘烈士写传的任务呢?事实上,受人之托只是汤增璧代孙撰《挽刘道一》诗及为刘烈士作传的外因,其内因才是起主要决定作用的因素——也就是说,代孙撰挽诗与写刘烈士传这两件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汤增璧与刘氏兄弟间之深厚交谊决定的。从汤所撰之《刘道一》中,完全可以看到其与刘道一间的革命友谊和密切关系。他在该传之“绪论”里说到与道一之深交,及刘子和杨卓林死义的价值时谓:“刘子居日本,论交慷慨,

[1] 参见汤钟琰:《斯诺〈西行漫记〉唐某姓氏事迹考略》,载《青海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3期,第73页。

[2] 参见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古近代史研究室校注:《宋教仁日记》,第329、339、341、345、347页。

为国仓皇，盖余心契焉”；“悲夫，云敛天末，洞庭始波，旧游如梦，望断征鸿，刘杨二子侠骨固有余馨也。”他在谈到自己对刘等死难同志的追思缅怀之情时说：“余悲刘子之材智而不寿也。”“惟余知交零落，心折二子如是终焉，余悲何及？”“屈原大招之赋，庾信思旧之篇，不足尽吾哀也！”他在论及为刘烈士写诗作传之缘故与目的时，还用《诗·小雅》中“脊令在原，兄弟急难”之典^[1]，来说明这是为了悼念仙逝的革命兄弟。其文曰：“朔风凄紧，落日荒凉，有楼滨海，有潮声呜咽于下。……客来道，刘子生前瑰奇，死后悽惻，脊令之苦声也。余为记之”；“综厥生平以告于世，杀胡儿之魄，而慰在天之灵。余也后死，责何能贷？”^[2]正是上述字里行间洋溢出来的缅怀革命兄弟刘道一的情谊与责任，促使汤增璧欣然命笔为刘烈士写诗和作传。

三、孙中山《挽刘道一》诗几种版本的正误问题

七律《挽刘道一》因由孙中山署名，故它在一个多世纪来流传颇广，并在辗转传抄与出版的过程中，先后出现了几个不同版本，其中之讹误也在所难免。下文先将见得较多的几种不同版本罗列出来，然后再就其正误问题谈些看法，以请教于方家。

就目前所见，该诗最早于孙中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当天——1912年元月1日，公开发表在上海的《民立报》上。其原标题为《孙大总统旧作（吊刘道一）》，诗文写道：

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

尚余遗孽艰难堪，谁与斯人慷慨同？

塞上秋风嘶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

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蓼公。^[3]

此姑且称之为“民立报刊出版”。该报为何当日要登载此诗？其所据版本又来自哪里——由谁提供的诗稿文字？皆尚弄不清楚。从

[1] 转见湖南省湘潭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刘道一烈士——纪念刘道一烈士牺牲八十周年》，第144页。

[2] 揆郑：《刘道一》，载《民报》第25号，“附录”第1—2页；又见《民报》影印合订本第6册，总第3999—4000页。

[3] 《孙大总统旧作（吊刘道一）》，载上海《民立报》1912年1月1日第7页之“杂录部·文苑”。原诗刊出时无标点，此处之标点乃笔者酌加的。

《民立报》那天共登出了来自海内外各方的21封“恭贺孙大总统电报”来看，^[1]笔者认为它很可能是作为贺喜之诗文作品来刊发的。这从该诗登在报纸第7页之“文苑”栏内，似可找到某些证明。至于该诗底稿之提供者，笔者推测这或许与时任该报主编的宋教仁有关。因宋乃追悼刘道一大会的筹划与参加者之一，对此挽诗颇为熟悉。台湾版之《国父全集》，及大陆中华书局出的《孙中山全集》第1卷与《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在收入孙《挽刘道一》诗时，都是用的这个版本（台版的《国父年谱》及其增订本，均未收编此诗）。^[2]是为其第一个版本。

前文已引过的张继“敬书”此诗条幅上所录之诗文，可视为《挽刘道一》诗的第二个版本，姑称它为“张继敬书版”。关于张氏书录此诗的时间，现一时很难具体确定，因其所“敬书”的字幅已找不到了；而汤钟琰教授在忆述中谈到这个问题时又说：张在所书诗文条幅之落款中，“还有年月日，我已记不得了。”^[3]不过，他同时又强调说明：上世纪30年代其父亲在南京任国民党党史会编撰，将珍藏的几幅“名人字画”拿出来“重新裱糊一下”时，其纸张已“旧得发霉”了。依据此情况来推断，笔者认为汤增璧请张继为其书录这代孙所拟诗稿之时间，应是他们仍在日本留学时，亦即其1910年回国前之可能性大。因汤与张这期间既是东京早稻田大学的同学，又先后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社中担负过重要工作。两位志同道合之年轻人，这期间在一起相处的时间甚多；相反，汤在1910年归国后，于奔波颠连中几乎难有与张继见面的机会。也就是说，张回国应汤之请而“敬录”此挽诗的可能性不大。

孙《挽刘道一》哀诗的第三个版本，是“章士钊所书版”。1917年，刘揆一所编之《衡山正气集》（此书是刘为纪念亡弟殉国10周年，将征集到的悼念烈士诗文编辑而成的）印出时，章士钊为它手书了一张

[1] 参见桑兵主编，赵立彬编：《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第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93—99页。

[2] 参见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编：《国父全集》第4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3年版，第1394页；广东省社科院历史室等3单位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34页；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393页。

[3] 汤钟琰：《斯诺〈西行漫记〉唐某姓氏事迹考略》，载《青海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3期，第73页。

《挽刘道一》诗的字幅：

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
尚余残局艰难堪，谁与斯人慷慨同。
塞上秋风嘶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
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

该字幅末之落款是：“孙文作、章士钊书，民国六年元月”。1929年创刊的《江苏革命博物馆月刊》第1卷第1期收入之孙《挽刘道一烈士》诗，用的就是这个版本；湖南省湘潭市的“刘道一烈士祠”，正厅右方悬贴之孙中山挽诗用的也是它。还有刘烈士后人写的一些纪念文章，如刘安鼐之《回忆我的父亲刘揆一》等，在引用孙的挽诗时皆用此版本。^[1]

此外，我们从胡汉民1930年编出的《总理全集》中，还可见到孙悼刘道一诗的第四个版本：

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
尚余遗孽艰难堪，谁与斯人慷慨同。
塞上秋风悲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
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2]

台湾国民党党史会编辑出版的传记《刘道一》，开头所引的“国父中山先生挽刘烈士道一的诗”，用的正是这个版本。^[3]另有些公开出版的诗文选收入此诗时，也多采用该版本。如1914年胡怀琛编、由上海广益书局出版的《中华民国名人诗选》（上），1941年重庆正中书局印行的《革命诗文选》，1963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编的、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近代诗选》，“民革”武汉市委员会选编、1991年内部印行的《辛亥志士诗词选》等，皆是如此。还有一些著作与文章，如李新主编的、由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的《中华民国史》第1编上册，及《羊城

[1] 刘揆一编：《衡山正气集》，1917年刊行本插页，原件藏湖南省博物馆；又转见湖南省湘潭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刘道一烈士——纪念刘道一烈士牺牲八十周年》，书前插页3，前言第3页，正文第3、253页，及饶怀民编：《刘揆一集》，第283页。章士钊所书字幅中的诗文无标点，此处按《刘揆一烈士》刊出此诗的标点。

[2] 胡汉民编：《总理全集》（上）第1集“杂著”，上海书局1990年版（本书据民智书局1930年版影印版），第1061—1062页。

[3] 参见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编，黄季陆主编：《革命人物志》第6集，第435页。

晚报》于1980年3月5日和4月2日，先后刊出的《孙中山的两首诗》和《柳亚子谈孙中山的诗》，及中国新闻社编、中国展望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辛亥风云》内之《革命先烈刘道一》等，在征引孙《挽刘道一》诗时，也都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从以上所引出的几版诗文中，可以看到它们的文字大体相同，明显的文字差异主要有以下三处：

第一处不同在诗文颔联之头句里——其三四两字有“遣孽”（民立报刊出版）、“遗业”（张继敬书版）、“残局”（章士钊所书版）之别；另据台湾《国父全集》的编者说，在国民党党史会收藏之《中华民国诗选三百首》卷4中的《吊刘道一》“单页”（藏件054/21）里，还发现这两个字有“作‘遗策’”者^[1]。在此诗里，“遣孽”乃指留存下来的邪（罪）恶势力，即是以清廷权贵为首的反动势力；“遗业”则更为明确，指的就是前引黄兴诗中所说的“吞胡恢汉业”，即未完成的反清民主革命事业。就全句之内容来解，虽然此处用“遣孽”或“遗业”皆说得通，但显然以后者更好些。而关键在于：汤增璧本人认同了张继所“敬书”之字幅里的“遗业”两字，故笔者认定当以此为是。“残局”通常是指象棋尚未下完的棋局，以之来比喻当时的反清革命斗争，既不当又令人费解；而用“遗策”则更是叫人难以理解。此皆是在转抄中出现的讹误。

第二处不同在诗文的颈联中——内有“嘶战马”（前三种版本同）和“悲战马”（胡汉民编《总理全集》本版）之别。这“嘶”与“悲”的一字之差，可以影响到诗文的格调，乃至全诗前后内容和意境之贯通。以诗法论之，此处当作“嘶”字为是。

第三处不同出现在诗文末联之头句：有“何时”（张继敬书版）与“几时”之别。“何”与“几”在这里可解为“什么”的意思，都讲得通。不过，“何”是疑问代词，而“几”则为询问数词，一般指大于2而小于10之数字。从全诗内容来看，既然刘烈士留下了“艰难堪”的未完革命事业，那后人要完成它——以竟其全功之时间，自然是难于确定为

[1] 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编：《国父全集》第4册，第1394页注文②。

哪年哪月，故此处用“何时”好些。还有，查阅孙中山的著作可知，他在萍浏醴起义前，曾几次谈到和认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预计要二三十年才会成功。^[1]也就是说，其在1907年要人请汤增璧代撰《挽刘道一》诗时，并没有想到自己领导的这场革命运动，能在短短的几年内获得胜利。由此看来，孙挽刘诗中之时间指代，应用“何时”一词为恰当。

通过以上的叙述辨析，笔者觉得孙中山署名的《挽刘道一》诗，应以代笔者汤增璧本人一直珍藏在身边的、由张继“敬书”之全诗，为其正版之作，也就是说，其诗文以前文已引的“张继敬书版”为准。至于目前台湾版《国父全集》第4册，及大陆中华书局版《孙中山全集》第1卷等所收入的“民立报刊出版”，则可视为该诗的同题异文。

（作者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1] 参见黄彦校订《孙中山选集》，第548、583页；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267—268、265页。

郭泰祺与孙中山伦敦蒙难纪念室的创建

——兼论孙中山伦敦蒙难事件在不同时期的政治意义

蒋 耘

[内容提要]

中国职业外交家郭泰祺在其出使英伦期间,1933年在中国驻英使馆孙中山当年被囚禁的小屋内创建了孙中山先生伦敦蒙难纪念室,并亲撰《孙中山先生伦敦蒙难纪念室记》。这一举动,既表达了郭泰祺对孙中山的追怀之情,也与当时国民党当局推行孙中山个人崇拜的造神运动相契合,更符合了在我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秋唤醒国人以不屈不挠之精神抱救国救民之志共御外侮的需要。此后,孙中山伦敦蒙难纪念室一直保留至今,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关键词]

郭泰祺 孙中山 伦敦蒙难纪念室的创建 伦敦蒙难事件的政治意义

郭泰祺(1888—1952),字复初,湖北省广济县(今武穴市)人。1932年9月出任中国驻英公使,1935年5月升任中国驻英全权大使,1941年4月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在出使英伦期间,他在中国驻英使馆内创建了孙中山先生伦敦蒙难纪念室。本文试图再现当年孙中山先生伦敦蒙难纪念室创建的概貌,并就其政治意义给以解读。

一、郭泰祺创建孙中山伦敦蒙难纪念室的背景

孙中山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之一,在民国建立后受到民众的普遍尊敬。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后,社会各界反响空前强烈,就连政敌——北京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在孙中山逝世当日出席国务会议时,“闻报立命散会,并停止办公,下半旗志哀,诸阁员亦诣灵床吊唁”,

同时发布《临时执政段祺瑞恤令》，高度评价孙中山对中华民族与国家的贡献。^[1]正在欧洲考察的段祺瑞的“军师”徐树铮也从国外发回了挽联：“百年之政，孰若民先，曷居乎一言而兴，一言而丧；十稔以还，使无公在，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北京政府对孙中山一生的高度评价和对孙中山逝世的快速反应，更提高了孙中山的威望。

国民党乘势积极利用葬礼塑造孙中山政治象征符号，全面提升孙中山的地位，并力图垄断和独占孙中山的政治遗产。3月12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告尊孙中山为导师，国民党要员吴铁城唁电称孙中山为“国父”，表示“总理虽死，主义不死”^[2]。各地方党部亦纷纷致电，一致将孙中山定位为民国缔造者与民族主义的导师。各地党部在追悼会上散发《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建国方略》、《遗嘱》、《中山先生事略》等传单，进一步扩大了孙中山的影响，丰富和强化了孙中山政治象征的内涵。3月21日，胡汉民、杨希闵、谭延闿、许崇智等留在广东的国民党要员联名发表宣言：“孙大元帅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载。汉民等服膺主义，追随奋斗，亦既有年。今大元帅不幸薨逝，汉民等痛丧国父，此后之责任益重，一惟秉承孙大元帅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遗嘱，努力继续进行，以期贯彻主义，无负在天之灵，而告无罪于民众。在国民会议未实现，中华民国合法政府未成立前，所有一切制度设施，汉民等仍敬谨赓续孙大元帅成规，戮力同心，并期有以发扬光大，以完成国民工作。……一息尚存，此志不懈。”^[3]4月14日，国民党党报《广州民国日报》发表社论《这是孙先生给我们的遗产》，写道：“从前国人只认识国民党有一个孙中山，但如今却认识有一个国民党了。从前国民党始终为主义奋斗的只有一个孙先生，但如今为主义奋斗的，却有全数的国民党员了。……现在孙中山死了，国民党不惟不死，反化为五十万

[1] 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处编：《哀思录》第一编，卷七、治丧报告，乙、治丧经过，第2页，上海1926年版。

[2] 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处编：《哀思录》第二编，卷二、吊唁函电，乙、唁电，第1页，上海1926年版。

[3] 《胡汉民等继承孙中山遗志完成国民革命宣言》（1925年3月2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66页。

的孙中山。”^[1]国民党意图通过上述宣传,确立这样的意象:孙中山等同于国民党,国民党是孙中山的唯一合法继承者,国民党是未来中国的合法领导者。

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国民党不断抬升“总理遗嘱”与“总理遗教”的地位,将孙中山崇拜作为该党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指导方针。5月,国民党召开一届三中全会,通过《接受总理遗嘱宣言》,宣示“完全接受总理遗嘱”,“牺牲一切自由及权利,努力为民族平等、国家独立而奋斗”,并规定“吾人一致奉行总理遗教,不得有所特创”。总理遗教成了该党不可逾越的信条,固化和神化了孙中山思想,不容许有任何的创新和发展。而且,该宣言规定,国民党除由选举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任执行之责外,不能更有总理”^[2]。“总理”成为孙中山独有的特定称号,即便后来蒋介石地位上升,他也不得不避讳“总理”,而另设“总裁”一职。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全国代表大会仅以至诚接受总理遗嘱并努力以履行之案”,决定在“粤秀山顶建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接受总理遗嘱纪念碑”^[3]。同时,在党章中保留《第四章总理》“以为本党永久之纪念”,并将纪念仪式及总理纪念周写进党章附注^[4]。1929年3月,国民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总理遗教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根本法,并通过决议:“本党党员之努力,一以总理全部之遗教为准则。”“举凡国家建设之规模,人权、民权之根本原则与分际,政府权力与其组织之纲要,及行使政权之方法,皆须以总理遗教为依归”,“全国人民之民族生活与国家生存发展,皆统一于总理之遗教之下。凡我同志及全国国民,皆宜恪守勿渝者也。”^[5]

[1] 秋霖:《这是孙先生给我们的遗产》,《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4月14日。

[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全宗档案七一一(4)/521。

[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全宗档案七一一(5)/143;《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89页。

[4] 《中国国民党党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全宗档案七一一(5)/143。

[5] 《根据总理教义编制过去一切党之法令规章以成一贯系统:确定总理主要遗教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根本法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全宗档案七一一(5)/146。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执政的国民党还从教育、出版、设置纪念日、例行总理纪念周、举行纪念仪式、建设中山纪念空间等多方面建构孙中山伟人形象,将孙中山符号由党内推向全国,利用孙中山符号建构整合国家与民族的象征性权威,制造和推动孙中山崇拜,藉以动员和控制民众,进而达成树立该党权威、巩固一党专制的政治目的。一时间出现了孙中山崇拜运动。

最具代表性的纪念仪式是1929年6月1日的孙中山奉安大典。国民党为此做了精心的筹划和周密的安排,当孙中山灵柩从北京迁移南京时,各地党部沿途展开了广泛的宣传与社会动员,南京为迎接对城市进行了全面改造。隆重的奉安仪式规模空前,既有旧式帝王葬礼的崇隆,又超越了传统帝王在时间、空间及社会影响等方面的局限,将孙中山移陵推向高潮,成为震撼全国的无与伦比的神圣的国家葬礼,从而凸显出孙中山的精神领袖地位,进而将这一政治象征全面展现给社会大众。以后,又设立奉安纪念日,并将谒陵仪式日常化,藉以强化人们对孙中山的崇拜心理。

具有代表性的中山纪念空间,除了专门敬谒孙中山的中山陵外,还有遍布各地的孙中山塑像、中山纪念碑、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和中山纪念室。而且中山纪念室较中山纪念堂简单易建,迅速成为民众接受意识形态宣传与举行活动的便利场所。

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纪念日,有总理诞辰纪念日、伦敦蒙难纪念日、广州蒙难纪念日等。伦敦蒙难是指孙中山1896年10月11日在位于伦敦波特兰街49—51号的清廷驻英使馆被清公使诱捕、拘禁之难。后经英国友人康德黎帮助,诉诸英国舆论,孙中山最终由英国政府出面与清使馆交涉而脱险,此次蒙难历时12天。^[1]此一事件使孙中山名声大振,加之出版《伦敦被难记》一书^[2],孙中山革命英雄形象逐渐在海内外传播。广州蒙难是指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公然叛变,发动兵变,炮轰总统府和粤秀楼。宋庆龄在千钧一发之际,让孙中山先避

[1] 关于伦敦蒙难事件真相,学界一直存在3种说法:清驻英使馆人员设计诱入囚禁说、孙中山自进使馆说及绑架说。

[2] 孙中山:《伦敦被难记》,原文为英文, *Kidnapped in London*, 甘作霖译,商务印书馆1912年5月版,后三民书店等再版。

走中山舰,令人折服其表现出的镇定和勇于牺牲的精神。这次是孙中山和宋庆龄夫妇共同经历的生死时刻。国民党执政后,11月12日总理诞辰纪念日、10月11日孙中山伦敦蒙难纪念日、6月16日广州蒙难纪念日被纳入革命纪念日体系。1930年,国民党通过革命纪念日修订方案,将革命纪念日分为“国定”和“本党”两类,总理诞辰纪念日仍为国定纪念日,伦敦蒙难与广州蒙难、首次起义纪念日则改为党内纪念日,纪念仪式仅在党内进行,由各地党部召集党员开会,但各机关团体学校需派代表参加,不放假。国民党执政时期,共有19个国定与党定纪念日。

儿童成为孙中山纪念日活动的重要宣传对象。《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规定,对幼稚园儿童及小学生要进行“各种纪念会之讲解,以启发儿童爱民族、爱国家之精神”^[1]。为加深学生对孙中山英雄形象的记忆,教育部将孙中山伦敦蒙难等事迹收入小学课本。课文《中山伦敦蒙难纪念》写道:“十月十一日,是中山伦敦蒙难纪念日。中山伦敦蒙难,靠着老师援救才得脱险。”课文还配有孙中山在伦敦被拘房屋的画面。课文后附有思考题:“中山起义失败后,为什么毫不灰心?我们对于中山为革命而被难,有何感想?”同时,还有课后作业:“(1)参考中山伦敦被难的历史。(2)设计中山伦敦蒙难纪念会。”^[2]借此引导小学生崇拜孙中山。此外,教育部社会教育司还令各学校、社教机关购置百代公司灌制的“总理蒙难”大鼓唱片,并组织学生编演孙中山伦敦蒙难剧目。著名儿童读物《小朋友》也刊登《总理伦敦蒙难纪念》等文章,让儿童都能了解伟大的总理孙中山。^[3]因而,孙中山伦敦蒙难已经成为小学生普遍熟知的故事。

伦敦蒙难具有传奇色彩,成为鼓书艺人说唱的内容,曾流传的词本就有《总理伦敦蒙难》和《总理伦敦蒙难记》等。^[4]这些民间艺人的说唱有利于向下层民众传输孙中山的英雄形象。国内发行量最大的

[1]《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1931年9月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032页。

[2]董文编:《社会课本》(初小用)第5册第8课,1935年第43版。

[3]林嫣琰:《演讲台:总理伦敦蒙难纪念》,《小朋友》1930年总第433期。

[4]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版,第314页。

报纸《申报》，也刊登宣传孙中山伦敦蒙难的文章《先总理伦敦蒙难实录》^[1]，更扩大了孙中山伦敦蒙难纪念的社会影响。

二、郭泰祺创建孙中山伦敦蒙难纪念室并亲撰“蒙难纪念室记”

在此推行孙中山崇拜的大背景下，郭泰祺前往伦敦就任中国驻英公使。而且，郭泰祺是中国驻外使节中为数不多的与国民党有着特殊渊源的人。

郭泰祺早年被张之洞选派美国公费留学，先后完成中学和大学教育，最终获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郭在美国得知后，即于1912年3月回国。他经同乡并有亲戚关系时任湖北军政府秘书长饶汉祥的介绍，担任湖北军政府的外交股长，从此步入外交界。1912年3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郭泰祺在王世杰的介绍下加入了国民党。1914年，黎元洪到北京就任副总统，郭随同前往并任其英文秘书，曾力阻黎元洪接受袁世凯武毅亲王的封号。1916年，黎元洪继任总统，郭任总统府高等顾问，兼外交部参事。其间，郭泰祺与时任外交总长的伍廷芳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伍廷芳非常赏识郭泰祺的能力与才干，将大量的实际外交事务交给自己的儿子伍朝枢和郭泰祺打理，这为郭泰祺以后在外交界立足打下了基础。1917年张勋复辟以后，郭泰祺在伍廷芳带领下南下广州，参加了孙中山组织的护法运动，担任护法军政府参事及外交次长。1918年初，郭泰祺、陈友仁及王正廷被派往美国，以争取美国对广州护法军政府的支持，但劳而无功。1919年1月，巴黎和会召开，护法军政府派他们三人为代表参加会议，但因耽误行期，郭泰祺与陈友仁未能及时赶到，而王因如期抵达巴黎，被任命为正式代表，郭与陈则充当了代表团的专门委员。和会在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操纵下，不顾中国也是胜利国，竟然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交给日本继承，要求中国代表团在协定上签字，郭泰祺极力阻止代表团在和约上签字。^[2]1920年11月，孙中山偕伍廷芳、唐绍仪由上海至广州，再次揭起护法大旗，重组军政府，郭泰祺任军政府

[1]《先总理伦敦蒙难实录》，《申报》1929年10月27日。

[2] 陶仁人：《被“遗忘”的民国外交家——郭泰祺》，《钟山风雨》2006年第5期，第39页。

参事兼宣传局局长。1921年5月,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郭泰祺任总统府参事。1922年4月,伍廷芳接任广东省省长,郭泰祺应邀任省政务厅厅长。1923年郭又在伍朝枢手下任外交部次长,直到1924年被派任国立武昌商科大学校长。因而,郭泰祺与国民党有着很深的渊源,而且,曾经直接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运动,是一个国民党籍的“资深”外交家。

1927年元旦,随着北伐形势的好转,国民政府迁都武汉。3月,北伐军到达上海一带,外交部长陈友仁派郭泰祺前往上海了解情况,为外交工作做准备。当时,蒋介石拥兵自重,在南京另立政府,形成宁汉对立局面。郭到上海后审时度势,未经武汉国民政府同意,私自接受蒋介石的委任,出任江苏省交涉员兼上海政治委员会委员,替蒋介石与外国人办交涉,最终打消了列强对蒋介石的疑虑,使列强同意蒋介石的军队借道租界进行“清党”^[1]。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议决永远开除郭泰祺党籍,并明令通缉,但宁汉合流后,此案不了了之。1927年5月,伍朝枢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外交部长,随即提名郭泰祺为外交部次长,同时仍兼上海交涉员。当时南京惨案刚刚发生不久,英、美列强与南京国民政府关系紧张,清党之后的国民政府又急需与苏联以外的列强建立友好关系,上海俨然成为一个无形的外交中心。郭泰祺以其“和蔼的态度,耐烦的性情,有立场却带人情味的辞令”^[2],在对外交涉上获取了不少的便利。

同年8月,蒋介石以退为进宣布下野,时任上海特别市市长的黄郛与蒋共进退。翌年2月,蒋介石重新上台后,黄郛被任命为外交部长,郭泰祺则被免职,一度仕途黯然失势,遂追随汪精卫反蒋。“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局风云变幻。1932年1月25日,任职不到一个月的孙科内阁因无力应付当时复杂的内外局面而辞职。蒋汪再次妥协,汪精卫任行政院长,由司法行政部部长罗文干兼任外交部长。“一·二八”事件爆发,为了应付中日间的紧张局面,郭泰祺被任命为外交部政务次长兼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作为中方首席代表参加

[1] 白崇禧:《悼念郭复初先生》,《中央日报》1952年3月16日第3版。

[2] 陶仁人:《被“遗忘”的民国外交家——郭泰祺》,《钟山风雨》2006年第5期,第39页。

中日停战会议谈判,希望利用郭泰祺与驻上海的英、美等国领事间的私人友谊请其出面调解中日冲突。经过英、美领事的居中调解,中日双方最终达成妥协的《淞沪停战协定》,郭泰祺代表中方在协定上签字。1932年,郭泰祺被任命为中国驻国联首席代表兼任英国公使。从1932年9月受命使西到1941年4月奉命担任外交部长回国,是郭泰祺外交生涯中最辉煌的时期。

郭泰祺来到英国后,工作之余经常会到使馆内那间当年囚禁过孙中山的小屋去看看,睹物思人,眼前时时掠过孙中山为革命奋斗的情景,脑海中不断想起自己追随孙中山护法的日子,感慨万千,害怕隐没了这一“总理革命事业成功之关键”地,决定加以修葺,以示后人,但又不敢过事铺设,害怕“有失阖户之真,而迷总理刻苦之意”。他觉得,在日寇入侵东北,我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秋,更应唤醒国人,卧薪尝胆,以不屈不挠之精神,抱救国救民之志,凝聚民族力量,共御外侮。所以,他于1933年在孙中山伦敦蒙难实地设立了纪念室^[1],并亲撰《孙中山先生伦敦蒙难纪念室记》,全文如下:

孙中山先生伦敦蒙难纪念室记

先总理孙中山先生于民国纪元前十六年(公历一八九六年)由美至英。清驻使龚照瑗先得驻美使馆电告,与英参赞乌凯尼谋命粤人邓廷铿诱至使馆内,防范甚严,声气隔绝,势甚危迫。因馆役柯尔之力,由其妻密投书于总理业师康德黎氏,商诸其友曼生爵士,竭力营救,卒赖舆论之督责,英政府以破坏国际惯例侵越英国主权为掣,向清公使严重交涉,始获释放,计自十月十一日蒙难至二十三日脱险时,凡十有二日。

或者总理生平倡导革命,历经艰危,固无时无地不在奋斗中,而斯役之所以著闻于世者,其自著伦敦蒙难记有云:“予之政治生涯实始于是年,予之以奔走国事而姓名腾诸英之口实始于是地。”是则伦敦之厄,不啻总理革命事业之一大关键,非徒事出异邦易耸视听而见称也。

泰祺秉节使英,公余常来斯室,睹兹遗迹,向往弥深,念昔追随之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郭泰祺个人全宗档案 三〇四八/316。

情,不胜隐没之惧,爰加修葺,用垂纪念。既以苴履留苏,不敢过事铺设,盖恐有失阖户之真,而迷总理刻苦之意也。嗟乎!哲人云亡,簪粟维深,而强寇侵袭,东北沦陷,诚我民族危急存亡之秋,亦即志士卧薪尝胆之日也。泰祺谬列樽俎,期伸正义,式救靡术,惕勤有训,凡国人之来斯室者,于景仰之余,追怀总理当日救国救民之宏旨,不屈不挠之精神,其亦知所以。兴手是为记。^[1]

郭泰祺创设孙中山伦敦蒙难纪念室之举,既表达了哀思和崇敬之情,又达到了教育后人、激励国人的作用,可谓是一创举,具体地讲,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把孙中山个人崇拜推到了海外,而且是在孙中山蒙难之地——孙中山个人英雄形象的构建之地;二是他首先认识到“孙中山”可以成为动员全民族抗日的政治象征。他的做法,在海外得到了陆征祥的赞同和实际行动的应和。

陆征祥(1872—1949),字子欣,上海人,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家。曾当过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和总理,在袁世凯的逼迫下,与日本签署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由此背上了“卖国贼”的骂名。然而,大错铸成之后,在以后的日子里,陆征祥带着强烈的负罪感,走上了一条漫漫的忏悔之路。1926年,其比利时籍妻子培德女士病逝后,他辞去了中国驻瑞士公使一职,不久,于比利时布鲁日的圣安德诺修道院出家。从此,脱离红尘当上了一名洋和尚。但祖国在他心里还一直不能忘怀。

1933年,陆征祥得知郭泰祺兴建总理伦敦蒙难纪念室后,印刷“万众一心”信笺50份,请郭泰祺“代留中山纪念室,并恳分神转送参观纪念室之青年同胞,聊表祥追念先人先师之私,尤深感篆殁存均有荣光焉。”并提出,“此次邮送刊物国联各会员国及驻外使领馆等,所费邮资至五千方比币之巨数”,请郭“慨募少许,以清拖欠”^[2]。

信笺正面四角分立印有“毋忘国耻”四字,正中间一颗红心图案中书有“万众一心”四个大字。信笺背面上方印有如下字样:

[1] 岑会朝1938年7月2日游览伦敦时抄录下的郭泰祺所撰“孙中山先生伦敦蒙难纪念室记”,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宋子文档案Box 29 folder 18。

[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郭泰祺个人全宗档案 三〇四八/316。

本院印字馆学习生林鸣奎君顷以万众一心箋封百份见贻。祥受而存之,深有感焉。窃思辛亥革命以迄于今,我一人革其面而未革其心,万众一心之语殆革心之谓乎!林生语重心长,齿虽幼而用意弥堪嘉尚,特弁数语以示鼓励而自惕厉。

中华民国二十年十月君王瞻礼日

本笃会修士陆征祥识于圣安得肋修院之慕庐^[1]

同年8月,郭泰祺为感谢陆征祥,赠比币二千方,并致跋陆征祥,全文如下:

跋陆先生所赠捐字

右陆子暨先生:

所集泰山经石峪字,先生迎方息影欧陆,潜心性理,集兹四字有所寄也。窃思总理推民胞物与之怀,创卓古铄今之业,是乃体天地心普万物之心而发挥光大之故。历经险阻,卒底于成功。子曰:大人者天地含其德日月合其明,其斯之谓乎,爰以张诸蒙难纪念室中,记缀数语,用崇总理之伟大。

民国二十二年秋八月广济郭○○谨识^[2]

1934年,国民党中央拨款修葺孙中山伦敦蒙难纪念室,并在《中央日报》上刊发文章予以报道宣传。^[3]

1935年11月,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骆介子等25人提出“备资赎回伦敦总理蒙难遗址,改建中山纪念堂,以资景仰而垂纪念案”。会议决议:“交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转国民政府设法办理。”^[4]随后,外交部奉令询问驻英使馆意见。1936年3月23日,李铁铮代郭泰祺拟写复外交部呈,全文节略如下:

案奉大部庶25字第四〇三号及一二二七号训令:以据骆介子向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议,复向行政院补呈意见请备资赎回伦敦总理蒙难遗址一案。嘱并案筹划呈候核夺。等因。查总理伦敦蒙难地点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郭泰祺个人全宗档案 三〇四八/316。

[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郭泰祺个人全宗档案 三〇四八/316。

[3] 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构建与传播》,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版,第304页。

[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全宗档案 七一—(4)/142。

即在本馆三楼之一室,泰祺就任之初,始加修葺,为文纪念,请央党国先进题辞,辟为纪念室,恐失闾户之真,且以经费有限,未能铺设,然亦聊以追维伟迹,纪念遗踪也。至本馆馆舍系民国十三年朱兆莘代办任内以七千六百五十镑改为永租,租期九百九十九年,地皮每年另付租金一百五十镑,永不增减,永租价款借自此间西寺银行Westminster Bank,利息年增,迄未清偿,泰祺就任后遵照成案实行,将驻伦敦总领事馆护照签证收入除照章应扣该馆之公费外,悉数拨付该行以偿息金,截至去年年底,计馆舍户下共欠八千四百七十八镑八先令七便士。按馆舍建筑已历百数十年,房屋狭小,不敷办公,而祺为节省公帑,未照此间各大使馆例,赁屋独居,且伦敦总领事馆三年前为紧缩计,移设本馆下层,尤感褊隘。现在本馆升为大使馆,酬应较前繁多,接应非一室所可敷用,加以总领馆往来人多,且杂同在一地,贵客白丁出入相值,殊碍观瞻,诸多不便。若能如骆介子同志提案,将现有馆舍改建总理蒙难纪念堂,而另觅馆舍,则除偿还银行贷款八千数百余镑外,建筑纪念堂及装修各费最低限度非二万五千镑莫办。而另置馆舍,接近十数年地价大增例,……至少需三万五千镑始足以购置一所。……照骆介子提案实行,则政府须付款约六万八千镑,折今国币约一百一十五万左右,当此国难期间国库支绌,恐事实上不能办到。祺意(一)现有馆舍建立之历百数十载,年久失修,且无现代设备,如非全部翻造加高建筑,以一层作总理蒙难纪念堂,并建筑装修各费约三万余镑,偿还银行债款八千余镑,两者约合国币六十八万元。(二)将总理蒙难室之一层就下层建筑所能负荷之限度内加以翻造,专作纪念,而于屋后厨室之上加建二层以为办公接应之用,此虽不克以言坚固永久,然就目前本馆建筑状况加以充分修理,添置升降机,当尚可维持四十年以上,其费用总需约二万镑,约今国币三十二万元(银行债款不在此内),依上述二项办法实行,总领事馆均须他迁。(按现在分设本馆地下层,既损该馆体面,且予本馆以观瞻上办公上种种不便,事实上亟宜另为之所也。)^[1]

[1] 中国驻英大使馆复外交部呈(1936年3月2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郭泰祺个人全宗档案 三〇四八/602。

从这则回呈中,可以看出几点:(一)郭泰祺是在使馆馆舍极其不敷使用的情况下建立孙中山伦敦蒙难纪念室的。(二)郭泰祺是不同意在国难期间国库支绌的情况下,如骆介子等人提案的那样斥巨资构建新舍并将现在的使馆馆舍专门改建中山纪念堂的。(三)郭泰祺建议翻修驻英大使馆,将总理蒙难室之一层就下层建筑所能负荷之限度内加以翻造,专作纪念,而于屋后厨室之上加建二层以为办公接应之用。

1937年4月,孔祥熙作为国民政府特使赴英参加英王乔治六世加冕典礼,率领随行的庞大代表团拜谒了孙中山伦敦蒙难纪念室,并赠孙中山塑像一座。

之后,孙中山伦敦蒙难纪念室一直陈列着,接待了一批又一批从世界各地到达伦敦的中国人,孙中山的为革命为民族献身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三、孙中山伦敦蒙难事件在不同时期的政治意义

孙中山是一位在中国尽人皆知、耳熟能详、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政治家,他既是国民党竭力宣传的“总理”与“国父”,也是共产党及其他党派在某种程度上共同接受的政治人物。孙中山伦敦蒙难事件在不同时期被赋予了不同外延,并达到了不同宣传效果,具有不同的政治意义。

第一阶段(1896—1904):伦敦蒙难事件提高了孙中山的知名度,坚定了孙中山的革命信念,加速了清王朝的覆灭,使孙中山的革命思想进入一个重要发展阶段。

伦敦蒙难事件使孙中山声名大振,成为国际知名的政治家和世界公认的中国民主革命派的领导人。孙中山1894年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1895年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会,同年10月发动广州起义,其时孙中山在兴中会内部还不是一个无可争议的领袖,但是1896年伦敦蒙难12天后,却得以成为兴中会组织的唯一领袖。^[1]

孙中山伦敦蒙难事件引起各国报纸的高度关注。英国《泰晤士

[1] 闵廷均:《论孙中山伦敦蒙难》,《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第8—9页。

报》、美国《纽约时报》、香港的《德臣西报》、上海的《时务报》等都在第一时间以显赫的位置刊载了孙中山伦敦脱险的新闻，盛赞孙中山为“汉族中之杰出者”、“历史中之重大人物”。具有代表性的是《德臣西报》，一年前它还把广州起义失败归咎于领导人，主张今后中国的任何革命举动都要由西方来指导，而现在却发现，孙中山是土生土长而又无愧于自己民族事业的领袖，是唯一一把对形势的充分了解和不顾一切的勇气结合起来的人。它评论道：“孙中山……未必不会成为历史上一个杰出的人物，……他身材适中，瘦而结实，言谈深刻，态度诚恳，在中国人中是少见的。……在他沉着的外表下，藏着一个迟早必然会在中国起巨大影响的人格，如果命运作美的话。”^[1]许多英国人致信孙中山表示祝贺，有一个名叫穆克伦（Rowland J. Mulkern）的英国士兵甚至追随孙中山参加了后来的惠州起义。而且，中国人民特别是华侨和知识分子开始接受孙中山，这是孙中山和清政府始料未及的。这在某种程度上，要归功于张之洞、李鸿章、严复、黄遵宪等人出资赞助、由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主义者办的重要报纸《时务报》。因为该报在7个月时间中断断续续地报道了这一令清政府头疼的事件。^[2]而该报在中国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留洋学生中影响很大。

孙中山以其革命家和政治家的敏锐，也利用记者纷至沓来的机会，揭露和控诉清政府绑架的卑鄙阴谋，宣传反清大业。他在获释的第二天，写信给伦敦《泰晤士报》和这个城市的其他报纸，对英国朋友的同情和支援表示衷心感谢，并坚定地表示：“予从此益知立宪政体及文明国人之真价值。敢不益竭其愚，以谋我祖国之进步，并谋所以开通吾横被压抑之亲爱同胞乎！”^[3]随后在英国的一次谈话中，孙中山更明确宣称：“目前中国的制度以及现今的政府绝不可能有什么改善，也决不会搞什么改革，只能加以推翻，无法进行改良，……人民的起义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他又应各方面的要求，将伦敦被难的经

[1] [美]史扶邻著，丘权政、符致兴译：《孙中山与中国革命》（上卷），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11月版，第96—97页。

[2] 闵廷均：《论孙中山伦敦蒙难》，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4月，第9卷第2期，第9页。

[3] [美]史扶邻著，丘权政、符致兴译：《孙中山与中国革命》（上卷），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11月版，第95—96页。

过用英文撰成《伦敦被难记》(Kidnapped in London),于第二年夏天出版。在书中,他写道:“予被逮于伦敦中国公使馆,颇为当世注意”,“更不料以是轰动政界,……予之知有政治生涯,实始于是年;予之以奔走国事,而使姓名喧腾于英人之口,实始于是地”。从孙中山的记载可以看出,伦敦蒙难鼓舞了他的革命自信心和献身精神,更坚定了他反清革命的决心,使得他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虽屡屡失败仍奋斗不止。

1897年7月,孙中山离英,乘轮经加拿大赴日本,在横滨初识日人宫崎寅藏、平山周等,并化名中山樵,从此以“中山”名世。1902—1904年间,由于白浪庵滔天(宫崎滔天)写的《三十三年之梦》^[1]及其汉译本^[2]的出现,孙文在日本和中国变得广为人知。不久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更加巩固他的地位。

第二阶段(1905—1925):孙中山组建了自己的政党,明确提出了三民主义思想,此时孙中山需要塑造自己伟大的英雄形象,以倡导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并建立统一的权威来整合党内各派力量以及在社会上扩大革命的影响。伦敦蒙难事件成为孙中山将自己塑造成伟大英雄的生动素材。

1905年8月,孙中山与黄兴等人,以兴中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为基础,在日本东京创建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成为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他所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被采纳为同盟会纲领。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同盟会的成立,有力地促进了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

从1906—1911年,同盟会在华南各地组织了多次反清武装起义,如广东潮州黄冈起义、广东惠州七女湖起义、广西防城起义、广西镇南关起义、云南河口起义、广州黄花岗之役,孙中山为起义制定战略方针,并在海外奔走,为起义筹募经费。1907年12月镇南关起义时还

[1] 从1902年1月连载在《二六新报》,8月由国光书房发行单行本。[日]狭间直树:《关于孙文的“支那保全分割论”》,《民国档案》2001年第4期,第48页注释③。

[2] 黄中黄(章士钊)抄译《孙逸仙》,1903年(《大革命家孙逸仙》,文星书店影印,1962年)。金一(金天翻译《三十三年落花梦》,群学社,1904年。[日]狭间直树:《关于孙文的“支那保全分割论”》,《民国档案》2001年第4期,第48—49页注释④。

亲临前线参加战斗。但各次起义都因缺乏群众基础、组织不够严密而失败了。多数党人灰心丧气，党内弥漫着失败主义的情绪。

而且在此过程中，同盟会内部也出现了政见分歧和矛盾冲突，甚至发生两次“倒孙风波”。因“倒孙”风潮，同盟会分成了两派：一派以黄兴、刘揆一为代表，维护孙中山的威信，维护同盟会的团结；一派以章太炎、张继、陶成章、李燮和为代表，对孙中山横加指责，制造分裂。1908年秋《民报》被日本警厅封禁后，同盟会东京总部完全处于瘫痪状态。

为了提振士气，为了解决组织涣散问题，1908年秋孙中山在新加坡成立同盟会南洋支部，委任胡汉民为支部长，不久，南洋支部迁至槟榔屿。为了消除“倒孙”风潮的负面影响，孙中山迫切需要树立自己的权威形象，伦敦蒙难事件再次被想起并成为宣扬孙中山革命事迹的素材。1911年，革命党人再版了由孙中山著述的《伦敦被难记》^[1]，而在此书中孙中山将自己塑造成了伟大的英雄——一个主动入清使馆宣传革命、历经磨难、最终脱险的孤胆英雄。孙中山及其追随者刻意渲染孙的英雄举动。陈少白就曾说：“孙先生对我说，他早已知道公使馆，他故意改换姓名，天天跑到公使馆去宣传革命。”^[2]但据澳大利亚学者黄宇和教授考据，孙中山是在去康德黎家的途中，经过清使馆时被龚照瑗诱捕的，而非“自投清国使馆”或“是为宣传革命大计，乔装深入使馆内作宣传”^[3]。

1914年6月，孙中山在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希望恢复和发扬同盟会的精神。孙中山总结二次革命的失败教训，开始倡导绝对服从自己，甚至要求加入中华革命党者，无论其在党的历史与资格如何深久，均须重写誓约，加按指模，誓约规定“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如有二心，甘受极刑”^[4]。这一专制做法遭到黄兴等人

[1] 孙中山著述、甘永龙编译：《伦敦被难记》，商务印书馆1911年版。1912年再版时题为《孙大总统自述：伦敦被难记》，其他书局如大东书局等也曾出版。

[2] 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5页。

[3] 黄宇和在《孙逸仙伦敦蒙难真相》一书中对孙中山的行为进行了详细考证，解构了英雄神话，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

[4]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篇》，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159—160页。

的反对,但陈其美等人不仅不反对,甚至劝黄兴拥戴、服从孙中山,他说:“此后欲达革命目的,当重视中山先生主张,必如众星之拱北辰,而后星躔不乱其度数;必如江汉之宗东海,而后流派不至于分歧,”因此,“遵守誓约,服从命令”是“当然天职而绝无疑义者。”^[1]在陈其美等追随者的拥戴下,孙中山在革命党内部独一无二的权威地位又得以确立。1919年,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后,其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直至1925年3月12日逝世。

第三阶段(1925—1931):国民党在领导国民革命过程中,在中国国家主义成长过程中,需要神化伦敦蒙难事件作为宣传孙中山崇拜的生动教材,利用孙中山符号建构整合国家与民族的象征性权威,制造和推动孙中山崇拜,藉以动员和控制民众,进而达成树立该党权威、巩固一党专制的政治目的。

民国成立后,伦敦蒙难事件被国民党不断神化,作为宣传孙中山崇拜的生动教材。在此影响下,民间对于孙中山的“英雄壮举”极为崇敬,遂有文人或团体参与建构孙中山伦敦蒙难传奇。辛亥革命后不久,郑正秋主持的民鸣社就在上海汉口路大舞台公演新剧《孙中山先生伦敦被难记》,这是一出以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为题材的戏剧,演出大受欢迎,以后屡次复演。1916年11月,民鸣社再度公演此剧,并在报纸上打出广告称,“此戏演一回,熟一回,公使馆舌战,最有精彩……每一段出,必然鼓掌如雷,彩声不绝,可见社会欢迎之至也。方今内忧外患频来,人人当取法乎此大伟人,以造福国家焉。”^[2]这些宣传更加突出了孙中山的英雄形象,尤其在“内忧外患频来”的岁月,国人更期盼“伟人”领导中国走出困境,“以造福国家”。于是,国民党开始利用伦敦蒙难事件进行反帝宣传。1927年1月,国民政府决定收回汉口英租界。为鼓励人们的反帝斗志,中山舰舰长李之龙编写《孙中山伦敦蒙难记》,在武汉血花世界剧场演出,并亲自扮演孙中山,揭露英国与清政府驻英公使相勾结,违反国际公法拘捕孙中山。孙中山的英雄形象

[1] 陈英士:《致黄克强书》(1915年春),载《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21页。

[2] 《饰演孙中山第一人——顾无为》,张伟:《沪渎旧影》,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9—120页。

激发了各界民众的反英斗志,积极支持政府的正义行动。结果,武汉国民政府顶住英国压力,最终收回汉口英租界。^[1]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宣传机构利用伦敦蒙难事件进一步塑造孙中山的英雄形象,突出孙中山作为精神象征的宣传,藉以抬高和巩固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国民党对于伦敦蒙难的宣传,集中体现了其建构孙中山政治符号、制造并推动孙中山崇拜的方法和手段。1928年广州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宣传部出版《总理伦敦被难概略》。1929年,国民党中央专门颁布《总理伦敦蒙难第卅四周周年纪念宣传要点》以及标语口号:“一、总理精神不死!二、总理伦敦蒙难,是为倾覆专制创造共和而受祸!三、总理伦敦蒙难,是促国民革命势力的雄厚,三民主义的完成!四、纪念总理伦敦蒙难,要继承总理的牺牲奋斗精神!五、纪念总理伦敦蒙难,要效法总理的慈祥博大人格!六、确遵总理遗教,努力训政工作!七、厉行革命建设,铲除叛逆军阀!八、拥护总理所艰难缔造的中国国民党!九、实现三民主义!十、国民革命成功万岁!”^[2]1930年,罗家伦从学术研究角度撰写《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史料考订》,考证了孙中山伦敦蒙难史实,推论孙中山是自动进入使馆进行革命宣传而被捕的,更突显出孙中山的高大形象。^[3]同年,王宠惠在《建国月刊》上发表《总理伦敦蒙难史料》^[4],以增强孙中山英雄神话的可信度。1931年,国民党浙江省执行委员会宣传部还专门编写了《总理伦敦蒙难纪念宣传大纲》,宣传孙中山被清驻英公使龚照瑗命人设计诱捕而蒙难12天的英雄事迹。大纲强调说:“总理伦敦蒙难是中国民族之生死关头。……总理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外抗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内抗满清政府之高压,努力唤起国人,共谋革命。以不屈不挠之精神,机警明敏之手段,终能战胜一切困厄,逐步达到目的。……伦敦蒙难是增加总理革命勇气的推进器,伦敦蒙难是总理革命事业成功之关

[1] 吴德才:《李之龙》,胡华主编、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0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0页。

[2] 《总理伦敦蒙难第卅四周周年纪念宣传要点》,《中央周报》第69期,1929年9月30日。

[3] 罗家伦:《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史料考订》,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

[4] 王宠惠:《总理伦敦蒙难史料》,《建国月刊》第3卷第5期,1930年。

键。”^[1] 伦敦蒙难被宣传为“增加总理革命勇气的推进器”，“总理革命事业成功之关键”，定为纪念日可谓名至实归。

总理成为国民党中独一无二的职位，为孙中山所独有的称号。国民党反复强调总理一词的政治象征意义，就是给人们灌输这样的印象：“总理是三民主义的创造者、中华民国的缔造者！”“总理是中华民族的救星、世界弱小民族的救星！”那么，孙中山所创立和领导的国民党当之无愧地是中华民族的领导者。

第四阶段（1931—1945）：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抗战爆发后，孙中山符号更具民族象征意义，成为动员和鼓舞广大民众坚持抗战的精神源泉。伦敦蒙难纪念室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并受到中央的重视，正是因为它符合了时势的需要。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一直独自掌控着孙中山政治象征资源，将孙中山定位为党的“总理”。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开始意识到民族主义具有建构民族国家、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尊严的重要功能。1935年，蒋介石将孙中山精神升华为“中华民国之国魂”^[2]，称“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要挽救危弱的国家，以建设新国家，必须以三民主义为最高的指导原则”，蒋介石概括孙中山的一生就是为民族主义奋斗的一生，“以革命的手段，救国救民”^[3]。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更是认识到“孙中山”可以成为动员全民抗日的政治象征。1940年3月，国民党中央决议，正式尊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4]。国民党在这时将孙中山从党的“总理”转化为“国父”，其寓意显然是要将孙中山塑造为全民族共同的精神领袖，促使全体国民接受民族主义思想，从而唤起民众，凝聚民心，团结御侮，共同抗日，而民间也是在抗战时期与国民党合作最为密切，连一贯批评国民党独裁、反对神化总理遗教、反对总理纪念

[1] 中国国民党浙江省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印：《国定本党纪念日宣传大纲集》，1931年8月，第234—235页。

[2] 蒋介石：《纪念总理逝世之感想与对于川省同胞的希望》（1935年3月12日出席重庆总理逝世十周年纪念大会演讲），载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十三卷，“演讲”，台北1982年版，第123—124页。

[3] 蒋介石：《总理遗教六讲》，国防部新闻局1946年9月版，第20、162、163页。

[4] 《关于尊称孙先生为中华民国国父之声明》，载朱汇森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12年1—6月），（台湾）“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4年版，第414—415页。

周仪式的胡适等自由知识分子也与政府合作,国民党从根本上获得了统治的合法性。1943年11月12日,中共在面向国统区的党报《新华日报》上发表社论《国父诞辰纪念》:“今天是国父孙中山先生的七七诞辰。国父是中华民国的创造者。他奋斗一生,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他首创的三民主义,目的就是要使中国人民能够过自由、平等、幸福的日子。国父是最能够顺应世界潮流的伟大政治家。……我们的抗战,正处在极为有利的国际局势中,同时却也还有一段极艰苦的路要走。只有团结,才能渡过这段路程,在纪念国父七七诞辰的日子,全国一致来重读国父关于民主团结的遗教,并努力实行,实为加强团结,克服困难,走上胜利的顶好的办法。”^[1]显然,孙中山特有的民族象征符号成为抗战时期国共合作及全民族团结抗战的重要向心力和凝聚力。

1933年郭泰祺创建孙中山伦敦蒙难纪念室的举动之所以得到中央的重视和经费补助,以及骆介子等25人1935年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备资赎回伦敦总理蒙难遗址,改建中山纪念堂,以资景仰而垂纪念案”,还有1937年孔祥熙乘参加英王乔治六世加冕典礼之机拜谒孙中山伦敦蒙难纪念室并赠孙中山塑像一座,都是因为伦敦蒙难纪念很好地凸显出此阶段的抗战救国的时代主题,符合对孙中山符号中民族主义精神挖掘的需要。

第五阶段(1949—迄今):“作为一种信念象征的孙中山永远活在世人的心中,甚至在未来依然可以为中国发挥作用。他现在是海峡两岸人民都尊敬的唯一近代英雄人物。一旦两岸重新和平统一,将证明他们对于孙中山的共同怀念是有益的跨越障碍的心理沟通。”^[2]挖掘孙中山伦敦蒙难的民族主义内涵,对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促进祖国统一具有积极的意义。

1949年后,孙中山被毛泽东奉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周恩来在日理万机中关注伦敦蒙难纪念室。据红色特工、“龙潭后三杰”之一

[1]《国父诞辰纪念》,《新华日报》1943年11月12日,转引自笑蜀编《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3—65页。

[2][美]史扶邻著,丘权政、符致兴译:《孙中山与中国革命》(下卷),《后记:勉为其难的革命家》,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11月版,第443页。

的熊向晖回忆：1962年，他被任命为驻英代办。驻英代办处设在波特兰街49—51号，原清政府购置的驻英公使馆馆舍旧址，亦即原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馆旧址，因年久失修渐成危房，而且馆舍不敷应用，需要拆除重建，但按当地规定，波特兰街任何房屋重建后均须保持原来的外观和高度。费用约需70万英镑。高度不能增加，建筑面积也难以增加。但将现馆舍出售，得款可购买面积较大的地皮，用70万英镑能建成符合需要的新馆舍。这一方案比较合算，遂报外交部核批。因当时国家经济困难，迟未得复。1963年秋，熊向晖回国休假，周恩来总理找他谈话时，他提到重建馆舍事。周恩来总理问：“孙中山先生在伦敦蒙难是不是关在这个地方？”熊作了肯定回答，而且应周总理的提问描述了孙中山伦敦蒙难的详细经过。周总理饶有兴趣地听完后，问道：“孙先生被关的那间房子现在做什么用？”熊说：“1933年国民党当局把那间房子专门作为纪念室。1937年孔祥熙参加英王乔治六世加冕典礼，在那里安放了孙先生的半身铜像，现在也在。”总理说：“你们给外交部的报告，要求出售波特兰街的房子，并没有提那里还有孙先生的蒙难室。要是今天不问你，我还不知道。那所房子该不该出售，首先要从政治上考虑。1956年，发表毛主席的《纪念孙中山先生》。在这篇文章里，主席指出，孙先生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耗费了毕生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刚才你讲，伦敦蒙难是孙先生革命生涯中重要转折点，不言而喻，孙先生蒙难的地方是重要的历史遗迹。而你们居然要卖掉，幸亏今天问了你，要不然，同意你们卖掉，怎么对得住我们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他指示：“波特兰街的房子不许出售，就在那里按原来的外观和高度重新建造。房子不够用，另外想办法。国家经济虽然有困难，为了纪念孙先生，这笔钱不能省。我派一位有经验的建筑师到伦敦实地考察，回来设计。要在原来的位置，重建孙先生蒙难室，必须保持原样。”周总理说，建好后，他想请主席书写“孙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室”，制成匾额，挂在室外的门额上。请郭老书写主席作的《纪念孙中山先生》全文，嵌进玻璃框，挂在室外的墙上。熊向晖返任后，外交部拨来70万英镑。不久，周总理派戴念慈建筑师到伦敦勘察，对孙中山先生蒙难室作了详细测绘，搜集了拆建馆舍的有

关资料,带回北京设计。代办处安排好拆建过程中的办公住宿地点后,正式办理拆建手续。这时,忽然接到英国文物保管会的通知:中国代办处的三间大厅是“亚当建筑”,必须保存,不得破坏。所谓“亚当建筑”,是指十八世纪英国著名设计师兼建筑师罗伯特·亚当和杰姆士·亚当兄弟设计和营造的建筑。代办处有金碧辉煌的三间大厅,特别是天花板美轮美奂,就是亚当兄弟设计营造的建筑艺术珍品。如要保存这三间大厅,整个拆建工程就无法进行。1967年熊向晖奉调回国。1972年3月,中国驻英代办处升格为大使馆。但拆建馆舍问题仍无眉目。1973年9月,熊向晖奉命卸任驻墨西哥大使回国。不久,周总理找他谈话。周总理说,驻英大使馆提出重建馆舍,他已作批示,必须重建孙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室,必须保持原样,并要外交部同熊向晖联系。过了两天,外交部副部长符浩给熊看了周总理的批件,征询熊的意见。熊向晖于是向他详细介绍了周总理十年前关于此事的指示以及办理经过。对孙中山先生蒙难室保持原样的工程问题,熊向晖建议他再向戴念慈了解。1976年周总理逝世,熊向晖怀着沉痛的心情,记下了他所知道的周总理生前交办而未办成的事,其中第一件就是按照原样重建孙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室。^[1]

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英大使馆在原地重建四层使馆大楼,并依原样将孙中山先生蒙难纪念室修葺一新。1986年6月8日,赴英国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副总理李鹏、政协副主席费孝通的陪同下,来到中国驻英大使馆,瞻仰了孙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室。胡耀邦总书记挥毫题写了“孙中山先生蒙难室”八个大字。^[2]

如今,中国驻英大使馆内一直保留着“孙中山先生蒙难纪念室”,室内陈列着孙中山蒙难纪念铜像、康德黎纪念铜像、胡汉民书孙中山蒙难札、郭泰祺书孙中山伦敦蒙难室记、胡耀邦书孙中山蒙难室匾等重要文物,它成为参观缅怀孙中山革命活动的纪念地。^[3]

综上所述,将孙中山当年被囚禁的地方辟为孙中山先生伦敦蒙

[1] 熊向晖:《周恩来关注孙中山伦敦蒙难室》,《党的生活》1997年第1期,第34—36页。

[2] 《人民日报》,1986年6月10日,第6版。

[3] 《伦敦蒙难:掩埋在历史深处的哀叹》, <http://www.dayoo.com/> 2011-05-28

难纪念馆,是郭泰祺的一大贡献,他给时人及后人提供了缅怀孙中山、对话伟人人格、凝聚海内外华人的场所。伦敦蒙难事件之所以在不同时期彰显出了各有侧重的政治意义,而且在不同时期都发挥着激励民众献身当代的作用,就是因为伦敦蒙难事件集中体现了孙中山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胡锦涛同志将这一精神遗产精辟地总结为:“孙中山先生追求真理的开拓进取精神和矢志不渝的爱国主义情怀,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博大胸怀和放眼世界的开放心态,孙中山先生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坚强意志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品德”。他指出,“在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征程上,这一精神遗产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和教育意义,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继承和发扬光大。”^[1]孙中山是凝聚海内外华人共同奋斗、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一面旗帜,“孙中山”将会成为中华民族永远的象征符号而世代流传。

(作者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员)

[1] 胡锦涛:《在孙中山先生诞辰14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6年11月13日。

宋庆龄在近代中国历史关键时刻的几次重大抉择

盛永华

〔内容提要〕

在宋庆龄近一个世纪的人生长河中,有近70年的革命生涯。她从爱国主义的立场出发,不断进击,在革命实践中通过反思、探索和迈进,不断地实现自我超越,与时俱进。她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几次作出重大抉择——辛亥革命低潮时选择捍卫共和、国共第一次分裂时选择捍卫三大政策、中共遭受严重挫折时选择支持共产主义事业、抗战胜利后选择站在人民的一边。宋庆龄总是站在历史潮流的前面,起着先驱者的独特作用。

〔关键词〕

宋庆龄 历史关键时刻 重大抉择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由封建末世进入近代。但是,鸦片与火炮并未能使近代中国实现近代化——资本主义化,反之,却将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境地:国家几被瓜分,民众被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枷锁所桎梏,贫穷落后、被动挨打成为这个东方古老帝国的主要特征。现实如此严峻,以至于近代中国的主题只有两个:救亡和发展。除了统治阶级内部极少数顽固分子外,各个阶级、阶层及社会集团和个人,都在不同程度地卷入救亡图存和社会变革的思潮和活动中。因之,爱国主义成为近代中国一切先进人物和进步社会思潮的主导,而救亡和发展则是近代爱国主义的主要内涵。

拯救和发展中国的进程,由多个互为先导与继续的革命阶段所组成:由民主革命——又分为旧、新民主革命两个阶段,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阶段。

宋庆龄是近代中国爱国主义者的杰出代表,她把毕生奉献给救亡和建设祖国的伟大事业。在宋庆龄近一个世纪的人生长河中,有近70

年的革命生涯。她从爱国主义的立场出发,不断进击,在革命实践中通过反思、探索和迈进,不断地实现自我超越,与时俱进。她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几次作出重大抉择,表明她总是站在历史潮流的前面,起着先驱者的独特作用。

一、在辛亥革命的低潮中选择捍卫共和

参加捍卫中国新生的共和制度的事业,是宋庆龄近70年革命生涯中关键性的一步;1913年对于宋庆龄来说,是她近一个世纪的人生长河中的关键性的一年。

该年6月,宋庆龄在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文学系毕业。她满怀着对家人的思念和对已推翻专制帝制、建立了共和制度的祖国的憧憬,准备回到睽违六载的故乡上海度假。她原拟度假后再返回美国学医或学新闻专业,日后为国人服务。然而在返国途中,她接到父亲宋耀如的电报,让她推迟行期并转赴日本横滨。

宋耀如召宋庆龄到日本是因为“二次革命”失败后,他作为袁氏政权的通缉犯已携眷流亡至此;更重要的是他要让宋庆龄分担他作为孙中山主要助手的重任。

宋庆龄1913年9月在日本开始跟随父亲和姐姐宋蔼龄协助昔日的临时大总统、现在的流亡者孙中山工作——为筹组中华革命党和发动“三次革命”、武装讨袁而进行宣传和联络。不久她正式成为孙中山的秘书。这位年轻的美国留学毕业生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出于爱国主义的情怀,在辛亥革命高潮已逝的革命尾声中,在孙中山极度困难、前途未卜的时候,由父亲亲自引领,义无反顾地投入孙中山领导的捍卫中国新生的共和制度的伟大事业,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革命战士,迈开了她为新中国奋斗的一生中坚实的第一步。

在宋庆龄踏上革命征途时,正是中国的共和事业遭到严重挫折的时候。封建专制势力疯狂反扑,共和国徒具虚名。孙中山在日本艰难地重新聚集队伍,蓄积力量,期望挽民主共和事业之狂澜于既倒。“二次革命”的失败使形势急转直下:在国内,袁世凯加紧了帝制自为的步伐;在日本,孙中山处境维艰——先是日本政府受到袁氏政权的压

力拒绝他登岸停留,以后权衡了各方利弊,对已抵达日本的孙中山及他的同志在“严加监督,以免使日本成为邻国动乱之策源地”^[1]的前提下,同意他们暂时留居。更大的问题在于革命队伍的本身——革命党人原本对袁世凯的认识和对策并不一致,部分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对袁世凯还存有幻想,此时更因如何解决“宋案”而意见尖锐分歧。“二次革命”的失败使队伍更加涣散,少数人因气馁而离开了革命队伍。孙中山曾沉痛地描述当时的困境:“军阀横行,政客流毒,党人附逆,议员卖身……使国人遂疑革命不足以致治,吾民族不足以有为。”^[2]流亡日本的革命党人“意见分歧或缄口不谈革命,或期革命以十年,种种灰心,相互诟谇,二十年之革命精神之革命团体,几乎一蹶不振。”^[3]孙中山通过宋教仁被刺杀的事件,最先、最深刻地认识到袁世凯的复辟野心;最坚决地举起武装反对袁氏倒行逆施的旗帜。他在困顿中着手组织中华革命党,重新聚集力量,领导进行“三次革命”,以图捍卫新生的共和制度。但终因这个新党带有浓厚的会党色彩而不能团聚广大战友,甚至连一些长期与他并肩英勇奋斗的同志如黄兴等,也因种种不同意见而离去,孙中山处于十分孤立的境地。但他没有气馁,他在东京一面加紧武装反袁的“三次革命”的组织与发动,一面继续关注指导国内的反袁武装斗争。他首先要设法与“二次革命”失败后陆续走避日本的同志联系,并联络日本朝野人士,争取他们的支持。在日本政府的严密监视下,宋耀如和他的两个女儿——宋蔼龄和宋庆龄成了孙中山联络同志的最重要助手。在日本外务省档案《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中,多有这些方面的记载。^[4]

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成立,孙中山就任总理。由此,重新形成捍卫共和制度的队伍和阵线。

宋庆龄对于形势的严酷,道路的险峻,个人面临的艰危是了解的。她曾追述当时自己的思想状况:到达日本后,很快就“从我的父

[1] 引自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837页。

[2] 《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1923年11月25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29页。

[3] 邹鲁著:《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编,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第160页。

[4] 详见俞辛焯、王振锁编译:《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1913.8—1916.4)——日本外务省档案》,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亲与孙中山博士的交谈中,我得悉我们的民国处在很大的危险之中,因为袁世凯想推翻它。一些国家在道义上和财政上支持着袁世凯,因为他们被其狡诈的外交手腕及其手下阴险毒辣的宣传所欺骗。我国民众之声被压制。革命事业似乎无望。孙博士的某些追随者,在绝望中把革命事业看作失败的事业而放弃了。”“仅仅为了满足一个自欺欺人的虚荣心,而把我们的民国倒退到君主国的想法,对我说来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我想起国势岌岌可危,非常痛切,决心为我们的事业而工作。”^[1]她当然知道她自己“必需冒许多危险”,而她的理想仅仅是“希望有一天我所有的劳动和牺牲将得到报答,那就是看到中国从暴君和君主制度下解放出来,作为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共和国而站立起来。”^[2]宋庆龄已将捍卫共和奉为“我们的事业”而坚决投身其中了。

对孙中山来说,宋庆龄的到来正是时候。宋庆龄除了承担大量具体的联络、文书、宣传工作外,她的年轻、美丽、温柔、深情而且充满革命民主主义的朝气,给失败逃亡中的孙中山以帮助、慰藉和鼓舞。而对于宋庆龄说来,这是使她成为一名真正的革命战士的关键时期。与孙中山频繁的接触与交流,大大加深了宋庆龄对孙中山的思想、事业与人格的理解,认为当时只有孙中山能够拯救中国,而自己能够帮助孙中山。宋庆龄献身革命的决心与日俱增,她“极愿效力党事,且急盼党事之成”^[3]。1914年9月宋蔼龄结婚后,宋庆龄正式接替姐姐成为孙中山的秘书。孙中山对宋庆龄的工作十分满意,对她的学习十分关心,“鼓励甚多”,使宋庆龄“不知不觉渐渐地被他吸引”^[4]。1915年10月,怀着“委身革命”愿望的宋庆龄,在父母、亲属以及孙中山的许多亲密战友强烈反对的具大压力中,与孙中山在东京结婚,成为他的助手、战友和伴侣。由此,她对孙中山的帮助更为直接全面,并使流亡中的孙中山生活得到照顾,心灵有所慰藉,这成为孙中山在失败中再起的重要动因之一。孙中山在给老师康德黎的信中称宋庆龄是他的“一

[1]《宋庆龄自述》,载《档案与史学》1997年第1期;《宋庆龄书信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6页。

[2]《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11页。

[3] 杨天石:《宋嘉树与孙中山、宋庆龄的婚姻—读宋嘉树复孙中山英文函》,载《百年潮》2001年第12期。

[4]《宋庆龄自述》,载《档案与史学》1997年第1期;《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26页。

位伴侣兼助手”^[1]。对于这段经历和身份的转变,宋庆龄则自诩“变成一个热情的小革命者”^[2]。婚后,宋庆龄仍然“帮助我的丈夫工作,我非常忙,我要为他答复书信,负责所有的电报并将它们译成中文”;“我负责所有密电码和外文信件的回信工作”^[3]。并且,她很快熟悉了革命的秘密工作,还学会了使用手枪。

作为孙中山的学生、助手、战友和伴侣,在与孙中山共同生活并肩战斗的十年里,宋庆龄跟随孙中山投入捍卫共和与推进共和事业的斗争:武装讨袁,两次护法战争,北伐统一中国……。在陈炯明叛变欲致孙中山于死地时,宋庆龄充满献身革命的无畏精神,掩护孙中山安全撤退,使捍卫共和的事业得以继续。宋庆龄尤为重要的贡献是,在旧、新民主革命交替之际,她同孙中山一起“与时俱进”,探讨指导中国革命的新思想,索求拯救祖国的新道路。对于孙中山后期的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进展,宋庆龄无疑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不仅由于她参与并承担了大部分实际的工作,而且在民主革命新旧交替的时刻,他们之间的政治思想交流和互相促进愈益强化。他们共同探讨、切磋以至共同抵御来自“右”边的干扰。宋庆龄对孙中山的无条件支持,对于孙中山的决策有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宋庆龄炽烈的爱国主义和激进的民主主义,执著的进取精神,对于新事物的敏感和接纳,成为她与孙中山共有的精神财富,并体现在他们与时俱进的活动中。毋庸置疑,宋庆龄是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制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支持者、促成者,她成为孙中山后期的重要助手。

从爱国主义立场出发,在近代中国历史剧变的时代潮流中,宋庆龄作了第一次人生抉择,并且用短短的十年时间,完成了一个青年留学生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转变。

二、在国共第一次分裂时选择捍卫三大政策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新解释了

[1] 盛永华主编:《宋庆龄年谱(1893—1981)》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0页。

[2] 《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11页。

[3] 宋庆龄:《我家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载《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三民主义,完成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制订,促成了反帝反封建的联合战线的建立,推动了北伐和大革命高潮的到来。这是孙中山毕生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途径的必然结果,也是孙中山和他的包括宋庆龄在内的忠实战友及助手们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高扬的标志。

然而,当大革命迅速深入发展的时候,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各阶级、各阶层都会通过他们的代表人物表达自己的诉求,革命队伍的分化、分裂不可避免。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四·一二”和“七·一五”政变,他们杀害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驱逐孙中山请来指导革命的苏俄顾问,用屠刀斩断联合战线,将昔日的盟友淹没于血海中,彻底毁弃了孙中山亲手制订的三大政策。

在国民党右派毁弃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时候,宋庆龄选择高举国民党左派的旗帜——孙中山的旗帜,坚定地捍卫三大政策。

(一) 高举国民党左派旗帜

蒋、汪分裂革命阵线使革命事业严重受挫,宋庆龄痛心疾首。她清醒地判断“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反动时期”^[1],蒋、汪之流及其同伙“正在堕落,或即将堕落为新凯撒的臣仆”,他们“操纵利用国民党”^[2],是国民党的冒牌领袖,领导着反动势力。因之,她公开宣布与国民党右派划清界线,表示“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我只有引退以待更贤明的政策出现”。但宋庆龄对中国革命和国民党并没有丧失信心,她明确表示:“我对于革命并没有灰心。使我失望的,只是有些领导过革命的人已经走上了歧途”。她相信:“现在本党虽然有些党员离开了孙中山手定的中国革命的道路,然而已站在本党旗帜之下的千百万中国人民,仍将遵循这条道路以达到最后的目的。……我相信国民党一切忠实的党员一定都会遵循这条革命的道路。”^[3]

[1]《在莫斯科发表的声明》(1927年9月6日),《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5页。

[2]《赴莫斯科前的声明》(1927年8月22日),《宋庆龄选集》上卷,第51页。

[3]《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1927年7月14日),《宋庆龄选集》上卷,第43—48页。

虽然宋庆龄已经看到目前革命的严重危机,然而她坚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终究是要胜利的。革命在中国是不可避免的。”^[1]她对国民党左派寄予深切的期望。

宋庆龄1927年8月赴苏联访问。在赴莫斯科前,她发表声明称:“我深信三大政策是革命的思想与方法的基本部分,……只有在国民党领导下正确地配合运用由三大政策所产生的革命力量,国民党人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2]在莫斯科,宋庆龄多次发表谈话、宣言、声明和函电,表明自己坚持国民党左派的立场——单在9月里,她就数次表示“我以一个中国妇女和中国国民党左派的身份,谨向苏联的女工人致敬”;“我代表中国国民党左派向苏联工人们致敬”;“我代表国民党左派,向你们列宁格勒的无产阶级致敬”等。^[3]宋庆龄当时确信“国民党左派代表中国的工人阶级,代表中国的千百万人民……这广大的被压迫群众是真正革命分子的主力,他们是中国战胜外国剥削和封建压迫的希望”^[4],“经过锻炼的群众领袖们今天全都站到国民党左派的行列中”,国民党左派“是中国唯一有资格承受孙中山留下来的革命的称号的党派”^[5]。所以,宋庆龄也明确地表示:她和国民党左派理所当然地是“代表革命的中国”,“也是代表中国的革命群众”的。

宋庆龄认为只要将右派清除出国民党,使国民党在组织上恢复其革命性,然后“在国民党领导下正确配合运用由三大政策所产生的革命力量”,革命便能获得真正的成功。^[6]为此,她把聚集国民党左派,整顿并组织队伍作为首要任务并投入了大量精力。1927年11月,宋庆龄和邓演达、陈友仁在莫斯科联合署名,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对中国及世界民众宣言》,宣布筹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并规定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宣告中止由蒋介石和

[1]《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1927年7月14日),《宋庆龄选集》上卷,第47页。

[2]《赴莫斯科前的声明》(1927年8月22日),《宋庆龄选集》上卷,第52页。

[3]《向苏联妇女致敬》(1927年9月3日)、《对塔斯社发表的声明》(1927年9月6日)、《对列宁格勒(真理报)发表的声明》(1927年9月6日),《宋庆龄选集》上卷,第54、58、59页。

[4]《对塔斯社发表的声明》(1927年9月6日),《宋庆龄选集》上卷,第58页。

[5]《中国目前的形势》(1927年9月19日),《宋庆龄选集》上卷,第61页。

[6]《赴莫斯科前的声明》(1927年8月22日),《宋庆龄选集》上卷,第52页。

汪精卫把持的国民党中央职权；筹备召集国民党各省市代表大会，以便选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中央的职权；筹备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以解决一切革命问题等。^[1]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筹组，是宋庆龄和她的战友集合国民党左派力量于孙中山的旗帜之下，力图改造和复兴国民党的重要步骤。

这个时期，宋庆龄对重振国民党怀着期望，是符合认识论的规律的，她的全部努力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首先，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忠实战友、助手和他的事业的继承者，在孙中山逝世后又参与了国民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她对孙中山创建的、曾经领导过中国革命的国民党充满感情，同时怀有深深的义务感，认为国民党本身就是孙中山领导革命的一面旗帜。在中国工人阶级作为自觉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中国资产阶级和国民党无疑曾经是先进的阶级和革命的政党，在它领导争取民族独立和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候，理所当然地代表着本阶级的利益，同时也代表着除了革命对象以外的全民的利益，并且取得了历史允许它所取得的成就。

其次，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国共合作的实现使国民党成为各个阶级的联合阵线，这个联合阵线在一定时期还保持着革命的精神，并以革命领导者的身份出现。又由于中国共产党在联合阵线中的艰苦努力，使工农运动日益高涨，北伐战争得以胜利进行。革命形势的高涨给日益落伍、分化的国民党披上革命的外衣。而且，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本质是在革命向纵深发展时逐步暴露的，人民群众对其本质的认识因而也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在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国民党怀有期望和幻想的时候，国民党这面旗帜是不能轻易丢弃的。

再次，在孙中山逝世后，围绕着以坚持或丢弃三大政策而展开的斗争日趋激烈，在斗争中阵线逐渐分明，以宋庆龄、廖仲恺、邓演达等为代表，追随和坚持三大政策的左派形成队伍，坚定地将中国革命向前推进。

[1]《邓演达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2—338页。

并且,在大革命失败后,主持中共中央的共产党领导者在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下,执行了左倾教条主义路线,也排斥打击过去的同盟者,他们甚至认为国民党左派比右派更危险,“因为他们能欺骗群众”,使自己陷于孤立的境地。

这些都是使宋庆龄高举国民党左派旗帜的原因。

宋庆龄把尽力保护并撑持国民党左派这面旗帜视为自己的责任。她重建或改组国民党的一切努力,在历史转折的激流中,对于挽救革命和团结、教育人民群众;对于孤立敌人和打击敌人都是十分必要的。

(二) 坚决捍卫“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三大政策是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的精髓和灵魂,并成为它的主要标志。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的蓬勃发展和辉煌实绩,显示了三大政策的生命力。

国民党反动派毁弃了孙中山的思想与事业,却又要借孙中山为自己“正名”,他们一面宣称自己是三民主义的虔诚信徒,一面歪曲阉割三民主义,抛弃其中的革命民主主义内核,偷换其中反帝反封建的重要原则,填充以封建法西斯主义的货色,为自己的反革命行动寻找理论根据。他们以篡改过的假三民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和人民大众,并作为内部纷争和排除异己的工具,甚至成为向帝国主义屈膝投降的论据。因而,形形色色的“三民主义”便应运而生。这些“三民主义”不管是披着传统的儒学——理学的外衣蛊惑人心,抑或从西方借取反动哲学加以比附,还是赤裸裸地断章取义,歪曲篡改,但都毫不例外地抛弃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革命的转折关头,为了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廓清阵线,辨明是非,必须揭露各种假三民主义的反革命实质,准确地在理论上阐发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要义。宋庆龄深知这个任务十分严重和迫切,首先要由自己义不容辞地来承担,这不仅因为她是孙中山的战友和伴侣,对孙中山的事业最为忠诚,而且还因为她积极参与了三大政策的制订,充分理解三大政策是历史的选择和时代的要求。

1927年至1930年代初,宋庆龄在访苏及旅欧期间,进行了十分重要的理论活动——着重阐述三大政策与三民主义的不可分割的关系。

还在汪精卫实行“分共”、宁汉合流前夕的危机时刻,宋庆龄发表了著名的《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着重指出:“为了在中国革命中指导我们,孙中山把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交给我们。”“孙中山曾明确地说明,他的三大政策是实行三民主义的唯一方法。”她揭露用屠刀做后盾而控制了国民党中央的蒋、汪之流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他们所推行的政策,是与孙中山“相反的政策”,其结果“使革命政党丧失了革命性,变为虽然扯起革命旗帜而实际上却是拥护旧社会制度的机关”。宋庆龄撕去了国民党右派所披着的三民主义的外衣,还原他们叛徒的嘴脸:“孙中山的政策是明明白白的。如果党内领袖不能贯彻他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宋庆龄希望她的声明能警醒那些在纷繁复杂的形势中是非不明者,以孤立国民党右派,挽救濒临破裂的革命阵线。^[1]

当革命阵线破裂成为事实后,宋庆龄旗帜鲜明地捍卫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她用“孙中山以大政治家的风度运用了三大政策,并由于三大政策使各种力量相互结合,国民党才能结束十年来广东的混乱局面,创建并供应了革命军队,大举北伐,……推进到黄河岸边”为事实根据,以无懈可击的逻辑进行论述:“为了铸造一个合适的革命工具,孙中山于1924年冬在革命的基础上改组了国民党,制定了三大政策的行动纲领来加强三民主义。”指出孙中山认为“工人农民是两大基本群众……他们代表全国约近百分之九十的人口。……如果我们要使革命运动具有生命力,和切合实际,很显然地就必须把他们吸收进来”;“孙中山所制定的第二项政策,认识到在与国内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作革命斗争的时期中,国共两党有合作的必要。中国共产党无疑地是中国内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动力”;“孙中山的第三项政策是关于国民党联合苏联这个基本重要的问题。这种联合是合理的,因为苏联没有以不平等条约加之于中国。……他制定第

[1]《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1927年7月14日),《宋庆龄选集》上卷,第43—48页。

三项政策,是因为有更重大的原因。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所有革命力量中最为活跃,同样地,他认为苏联在世界上所有革命力量中最为壮大。”宋庆龄同时指出另外一个事实:国民党右派——“国民党冒牌领袖们所领导的反动势力危害了三大政策”,他们“投靠了反动势力与反革命”,因而断送了大革命的成果,并带来白色恐怖,革命者和追随革命的工农大众血流成河。^[1]

在捍卫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斗争中,宋庆龄始终把握住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的灵魂和精髓——“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坚持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是不可分割的完整体系。而在当时的实际斗争中,她更突出强调三大政策的实施。她视三大政策为新三民主义的灵魂,是新三民主义的内涵,是实现新三民主义的途径,是正确的战略与策略的体现。

宋庆龄把三大政策作为推动革命的行动纲领,是对孙中山思想的发展。她的这一思想贯穿始终。此后,她仍多次指出“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是不可分割的,它们合在一起才是对他(孙中山)的中国革命政治纲领的唯一‘正确解释’。”^[2]这样,宋庆龄始终把握住新三民主义的灵魂,任何抛弃了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都是对孙中山思想的背叛,对革命事业的背叛。宋庆龄在革命的关键时刻,以三大政策作为检验革命与反革命的“试剂”,对国民党右派进行揭露和批判,大大有助于革命队伍的重新整合,有助于中国和世界人民认清逆转的形势以及判明革命的对象。

在捍卫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的斗争中,宋庆龄还着重阐述了“扶助农工”这项政策,使其内涵得到丰富和发展。

生为“贫苦之农家子”的孙中山,对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工农群众充满了同情与悲悯,他期望以政治和法律的手段来实现“耕者有其田”;以“节制资本”来发展经济和缩小贫富差别。在他革命生涯的后期,开始认识工农群众的力量。而经过血与火洗礼的宋庆龄对于“扶

[1]《赴莫斯科前的声明》(1927年8月22日),《宋庆龄选集》上卷,第49—52页。

[2]《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1962年11月12日),《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89页。

助农工”的认识,则有了飞跃的发展。首先,宋庆龄对工农阶级的历史及现实的地位与作用有了科学的认识,指出工农阶级是“在我们打倒帝国主义、废除奴役我们的不平等条约和有效地统一全国的斗争中,都是我们的力量基础,他们是建设自由新中国的新柱石”,是“我们所依为主力和革命为之奋斗的阶级”。正当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挥向工农大众的时候,宋庆龄却认定工农阶级不仅仅是革命的最主要的受惠者,更是革命的主力军。她把对待土地革命及工农大众的态度,作为革命与不革命及反革命的试金石,认为任何削弱工农的政策,都是“动摇了党的基础,出卖了群众,而且不是真正忠于孙中山。”^[1]更重要的是宋庆龄把“扶助农工”政策与土地革命联系在一起。中国革命的实质问题就是农民问题,革命的中心任务,是铲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和与之相应的封建专制政权。宋庆龄此时已认识到“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推翻封建制度;土地革命如果不能实现,整个革命就不可能有任何进展。因此,谁反对土地革命,反对千千万万的农民获得经济解放,谁就站在反革命阵营那边。”^[2]宋庆龄从忠诚于孙中山的“扶助农工”政策出发,把土地问题的解决,与推翻整个封建制度联系在一起,并强调只有用革命的手段,才能使土地问题得到真正的解决。这表明宋庆龄已认清旧中国反动统治的最本质最核心的问题,科学地阐明了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的关系。由此,为宋庆龄不久以后选择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打下了基础。

三、在中国共产党遭受严重挫折时选择支持共产主义事业

宋庆龄的这次抉择,完成于1930年代初期。她在对前阶段的革命理论和实践进行总结之后,思想上发生了质的飞跃,明确宣布信仰科学社会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认同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完成了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从此,她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总的战略部署,战斗在一条特殊的战线上并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1]《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1927年7月14日),《宋庆龄选集》上卷,第44页。

[2]《在莫斯科发表的声明》(1927年9月6日),《宋庆龄选集》上卷,第55页。

宋庆龄在“宁汉合流”一个月后即出访苏联，先后在列宁和马克思的故乡旅居了四年。在苏联和德国，当时聚集着一批向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学习革命经验，锤炼革命意志的中国青年——大革命失败后，许多著名的革命家流亡到这里，以便总结经验，重振旗鼓。宋庆龄在旅欧的四年里，目睹了资本主义严重的经济危机及伴随产生的空前社会危机——资本主义成为法西斯滋生的土壤。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生产及人民生活蒸蒸日上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了使严酷的现实得到索解，她经常整天“沉湎于书籍之中”^[1]，除阅读理论著作外，还大量阅读各种报刊杂志，包括国内出版的《新青年》及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克拉拉·蔡特金、多列士等德、法共产党的领导人与宋庆龄时相过从。同时旅居德国的坚定的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几乎每天都往访宋庆龄，共同研究中国的政治、历史，着重分析中国的土地——农民问题。邓演达在致国内同志郭冠杰的信中，曾述及这时期他们的有关情况：“关于继续中国革命的事，已和孙夫人、陈友仁先生讨论多时，有了具体的结论。此后，我们的革命工作仍应注意农民问题，解决土地问题，以建立我们的革命力量。政治、军事工作，都应建立在这种力量上面，望努力推进这方面的工作。”^[2]宋庆龄亦曾忆述当年的生活：“在柏林的几年中，有一部分国民党员，邓（演达）同志在其中组织了一个学会并加以领导。……使那些接近他的人，都能获得极大的教益，并更深切了解中国革命前途。”^[3]

当宋庆龄1931年夏返国时，面对的是已经建立起来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统治和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极其黑暗的政治局面和人民的苦难，加速她世界观和政治思想的飞跃和转变。

宋庆龄在欧洲法西斯主义日益猖獗，而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如美、英、法等对德国的侵略政策采取绥靖主义的时候，公开宣布信奉科学社会主义。她提出“目前是资本主义垂死的时代”，并且“标志了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的诞生。”她从社会发展的角度阐

[1] 上海《民国日报》1931年8月14日。

[2] 转引自刘家泉著：《宋庆龄流亡海外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65页。

[3] 《纪念邓演达》（1941年11月28日），《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46—347页。

发无产阶级革命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资本主义制度带来了毁灭它自己的阶级——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凭着他在生产上所占的地位和明确的阶级利益，已经发展了自己的思想意识”，而且“取得了领导地位”，正在“领导着全世界被剥削和被压迫的人民——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的工人和农民从事斗争。”斗争的结果，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诞生——“俄国工农革命获得胜利，奠定了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1]宋庆龄满怀激情地讴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联，同时揭露像英、美、法这些“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的虚伪实质，指出它“对人民大众来说，始终是有名无实”的“形式民主”，只是“宪法上的具文”，当它与资产阶级的利益发生抵触的时候，“也要被取消的”^[2]。通过宋庆龄这些论述，表明她的世界观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她已经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来看待帝国主义阶段的世界历史的发展，并以此作为解决革命进程中各种问题的武器。

因此，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指导来分析总结中国革命，宋庆龄便可正确地判断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革命的对象、主力军、领导者，革命的道路以及前途等一系列问题。她根据蒋介石政权的倒行逆施，判定它是“欺压群众、祸国殃民的地主和资产阶级集团的代表”^[3]；中国人民革命的任务，既要“击败日本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又要“从中国的军阀、地主和资本家的枷锁下解放出来”^[4]。帝国主义侵略及封建主义压迫这双重枷锁的挣破，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惟有以工农政策为基础的党才能为社会主义打下基础，才能粉碎军阀的势力并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5]她同时充分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进行，而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指出：“只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土地

[1]《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在上海反战大会上的演词》（1933年9月30日），《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31—132页。

[2]《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1933年3月），《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07—109页。

[3]《中国的工人们，团结起来》（1933年5月24日），《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77页。

[4]《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在上海反战大会上的演词》（1933年9月30日），《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36页。

[5]《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1931年12月19日），《宋庆龄选集》上卷，第85页。

革命与反帝革命,才可以建立使中国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基础。”^[1] 宋庆龄以她特有的方式和语言,表达她对中国革命的理解,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及其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拥护和认同:“中国的亿万民众——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广大农民群众——如果联合起来为粮食和土地而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作斗争,即是不可抗拒的。”^[2]

树立了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以科学社会主义为信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宋庆龄以她的理论与实践证明,她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已经实现了自我超越,从旧民主主义跨入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范畴;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如同宋庆龄革命生涯中的第一次选择一样,宋庆龄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低潮时期,从信仰新三民主义发展至信仰共产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因“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而濒临失败的形势下,在受到中共排斥的困难环境中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的。然而,这次选择较之于第一次,则更为困难和艰辛。这种理性的选择,必须通过总结、自我否定和扬弃才得以完成。也只有那些最优秀的分子,才能从旧的营垒中脱胎出来,跨进新的革命行列。

爱国主义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是宋庆龄在漫长的革命道路上不断奋进的思想基础和原动力。对祖国的挚爱和对人民的义务感使她永不终止前进的步伐,始终站在历史潮流的前面,起着先驱者的作用。

丰富的革命实践和科学的理论指导,使宋庆龄的正确选择成为可能。宋庆龄自与孙中山结合始,便与革命结下了不解之缘。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目睹了昔日的“战友”如何用屠刀腰斩了孙中山的事业。鲜血与生命积淀的惨痛教训使她深知,要真正挽救和发展中国,必须改弦易辙,走新的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和如“酵母”般遍布国内各地的工农武装暴动,使宋庆龄于无声处听到了惊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存在,“给中国人民指了出路”^[3],也给宋

[1]《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在上海反战大会上的演词》(1933年9月30日),《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35页。

[2]《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在上海反战大会上的演词》(1933年9月30日),《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34页。

[3]《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在上海反战大会上的演词》(1933年9月30日),《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37页。

庆龄以鼓舞和信心,于是她合乎逻辑地、坚决地接受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和他的同志创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以及相应的路线方针政策。

优秀的个人品格及睿智卓识,使宋庆龄的正确选择得以实现。宋庆龄继承了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中所有的精华。热爱祖国和甘于奉献的精神,是宋庆龄优秀品格的核心。为了祖国的独立富强和人民的解放幸福,她可以忍辱负重,毫不计较个人的恩怨得失。她不因访苏期间由于与斯大林在许多问题上的歧见致使遭到冷遇而放弃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选择,也不因执行“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自己的误解而离弃孙中山的“联共”政策,反而在中国共产党遭受严重挫折的危难时刻公开宣布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事业,申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她的睿智卓识使她在经历了无数曲折之后,认识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掌握了历史的发展规律,这是她做出科学的选择的保证。大革命失败后,宋庆龄曾一度寄希望于国民党左派,她希望把他们团聚起来,加以改造和整顿,重振国民党以复兴中国革命。但国民党左派的涣散使她很快失望,终于不得不宣布“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而将目光集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斗争。

宋庆龄革命生涯中的这次重大抉择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作为孙中山事业的继承者和捍卫者,她的奋进成为联接贯通不同革命时期的津梁和纽带。她所带来的前一革命阶段的斗争传统以及经验、教训,成为新的革命阶段可资借鉴的宝贵财富;她把前阶段的革命队伍聚集于孙中山的旗帜之下,进行整顿和改造,并率领他们投入新的革命斗争。她的巨大影响和感召力,使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能够比较顺畅地获得广泛的认同。

四、抗战胜利后选择站在人民的一边

中国人民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战胜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民族团结抗战的胜利使全国人民对民族和解充满期望。宋庆龄正确反映了人民的意愿,她在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前夕,于1946年7月22日公开发表《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

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敦促国民党实现国内各民族和阶级间的和解，以实现和平建国。她真诚希望在中国建立一个超越党派利益局囿的真正人民民主共和国，认为“目前的危机不是那一边——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胜利的问题，而是中国人民的问题，他们的团结、自由和生活的问题。这问题不是双方增减兵力或者斤斤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所能解决的。悬于天平之上的不是党权的问题，而是人权的问题。”宋庆龄特别指出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的“无止无休”的谈判是“不能得到最后答案的”，她“特向中国两大党的领袖们和其他党派的领袖们呼吁，立刻将联合政府组织起来”，宋庆龄强调要“正确地理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并且在今天正确应用它”来指导联合政府的建立：1. 联合政府要由各党派的代表共同组织——这个政府“决不能单独由国民党派定的代表来组织”，全国各党派都应派出代表参加政府讨论和实施领导和和平建国的大计。即便是国民党的代表，也“应该由党员中推选”，“不应由一个统治集团指派”；2. 联合政府必须实行宪政——政府必须结束“训政”时期，根据宪法来治理国家。这个宪法必须得到中国人民的“承认和批准”，并且要明文规定“中国人民将有不可剥夺的自由”；3. 政府还必须“合理的解决”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土地问题，因为“人民起来反抗饥饿、封建主义和殖民制度，这是不能抹杀的权利”。宋庆龄敦促“国民党必须通过联合政府、人民民主和土地改革来执行它的历史任务，领导中国人民走向全面解放”。她警告国民党统治集团“现在是用实际行动来建立民主的时候了”，否则，“就要担负掀起内战的责任”^[1]。

宋庆龄在抗战胜利以后的政治立场，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反映了中国人民对国内和平、统一、民主、建国的热望。

国民党统治集团却坚持实行独裁统治，决心以暴力手段消灭共产党。还在抗日战争胜利临近之时，国民党就越来越把力量放在反共和反对国内其他民主力量方面。蒋介石在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大会上把发动内战以消灭共产党的罪恶企图表达得赤裸裸：“今天

[1] 《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1946年7月22日），《宋庆龄选集》上卷，第415—419页。

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1]美国则出于自己“全球战略”的考虑,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企图在中国建立一个亲美的政府。

当国民党反动派违背全国人民和平建国的愿望,甘为历史的罪人而重开内战的时候,宋庆龄选择以全部热情、智慧和力量支援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成为新中国的伟大的缔造者之一。

结 语

宋庆龄革命生涯中的几次重大抉择,反映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而她自己自觉顺应历史潮流,不断自我超越,一路进击,为祖国实现独立、民主、富强奉献一生,作出独特的贡献。宋庆龄走过的道路昭示我们:一个革命者,首先必须是充满奉献精神的彻底的爱国主义者,这点至今仍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作者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

[1] 程思远著:《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8页。

宋庆龄等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 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案之提出

朱玖琳

〔内容提要〕

华北事变以后,民族矛盾已明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国共两党均意识到共同抗日的重要性,在内战将近十年之后,双方终于首次坐到谈判桌前进行协商。时值国民党第五届第三次中央全会召开,1937年2月,宋庆龄、何香凝同孙科、冯玉祥等国民党中执监委成员联名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案,以协助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谈判活动,争取国民党中枢成员的支持,赢得公众的舆论同情,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关键词〕

宋庆龄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 孙中山 三大政策

1937年2月,宋庆龄、何香凝同孙科、冯玉祥等14名国民党中执监委成员联名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案。关于提案之提出曾有文专门叙述^[1],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结合两岸的相关档案和史料,以及远藏于美国的蒋介石日记,对提案之提出经过再作补充,并进一步探讨宋庆龄、何香凝为什么要选择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时提出提案,“西安事变”对其有何影响,宋庆龄、何香凝又是如何将提案告知蒋介石,蒋介石对提案的态度如何,提案之提出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如何,宋庆龄、何香凝是否出席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案如何公之于众,以及各国在沪媒体的反应如何等问题。希望透过表象,将这一段看似简单的史实再作进一步深入分析。

[1] 见杨天石:《宋庆龄为国共合作募集签名——近世名人未刊函电过眼录之五》,《光明日报》2003年9月16日。

一、在国民党中央枢成员之间的活动

1936年10月，宋庆龄、何香凝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中间，开始开展征集提案签名的活动。10月20日，宋、何二人特致函吴稚晖，希望他能领衔签名。函谓：

稚晖先生大鉴：

庆龄、香凝等于日前接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国民党及国民党员邮件一封，想先生亦已得读同样邮件矣。兹送上庆龄、香凝等所草就函件一通，素知先生一向遵守先总理临终遗嘱，想必能赞同而一致签名，现除先生外已有多人答允签名，不过欲先得尊名领衔耳。谨此 敬请

大安

宋庆龄 何香凝

十月廿日^[1]

此函信封上书：“面呈吴稚晖先生亲启 宋何缄”。

当日上午，宋、何二人代表持宋何函并宋、何、孙科已签名的提案（即宋何函中所谓“函件一通”）致吴稚晖处面呈，但未遇。代表后又持二人致李石曾函并提案，至李石曾处。李赞成联合战线的原则，即复一短信，并在孙之后签名，但李对提案的部分内容有保留意见，故于晚间作一长函致宋、何。次日，李石曾致函吴稚晖告知此事。函谓：

稚晖先生大鉴：

手示敬悉，静兄来京一节，已与谈及，亦有此意，惟行期尚未确定。

昨早宋、何两夫人有代表访弟，出示二君来函，弟即复一短函，除签名外，略谓尚拟有所申述，晚间又作一长函，函稿附上。弟意联合战线之原则不能不赞成，而内容则有须保留者，未知尊意以为何如。二君来函亦钞奉，其签名文件已签。宋何孙哲生三人弟曾签于孙之后，二君代表谓先已至先生处不遇，弟告以现不在沪，此事大约即与先生

[1] 台北“党史馆”藏“李煜瀛致宋庆龄何香凝函”，档案号“吴稚晖档案07741”。

日前所谈京中之事同一关系也。

余容续罄。此颂

道绥

弟石曾敬启

十月廿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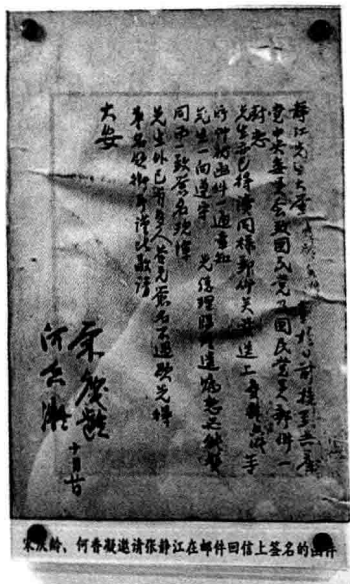
附件二纸。关于弟之函稿及此事前途均请赐教为禱。又及。

日来先生接其函件否？京中另有所闻否？又及。^[1]

李石曾抄录给吴稚晖的宋何二人来函以及他回复宋何二人的长函，在吴稚晖档案中未见。其回复宋何二人的长函内容我们大致可知，应该是他对提案保留意见的申述；而宋何二人来函的内容则应该与她俩致吴稚晖函内容一样。因为10月20日当日，宋庆龄、何香凝亦另有函致吴稚晖、李石曾二人的“静兄”张静江，内容与致吴稚晖函完全相同。^[2]

据此我们可以推断，10月20日是宋、何正式开始广泛征集提案签字的起始日期。这一天，她们至少签署了3份征集函，并派代表相继在南京和上海募集签名。依照地位的重要性，她们继孙科签字之后，又把征集对象定位在“三剑客”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的身上。虽然李石曾、张静江均先后签字，但是吴稚晖并未受他俩的影响，最终没有在提案上签名。

不久，何香凝只身前往南京，准备在南京举办救国画展，同时为征集签名而活动。在南京，冯玉祥夫人李德全曾特地在冯家私邸专门设宴欢迎何香凝。在欢迎宴会上，何香凝演说特别强调要“遵守总理遗嘱，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



宋庆龄、何香凝邀请张静江在邮件回信上签名的照片

[1] 台北“党史馆”藏“李煜瀛致宋庆龄何香凝函”，档案号“吴稚晖档案07741”。

[2] 见南浔张静江故居之张静江生平展览。

同奋斗”^[1]。

由于何香凝的亲自运动,主张为抗日应该联俄容共的冯玉祥也加入了征集活动。11月7日上午,冯玉祥拜访何香凝,谈联俄抗日之事,并陪同何前往张继家,征求其在提案书上签名。在张家,冯玉祥看到何香凝与张夫人崔振华谈话之热泪,“心中甚为难过”,张继在提案书上签了名。中午,冯玉祥同鹿钟麟、石瑛、张知本等会餐,又谈签名事,鹿、石二位亦签名。但是,冯玉祥回寓所不久,张继即找上门来,要求勾去签名,谓其夫人不敢赞同孙夫人宋庆龄的观点。冯推说已将提案书交还给何。^[2]事实上冯玉祥本人也感到压力,认为“环境如此,国事如此,宋、廖二夫人来的东西不得不小心”。11月8日,他同鹿钟麟商量的半天,认为不得罪张继的最好办法是去找李烈钧向张继说明提案的重点。^[3]11月16日,冯玉祥来到李烈钧家,详谈提案书及张继签字的事,李看了提案书后,“马上便有了办法,光明磊落的解决了一切困难”,他将自己的名字用浓墨签到张继的名字上,完全盖住了张的名字,并告冯打电话详告张。^[4]11月27日晚,孙科设家宴,宴请居正、李烈钧、何应钦、朱霁青、马超俊、梁寒操、张继、张知本、陈立夫、程潜等人,冯玉祥亦在列。显然,孙科也在为征集签名事效力。席中谈外交事,说日本已到了断交之时,但联俄还无甚把握。张继说,联俄抗日无问题,惟容共不可也。在座的各有各的意见,但大致相差不远。^[5]说明此时众人大多不赞成联共。在此过程中,包括汪精卫、石瑛、曾养甫在内的不少人均提出不仅要联俄,还要联英、法、美。^[6]为了反映众人对提案的意见,宋庆龄、何香凝修改了提案,将恢复“三大政策”改为扩大“三大政策”。

因为宋庆龄、何香凝等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呼吁恢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于是日本人便开始造谣。1936年11月26日,代表日本官方观点的上海日文报纸《上海每日新闻》称:

[1]《申报》1936年11月15日;《冯玉祥日记》第4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31页。

[2]《冯玉祥日记》第4册,第825—826页。

[3]《冯玉祥日记》第4册,第827页。

[4]《冯玉祥日记》第4册,第833页。

[5]《冯玉祥日记》第4册,第839页。

[6]《冯玉祥日记》第5册,第18、19页。

依照苏联政府的一个新的策略,中国共产党已加强它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宣传。一个反对日本的共同阵线已在中国建立,加强共产主义活动,它是指挥反对蒋介石的。这些骚动可能有严重的反应,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巡捕房已从事搜索煽动者。“救国联合会”的七个有名望的成员最近被捕,他们以反对国家安全的行为被控告。至于这个联合会的其他成员目前都将逃亡,当局正积极地搜索他们。

本月25日清晨,新的逮捕已完成,当时二个有名望的共产党成员包括宋庆龄夫人已被逮捕,由于事关重大,法巡捕房保守最大的秘密。

这两人的逮捕可能有严重的后果。^[1]

同日,上海的另一份日文报纸《上海日报》也刊登了同样的消息。宋庆龄随即于当日发出《为沈钧儒等七人被捕声明》,指出日方散步的谣言正好证实了七君子之被捕“是由于日帝国主义的影响所致”。她说,救国会以促进政府成立联合战线,抵抗日本侵略为目的,日寇为使政府与人民分裂而故意制造救国会的罪名,但这只能“更引起中国人民反日的忿怒和爱国的热诚”,并谓:“对我个人的攻击罪名,这是不值一笑的。我也用不着来驳斥这些日本报纸的污蔑。他们的惯于诽谤造谣卑劣宣传,早已有目共睹,有耳皆闻。”^[2]

谣言随即又从西安传到了南京。次年1月2日,冯玉祥在中山陵见到邵力子时,邵告冯说西安报纸有冯同孙夫人宋庆龄、廖夫人何香凝均失踪之事,冯即言:“日人之谣不可信也”^[3]。

二、“西安事变”的影响

宋庆龄等征集提案签名期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爆发后,下午四时,在上海,正在养病的孔祥熙通过南京得知消息,随即直接找到宋美龄告知她。^[4]当晚,在上海的宋氏家人除宋庆龄外均聚集一处商量对策。宋庆龄之所以没有参加,是因为宋家人认为

[1] 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法租界公董局警务处关于纪念孙中山活动情况及有关宋庆龄的言论和行踪”,档案号U38-2-929-032。

[2]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6—157页。

[3] 《冯玉祥日记》第5册,第3页。

[4] 郭荣生编著:《民国孔庸之先生祥熙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13页;〔美〕埃米莉·哈恩著:《宋氏家族——父女·婚姻·家庭》,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228页。

“尽管从私人感情方面她是同情的,但她绝对站在西北军一边”,所以不能让她来参加“这个讨论行动计划的会议”^[1]。是夜,宋美龄和孔祥熙、端纳等人乘夜车连夜离沪赴宁。曾经广泛流行的一个说法是:事变当晚,孔祥熙来宋宅要求宋庆龄签署一项关于谴责张学良、释放蒋介石的声明,遭到了宋庆龄的拒绝,宋对孔说:“张学良做得对,要是我处在他的地位,我也会这样做,甚至还会走得更远!”^[2]但事实上,宋庆龄直至事变次日才得知蒋介石在西安被扣。事变次日是星期日,是日上午,杨杏佛之子杨小佛一如往常地按照事先约定来到宋庆龄家,他在客厅坐等宋庆龄时,宋庆龄正在旁边楼梯间的挂壁式电话机前接电话,接完电话后,宋庆龄自言自语地来到客厅,她的神情略带紧张,口中反复嘟囔着“南京出事体了”、“南京出事体了”之类的话。午餐时,她对杨小佛说:“最近有人要来寻我了,我要忙了,最近一阵依不要来。”^[3]这一细节说明宋庆龄在事变当晚并不知情。此点与宋家人对宋庆龄有戒心,所以没有通知她参与家庭讨论正相吻合。

张学良扣留蒋介石之后,中国共产党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之间就是否杀蒋的问题产生了矛盾。有说法称:12月13日,宋庆龄把斯大林的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转发给毛泽东,电报称:如果中国共产党不利用他们的影响使蒋获释,莫斯科将斥责他们为“土匪”,并将在全世界面前予以谴责。^[4]这一说法是否成立遭到质疑。^[5]

中共中央收到的共产国际12月16日来电出现乱码,17日,中共中央又收到潘汉年发来的一封电报,其中译介了莫斯科《真理报》和《消息报》14日和15日的两篇指责“西安事变”和张学良行为的社论。另外,潘汉年在随后的一封电报中也明确提出:中共中央对事变的态

[1] [美] 埃米莉·哈恩著:《宋氏家族——父女·婚姻·家庭》,第229页。

[2] [美] 埃德加·斯诺著:《复始之旅》,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12页;毕万闻著:《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302页。

[3] 据杨小佛先生对作者口述。详见杨小佛口述、朱玖琳整理:《目睹孙夫人宋庆龄的两个重要历史时刻》,《孙中山宋庆龄研究动态》2013年第1期。

[4] [美] 埃德加·斯诺著:《复始之旅》第112页;毕万闻著:《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第305、318页。

[5] 杨奎松教授认为斯大林电报并不存在,斯大林也不可能通过宋庆龄向中共转发电报。详见杨奎松著:《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迷》,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24—325页。

度应保持慎重,切勿采取与张、杨同样之行动。中共中央随于20日收到共产国际重新发来的指示,并于21日复电表示中共也已经基本采取了与共产国际相同的方针。^[1]

可以肯定的是,宋庆龄清楚苏联方面对于“西安事变”的态度,她应该看到过季米特洛夫最后定稿的共产国际12月16日致中共中央电或者是莫斯科《真理报》和《消息报》14日和15日的报道。她的途径很有可能就是潘汉年。^[2]

认同杀蒋只会对日本最有利这一严重后果后,宋庆龄签署了一份要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英文声明。声明全文译文如下:

立即发

在就西安事变访问孙逸仙夫人时,孙夫人声明:

“中国目前处在战争之中,日本帝国主义军队正在入侵我国的绥远。考虑到现在国家正处在危急时刻,所有军队的当务之急是:求同存异,组成一个抗日的统一战线,任何企图阻碍此战线形成的做法都是在犯罪。

是什么促成西安事变的发生?目前还不太清楚。有一种说法认为,西安事变是由于张学良个人对蒋介石的不满而引起的。然而,在一份电文中,张学良称,他唯一的目的是劝谏蒋介石将军同意建立一个统一战线,抵御日本的入侵。

无论张学良的动机是什么,所有爱国的中国人都会认为这是一次最为不幸的事件,因为它又将国家引入内战的危险之中,而内战将导

[1] 见杨奎松著:《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迷》,第329页。

[2] 潘汉年在上海与中共中央进行联络的途径有两个,一个是靠张学良设在上海公馆的电台,一个是国民党为便利其谈判而提供的专用电台。潘汉年17日致中共中央电即通过国民党电台发出。(见杨奎松著:《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迷》,第323、329页。)另外,潘汉年在路易·艾黎的寓所还设有一台秘密电台。陈翰笙曾说:“由潘汉年领导的中共地下党电台,就设置在艾黎的寓所里。”(陈翰笙:《地下工作二十年》,张椿年、陆国俊主编:《陈翰笙百岁华诞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0页。)而艾黎也说:“我们家顶楼的小房间,设置了共产国际中国组的秘密电台,由甘普霖负责。有两个德共年轻的女党员维特·玛亚和菲利·玛雅协助他工作。我们通过这部电台,与在国内一些地方进行长征的红军保持通讯联络。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传来,我们都无比喜悦。借纪念俄国十月革命节的机会,我们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庆祝酒会。宋庆龄、史沫特莱和正在筹办《中国呼声》杂志的美共党员马克斯·格兰尼奇夫妇都赶来参加,刘鼎也参加了这次聚会。”(路易·艾黎:《刘鼎,杰出的中国人》,李滔、易辉主编:《刘鼎》,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致更深重的民族灾难,同时也给日本的入侵提供了便利。

一些孤立的活动,如拘留、监禁、暗杀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镇压大众的呼声和在另外一条战线上展开更大规模的内战只会把中国引向毁灭。中国目前正处在这样一个危急关头,她已不能在另一场法西斯内战中损失她的工人、农民、战士、市民和元帅。因为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中,需要他们每一个人。

内战必须停止,这是我一贯的立场。面临日寇入侵我国国门的危急时刻,个人的不同政见都必须放弃!

现在,另外一场南京和西安间的内战正在有逼近的危险。我热切地呼吁每一个中国公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阻止这样一场灾难的发生。让我们所有的中国人联合起来,抵抗日本侵略、保卫自己的祖国。”^[1]

宋庆龄没有在声明原件上签署日期。从声明内容上看,与季米特洛夫定稿的共产国际12月16日致中共中央电报有类似的地方。季米特洛夫的电报称:“张学良的行动,无论其意图如何,在客观上只能损害中国人民的力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并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2]宋庆龄的声明谓:“无论张学良的动机是什么,所有爱国的中国人都会认为这是一次最为不幸的事件,因为它又将国家引入内战的危险之中,而内战将导致更深重的民族灾难,同时也给日本的入侵提供了便利。”但是与共产国际完全否定张学良不同的是,宋庆龄的声明委婉地表示了对张学良的同情,声明谓:“在一份电文中,张学良称,他唯一的目的是劝谏蒋介石将军同意建立一个统一战线,抵御日本的入侵。”张学良曾于12月15日分别致电宋美龄、孔祥熙、阎锡山等,强调:“良等此举,纯为抗日,绝非造成内乱之意,并尽其所能,避免内战。”^[3]宋庆龄声明所指显系此电。

宋庆龄声明显然草拟于12月16日季米特洛夫电之后,声明左上角印有“立即发”字样,但当时并没有公开发表,究其原因,也许是因

[1] 中译文引自顾正斌:《评新发现的宋庆龄关于西安事变的声明》,载《纪念宋庆龄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3—144页。笔者对照原件略作改动。

[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6年12月16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5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65—266页。

[3] 转引自杨奎松著:《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第315页。

为中共迅速修正了其“西安事变”的认识和对蒋介石的策略，而国民党一边因为宋美龄等的作用，主和派占了上风，宋子文、宋美龄飞赴西安与共产党谈判，使得这一声明失去了发表的时效性。

12月25日，蒋介石在口头承诺停止“剿共”、实行联共抗日等条件后，获释离开西安。也许正是“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打消了部分国民党中执监委的顾虑，促使他们支持恢复“三大政策”。此前，国民党中有很多人始终不承认孙中山有所谓“三大政策”，而这一提案甚至将国民党人习惯称呼的“容共”政策明确提为“联共”政策。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份提案书上签字的14名国民党中执监委中，坚定的国民党左派只有宋庆龄、何香凝、经亨颐3人。

1937年2月13日，冯玉祥在日记中记道，是日，孙科告诉他：“一、孙夫人庆龄、廖夫人何香凝来函，为提案事，即总理三大政策实行事，又签名十四人；二、此案已经宋、何二位交给介石矣，请他斟酌如何……”^[1]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为治疗脊骨跌伤一直在休养，2月9日中午，他从杭州飞抵上海，每日进行电疗，2月14日为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蒋偕宋美龄飞往南京。宋庆龄、何香凝应是借探视在沪疗伤的蒋的时机，将提案面交蒋。从宋庆龄1937年1月26日给王明的信可以判断，蒋应该十分清楚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的内在联系。因为宋子文从西安归来后告诉宋庆龄，周恩来当着宋美龄的面告诉他，宋庆龄给苏区寄去了5万美元，还对他和宋美龄说，他们可以通过宋庆龄同红军的代表取得联系。^[2]

由于脊伤未愈，蒋继续在京电疗，未参加15日的开幕式。纵观蒋介石这一时期的日记，他时刻关注着即将召开的五届三中全会，并标注需要重视的全会重要案件。2月10日蒋记道：“孙宋等提案之注意”，2月11日蒋再记道：要注意“孙宋等提案之方针”^[3]。看来宋庆龄、何香凝在蒋抵沪次日便去看望了他，并面交提案。2月17日，

[1] 见《冯玉祥日记》第5册，第44页。

[2] 《宋庆龄给王明的信》（1937年1月26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5卷，第276页。

[3]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2月9—15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

蒋在会议召开两天后到场与会,午后,冯玉祥赴蒋宅参加会餐,蒋邀冯到楼上谈话,冯“告以孙夫人、廖夫人及大家之提案事”^[1]。蒋当时对提案的明确态度如何,蒋、冯日记中均未记录。但从这一时期,蒋日记中出现的“帝国主义之谋害他人之险狠,俄德皆然,岂仅倭寇而已哉”、“外交决独立自主为基础,而以国联为和平集团之惟一路线”、“编共而不容共”、“抗日而非排日”^[2]等字眼可以明确判断,蒋并不同意“孙宋等提案之方针”——停止一切对日辱国谈判,建立抗日联合阵线。

三、提案之提出与国共谈判的关系

就在宋庆龄、何香凝在上海将提案面交蒋介石的时候,1937年2月12日,周恩来等开始与国民党代表顾祝同等在西安进行正式磋商。^[3]是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要求周在谈判时应同时提出中共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的5项要求(停止内战,实行民主自由,召开国民大会,迅速准备抗日,改良人民生活)和4项保证(取消两个政权敌对,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改变名称,在革命根据地实行新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并谓“请告汉年”,“三中全会孙夫人等左派不可太突出”,所作提案必须考虑到蒋介石能否采纳,“估计蒋不能采纳者则不提”^[4]。显然,提案的提出与这一时期的国共谈判密切相关,中共要在舆论上进行造势,同时也在顾忌过分刺激蒋会影响谈判顺利进行。

华北事变以后,民族矛盾已明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联共(布)意识到在目前的局势下,中国的首要问题是抗日,国共必须为抗日实现统一战线。于是中国共产党也作出了相应反映,表示只要蒋介石抗日,中国苏维埃政府可以在抗日战线上与蒋携手。与此同时,国民党也意识到共同抗日的重要性。1936年初,宋庆龄受宋子文之托,

[1]《冯玉祥日记》第5册,第52页。

[2]《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2月10、11、16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

[3] 杨奎松著:《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

[4]《1937年国共谈判中毛泽东、周恩来、洛甫等的一组来往电文》,《中共党史资料》2007年第2期。

委派董健吾和张子华赴陕北瓦窑堡，向中共中央传递国民党要求与中共谈判、重建国共合作关系的重要信息。董带回了毛泽东关于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复电。^[1]

同时，宋庆龄也应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在为中共联蒋而努力。1936年7月，潘汉年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回国担任国共联系人。在上海，他会见宋庆龄、沈钧儒等人，向他们介绍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得到了他们的充分理解与赞同。^[2]当时，宋庆龄要求中共派给她的联络人李云帮她了解牛兰夫妇的情况，李云的丈夫徐强负责南京情报工作，其中就有一份有关牛兰的情报。经向冯雪峰汇报后，每次从南京来的密写情报中如有关于牛兰夫妇方面的情报，李云都抄一份给宋庆龄。潘汉年看到李云单独写牛兰方面的情报，就问她原因，得知情况后，潘汉年笑着说：“啊，夫人要，不是光她看，而且上面也要看。”李云感到奇怪，潘又笑着说：“不知道怎么搞的，他们怎么会把第三国际的关系交给孙夫人？！”^[3]

10月上旬，潘汉年再从瓦窑堡回上海，向宋庆龄面交毛泽东的致函及《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毛泽东在信中请求宋庆龄以所附中共致国民党函为参考，与潘汉年“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并介绍国民党中枢人员，与潘汉年会面。潘汉年当时主要任务之一是“发动各实力派向蒋要求立即停战抗日”，正值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全会即将召开，于是他草拟了“恢复三大政策的提议”致宋庆龄、何香凝、孙科，并运动各实力派签字。^[4]宋庆龄、何香凝一贯认为国民党在1927年后违背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同时两人均是坚定的抗日救国论者，因而她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议予以了积极的回应。

同时，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北平学联公开出面和华北各地学生团体联系，于1937年2月4日正式成立华北学生献旗请愿团，准备

[1] 详见石肖岩：《一份宝贵的资料》，《中国青年报》，1981年6月4日；杨奎松：《关于1936年国共两党秘密接触经过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

[2] 陶柏康等：《潘汉年生平大事年表》，载《潘汉年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7页。

[3] 李云：《党派我给宋庆龄当秘书》，《炎黄春秋》2001年第6期。

[4] 潘汉年：《关于与国民党谈判情况给毛泽东等的报告》（1936年11月12日），《党的文献》1993年第5期。

赴南京进行献旗、请愿,表达拥护国内和平统一、积极抗日的政治愿望,并准备在南京招待新闻记者、联络当地救亡团体。所献三面旗,“一面是献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旗帜,上面绣的字样是‘一致对外’,这是一幅横旗;向蒋介石献的旗上的字样是‘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日’;向冯玉祥副委员长献的旗上的字样是‘为和平而奋斗’”^[1]。献旗团12日抵达浦口就遭军警包围,14日即被勒令返平,原定计划根本无法实现。冯玉祥为此曾质问蒋介石,为什么要把献旗来京之人“押解回平”^[2]。

就在献旗团被迫返平当日,2月14日,宋庆龄亲赴南京,与何香凝一起访张知本,口头谈“扩大总理三大政策之事”,并嘱张将二人致冯玉祥函交给冯,告诉冯提案已修改,“改改前头,改改后头,并把总理三大政策改为扩大三政策”,“把联俄改为联俄、法、英、美”,“联共改为联各党各派”,“扶助工农政策,改为扶助工农、工商各行业之政策”。冯随即照此修改自己的提案,并找人签名。^[3]此举显然是为配合孙、何提案,做呼应之用。

1937年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开幕。宋庆龄等的提案被编为“密12号”,王法勤在提案封面上特别用毛笔批上“密交常会”的字样^[4],提案因此未在大会上公开讨论。冯玉祥的《促进救国大计案》虽有16人签名,但被编为“密13号”,同样未得到印刷,也“不读全文”。^[5]冯玉祥为此而感叹道:“孙夫人提的案子,很可以告知大众,本无什么不可说的,何必如此呢?”^[6]

四、宋庆龄在上海寓所公开提案

也许是为了响应毛泽东提出的“三中全会孙夫人等左派不可太

[1] 黄绍湘:《“一二九”运动中与国民党当局斗争的片断——华北学生献旗团赴南京请愿经过》,载《一二九运动回忆录》第一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 《冯玉祥日记》第5册,第52页。

[3] 《冯玉祥日记》第5册,第46、48页。

[4] 台北“党史馆”藏“提议为外患日急请讨论扩大总理三大政策团结御侮案”,档案号“会议纪录5.2/17.9.9”。

[5] 台北“党史馆”藏“促进救国大计案”,档案号“会议纪录5.2/17.9.10”;《冯玉祥日记》第5册,第54页。

[6] 《冯玉祥日记》第5册,第58页。

突出”，并且避免与坚持反共的国民党中央成员正面冲突，已经身在南京的宋庆龄、何香凝并没有出席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而是重回沪上。虽然提案未在会上得到公开讨论，但是宋庆龄以自己的方式向外界公布了提案，呼吁停止对日谈判，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2月18日上午，她在上海法租界莫利爱路寓所举行记者招待会。值得一提的是，她不仅公开发表了提案全文，还附上了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公开信。^[1]

当晚，在上海影响颇大的英文报纸《大美晚报》在它仅有的4开4版的版面上，用整整一个版面，以《呼吁成立抗日“联合阵线”孙夫人发表谈话号召群众运动 冯玉祥支持提案 寻求与苏联和中国红色政权联盟》为标题，全文刊登了提案和公开信。《大美晚报》是美国侨民在上海发行的报纸，地位仅次于《字林西报》，它一贯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在是晚客观报导道：“今天上午，孙逸仙夫人从她在法租界的寓所发出一份个人谈话，并附由孙夫人、冯玉祥将军和其他一些人联名诉请南京三中全会在民族危机时刻建立‘联合阵线’的提案全文。”“宣言追述了1924年允许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时期，呼吁恢复那一时期孙博士联俄联共与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并指出这样做将‘以救党国于危亡，以竟革命之功业’。”^[2]

当时，上海法租界公董局警务处政治科特地调查了沪上报界对此次新闻发布会的态度。对《大美晚报》，它略带咬文嚼字性地评价说：“《大美晚报》使用‘孙逸仙夫人从她在法租界的寓所发出’这样的字眼，完全不符合在莫利爱路29号进行的任何采访或记者招待会的报道方式。”并指出：除《大美晚报》外，其他转载的外文报刊有《东亚劳埃德报》（*Ostasiatischer Lloyd*）（德文报纸）、《China Daily Herald》（中文固定译法不详——笔者注）（亲苏报纸）、《上海每日新闻》（*Shanghai*

[1]《宋庆龄选集》将宋庆龄1937年2月18日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公开信标注为宋庆龄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的演说词，而且几乎所有宋庆龄、何香凝的有关传记和文章均称二人亲自与会，但是《冯玉祥日记》、《五届三中全会出席列席委员名单》（载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51—453页），均显示二人并未出席会议。法租界档案更是明确揭示了宋庆龄未参加会议的事实。

[2]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法租界公董局警务处关于纪念孙中山活动情况及有关宋庆龄的言论和行踪”，档案号U38-2-929-025-029。

Mainichi) (日本报纸)。《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仅发表了一篇简短的社论,批评孙逸仙夫人在中日两国关系有明显改善之际提出停止对日谈判。《上海泰晤士报》(Shanghai Times)和《大陆报》(China Press)则只字不提。它还特别提到:信件和提案的英文文本由位于汉口路同安里441号内的“China in Foreign Eyes Press”(中文固定译法不详——笔者注)译成中文。只有《新华晚报》(独立的报纸)和《大沪晚报》(在意大利领事馆注册的中意合办报纸)两家中国报纸于2月19日转载了该译文,但未加任何评论。^[1]

在上述报纸中,《大陆报》原是受孙中山委托由中美合资于1911年8月创刊的,此时该报已完全由孔祥熙掌控,《大陆报》的“只字不提”明显反映了孔祥熙对提案的个人立场。

由于国民党政府不愿向民众公开宋庆龄等的提案,所以绝大多数国人并不知道有此事。而仅有的两家中国报纸又将提案与公开信相混淆,把公开信当提案刊登出来,因而提案的中文稿事实上一直未获公开。3月13日,油印的中国红色政权机关报《新中华报》全文刊登了此提案书的中文稿草稿。4月15日,南京《救国日报》亦刊登了同样的草稿全文。^[2]至此,提案为公众所知。不过这份提案与宋庆龄、何香凝面交蒋介石的提案在内容、文字和句读上均有差异。

宋庆龄、何香凝面交蒋介石的提案全文如下:

提议为外患日急请讨论扩大总理三大政策团结御侮案

总理于民国十三年改组本党,确立联俄联共与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后,革命阵容,为之一新,革命进展,一日千里。不幸十六年以后,内争突起,阵容分崩;三大政策,摧毁无遗。革命旋归失败,外侮接踵而来。尤其最近五年间,失地几及六省,亡国迫于眉睫。凡属血气之伦,莫不推胸泣血。本党同志负革命成败,民族兴亡之大任,将何以对我总理在天之灵?将何以慰诸先烈不死之英魂?更将何以告数万杀身成仁残手断足之革命将士?吾等受总理托付之重,执行遗嘱,责无旁

[1] 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法租界公董局警务处关于纪念孙中山活动情况及有关宋庆龄的言论和行踪”,档案号U38-2-929-025-029。

[2] 全文可见《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63—164页;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436页。

贷，苟且偷生，常自惭恚，每忆及总理弥留时，因关怀革命，泪盈两眶，不肯遽逝，凄惨情形，尤觉不堪卒想。近接中国共产党致我党中央委员会函，提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足证团结御侮，已成国人一致之要求，虽与本党向处敌对地位之中国共产党，亦愿停止危害本党政权之企图，拥护统一抗日。我党更应乘此机会，急起直追，扩大总理三大政策，外与英、法、美等国进行联络，以接外援，内则全国各党各派一致团结，共同对外。更设法扶助农工商各行业，使与救亡图存之大业相适应；举全国之人力、财力、物力，以救党国于危亡，以竟革命未完之功业。为此特向大会紧急提议，即付讨论，扩大总理三大政策，以应付当前之非常国难，党国幸甚！特此提案。此致

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全体委员

提案人

宋庆龄 何香凝 李煜瀛 张人杰 经亨颐 石敬亭 梁寒操
张知本 孙 科 冯玉祥 鹿钟麟 李烈钧 石 瑛 朱霁青^[1]

公开发表件与面交蒋介石件，文字和句读的差异非常微小，可以忽略不计，但双方内容上有一段存在着实质性的差异，具体如下：

面交蒋介石件	公开发表件
近接中国共产党致我党中央委员会函，提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足证团结御侮，已成国人一致之要求，虽与本党向处敌对地位之中国共产党，亦愿停止危害本党政权之企图，拥护统一抗日。我党更应乘此机会，急起直追，扩大总理三大政策，外与英、法、美等国进行联络，以接外援，内则全国各党各派一致团结，共同对外。更设法扶助农工商各行业，使与救亡图存之大业相适应；举全国之人力、财力、物力，以救党国于危亡，以竟革命未完之功业。为此特向大会紧急提议，即付讨论，扩大总理三大政策，以应付当前之非常国难，党国幸甚！	近半年来，迭次接中国共产党致我党中央委员会书信通电，屡次提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足证团结御侮，已成国人一致之要求。最近西安事变，尤足证实此点。虽与本党向处敌对地位之中国共产党，亦愿拥护统一抗日，我党更应乘此机会恢复总理三大政策，以救党国于危亡，以竟革命之功业。为此特向三中全会紧急提议，以应付当前之非常国难，党国幸甚。

[1] 台北“党史馆”藏“提议为外患日急请讨论扩大总理三大政策团结御侮案 1937年2月”，档案号“会议纪录5.2/17.9.9”。

两相比较,这一段的差异共有四处:

一是关于中共与国民党中央的函电,面交蒋介石件只提到了1936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而未提1937年2月10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

二是关于“西安事变”,面交蒋介石件只字未提。

三是关于批评中共的语言,面交蒋介石件中有中共愿意“停止危害本党政权之企图”的字样,公开发表件则没有。

四是关于“三大政策”的内容,公开发表件用的仍然是恢复“三大政策”的内容,而面交蒋介石件则用的是扩大“三大政策”的内容。

面交蒋介石件不提“西安事变”,公开发表件则删除批评中共的文字;面交蒋介石件改用扩大“三大政策”,公开发表件却保留原恢复“三大政策”的内容。这是因为面交蒋介石件要照顾蒋介石的情绪,要反映签名的国民党中执监委的普遍意见,而公开发表件则更看重中共的形象,要为中共在国共谈判中赢得更多的舆论同情。

至于改恢复“三大政策”为扩大“三大政策”的关键内容,宋庆龄是以个人公开信的形式对外公布的。在公开信中,她疾呼“丧权辱国的对日谈判必须停止”,要求结束训政时期、尽早召集国民大会、集中人才、不拘党见、庶民众有实际上参加政府之机会,表示:“一切内争是可以、并且应当和平友好地解决。内战必须不再发生。和平统一必须实现。我们必须赶快建立反抗外来侵略的中国国防。”她还强调:“不要使我们自己在世界上处于孤立的地位,而要与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合作,如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1]

2月22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闭幕,这次会议首次公开提出抗日,并表示要和平统一,与中国共产党可以进行谈判,但仍然表示要根绝赤祸。蒋介石在散会后对记者发表谈话时表示:开放言论只禁止三点——宣传赤化与危害国家扰乱地方治安之言论与记载、泄漏军事外交之机密、有意颠倒是非捏造毫无事实根据之谣言;集中人才当充分

[1] 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法租界公董局警务处关于纪念孙中山活动情况及有关宋庆龄的言论和行踪”,档案号U38-2-929-027-030。

实现；赦免政治犯应有限制。^[1]

中共对此结果还是满意的，认为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宣言决议“提到对内集中国力和平统一，对外维护领土主权，一直抗战，并发表了目前的三民主义方针，这确是进了一步，应当欢迎他”^[2]。

在形势突变，以及包括社会舆论在内的各方面因素的合力之下，“七七事变”后，1937年9月22日，国民政府公布《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的宣言》，中共在宣言中宣称服从三民主义，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承认共产党的存在，并表示愿意不计前嫌，团结抗日。宋庆龄随即于26日在《抵抗》三日刊第12号、《救亡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国共统一运动感言》，表示：“中共宣言和蒋委员长谈话都郑重指出两党精诚团结的必要。我听到这消息，感动得几乎要下泪。”次年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在武汉举行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宣言和《抗战建国纲领》等文件，强调全国抗战力量应在国民党和蒋介石的领导之下，集中全力共同抗战。宋庆龄随即与何香凝共同署名发表《拥护抗战建国的纲领，实行抗战到底》的声明，拥护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所发表的“宣言”和《抗战建国纲领》。^[3]

结 语

华北危急之后，宋庆龄响应中共号召，致力于促进国共合作联合抗日。为帮助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回国的潘汉年实现发动国民党各实力派向蒋介石要求立即停战抗日的任务，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之际，宋庆龄和何香凝一起，以潘汉年草拟的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案，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中间，开展征集提案签名的活动。随后冯玉祥亦加入进来，协助宋、何征集签名。

在征集签名的过程中，宋庆龄根据被征集人的意见，对提案进行

[1]《申报》1937年2月23日。

[2]《1937年国共谈判中毛泽东、周恩来、洛甫等的一组来往电文》，《中共党史资料》2007年第2期。

[3]《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23—226页。

了修改,将恢复“三大政策”改为扩大“三大政策”。

其间,“西安事变”爆发,宋庆龄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显然对征集签名活动十分有利。宋庆龄和何香凝直接将提案面交蒋介石,引起蒋的注意。为了配合宋、何的提案,冯玉祥也草拟了一份类似的提案,“西安事变”后,遵照宋庆龄的指示,冯玉祥修改了自己的提案,把恢复“三大政策”改为扩大“三大政策”,把联俄改为联俄、法、英、美,把联共改为联各党各派,扶助工农政策,改为扶助工农、工商各行业之政策,从而将联合抗日的统一战线阵营扩大到最大化。但是两份提案均未得到全会的公开讨论。

为了不过分刺激蒋介石和坚决反共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们,宋庆龄没有去南京参会。在全会召开期间,她在上海寓所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了提案全文。尽管如此,由于国民党政府不愿向民众公开宋庆龄等的提案,以至于提案的中文稿草稿在事隔两个月之后才在国统区得以公开。

提案在全会上未得到公开,更谈不上通过,它的意义在于配合国共谈判,帮助中共在舆论上造势,尤其是获得部分国民党中执监委的同情,它是各方合力推动国共合作抗日的重要环节之一。

(作者为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研究室副研究员)

宋庆龄在中国救济福利领域的贡献与作用

沈海平

〔内容提要〕

宋庆龄倡导新型的救济福利主张与理念,开辟新型的救济福利工作道路,为中国社会救济福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特别是她在新中国成立后,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在社会福利与救济领域所做出的努力与探索,对我们重新认识现行的社会福利发展和福利国家模式更是具有指导作用。

〔关键词〕

宋庆龄 救济 福利

作为20世纪的伟大女性,宋庆龄对世界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她在社会救济与福利领域的探索与实践,更是她一生所做贡献中十分重要的部分。宋庆龄有主张、有方法、有机构、有贡献、有影响。她以自己的努力与实践,推动了该领域的发展。

宋庆龄曾亲手创办了一个国际救援机构,并实施领导长达43年,直至她辞世。在这个机构里,凝聚着宋庆龄的思考、理想、追求和创造。在她逝世30年之后,由她创办的机构,依然延续着宋庆龄的精神,至今生机勃勃、充满活力。

本文试通过对宋庆龄创办并领导救援机构长达43年的探索与实践的梳理,浅析她在中国救济福利领域的贡献与作用。

一、倡导新型的救济福利主张与理念

1938年6月14日,宋庆龄在香港成立了战时救援机构——保卫中国同盟,全力投入到战时救援工作之中。至此开始,宋庆龄有关救济与社会福利的论述不断公之于众。在她撰写的诸多文章和发表的讲话与函电中,都倡导了积极的救济主张与全新的理念。

1. 救济是为了赢得和平

宋庆龄有一句名言：“救济只是反法西斯的救济。救济只是争取民主的救济。”^[1] 她认为，要拯救战争难民，除了给予物资上的紧急援助外，更重要的是要打赢这场战争。1939年“三八”妇女节，在香港各界妇女集会上，宋庆龄发表演说，从国际反法西斯战略视角，揭示中国抗战的国际意义。她说：“我们中国人民和笼罩世界的战争威胁做了斗争，同时也为着你们的和平做了斗争。”^[2] 她理直气壮地向全世界呼吁支援抗日战争，因为“中国不仅单为了她自己而抗战，并且也为了全人类。”“我们的抗战是反抗压迫者、法西斯主义、黠武主义，而这一切也是你们的敌人，从这个共同基点上，我们有着呼吁你们援助和支持的权利。”^[3]

宋庆龄提醒欧美各国“远东前线依然是抵抗法西斯侵略的关键地区，它还将被证明是一个决定性意义的地区”，“一个自由的中国，是远东和平的唯一保障。一个自由的中国，将是走向全世界和平和自由的第一与最重大的步骤”，“中国的斗争就是你们自己的斗争；但中国的需要更大！”^[4]

这种由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和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所折射出来的救济工作理念，赢得了海外救济团体和广大爱国同胞的充分认同，成为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和一切救济团体有效合作的思想基础，使保盟的救援工作迅速打开局面。

2. 援助是相互的

基于国际援助相互性的立场，宋庆龄打破了传统的救济是单方面恩赐的观点，首创了一种全新的观念，即在捐赠者与被捐赠者之间是一种共同反对法西斯敌人的平等关系。在《向美国世界青年大会播音演讲词》中，宋庆龄指出：“日本希望征服中国，用作征服一切太平洋国家，随后并征服全世界的根据地。今日你们帮助我们向这种威胁作

[1]《给中国在海外的朋友们的公开信》（1943年9月18日），《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78页。

[2]《关于援助游击队战士的呼吁——在香港国际妇女节集会上所作的演说》（1939年3月8日），《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66页。

[3]《致英国工党书》（1937年9月17日），《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02—203页。

[4]《致外国团体的信》（1939年10月20日），《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89—291页。

战,也就是帮助你们自己,免得你们自己的青年,以后在别的战场上牺牲。”^[1]她在《给全世界的朋友的信》中指出:“我们有权这样要求你们,因为中国政府 and 中国人民在斗争中已经在帮助你们。而正在成长过程中新的、强大的和民主的中国,将来会给你们更多的帮助。”^[2]她在《展望战后》一文中指出:“只有在占人类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民完全赢得了民族独立和民主之后,中国巨大的生产力才会解放出来,使整个世界受惠。”^[3]在《致耿丽淑》的信中说,“过去,中国人民总是处于‘受援者’的地位。现在胜利以后,我们能够从物资上与精神上都处于‘捐赠者’的地位,特别在被压迫国家的进步势力之间尤其如此。”^[4]

3. 救济不是施舍

宋庆龄和她领导的机构,坚持反对一些外国救济机构把对中国人民的捐助与救济视为“行善”和“施舍”。她多次阐明,中国人民不是乞丐,而是为维护人类共同利益而请求援助。

某些外国团体抱着“施舍”的心态实施对华援助,因而将一些弃之不用东西甚至上次世界大战时生产的过期药品和废旧绷带抛给中国。宋庆龄对这些把“垃圾”作为施舍的行为极为愤慨,宋庆龄通过她领导的保盟对此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同时将两个国家的红十字会把1917年生产的物品运来中国的事公之于众,并且发表文章谴责这一卑劣行径:“无论怎样不起眼的援助我们都欢迎,”她严正指出:“捐赠一些完全无用的器械、对中国伤员和全力护理伤员的优秀医生,这是一种侮辱。”^[5]

宋庆龄坚决摒弃那种把中国人民当作“施舍”的对象,反对以居高临下或“恩赐”的姿态从事救济工作的陈腐观念,认为援助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援助与受助的双方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她毫不犹豫地拒绝那种附有政治条件的任何“行善”活动。

[1]《向美国世界青年大会播音演讲词》(1938年8月23日),《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45—246页。

[2]《给全世界的朋友的信》(1939年5月1日),《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74页。

[3]《展望战后——抗战纪念日致美国友人》(1939年7月7日),《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84页。

[4]《致耿丽淑》(1950年5月29日),《宋庆龄书信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9页。

[5]中国福利会编、吴景平译:《保卫中国同盟通讯》(上),中国福利会出版社2013年版,第45页。

她自豪地表示：“在中国的福利工作中，并没有一点‘慈善’的气息，也没有资本主义救济活动的‘施舍’心理。”^[1]“每一块募集到的钱，每一个为这目的而发出的呼声，都不仅是减除痛苦，而且是打击那些制造这种痛苦的东西。这些东西如果我们不予摧毁，它们就必然要带来新的灾难。这是最真实的人道主义。”^[2]

4. 救济福利工作以自力更生为前提

宋庆龄始终坚持以自力更生为前提，强调助人以自助。即“授之以渔”而非“授之以鱼”。她曾一再重申：“就救济工作的意义来说，就是我们要创办和维持一些可以自给自足的工作计划，这就是我们的指导方针。”^[3]

宋庆龄反对依赖外援，她说“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我们才能把中国建设成新世界的一部分。”^[4]对一些国家刻意造就中国人的依赖心理，宋庆龄叱责道：“当他们以慈善的姿态给我们一碗米的时候，他们要迫使我们感谢帝国主义，他们企图使人们轻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的力量，他们一直在培养一种对慈善救济的依赖性，那些以帝国主义为背景的救济机构，要我们感谢今天的恩赐，但是从来不帮助我们为明天而努力。因此，我们觉得这种帝国主义式的救济工作必须连根拔掉。”^[5]

宋庆龄十分重视发挥中国人民自身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用通俗的语言讲，即提倡“造血”，反对“输血”。从长远着想，她认为不应该采取“直接分发衣食的消极救济”，真正的救济“不是通过外国机构来分配救济款物，而是帮助中国人民使他们有自救的力量。”^[6]

“中国福利基金会多少年以来，一直拥护帮助中国人民使他们能够自助这个主张。这一点是可以向我们的支持者和我们自己保证的。我们一直在这一合适的步骤中进行着工作。除了一些紧急事情外，我

[1]《福利工作和社会主义》（1958年6月），《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13页。

[2]《给中国在海外的朋友们的公开信》（1943年9月18日），《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78页。

[3]《致海外朋友的第四封信》（1948年3月），《宋庆龄选集》上卷，第447页。

[4]《给中国在海外的朋友们的公开信》（1943年9月18日），《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76页。

[5]《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报告》（1950年4月25日），《宋庆龄选集》上卷，第526页。

[6]《给国外朋友的一封信》（1940年4月15日），《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09页。

们是要把事情从基础做起的。”^[1]

1948年3月,宋庆龄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们工作计划的新重点,是给人民以生活和建设的机会。这对他们的许多人来说,还是初次有这样的机会。为他们提供这样的机会,就是这个福利工作的合理的基础。”^[2]

5. 一视同仁的帮助——提倡公平、公正

宋庆龄为她创办机构制定的原则是“一视同仁的帮助”。给最需要帮助的人以帮助。她说“我们反对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对救济和恢复的工作设置障碍,并对它斗争……我们的工作遍及全国各个角落的人民,无论他们为了什么原因,居住什么地方。这是我们引为自豪的历史。”^[3]

她多次阐明“中国救济事业,作为积极的、民主的活动,就是要按照平等、按照比例的原则对所有抗日的人民予以援助。”^[4]在确定援助对象和援助项目时,宋庆龄坚持福利理论中最重要的公平规则。宋庆龄总是强调给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以援助。宋庆龄说:“我会是一个志愿建立的救济组织,它专门帮助一些需要各种支援和值得支援的机构。”^[5]“我们的救济方针确定地建立在‘帮助需要最迫切的地方’这一基础上的。”^[6]

“哪里需要援助,哪里的人民在自力解决困难,我们的援助就到哪里。”^[7]抗战时期,宋庆龄选择抗日根据地全力援助。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华日军以其63%—75%的兵力,对敌后根据地实行残酷的“大扫荡”,敌后军民处于抗战以来最困难的阶段。

解放战争时期,宋庆龄选择了解放区。正如宋庆龄所说:“我们致力的一方面工作,是要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其他半官方团体所提供的国际救济资金和物资中,为在战争中出力最大,损失也最大的解

[1]《致海外朋友的第四封信》(1948年3月),《宋庆龄选集》上卷,第447页。

[2]《致海外朋友的第四封信》(1948年3月),《宋庆龄选集》上卷,第446页。

[3]《致海外朋友的第四封信》(1948年3月),《宋庆龄选集》上卷,第447页。

[4]《给中国在海外的朋友们的公开信》(1943年9月18日),《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78页。

[5]《致蒋廷黻》(1945年10月25日),《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90页。

[6]《救济工作和政治——答宋子文先生》(1941年6月14日),《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30页。

[7]《致海外朋友的第四封信》(1948年3月),《宋庆龄选集》上卷,第447页。

放区争取他们应得的一份。当时,这种救济金和物资的98%拨给了国民党。而拥有全国遭受战祸人口至少一半以上的解放区,只分到2%!”^[1]

新中国建立后,宋庆龄本着解决急需、着眼未来的原则,选择在妇幼保健、少年儿童文化教育事业方面开展实验性、示范性的工作和科学研究。因为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有很多事情人民政府来不及做。尤其是在妇女、儿童的卫生保健,少年儿童的校外教育、课余生活、文化娱乐方面,当时政府无法顾及,而宋庆龄认为十分必要,需要马上着手进行。于是亲自创办了一系列专为妇女儿童服务的新型机构和设施,为构建和谐社会进行了有价值的探索和尝试。

6. 为人民谋福利是国家的责任

宋庆龄最突出的贡献在于她提出了社会主义福利观。

1927年至1931年宋庆龄经过到苏联以及欧洲的学习与考察,对救济与福利工作有了新的认识与感悟。宋庆龄提出,福利工作是国家的一种责任。为人民谋福利是国家的责任。宋庆龄认为,国家有责任为人民谋福利,尤其是教育、就业、医疗,是每个人应享有的基本福利。她说:“救济福利工作是每一个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必需的附带物。国家本身就含有作为一个机构来为社会服务的含义。它是在历史上某一特定的时期中建立起来的,当社会从低级发展到更高级的形式,福利设施也随之而发展,为更广大的人群服务,成为国家对它的成员不可推诿的一种职责”^[2]。人人享有平等、民主、自由与幸福的生活是宋庆龄一直追求和奋斗的目标,宋庆龄的理想是要建立一个普及福利的国家。她创建的机构——中国福利会,就是一个以为人民谋福利为己任的团体。她说:“中国福利会是在一个时代里诞生,而在另一个时代里成长的。我们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垂死的痛苦中开始了工作,并曾用我们绵薄的微力来加速它的崩溃”^[3];“在这个伟大的历史变革中,它为加速反动势力的死亡,助长新生事物的成长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尽管这份力量有限,但因为它汇合在人民革命的洪流中,

[1]《为人民服务四十年》(1978年6月),《宋庆龄选集》下卷,第555页。

[2]《救济福利工作的两种概念》(1958年6月14日),《宋庆龄选集》下卷,第314页。

[3]《救济福利工作的两种概念》(1958年6月14日),《宋庆龄选集》下卷,第314页。

因而发挥了作用,我们为此感到欣慰和自豪”^[1]。因此,不论是“福利国家”或是没有这种称谓的国家,都应当采取措施建立和完善福利制度,增加政府对社会福利事业的投入。同时,应该建立多渠道筹集资金的机制,以发展福利事业。

宋庆龄是新中国第一个认识到,也是第一个提出儿童权益的保障要载入国家宪法与法律,纳入政府工作职能的人。1949年12月11日,亚洲妇女代表会在北京召开,宋庆龄在书面发言中呼吁亚洲妇女们为“母亲对儿女的权利”、“增加托儿所、保育院、幼稚园、卫生设备与个人卫生教育来保养儿童”、“所有儿童必须受强迫免费教育、并开展‘小先生’运动以扫除文盲”^[2]……此后,宋庆龄又多次在文章中阐述这个观点,并且作为国家领导人在相关工作领域不断予以推动。这不仅仅是她的理性认识,更是她从实践经验的总结。

此外,宋庆龄还提出了福利工作的两种概念——她指出,“由于社会性质不同,这种服务的概念也有所区别,而且有很大区别。”她批评了虚伪的,以慈善为外衣的救济概念。“他们的计划和设施的目的,不外是利用人类的同情和善意,来转移人们对于旧社会中造成的对人的巨大损害和糟蹋的注意力”,“最坏的时候,这种救济福利工作玷污了‘慈善’的名义。”——在大多数人民享受不到福利国家恩赐的社会,救济工作也是为了使这种制度神圣化的巨大努力的一部分,所谓救济工作,也就是被用来给那些没有对人民尽职的社会作一些“弥补”的工作。她说“实际上,在旧社会里,大部分救济福利事业正是被当作另一种大买卖来做的。首先,社会本身制造了一些问题,扩大和促进了‘慈善’的迫切需要。其次,由于那种国家没有足够的条件来制定和实施人民所需要的救济福利工作,于是就培养了大量的私人慈善事业。然而从人民身上榨取的金钱究竟有一个限度。”^[3]

她高度赞扬了社会主义制度,认为只有在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社

[1]《为了下一代的成长》(1963年6月),宋庆龄著:《永远和党在一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7页。

[2]《在亚洲妇女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49年12月11日),《宋庆龄选集》上卷,第490—491页。

[3]《救济福利工作的两种概念》(1958年6月14日),《宋庆龄选集》下卷,第319页。

会制度下,才能动员国家的全部资源和人力,完成它的目标。“在所有的社会形态中,社会主义在其他各方面也都是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1]

宋庆龄的新型救济福利观,说到底即社会主义的救济福利观。她提倡人与人之间,包括国与国之间建立一种平等互助、团结民主、诚信友爱、和谐相处的关系,注重人的发展,要求让人们受到广博的教育,不断提高人们才智教育的实施,尤其对社会弱势群体应给予更多的关怀,保护妇女儿童权益,关心妇女的身心健康和儿童的成长,让全体人民更多地分享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与发展的成果,共享幸福美好生活。

二、开辟新型的救济福利工作道路

宋庆龄是十分务实与注重行动之人。宋庆龄对社会福利与救济领域的探索,不仅仅是在理论上,更多则体现在她的实践方面。

宋庆龄进行的救济福利实践分为三个阶段: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三个阶段中,机构的名称与目标以及工作重点和范围都有所不同。

在第一个阶段,从1938年至1945年,宋庆龄领导保卫中国同盟,打破了不同肤色、不同政治倾向和不同社会地位之间的界限,体现出真正的人道主义,成为让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成为联系五大洲人民之间友谊的纽带,从而架起世界人民支援中国人民抗战的桥梁。宋庆龄在抗日战争时期创办救援机构的实践,也为中国慈善救济事业的发展增添了光辉的篇章。

在第二个阶段,从1945年底至1950年8月,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以不足5年的时间,作出了卓越成绩与贡献,在1950年4月底于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救济代表会议上获得一致公认。宋庆龄应大会邀请,报告了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并当选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执行主席。

1950年起,进入宋庆龄实践的第三阶段。第三阶段的重要任务是,开辟社会福利新领域,将科学研究引入福利事业。长期以来,中国

[1]《救济福利工作的两种概念》(1958年6月14日),《宋庆龄选集》下卷,第321页。

福利会正是由于坚持了宋庆龄“实验性、示范性、加强科学研究”的方针,不以追求为妇女儿童服务的数量为目标,而是致力于在为妇女儿童服务的领域里不断研究、实验、示范、推广,不断创新,不断提高,用获得的经验与成果向全国同行以及类似的机构示范与普及,服务于全国,惠泽更多妇女儿童与家庭。也使得中国福利会机构的事业始终保持领先,充满生机与活力。

在上述三个阶段的实践中,宋庆龄的探索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对救援机构组织架构的探索。

由宋庆龄亲自创办的国际救援机构,从组织架构、人员结构、以及机构名称的确定,领导成员的组成,都是一种全新的探索。这个独特的机构,历经三个历史时期,无论选择机构名称,还是考虑活动区域,或是工作范围与重点的调整变化,都是开创性的,也是与时俱进的。

宋庆龄根据所处的时期与不同的工作重点与主要任务,及时变更机构名称,使之与机构的性质与任务相符。从全力准备打赢抗日战争的“保卫中国同盟”,到抗战胜利后致力战后重建工作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再到新中国诞生之后的“中国福利会”,机构名称因不同的历史阶段与不同的中心任务而三次及时变更,机构性质与工作范围也从名称上一目了然。机构的所在地,由香港—重庆—上海,也根据机构开展工作的环境因素与便利程度而决定,一切为了确保事业的顺利开展。

机构领导层的构成,也是宋庆龄的一大探索。保盟时期的核心人物是一个统一战线的联合体:曾经担任会长的宋子文具有国民党政府的背景;保盟中央委员廖承志与廖梦醒姐弟都是共产党的代表;保盟中央委员贝特兰是著名的新西兰籍记者与作家;保盟名誉秘书是香港医务总监司徒永觉的夫人、英国人希尔达·赛尔文—克拉克,保盟名誉司库是香港大学历史教授、英国人诺曼·法郎士;负责保盟宣传工作的爱泼斯坦当时没有国籍,是美国合众社的记者;美国籍的马海德与德国籍的王安娜分别担任保盟驻延安与重庆代表;基督教女青年会的耿丽淑是保盟在上海分会的联络人;担任保盟司库的邓文钊时任华比银行经理。此外,保盟的名誉会员中,有罗斯福总统的母亲、作家赛珍珠、印度总统尼赫鲁和科学家爱因斯坦等。中国福利基金会时期,

五位核心领导成员中,三位为外籍人士。担任总干事的美国人谭宁邦,是由美国共产党主席介绍而来的,曾任职美国军队宣传部门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福利会时期的领导层,更是由国家与上海市各相关部门的领导担任,但是仍保留了两位美籍顾问——谭宁邦与耿丽淑。特别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对外封闭较长的历史时期中,宋庆龄领导的机构,自1952年起,不仅任命了美籍顾问,而且拥有较多外籍工作人员(在宋庆龄创办的《中国建设》杂志社,来自不同国度的外籍工作人员前后约有90多人)。

其二,尝试不同的救援模式。

与传统救济模式直接给付金钱物不同,宋庆龄除了根据急需与突发灾难给予及时与必要的救助之外,注重以各种具有造血意义并持续有效的项目援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庆龄探索了对战时医疗系统与战时经济战线的救援模式,并给以重点支持。

宋庆龄把工合和工合运动视为无价之宝,认为它是在战时实现孙中山先生民生主义的有效途径。她亲自担任了工合国际委员会名誉主席。著名的香港“一碗饭”运动就是为支持工合运动而发起的。工合运动的目的是为振兴民族工业,在经济上有力地支持了坚持持久的抗战,解决了大批抗战急需物资,安置了众多失业工人和难民。工合创办的培黎学校,为中国民族工业,培养了大批技工,成为经济上的国防线。

支持建立战时公共医疗事业,也是宋庆龄的一项重要探索。在她的领导与支持下,解放区的医疗卫生事业得到不断发展。国际和平医院从1939年建立起的一个,到1945年底,发展到四个。到1948年,发展为八所中心医院,它们分布在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苏皖、山东、晋绥、冀热辽等地区,还有42所国际和平医院分院,共有11800张床位,此外还有几十个战地巡回医疗队,为1.4亿人口的解放区军民服务。中国福利基金会还帮助解放区先后成立了六所白求恩医科学学校和许多短期医科训练班,已培训2000多名各类医务工作者。医疗救援模式,为新中国的医疗事业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此外,宋庆龄与国际组织合作建立的战灾儿童义养会中国分会,

也为救助战灾儿童,探索了新的有效救助模式。

其三,开辟新型工作领域。

抗战胜利后,宋庆龄就率先在上海劳动人民集中居住的棚户区开始着手新型儿童福利工作的探索与尝试。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她在街心公园,用铁皮搭建房子,开办儿童福利站和儿童图书室,组织儿童剧团和小先生活动。同时建立医疗室,组织医务人员,义务为女工体检、治病,为船民接生。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即派出妇幼保健与少儿工作专家专程赴东欧各国考察、取经。还选派一批骨干到大学深造,邀请第一流的专家为机构培养各类专业人才。在宋庆龄直接领导下,建立了新中国第一个妇幼保健医院、儿童艺术剧院、儿童艺术剧场和少年宫,形成了一个专门为妇女儿童健康服务的系列。她在新中国成立后所从事的一系列努力,开辟了新型福利事业的道路,推动了新中国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

其四,将科研精神引入救济福利领域。

全国解放后,宋庆龄作为国家领导人有大量繁忙的国务在身,但是,她将科学研究精神引入慈善救济与福利领域,通过自己直接领导的中国福利会这个机构发挥着特殊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她将自己领导的机构作为开展福利工作的实验基地,为机构制定了“实验性、示范性、加强科学研究”的方针,要求下属单位研究被政府忽视、遗忘、或一时间无法顾及之处。如在产科、在计划生育方面、在指导农村的妇幼保健工作方面,在儿童的校外教育、学前教育、儿童早期营养、优生优育等方面,努力保持一流的工作水准,起到实验、示范等作用。

由于宋庆龄的努力,在中国福利会的样板下,中国类似的妇女儿童福利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并迅速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全中国每个省市都有了类似机构。

三、指导中国救济福利事业的发展

宋庆龄率先把国际社会福利中先进的方法介绍和引进到中国,是推动中国从传统的社会慈善救济向近代社会福利转换的开拓者之一。

宋庆龄开创的社会救济与福利事业是新型的福利事业,它与旧的福利事业有着本质的不同。旧的慈善福利是在不改变社会生产关系、不触动旧政体的前提下,做些局部救济、弥补、镇痛,仅能缓解极少数人的一时困难,不能改变被压迫群众受压迫的地位。而宋庆龄开创的事业则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同民族民主革命事业相结合,直接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社会主义时期,是以妇女儿童的幸福与身心全面健康发展为主要目标,其性质、作用和地位是旧慈善事业所不能类比的。

综上所述,宋庆龄在救济福利领域的贡献对中国救济福利事业所起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理念与实践两大层面,具体如下:

1. 提升了中国救济福利事业的层次

宋庆龄以其政治家的卓越才能,和社会福利活动家的丰富实践经验,使她的社会福利思想和实践活动,超越了一般社会福利理论家以及社会福利活动家的境界,从一个较高的基点上来阐释社会福利。此外,她在新中国成立后,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在社会福利与救济领域所做出的努力与探索,对我们重新认识现行的社会福利发展和福利国家模式更是具有指导作用。

宋庆龄站在关注国家、民族的前途与命运的高度,开创了新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福利事业。她把自己的社会福利思想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相结合,与中国社会的实际相结合,把社会福利与救济事业与重大社会问题相结合,把社会福利及救济事业与未来国家建设与发展相结合,为中国的社会福利与救济事业引入了新理念,进而提升了中国救济福利事业的层次,并开创了全新的局面。

2. 创新了社会福利理论

宋庆龄在社会福利思想进入一个活跃的发展时期,社会福利活动开始跨越国界,走向国际合作和交流这个国际环境的背景下,积极吸收西方国家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新兴社会福利思想和理念,并将其移植到中国的土壤,形成和确立了她独具的国际社会福利的视野和福利观。同时她始终立足于融汇东西文化和将福利理论运用于实践活动中。特别是她提出的国际福利援助需要对等、平等、互惠的原则,对

当今国际社会的福利援助活动和理论发展仍然具有深刻的意义。

宋庆龄不是为救济而救济。宋庆龄社会福利与救济理念的核心与特点定位于世界和平与大同。将福利事业提高到维护世界和平的高度来认识,这是宋庆龄为加强福利事业所作的伟大贡献,它有助于消除人们将福利仅仅视为改善生计的传统观念。

3. 丰富了中国社会福利与救济领域的实践

宋庆龄十分善于引进与吸取先进经验并付诸实践。宋庆龄在引进现代先进慈善福利理念与方法的同时,身体力行,并积极付诸行动。

她创建并领导的机构——中国福利会,就是宋庆龄一项开创性的实践,也是宋庆龄为中国社会福利与救济事业做出的十分重要的贡献。这个机构是她为实现理想进行探索、创造并倾注心血的实验田。她开创了若干个第一,并在实践中创造了很多行之有效的好方法与好经验,创设了一批好的项目,丰富了中国社会福利与救济领域的实践。

4. 为中国社会福利与救济事业架起国际桥梁

中国福利会自开创之始,就是一个国际性的救援机构。在中华民族面临危亡的时刻,宋庆龄把中国的抗日战争,看成是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组成部分,把中国看成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部战场。

中国福利会人员组成的国际化,使得机构与国际社会联系广泛而紧密。机构自创立之始就与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国家的友好团体及东南亚的华侨组织建立了密切联系。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仍在机构中保留外籍专家,并通过对外的《中国建设》杂志和为妇女儿童服务的基层单位,保持与世界的联系与沟通,使她领导的机构,成为让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成为联系五大洲人民友谊的纽带。

宋庆龄善于与社会的方方面面沟通、接触,通过多种方式、不同渠道,让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了解中国人民的真实情况,使世界各国人民切实有效、源源不断地援助中国人民。为了民族的利益,为了人民的幸福,宋庆龄团结不同政治主张和信仰的团体、个人共同携手,齐心协力。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会所起的作用,打破了不同肤色、不同政治倾向和不同社会地位之间的界限,体现出真正的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

5. 创建了廉洁清新的慈善形象

救济福利事业能否做到公平、公正、公开,是赢得公众信任的关键,也是宋庆龄开展社会福利与救济事业一贯坚持的原则。

宋庆龄领导的机构,人员紧凑,从宋庆龄开始,从领导成员到骨干,绝大多数工作人员都不领取任何报酬。他们心甘情愿地凝聚到宋庆龄身边无私奉献,乐尽义务。宋庆龄曾毫不犹豫地坚决拒绝了有人要拿善款买一辆轿车的建议,她说:“把每一枚铜元用到祖国的抗日战争中去。”^[1]

宋庆龄要求认真对待每一份捐赠,每一笔捐款。并将每一笔捐赠的来源及去向公开刊登在机构的刊物与年报上。从宋庆龄创办机构开始,所有账目一律公开并接受会计事务所的审计。她要求所有工作人员在接受捐赠时都必须签名盖章。在上海宋庆龄故居,今天还保存着一枚刻有宋庆龄名字的戒指,这是宋庆龄专门用以在捐款时盖章的。宋庆龄自己经常在签名盖章时磨出茧子——因为太多人为了获得宋庆龄的亲笔签名而踊跃捐款。宋庆龄常常亲自给捐赠人复信,表示由衷感谢,并且详细告知其捐赠的具体用途与去向。无论是捐出3本旧图书,还是捐出10元钱。

宋庆龄经常亲自到仓库参加清点物品。在义卖活动中,她带头捐出珍藏的孙中山的遗物,筹集善款。宋庆龄还腾出母亲的房子创办托儿所,捐出获得的斯大林和平奖金10万卢布创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宋庆龄以其高贵的情操与崇高的威望,被誉为“中国的良心”,为中国慈善事业树立了公平、公正、公开、廉洁、透明的典范。

6. 推动中国社会福利与救济专业化建设

基金会与国际救援团体发源于资本主义国家。最早始于17世纪,到19世纪迅速发展。期间,经过200年的演变,才形成较完善的运行与操作模式。由于它是随着近代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产物,所以,在落后的中国,慈善救济团体总体处于较低的水平。

宋庆龄领导的保盟,自1938年成立,就是一个国际化的救援团

[1] 转引自尚明轩、唐宝林著:《宋庆龄传》,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第396页。

体。机构领导与骨干半数以上是接受过西方高等教育并具有一定社会活动经验与能力的外国人。同时,机构自创办之日起,始终与几十家著名国际机构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与项目合作。其中,与美国与英国的援华机构往来最多。

国际慈善救援机构专业化的运作模式直接影响和贯穿宋庆龄领导的机构活动运作的始终。同时,为了保证工作的顺利,宋庆龄要求机构工作人员严格按照专业化的流程进行操作。也要求并培训受助方,依照捐赠方的要求做到各项手续完备。

在长期密切交往与合作中,在不断磨合中,宋庆龄领导的机构的专业化程度逐渐加强,项目申请、监管;财务管理、审计等流程与管理套路越来越规范。经过无数次大型劝募和国际援助项目的执行,专业化的运作与操作方式,经过不断学习、运用,经过借鉴、消化与融合,早已固化为机构的规范。其机构正因为具有较高的专业化程度,因而被国际机构认可,获得信任,同时赢得更多的支持。也才成为中国最具权威和公信力的慈善救援机构,成为典范。

宋庆龄以其执著的奋斗精神,不懈的努力,亲自探索和实践,为社会福利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宋庆龄的崇高威望和人格魅力,成为一面光辉的旗帜和榜样,为推动中国社会福利事业,特别是以科学精神,朝向专业化、职业化道路的发展,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结 语

从保卫中国同盟——中国福利基金会——中国福利会,回顾宋庆龄在中国救济与福利道路上所经历的过程,对进一步推进与发展中国社会福利事业具有十分积极的指导意义。

宋庆龄在救济和福利领域的努力探索与实践,是奉献给中国救济福利事业的一笔宝藏。

宋庆龄与她在中国救济福利领域的探索与实践,将永远载入人类和平、进步与发展的史册。

(作者为中国福利会宋庆龄研究工作室研究员)

宋庆龄对孙中山民生主义的理解、阐释与实践

邵 雍

〔内容提要〕

民生主义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04年孙中山在《洪门筹饷局章程》提出“实行民生主义”。二十年后他对此作了适应时代潮流的新解释,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两大原则。孙中山夫人宋庆龄认为,孙中山的农村经历以及早年在欧洲进行革命活动时接触到的社会主义思想是其民生主义思想的两大来源。宋庆龄对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有自己的理解与实践。孙中山逝世后,她多次阐发民生主义,并且不遗余力,身体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宋庆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实现孙中山民生主义的美好遗愿又开始了新的奋斗。

〔关键词〕

孙中山 民生主义 宋庆龄

民生主义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宋庆龄对此有自己的理解与体会。孙中山逝世后,她多次阐发民生主义,并且不遗余力,身体力行。

一、孙中山对于民生主义的表述

从目前的文献记载来看,孙中山最早在政治文件中使用民生主义一词的大约是在1904年7月。在他亲手制定的《洪门筹饷局章程》中规定:“革命军之宗旨,为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使我同胞共享自由、平等、博爱之幸福。”^[1]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发起成立中国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

[1]《洪门筹饷局缘起》(1911年7月21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28页。

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革命纲领。其后他在《民报》发刊词中把上述16字政纲归纳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合称三民主义。《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指出:“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1]多年后他在作《三民主义》讲演时,又把自由、平等、博爱(法国革命的三大口号)与三民主义一一比照,认为博爱“和我们的民生主义是相通的”^[2]。

1915年2月28日孙中山致旧金山中华民国总公会的公函中说:辛亥革命之后“我党以退让为高,而官僚争进,官僚得志,而我党无权,我志未成,而民生亦苦。……而为第三次革命,则必以入中华革命党为第一手续,共图政治之解决,恢复民国,实行民权,民生主义,造福海内外。”^[3]

十月革命之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有了新的发展。1920年11月他在一次演说中指出:要预防欧洲各国贫富悬殊的问题就要“提倡民生主义。厉行民治精神,务使社会财产,渐趋平均”^[4]。在他看来,“民生主义是对于贫富争平等的,不许全国男女有大富人和大穷人的分别,要人人都能够做事,人人都有饭吃。”^[5]孙中山认为:“近来人类要求社会上机会平均,贫富相等,便是民生革命。……现在已经成功的,只有俄国。”^[6]

1924年1月,孙中山主持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通过的宣言对三民主义作出适应时代潮流的新解释。其中民生主义则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两大原则。

国共合作后,孙中山虽然提出了“耕者有其田”,不过他主张将

[1]《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1906年秋冬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96页。

[2]《三民主义》(1924年1月至8月),《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83页。

[3]《致金山中华民国总公会函》(1915年2月28日),《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68页。

[4]《在广东省署宴会的演说》(1920年11月28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30页。

[5]《女子要明白三民主义》(1924年4月4日),《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67页。

[6]《在广州欢宴各军将领会上的演说》(1923年12月2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71页。

俄国暴力剥夺地主土地的政策改为用地主与农民和平协商的方法解决土地问题。1924年六七月间他与苏联顾问谈话说：“我决定将迄今为止地主(出租土地者)占有的土地交给农民，为农民所有。但是由于地主在一些地方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势力很大，影响也大，所以我认为……只有当我们建立起这些农会，待到农民武装起来的时候，才能实行解决土地问题的激进措施。”^[1]同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典礼上明确表示：“现在俄国改良农业政治之后，便推翻一般大地主，把全国的田土都分到一般农民，让耕者有其田。耕者有了田，只对于国家纳税，另外便没有地主来收租钱，这是一种最公平的办法。我们现在革命，要效仿俄国这种公平办法，也要耕者有其田，才算是彻底的革命”。但是他反对“没有预备，就仿效俄国的急进办法”^[2]。

关于节制资本，进入民国后孙中山多次论述过。1912年9月，他说：“铁路民办国有，确有最好之办法与先例。……若批给外人承办，彼必不肯迁延时日，任意消耗，此可断言者。故鄙人主张借款修路，更主张批给外人包办。惟私人经营之事业，每易流于垄断之弊，是以鄙人又主张民生主义，四十年后，收归国有。”^[3]孙中山认为，除了铁路最好由国家统制资源外，农业也应考虑进去。1924年1月至8月，孙中山做民生主义讲演时指出，美国吃饭问题还没有解决，原因“就是由于美国的农业还是在资本家之手，美国还是私人资本制度。在那些私人资本制度之下，生产的方法太发达，分配的方法便完全不管，所以民生问题便不能够解决。”^[4]

二、宋庆龄论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的来源

1. 农民出身与农村经历

1866年孙中山出生在广东香山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1927年宋

[1]《只有组织和武装农民才能解决土地问题在广州与苏联顾问的谈话》(俄译中)(1924年6、7月间)，《孙文选集》下卷，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00页。

[2]《给刘震寰的指令》(1924年8月20日)，《孙中山全集》第10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56页。

[3]《在北京招待报界同人时的演说和谈话》(1912年9月14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66页。

[4]《三民主义》(1924年1月至8月)，《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409页。

庆龄深情地回忆说：“孙中山很穷，到十五岁才有鞋子穿。……他的家住在一间茅屋里，几几乎仅仅不致挨饿。他幼年吃的是最贱的食物，他没有米饭吃，因为米太贵了。他的主要食物是白薯。”^[1]但孙中山从小就认为中国农民不应该长此这样困苦下去，中国的儿童应该有鞋穿，有米饭吃，于是就要用革命来改善中国农民的地位。1956年宋庆龄再次指出：“孙中山是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正是他对旧中国农村中悲惨生活的亲身体验，决定了他的生活方向。……在他心里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孙中山“从他自己的出身知道土地问题对革命和国家命运的重要性”，“一贯要求把农民吸收到斗争中来”^[2]。

2. 国外的社会主义思想

1966年宋庆龄在给亲友的信中陈述了自己在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大会上讲话的概要，其中回顾了孙中山与社会主义思想的逐步接触：“他和越南革命者有过接触(胡志明主席曾在我们广州的总统府住过几个月)。我记得1915年当我们在日本时，不少印度、朝鲜、缅甸、印尼和其他国家的革命者都到他的家里来过，向他求教和争取他的支持。在巴黎，孙先生曾会见过不少社会主义者……。孙中山的革命观点超越了中国国界，在反帝斗争方面尤其突出。你也许已知道他和列宁之间相互的钦仰和他们之间富有成就的信件来往和合作。”^[3]

孙中山先是无法分清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区别，后来又有意无意地力图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装到他的三民主义的理论框架中，混淆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说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甚至宣称：“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实无别也”^[4]。对于孙中山的上述提法，宋庆龄自然并不生疏。1937年4月她在美国纽约《亚细亚》杂志发表文章，指出：“我们回忆一下孙中山所说的关于共产党的话，是有好处的。他说：‘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

[1]《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1927年7月14日)，《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5页。

[2]《孙中山——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的儿子》(1956年11月4日)，《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宋庆龄选集》下卷，第240、244页。

[3]《宋庆龄致林达光、陈恕夫妇》(1966年5月18日)，《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4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版，第157页。

[4]《批邓泽如等的上书》(1923年11月29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58页。

个好朋友。主张民生主义的人,应该要细心去研究的。共产主义既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为什么国民党党员要去反对共产党呢?’”^[1]

1956年宋庆龄总结说:在欧洲进行革命活动期间,“孙中山开始发展了他的社会主义观点,……心里已逐渐明白,资本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他提出平均地权,“企图以此解决中国农民的贫困问题,并为整个国家的发展奠下基础。”宋庆龄还认为“平均地权”“击中了中国忧患的根源——罪恶的封建土地制度”。辛亥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内许多人不愿意改变旧的土地所有制关系,反对孙中山制定一个使党能有群众基础的纲领。晚年的孙中山在苏联与中共的帮助下,“最后制定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来解决农民问题,这就是他在几十年中不断追求的一个目标。”^[2]

3. 关于中国传统思想

根据不完全统计,从1912年4月到1924年底,孙中山不止一次兴致勃勃地全文抄录了《礼运·大同篇》给友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3]其实,这也是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的源头之一,不过笔者目力所及,尚未发现宋庆龄对此有系统阐发。

1967年宋庆龄在致林达光的信中强调,孙中山“不代表地主或绅士阶层,而是代表普罗大众,代表受压迫的大众。”“他关心的是普通人民的利益。”^[4]这多少演绎了孙中山本人全文抄录的《礼运·大同篇》的精神。

三、宋庆龄对民生主义的阐发

孙中山生前,宋庆龄是他的伴侣、学生与助手。孙中山逝世后,宋

[1]《儒教与现代中国》(1937年4月),《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78—179页。

[2]《孙中山——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的儿子》(1956年11月4日),《宋庆龄选集》下卷,第239—247页。

[3]参见《孙中山题词遗墨汇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9页。

[4]《宋庆龄致林达光》(1967年2月24日),《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4辑,第165页。

庆龄就成为孙中山思想与事业的重要继承者。

1927年7月14日宋庆龄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宣布将不再参加国民党新政策的执行，指出：“一切革命都必须社会的革命”，“目前存亡攸关的是民生主义，它是解答中国基本问题的主义。”^[1]同年9月宋庆龄到达莫斯科后，说过：“谁反对土地革命，反对千千万万农民获得解放，谁就站在反革命阵营那边。”^[2]这和1927年武昌中央农讲所《开学宣言》的语言十分相似：“谁反对农民运动，谁就是反革命。”^[3]

1927年11月初，宋庆龄在参加十月革命纪念活动的东方国家代表团的会议上发言，在论述十月革命对于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重大意义之后，又阐述了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她说：“中国革命的目的也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是要让中国人民摆脱本国资本主义和军阀的压迫。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本意也是在求中国未来的发展，并非要使我国私人资本先达到西方国家的高度，由其控制国家和压迫人民。相反，从一开始就要把所有重大的企业与公共事业掌握在国家手中，以便使广大工农群众迅速组织起来，接受教育，最后由他们当家作主，决定国家未来的发展模式并监督之。”^[4]宋庆龄这一讲话的要点是发挥了孙中山节制资本的思想，主张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甚至“非资本主义道路”。与在世时的孙中山一样，宋庆龄也想避免资本主义的弊病。

1928—1929年宋庆龄在德国期间，常与邓演达一道去柏林一些大的图书馆搜集世界各国特别是亚洲各国土地问题的资料，进行研究。邓演达曾写信给好友说：“关于继续中国革命的事，已和孙夫人、陈友仁先生讨论多时，有了具体的结论。此后我们的革命工作，仍应注重农民问题，解决土地问题，以建立我们的革命力量。”^[5]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宋庆龄在各种场合多次阐发民生主义。

[1]《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1927年7月14日），《宋庆龄选集》上卷，第43页。

[2]《在莫斯科发表的声明》（1927年9月6日），《宋庆龄选集》上卷，第55页。

[3]《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纪念特刊》，1927年，第2页。

[4]李玉贞译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藏宋庆龄英文档案选译》，《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3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244页。

[5]丘挺、郭晓春著：《邓演达生平与思想》，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9页。

1937年2月18日,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期间,宋庆龄发表题为“实行孙中山的遗嘱”的演说。她指出:“改善人民的生活是任何中国政府的主要任务。几年来,铁道和公路建设虽然有一些进展,但人民的生活状况依然没有改进。乡村中是一片贫困、疾苦和灾难的景象。我们的农民仍受尚未废除的封建残余势力的搜括,以及苛捐杂税的痛苦。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农民是中国经济的骨干。城市中的失业问题正影响着劳苦大众。不仅工人的处境十分凄惨,青年知识分子也找不到工作。我们中国的青年虽然受了中等或大学教育,仍不免踽踽街头,得不到运用他们的知识的出路。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在于促进我国的农村建设和工业化。为要进行这项工作;必须遵循先总理遗教。政府必须解除对群众运动的箝制,发扬群众对建设的主动性和热情。只有这样,民生主义才能实现。”^[1]在宋庆龄等国民党左派的努力下,这次全会开始改变国策,最后通过了事实上承认联共抗日的决议案。

同年4月,宋庆龄在美国纽约《亚细亚》杂志发表《儒教与现代中国》一文,高度评价连同民生主义在内的三民主义,认为“孙中山已经把他的理论综合为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这些主义适合于目前中国的情况。……孙中山主义就代表着民主和人民的幸福。”^[2]宋庆龄还在文中指出了实现民生主义与民族主义、民权主义的内在关联:“为了提高民族意识并真正实行民主政治,我们就必须大踏步地实行民生主义。孙中山说:‘民生就是社会一切活动中的原动力。因为民生不遂,所以社会的文明不能发达,经济的组织不能改良,道德退步,种种不平的事情象阶级战争和对工人的残酷行为以及其他形式的压迫,都要发生,都是由于民生不遂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社会中的各种变态都是果,民生问题才是因。’”宋庆龄接着评论说在国民党当政的这年中,“没有做过任何事来改善群众的生活。农民生活贫困;许多省份在内战中受到重大灾害。……今天我们的农业却同孔子时代一样地落后。结果,我们失掉了茶叶、丝和棉的宝贵市场。

[1]《实行孙中山的遗嘱》(1937年2月18日),《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66—167页。

[2]《儒教与现代中国》(1937年4月),《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76—178页。

为了改进农民生活,我们必须组织全国性的运动,来改善和提高农业生产中的近代技术。”^[1]

在纽约《论坛与世纪》杂志1937年8月号上发表的文章中,宋庆龄进一步揭示了实现民生主义与实现民权主义的辩证关系,指出:“为实现孙中山的经济政策,必须允许人民群众性运动的自由发展。这也是建设国家、稳步发展工业和交通以及改善农村经济的一个先决条件。我们国家的基本建设只有在实行真正民主的时候才能进行。”^[2]

最完整、最全面阐述战时实施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是宋庆龄1939年7月7日写的《展望战后》。文中首先强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民族的共同纲领”,“孙中山的头两个主义是实现民族独立和实行民主,第三个主义即民生主义,是谋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状况”。宋庆龄提出,国共两党在抗战之后的共同目标“是建立一个三民主义的共和国,一个根据民主的原则治理、注重人民生计的新式的独立国家”。具体要点有五:关于耕者有其田、控制工业、欢迎外国资本、战时的进展以及保护私人财产。其中耕者有其田与控制工业与孙中山民生主义中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相对应。关于前者,宋庆龄强调:“在我们这个农业国家里,土地问题当然是极为重要的。孙中山相信,土地应属于耕作者。”对于后者宋庆龄认为“对于政治统一之后的产业发展阶段,孙博士定下的政策是国家统制资源、铁路和公用事业。他还宣布节制私人企业,但这并非意味这些企业将受压制,相反,将鼓励它们在满足国家经济建设需要的原则下经营其企业。”而“欢迎外国资本”则是鼓励私人企业经营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宋庆龄说:“一个三民主义的中国将为外国资本投资提供广泛的范围。中国欢迎所有愿意帮助中国的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孙中山在他领导国民党的时期内,曾屡次宣布,凡愿在平等、非侵略、对我们使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取得应有地位的愿望持同情态度的基础上,与我们交往的各国,我们将努力以各种方式促进同这些国家的经济关系。”“保护私人财产”涉及中外企业家以及其他产权人的切身利益,对此宋庆龄宣布“三民主义代表了民族民主

[1]《儒教与现代中国》(1937年4月),《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79页。

[2]《中国是不可征服的》(1937年8月),《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92—195页。

革命的纲领,在此纲领范围之内,私有财产的原则是不会被攻击或废止的。只有敌人和卖国贼的财产会被剥夺。”^[1]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文章中,宋庆龄一度看好国民党主持下的“战时的进展”^[2],认为“尽管这一方向的进步仍然不够,但在今日抗战的过程中,我们见到孙中山的这些经济思想已开始实现了。在许多地方已经减少了租税。荒地已在垦殖。我们的战时建设正在国家倡导之下进行,并通过像工业合作社这样的组织,在某些情况下按民主原则加以组织。抗战之后,我们盼望的经济发展的模式将是各族人民都能分享的。”宋庆龄对民生主义的新阐释有她的独到之处,照一般人看来抗日战争时期似乎应当强调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但宋庆龄却站在民主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高度,已在考虑战时及战后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以及社会建设诸问题了。

1939年11月28日,宋庆龄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文章,再次深刻阐述了三民主义之间的有机联系与不可分割性。她指出孙中山“认为三民主义是为民众求三方面平等的武器,所以民族民权民生是密切的联在一起,要同时平行的来发展。……孙先生认定:中国的民众假使没有得到民主的权力和经济上的改善,则无力抵御外来的侵略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假使我们没有抵御外来的侵略,则处于次殖民地地位的中国,永远不能建立一个新时代的国家,给予民众以政治上的平等和生活上的改善,所以惟有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得到充分的发展,然后才有真正独立的中国。民国十三年八月十日孙中山先生向国民党党员发表演说,指出党员在辛亥革命时期的错误,……他们以为清廷一经推翻之后,民主的政体和经济上的改善,会自然而然的实现出来。这些国民党党员们,没有认识民主的真谛,更没有认识民生主

[1]《展望战后——抗战纪念日致美国朋友》(1939年7月7日),《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75—284页。

[2]后来宋庆龄的态度有很大的变化。1942年5月22日宋庆龄在苏联驻重庆大使馆对苏联大使潘友新说:“许多普通的国民党员抱怨生活不易,物价昂贵,……认为原因便在于国民党领导不力,说如果由共产党治国,那就不会允许这样的情况出现。”(转引自李玉贞译注:《宋庆龄与苏联驻华外交人员谈话记录(1942—1945)》,《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2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207页。)

义。”^[1]根据宋庆龄的解读,孙中山的本意是说民生主义与民权主义是递进的关系,是超过民权主义的一个主义,而对于这一深意,很多国民党党员很不理解,根本就没有搞清楚。

四、宋庆龄对民生主义的实践

宋庆龄是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的忠实实践者。孙中山生前关心妇女的权益。早在1902年孙中山在与留学生秦力山谈话时提出:“吾国他日若有动机,……不同男女,年过有公民权以上者,皆可得有一制限之地以为耕牧或营制造业。”^[2]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在1926年1月就参与审查国民党第一个《妇女问题决议案》,关注妇女问题,她提出男女在教育、职业、法律、工资等方面的平等、保护母性、反对童养媳等15项具体的要求,并提交国民党二大通过。

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宋庆龄对于中国的民生问题更为重视。1934年她在上海帮助路易·艾黎等国际友人组织学习马克思、列宁小组时专门组织他们进行社会调查,深入二三十家工厂,调查工人职业病和营养不良情况,写出了揭露资本家残酷剥削童工和工人阶级悲惨生活的《铬中毒在电镀工业里的情况》的调查报告。^[3]

抗日战争时期,宋庆龄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说:“要了解什么是对广大人民有益的事情,我认为并不太难。为各人的发展提供更多的自由是有益的;生产更多的生活必需品是有益的;将这些产品供应给最广大的群众也是有益的。”^[4]同理,宋庆龄“按民主原则加以组织”搞起来的一些工业合作社组织,对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也是有益的。其实工合组织的源流也可以在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中找到。1923年12月孙中山在广州的一次演说中说:“我们革命成功之后,要有平米吃,……外国人想做的办法,是工人同农民合作,不要商家做经纪、赚佣钱,便可省却许多消耗费。……要米价平,便要工人同农民办一

[1]《真正实现中国的独立》(1939年11月11日),《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96页。

[2]《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页。

[3]参见尚明轩主编:《宋庆龄年谱长编》,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第392—393页。

[4]《宋庆龄致弗农》(1943年6月16日),《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页。

合作社,用工人所做的器具,交换农民所出的米,省去商家的中饱,那样米价便可以平。外国实行这种方法,最有成绩的是英俄两国,他有了所办的合作社,大约有几千万人。我们如果仿照英俄两国的方法去行,便有平米吃,工人和农民也可以多得钱。”^[1]与孙中山一样,在宋庆龄看来,不管社会制度如何,只要是有利于改善民生的具体做法都是可以仿效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宋庆龄在1945年10月在重庆将保卫中国同盟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她认为该会的工作是“帮助中国人民的”^[2],具体地讲,“主要是帮助那些通过救济和福利而自救的人们”^[3]。1946年秋她在给外国友人的信中强调:“日前,我主要的精力放在为中国人民提供足够的救济和福利方面。”^[4]按宋庆龄自己的讲法,中国福利会是“专门从事妇女和儿童的健康、福利和教育工作的机构”^[5],因此她在1947年又提出:“我们要从断垣残壁下,街头巷角里,以至饥饿寒冷的乡村中,把这些被遗忘的孩子们找出来,给他们以他们所迫切需要的东西。”^[6]

解放战争时期,宋庆龄赞成将革命进行到底。1949年初她就预见解放战争胜利后,“当和平重返我们这片广大的国土时,我们将不得不更加努力工作,不惜代价地为我们饱经战争创伤的人民带来幸福的生活。”^[7]一直以来,宋庆龄对实现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充满信心,曾经对人谈及她自己的努力目标时说,要使“世界各处都获得自由,教育和文化取得它应有的地位,每一间茅舍都变成舒适的住屋,地球上的产品可以容易买到,工厂的收入等于所付出的劳动,每个家庭由生到死,都能得到免费的医疗,每个人……都能平等地获得他的必需品。”^[8]

平心而论,尽管孙中山生前提出了民生主义的重要思想,也为之进行了一番奋斗,但由于种种原因,实施情况并不理想。1921年7月

[1]《在广州对国民党员的演说》(1923年12月30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576页。

[2]《宋庆龄致李文杰》(1947年2月27日),《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第111页。

[3]《宋庆龄致尼赫鲁》(1948年4月1日),《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第147页。

[4]《宋庆龄致斯潘塞·摩萨》(1946年9月2日),《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第90页。

[5]《宋庆龄致费奥雷拉·德尔拉·塞特夫人》,《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第337页。

[6]《〈黑母鸡〉中译本序》(1947年2月),《宋庆龄选集》上卷,第427页。

[7]《宋庆龄致史蒂文森夫人》(1949年1月16日),《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第176页。

[8]《宋庆龄致亨利·华莱士》(1949年9月10日),《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第220页。

中共一大在讨论大会宣言时,与会代表包惠僧对孙中山南方政府领导下的广州发表评论,认为广东的军事独裁致民不聊生,没有一点革命的气味。他在会上说:“我曾到过广州,广州是满街无兵司令,军人横行,遍地是赌场(名为楼上银牌)、鸦片烟馆(名为谈话处)、妓馆。”^[1]这里固然有偏激之词,但孙中山治理下的广州乃至整个广东贯彻民生主义不力是肯定的。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28年的艰苦卓绝斗争,终于在1949年10月1日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实现孙中山民生主义美好遗愿创造了基本的条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宋庆龄又开始了新的奋斗。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1]《“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1页。

《孙中山评传》的出版与孙中山研究的未来

林家有

由林家有、张磊主编的《孙中山评传》，最近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分上下册，约120万字，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项目。本书是由中山大学、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华南师范大学、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等单位10多位同人经过数年共同努力的研究成果。

2011年10月笔者以中山大学的名义申报国家社会基金资助项目获批准后，又根据评审专家的意见就书稿作了数次删改、增补和校正，终以今天的面貌与读者见面。

笔者想就编写本书时的原先设想，及现有成果的长处与不足作一个简单的总结，并对未来孙中山的研究提些意见，供学术界作进一步研究孙中山时参考。

（一）为什么还要撰写《孙中山评传》？

在20世纪末，海峡两岸曾出版过两部比较有份量的孙中山传记。一是台湾吴相湘先生著《孙逸仙先生传》，台湾远东图书公司1982年11月出版，全书1782页，约95万字；一是南京大学茅家琦先生等合著《孙中山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出版，全书1005页，724千字。此外，尚明轩先生、张磊先生也出版过孙中山传。

吴相湘先生的《孙逸仙先生传》共50章，就孙中山的主要经历和重大事件，以及孙中山的家庭生活、个性与嗜好分门别类地陈述，就事论事。台湾国民党史专家过去对于大陆学者的研究成果不屑一顾，对于孙中山的联俄联共决策有较多的歪曲。吴相湘先生的《孙逸仙先生传》改变了台湾学者以往的态度，从学术的角度对孙中山进行研究和

分析,提出一些新的观点,也引用大陆学者的成果,对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及其他国家的关系都有新的看法和新的资料,但该书显得比较琐碎和庞杂,分析缺乏深度,材料收集也有待加强。茅家琦先生等人合著的《孙中山评传》,坚持正确的思想指导,就孙中山一生的主要经历进行陈述,观点清晰、明确,参考的材料也比较全面,然而由于受当时条件的局限,该书和其他有关著作对一些重要事件的论述还是比较简单,新材料的运用也有待加强,对一些问题的分析也有待深入。

尤其是经过20世纪80至90年代的孙中山研究繁盛,世界各地出版有关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孙中山与世界、孙中山与华侨,以及孙中山的家世源流、青少年的读书、生活、成长等方面的研究都有很大的发展,对于孙中山的评价也不一,乃至辉煌过去以后出现了对孙中山研究的冷淡。海峡两岸对孙中山的研究呈现了退潮,甚至还出现影视丑化、歪曲孙中山的形象,以及攻击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是清末民初中国动乱的根源,说革命不如改良,改良不如立宪,立宪不如新政,孙中山不如黄兴,黄兴不如袁世凯,有的人还给孙中山扣上中国一党专政、独裁缔造者的帽子。学术思想的混乱带来社会思想的异向,以及行动的歧异和动摇。台湾还将孙中山三民主义研究所改为国家发展研究所,对于他们的所谓“国父”,除了继续悬挂孙中山像外,研究热情不高。所以,我们认为,像孙中山这样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如果让台独分子将其作为“外国人”,将他当作台湾政治和历史的边缘化人物,这不仅会造成思想的混乱,而且对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诚如金冲及先生在《孙中山:一个时代的代表——读张磊〈孙中山传〉》一文中所说:“我们党把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并称为二十世纪‘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新中国成立后,每年国庆节天安门都要竖起他的画像。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众多历史人物中,还有谁能受到人们如此的尊敬?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历史人物已渐行渐远,今天一些人对孙中山了解不多,对他的历史地位、历史功绩认识不足,这样便不能了解近代中国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不能了解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轨迹和脉络。”所以,加强对孙中山的研究,全面地总结孙中山一生

为实现中国独立、民主和富强所做出的努力、艰辛和曲折,正确地了解孙中山对时代的认识、他所追求的目标以及种种设想,认真系统地梳理孙中山给中华民族留下了哪些思想、精神和文化遗产,是当务之急。撰写一部与孙中山的历史地位相称的传记,不仅是时代的需要,当今中国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和民主、富强、复兴中华的政治需要,也是总结和继承孙中山的思想文化遗产,实现中国社会的和谐、幸福和文明、进步的需要。

(二) 准备撰写一部什么样的《孙中山评传》?

要写好《孙中山评传》,首先要定好位,明确思路、目标和方向;其次就是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如何地写,由谁来写的问题。孙中山是中国伟大的爱国者、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和中国近代化的先驱。他是20世纪中国第一位时代伟人,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杰出政治家和思想家,也是近代中国的建设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推动者和设计者。他的思想、精神和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财富。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作指导,采用历史学、政治学、军事学和社会学的方法,取长补短,相互补充,就历史如何选择孙中山,孙中山又如何地选择自己的历史,他怎样由一个广东农村的青少年走向世界,如何确立自己的爱国、革命和建设理想,实现振兴中华、复兴中国的奋斗历程作为主线,以孙中山的思想、学说和文化遗产作为重点,努力写出一部具有明显特色和学术价值的孙中山传记。我们的目标是坚持政治性与学术性、创新性与继承性、叙事性与分析性相统一。既要做到资料扎实、信息量大,又要重点突出;既要全面、系统,又要详略适中,写出一部既有思想性,又有学术性的著作。

(三) 我们这部《孙中山评传》有哪些重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孙中山是伟人,但伟人也是人,他不是神。他有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丰功伟绩,但也有屡经挫折的教训;他的思想有追赶时代潮流和前瞻性的启导,但也有阶级和个人的局限。如何能够将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以及与实践相结合的思想统一起来是撰写《孙中山评

传》成功还是失败的关键。过去学术界研究孙中山存在一个明显的弊端,即凡是写孙中山传记的只写孙中山的主要经历,不写或少写他的思想发展;而凡是研究孙中山思想的著作也只是写孙中山某一方面思想的内涵及其影响,不写或少写他的活动。这样做的结果不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就是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犯了以小见大,或以大见小的大忌。《孙中山评传》要写出新意,必须重视处理好以上所说两者的关系。本传最大的特点就是将孙中山的主要经历和他的重要学说、思想、精神统合起来写,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是我们对孙中山的主要经历,尤其是他在领导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为什么有成功又有失败,又为什么不会这样做而会那样做,都有一个全面的、客观的了解,不会造成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效果。

此外,这部《孙中山评传》有一个明显的特色是将继承与创新结合起来。本传参阅有关孙中山的资料和研究成果超过100多种,对于有新的符合实际的观点和资料,不管是什么时候的,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也不管是什么人的,我们都加以吸收和利用;对于那些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观点和所谓材料不管是什么人,什么时期的,我们都加以否定和拒绝引用。所以,本传对于那些没有什么新材料,过去学者讲得较多的史事,我们则从略,不作铺陈;对于那些有新材料,而过去学者利用得比较少的史事,我们则尽量详述多引,给读者一些新的信息和观感。

我们认为,本评传政治把握较好,创新性明显,评价较全面和公允,思路清晰,史论结合得当。这部评传是广东学者研究孙中山成果的累积,但又不是简单的重复旧说,具有继承与创新相统一的明显特征。

主要的创新点有几个方面:

第一,对孙中山的家世源流和家庭情况,本传通过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保存的大量材料和作者的调查访问,对于孙中山的家世源流和孙中山是否是客家人做了更加符合实际的结论。

对于中山市翠亨孙氏的来源,1942年12月,中山大学罗香林教授在其所著《国父家世源流考》一书中(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首倡孙中山祖先由河南省迁江西省宁都,后入广东紫金,最后迁香山翠亨

的“客籍说”和“客家说”，此说一出便在学术界盛行。上世纪80至90年代学术界又就此问题展开讨论，其中一种意见认为罗香林的说法有错，孙中山是广府人，不是客家人，坚持此说的学者认为孙中山的祖先是从郑州迁杭州，后进入广东南雄—东莞—香山。经过阅读孙中山家族流传了几百年的成说和家族文物（祖坟及家谱），我们否定了孙中山是客家人的成说，还原孙中山祖先由郑州—杭州—南雄—东莞—香山的说法。对于孙中山的家庭，过去只说孙中山是“贫困之农家子”，但实际情况如何，不甚了了。这次我们利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保存的翠亨孙氏祖尝山田合约、田契，以及账册等材料，对于孙中山出生时家庭的情况有进一步了解，对于孙中山少年时翠亨村的情况，以及他立志走向世界对他成长的影响作了与过去一般论者不同的陈述和分析。

第二，本传突出孙中山不仅是民主革命家，也是中国近代化的先驱，是国家和社会的建设者的内涵，从而否定了孙中山只是革命家，是破坏者，不是建设者的歪曲。本传对于孙中山在民初从事铁路督办等实业建设给予肯定，尤其是对孙中山的《建国方略》著作给予与以往传记不同的评价。对《孙文学说》一书，过去只认为它是孙中山的哲学著作，这次我们对《孙文学说》的评价则从该书“有志竟成”的结论中，不仅说明孙中山在书中反复论证“意志”与事业的关系，说明孙中山“屡败屡战”、“愈挫愈奋”的精神对于建构共和、民主文化的重大意义，还对孙中山从“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三种人的不同地位来建构他的“人学”理论的意义作了分析和研究，给人一种新的感觉，并从孙中山“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必须同时建设来说明其建构人文精神的重大影响。对于《实业计划》一书，也不仅仅是将它视为一种实业建设的规划，并将其视为“二次革命”，以及讨袁护法运动受挫后，“再造民国”的建设蓝图。对于《民权初步》一书的评价，过去只将其视为实现民权的政治启蒙性、通俗性读物，本传则将其提升为反对袁世凯复辟的新举措，是孙中山以小见大，借讲“会议通则”来说明袁世凯废弃“临时约法”和国会，不仅民权已不复存在，而且新的皇权专制已经复辟，要维护民权就要从懂得如何开会、集会，以及如

何做决议的平常小事做起。孙中山还将其视为“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大大地提升了《民权初步》的思想价值。

第三,对于晚年孙中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过去国民党的历史学者做了许多歪曲的陈述,尽量设法抹杀其影响,而中共的一些思想家则又无限夸大其作用。本传根据共产国际的档案资料,对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对华政策做了深入的研究,一方面指出其早期对华政策的错失,带有俄国沙文主义民族利己主义的倾向;另一方面又肯定共产国际、苏俄改变政策实行联孙的重大意义,对于推动国共两党实行第一次合作、掀起国民革命高涨起到积极作用。本传对于苏俄派来中国的代表鲍罗廷及其与孙中山的思想分歧、制订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以及鲍罗廷在国民党“一大”期间及“一大”后的国民党活动中,与孙的意见分歧和磨合、对孙的影响,都有许多补充和新的观点。本传对于孙中山想用《国民政府建国大纲》来代替国民党“一大”宣言,并在国民党“一大”刚闭幕时就进行与“一大”宣言不合调的“三民主义演讲”,都有新的说法和观点。

第四,1924年5月,广东商团在广州集会,决定设立联防总机关,推举英国汇丰银行广州支行买办陈廉伯为总长,阴谋反对革命政府,争取更多权益。后来,广东商团在广州发动叛乱。过去一般都认为是港英当局指使买办陈廉伯在广州叛乱,但事实上香港港英政府与广东商团叛乱并无直接关系。鲜为人知的则是共产国际趁广东商团叛乱事件夸大事实,鼓吹资产阶级企图夺取广东革命政府权力,趁机输入阶级斗争理论,煽动工农群众与商人的对立,并以对工农阶级和联俄、联共的态度将国民党员分为左中右派,开创了近代中国所谓左派与右派的历史。本传对此有新的陈述,并据事加以说明,回归原生态。

第五,孙中山北上时绕经日本,希望建立中日俄联盟主宰东亚局势。这是孙中山的一厢情愿,事实证明孙中山对日本的侵略野心未能深切了解,日本对于俄国与其争夺我国东北的野心,各怀鬼胎,日本不可能与俄国结盟,更加不可能与中国结盟。孙中山到了日本,日本当局对孙中山访日作冷处理,使孙中山空手而回。孙中山到了天津身体就不适。本传对于日、俄之间对中国权益的觊觎有透视和分析。

第六,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哲学思想、文化观集中起来作为孙中山传记的独立内容单列一章,这是新的尝试。以往孙中山的传记只是将他的思想放在一定的时间段给予陈述,分量有限,内容单薄,不能给读者对孙中山的学说、思想一个系统的、全面的了解。我们这次用较大的篇幅对孙中山的学说作介绍、分析和评价,体现出较强的学术研究取向。

第七,宋庆龄是孙中山的战友、伴侣,在孙宋结合的十年中,他们相依为伴,共同战斗,共同建构革命的、建设的思想和架构。在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成为孙中山事业、思想的忠实守护者、捍卫者。研究孙中山离不开宋庆龄,本传就宋庆龄与孙中山的关系专列一节,目的是告诉学者和读者,研究孙中山应当与研究宋庆龄结合起来。

第八,叙事详略有序。对于那些没有什么新材料的事件,我们尽量避免铺陈,加大篇幅,该略的就略,但对于那些新材料较多,而过去学术界研究薄弱的内容,我们则尽量详述,加强对新材料的引用和分析,使本书更具学术性,突出学术性在本书的意义。

总之,本评传着重于政治的正确把握,运用史料与分析的结合,力求评价的公允、客观,反对那些情绪化的“反孙”思维和无端的指责。我们将孙中山的生平经历和学说思想结合起来研究和总结,说明孙中山一生奋斗的艰辛,以及他与时俱进,对国家、民族所做出的贡献及其历史地位。本评传跟以往已经出版的评传和传记最大的不同是叙事比较全面,资料文献工作扎实,重点突出,是一部思想性、学术性和现实性完整统合,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孙中山思想评传。

本书存在的不足和欠缺也很明显,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于孙中山护法运动和捍卫共和的曲折和民初中国政局的复杂性、艰苦性的陈述和分析较为薄弱。比如,武昌起义后,孙中山对于建国问题准备不充分,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体,孙中山前后多次反复,而他的思想跟国内的立宪派、改良派和革命派的同与异,本书陈述较少,分析也不够。又比如对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期,孙中山治国的艰难,对国际上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以及裁撤民军和让权袁世凯的原因的想法及其应对策略的分析也有待加强,对护法运动失

败的原因也可做补充。

第二,对于孙中山的人际关系、交往方面的论述较少。在有关的事件中对于孙中山与有关人的关系略有谈到,但谈得不深不细,分析不够;比如孙中山与其他革命者在方针、策略上的歧异,以及对改良派、立宪派的态度,后期孙中山与冯自由、孙中山与邹鲁、孙中山与谢持、孙中山与陈炯明、孙中山与宋庆龄、孙中山与蒋介石等人关系的变化缺乏深入的研究。孙中山与日本及其他国家友人的关系也有待深化研究。

关于孙中山与各方人物的研究还有许多工作可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出版桑兵教授主编,由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同人编辑的《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共有10册,数百万字,对于研究孙中山与各方人物的关系提供了资料和方便。这方面的工作应该做的还不少。

第三,对于学术界谈过的所谓“中日同盟”和孙中山的“满洲借款”等问题,本书采用回避的方法处理,这样做固然也有理,因为真假未明的事不可以入传,但作为学术研究毕竟是个缺陷,应该将这些问题作深入研究,尤其是要将真与假的事实真相弄清楚,说明白,对于孙中山的态度有一个正确的说法,这才是对历史负责,对孙中山负责、对学术负责。

此外,对于孙中山的建设思想的研究应该加强。过去我们只将孙中山视为民主革命者,对这方面的研究很多,但对于孙中山建设思想的研究则重视不够。为改变这种状况,我与我的几位博士生和黄彦先生曾撰写过一部《孙中山社会建设思想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去年我又将我的《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道路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作了增订、扩充,改以《孙中山国家建设思想研究》为题,近期由广东人民出版社作为重点图书推出,目的就是为引起学者和有关人士对孙中山建设思想和建国方略的重视,拓宽对孙中山研究的视野和思路,希望出版更多的研究成果。

(作者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宋庆龄与美国友人浦爱德：浦爱德档案对 研究宋庆龄的意义

王成志*

宋庆龄与美国友人浦爱德有着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友谊和非常亲密的关系，美国哈佛大学施莱辛格图书馆藏浦爱德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非常丰富。其中的宋庆龄档案含档案文献资料约一百来件，涉及生活方面内容的信函，最能反映宋庆龄的仁爱、幽默、大度和伟大。浦爱德档案对研究宋庆龄和近现代、乃至当代中国历史发展均富有意义。

浦爱德其人

1888年12月2日，浦爱德（Ida Pruitt, 1888—1985）生于山东登州黄县，父母为美国来华传教士。其父浦其维（Cicero Washington Pruitt, 1857—1946）为佐治亚州南浸信会牧师，1882年来华，在黄县传教。其母浦安讷（Anna Seward Pruitt, 1862—1948）生于俄亥俄州，为长老会来华传教士。二人在黄县相识，1888年初结婚，共生六个子女。二人一辈子几乎都在中国北方农村传教。1936年浦其维退休，离开中国回美国。

浦爱德是家中老大，在山东农村成长，后回美国受教育。1906年至1909年入读亚特兰大寇克斯学院（Cox College），学文学；1909年至1910年入读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在其慈善事业学院（School of Philanthropy，即今纽约社会工作学院 New York School of Social Work）学习，获理学学士。后在纽约一孤儿院任小学老师。1912年其大弟在俄亥俄州突然不幸病逝，对浦爱德打击特别大，她返回中国山东老

* 王成志博士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部负责人，是美国图书馆协会美国华人图书馆员协会和台湾师范大学图书资讯学研究所合办的《图书馆与资讯科学》半年刊英文主编，其《北美藏民国档案提要》，中英文对照，即将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

家与家人团聚。1912年至1918年在山东芝罘(烟台)任其母亲创办的教会女校教师和校长。1918年再次赴美,在费城组织慈善协会(Philadelphia Society of Organizing Charity)从事社会工作,并同时照顾到美读书的两个弟弟。

1920年,浦爱德被洛克菲勒基金会选中,组建新成立的北京协和医学院的社会服务部(Social Service Department)。浦爱德没有正规的医务社会工作的科班训练,北京协和医学院首先派她到麻省总医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跟医院社会服务部主任、美国医务社会工作的先驱伊达·坎农(Ida Cannon)实习学习医务社会工作一年。1921年至1938年,浦爱德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社会服务部主任,负责西方医生和中国病患者之间的沟通、病人的入院前后护理和全面康复;在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医疗服务和最普通的病人之间架起平等和交流的桥梁。浦爱德训练和培养中国第一代社会工作者,推动了全中国的社会工作开始发展。浦爱德开创了中国的医务社会个案工作(medical social casework),留下数千个非常系统的医务社会工作个案。这些个案几乎都是比较完整的个人、家庭和社会故事。这批医务社会服务档案是研究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生活的最宝贵的档案文献资源之一。到1938年,浦爱德离职时,社会服务部发展到34人之强;她的学生和社会服务部训练出来的人员,为当时中国各大医院、医学院的社会工作的中坚力量。在北京期间,她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授课。她收养一位中国女孩和一位俄罗斯女孩为养女。^[1]

在北京期间,浦爱德或许在她不自知的情况下与地下共产党人早有联系和交往。1935年,中共早期党员刘仁静及其妻儿被捕,浦爱德帮助营救,至少使刘的夫人和孩子很快得到释放。^[2]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协和医学院临时的红十字会医院成

[1] 本文浦爱德的生平,主要参照金敏的研究和哈佛大学施莱辛格图书馆浦爱德档案(Ida Pruitt Papers, 1850s—1992)。金敏的研究主要为: Marjorie King (1984). Ph.D. Dissertation: Temple University: *Missionary mother and radical daughter: Anna and Ida Pruitt in China, 1887—1939*. Marjorie King (2006), *China's American Daughter: Ida Pruitt (1888—1985)*,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金敏1984年博士论文主要写浦爱德母女的命运和历史。2006年的著作主要为浦爱德传记。

[2] 李辉:《伊罗生:卷入中国革命漩涡的美国记者》,载《百年潮》1999年12期。

立,以救治参战的二十九军和通州第一保安大队伤兵。浦爱德派其助手、社会服务部副主任于汝麒实际负责,以协和医院比较有利的条件进行救死扶伤。浦爱德以其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全力支持、甚至自己直接出面救治伤病员、供应急需的药品。她支持地下抗日力量,特别是抗日军人和游击队,直接同意或默许其爱国部属向他们提供医药和用作炸药的化学药品、甚至同意、支持其下属多次介绍和安排大量治愈的伤兵投向国、共抗日武装部队。她甚至在自己的住所掩护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和军官。^[1]

自1938年开始,浦爱德协助路易·艾黎从事工业合作社工作。1938年底,她先是在上海担任工合促进委员会的干事。随着工合运动的成功展开,宋庆龄、斯诺等在香港成立工合国际委员会,以筹集海外资金。浦爱德从上海到香港,任干事,具体实施宋庆龄、斯诺和艾黎等人的计划。

1939年,浦爱德受艾黎委托赴美国、并按其要求留在美国,筹建中国工合美国促进会(American Committee in Aid of Chinese Industrial Cooperatives)。经过她的创造性的努力,委员会很快成立,并发展到一百多人。浦爱德从1939年至1951年居住纽约,任中国工合美国促进会总干事,主要在美国向公私机构和个人为中国工合筹集资金,宣传中国抗日救亡。到1946年为止,美国促进委员会为工合募集300多万美元。而这笔海外资金是香港工合国际委员会能独立控制的为数不多的资金之一,其中相当一部分投入到了积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控制区域,支持中共的抗战。^[2]

1946年,浦爱德在纽约曼哈顿上西区与著名的美国友人陆慕德(Maud Russell, 1893—1989)同租一公寓,并与同在纽约的耿丽淑(Talitha Gerlach, 1896—1995)过从密切。1951年,浦爱德退休,为与家人离得近些,搬到费城。1955年李克(Walter Allyn Rickett)、李又安(Adele Austin Rickett)夫妇从中国获释回美,浦爱德再次在费城搬

[1] 吴桢:《记北平红十字会医院——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在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编》第39辑,第264页。

[2] 盛利:《中西之间——浦爱德研究》,章开沅、马敏主编:《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刊》第五辑,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家,以住得离他们近些。

浦爱德是斯诺夫妇、贝特兰和艾黎等的好朋友,同时又是很多中国共产党人包括邓颖超的朋友。浦爱德同情支持共产党、支持新中国政府,道理很简单,用她自己的话说,因为“他们帮助中国人民”(They were helping the Chinese people)^[1]。自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联邦调查局开始调查、监视,甚至骚扰浦爱德,达十余年之久。但这并不影响浦爱德关注乃至参与妇女权益和平运动,以及保持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友好态度。一旦有不利中国的舆论,她总是利用各种机会为中国辩护。1959年和1972年,她曾两度访问中国。

浦爱德是位多产作家和翻译家,作品主要是关于中国历史文化和中美友谊。主要作品有《汉家女儿:一个中国劳动妇女的自述》(*Daughter of Han: The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Working Woman*) (1945, 1967),《殷大妈:北平生活回忆》(*Old Madame Yin: A Memoir of Peking Life, 1926-1938*) (1979),等等。她还编写、翻译老朋友吴永(Wu Yung)口述、刘治襄转录的《庚子西狩丛谈》(*The Flight of an Empress*),老舍(Law Shaw)的《四世同堂》(*Yellow Storm*) (1951),和王莹(Wang Yung)的《宝姑》(*Little Bride*) (未正式出版),等等。

浦爱德与宋庆龄

浦爱德与宋庆龄的关系可以说源自同在佐治亚州的大学学习时期,那时浦爱德就认识宋庆龄。但中国工合运动让浦爱德与宋庆龄能一起工作、更亲密地联系起来。1938年之后,二人保持终生的友谊,几乎每年都有直接和间接的联系。

1937年,艾黎和斯诺夫妇等共同倡议在非敌占区发起建立小工业合作社、组织普通民众开展战时自救并支持抗战的计划。1938年,他们正式发起中国工业合作社组织。1938年秋,浦爱德在北京协和医院医务社会工作部的工作未得续聘,斯诺夫妇邀请浦爱德加入工合。由于浦爱德对中国乡村经济和文化有很深的感情,有点担心工合组织

[1] Marjorie King, *China's American Daughter: Ida Pruitt (1888—1985)*,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23.

或许会有城市工业化的倾向、不见得对中国贫苦民众有利,因此一开始她并不是很积极。

1938年12月初,浦爱德和艾黎在浙江金华相遇,二人一见如故,连续两天不停地交谈,彼此遂有很深的了解和信任,她完全打消了对工合组织的顾虑,决定全身心地投身工合运动。随后,蒲爱德在上海担任工合促进委员会的干事。

同在1938年,宋庆龄在香港发起组织抗日救国的救济团体保卫中国同盟。保盟广泛动员海内外侨胞、华侨和国际社会资助中国抗战。新西兰记者和作家贝特兰(James Bertram, 1910—1993)作为第一个外国人参与其中,并任干事。^[1]而那时,贝特兰正是浦爱德的男朋友。

中国工业合作社的成立和发展得到了国民党政府、宋氏家族所有重要成员,特别是宋氏三姐妹、孔祥熙和宋子文的大力支持。首任工合协会名誉理事长是蒋介石,后为宋美龄。当时是国共合作的高潮时期,中国工业合作社也得到中共的大力支持,邓颖超、董必武等直接参与其中。随着工合运动的成功展开,1938年8月,宋庆龄、斯诺等在香港成立中国工业合作运动香港促进委员会(China Industrial Cooperatives Hong Kong Promotion Committee),以筹集海外资金。宋庆龄任名誉主席(Honorary Chairman),艾黎任技术顾问(Technical Advisor);浦爱德从上海到香港,任代理主席(Acting Chairman)^[2],具体实施宋庆龄、斯诺和艾黎等人的香港工合促进委员会的计划。1939年1月,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Chinese Industrial Cooperatives)在香港成立,宋庆龄任名誉主席,香港英国主教何明华(Ronald Owen Hall, 1895—1975)任主席,陈乙明任司库,宋子文、埃德加·斯诺、路易·艾黎、钟秉铎、郑铁如、何东等20余人为委员。浦爱德是首任秘书。

这一时期,浦爱德和宋庆龄在工作上有紧密的合作;而且宋庆龄邀请浦爱德参加在宋庆龄寓所定期召开的保卫中国同盟会议。

宋庆龄支持工合,并把工合当作保盟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推动,所

[1] 卢年高. 贝特兰 James Bertram. 燕京研究院(2002),《燕京大学人物志》第二辑,页92—93。

[2] Rewi Alley (1939), *Chinese Industrial Co-operatives General Report*, May 1939.

以亲任中国工合香港促进委员会和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的名誉主席。1939年5月1日,宋庆龄在《给全世界的朋友的信》中,呼吁世界人民支持和援助工合:“请你们支援中国的工业合作协会,这种工业合作运动不仅重建着破坏得支离破碎的中国工业,使千万个沦为难民的工人有了工作和恢复自尊心,并为中国的经济民主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1]

1939年春夏之交,浦爱德到重庆中国工合总部,并参观考察一些省份的工业合作社。在重庆,她还会见宋美龄和宋蔼龄。作家浦爱德写的中国工合材料,宣传效果非常好,让人看到在大敌当前的中国,下自普通老百姓,特别是最低层的农民和妇女,上至孙夫人和蒋夫人,均持有抗日救亡的坚强决心和意志。不久,受艾黎委托,其实也经宋美龄同意,浦爱德赴美国建中国工合美国促进会(American Committee in Aid of Chinese Industrial Cooperatives),任总干事。

在美国,浦爱德通过继续写文章和发表演讲来大力宣传中国抗战和中国工合事业,呼吁美国人民支持中国抗日救国。她成功地邀请一批包括罗斯福总统夫人在内的名人政要成为工合美国促进会名誉主席和董事会成员。^[2]她积极在海外华侨和同情中国抗战的社团和朋友中募集捐款,特别是对解放区群众的抗战情绪及工合在解放区的发展情况,介绍宣传得格外详尽。使得美国一般群众了解中国抗战实际情况,特别是当时八路军和新四军所在地的情况。

浦爱德建成工合美国促进会之后,屡次要求回中国,但艾黎每次都要求她延期,宋庆龄也要她留下,以便工合美国促进会能有成效地工作。主要由于国共两党的矛盾,中国工合内部的矛盾和争斗很快开始出现。浦爱德以协调人的角色化解不少矛盾和纠纷。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国民党先欲控制工合,后减少直至停止财政支持,浦爱德自始至终与宋庆龄和艾黎的立场保持一致。在国民党政府逐渐控制工合、艾黎的工合领导权被削弱后,浦爱德及其美国促进委员会的作用越发突出。美国促进委员会的海外捐款是香港工合国际委员会能独立控制的为数不多的资金之一。这些资金相当一部分转送到抗战的八路

[1]《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74页。

[2] 彭秀良:《被尘封的国际友人浦爱德》,载《文史天地》2012年2期。

军、新四军控制区域，支持中共的抗战。^[1]

宋庆龄在1943年6月7日给浦爱德的信中写道：“很高兴地听李约瑟说你在纽约的美国促进会中占上风，我大笑；白修德报道的河南大饥荒，工合可帮助，但不行；艾黎不得不低调，我无能为力。祝你一切顺利并请你保持乐观，我自己也要这么做！”宋庆龄在1947年12月17日给浦爱德的信中写道：“我卧病在床，方能给你写信；我总是思念你；你带来那么多好东西，只能在圣诞节时供你所有的朋友分享；美国现在与战时的民主政策相矛盾，你在纽约一定很难；我希望你尽早回到我们身边。”但美国促进会仍离不开浦爱德。

对来自海外特别是来自美国的资助，周恩来在1938致函感谢保卫中国同盟，毛泽东和李富春也在1938年致函感谢美国援华会和美国促进和平与民主同盟，董必武在1944年致函感谢美国援华会。他们除表示感谢外，均希望获得进一步援助。^[2]毛泽东1939年9月25日专门写信给香港工合国际促进会何明华主教表示谢意，他写道：“我赞成以合作社的方式在中国组织建设许多小型工业，对于你在这一事业上的热心，以及你在帮助我们抗战上所取得的光辉成绩深表感佩。”并且希望“如能在华北游击区和西北接近战区的地方组织建立这种工业合作社，八路军和鄙人自己对此种援助将表示极大的赞赏和热情的欢迎”^[3]。

1945年12月宋庆龄将保卫中国同盟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以期帮助战后恢复和国家重建工作，谋求建立和平、民主、独立的新中国。1948年至1949年，根据国内和国际形势变化和发展，宋庆龄仍然相信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福利事业的支持和援助非常重要，遂同意在美国成立中国福利呼吁会（China Welfare Appeal）并指导其发展。耿丽淑任主席。耿丽淑是浦爱德北京协和医学院和工业合作社国际部的同事。1950年，中国福利基金会改名为中国福利会。主要由于美国政府对新中国敌对政策的逐步发展、麦卡锡主义开始盛行，以及新

[1] 盛利：《中西之间——浦爱德研究》，章开沅、马敏主编：《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刊》第五辑。

[2] 中国工合档案（Indusco, Inc. Records, 1938—1985），哥伦比亚大学巴特勒图书馆善本手稿图书馆（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 Butler Library, Columbia University）。浦爱德本人捐赠。

[3] 朱健：《路易·艾黎在中国》，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84页。

中国政府救济政策的改变,中国福利呼吁会在美国的工作非常被动,难有所为。宋庆龄安排耿丽淑于1952年初回中国,中国福利呼吁会的工作逐渐停止。然而,中国福利呼吁会的组织并没有消失。从美国联邦调查局解密的文件看,1952年的中国福利呼吁会报告宣布,中国工合美国促进会的工作已经成功地完成;浦爱德将转任中国福利呼吁会主席。中国工合美国促进会该年6月的会议决定,中国工合的支持者的名录将转至中国福利呼吁会,并吁请中国工合美国委员会的董事会成员转任中国福利呼吁会董事会成员,同时强调中国福利呼吁会为中国与人民中国(People's China)之间的唯一的联系纽带。^[1]而且,浦爱德在1952年至1954年间,也任中国福利呼吁会董事会成员。

浦爱德一直希望回中国。1958年12月,她通过艾黎向老朋友宋庆龄写信,表示希望回国。1959年2月,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向她发出正式邀请函,邀请她访问中国三个月。楚图南会长签字的信函说,为感谢她对促进中美友谊和理解的做出的巨大努力,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支付她国际旅费和在中国的费用。

1971年,中美关系开始好转,浦爱德遂立即申请回中国签证。七个月后,在宋庆龄的帮助下,终于拿到签证。1972年10月到12月1日,在耿丽淑的陪同下,83岁高龄的浦爱德再次回到中国参观访问,特别是会见老朋友宋庆龄。从浦爱德和宋庆龄二人握手会见的照片来看,老朋友的大笑是那么自然和会心。

浦爱德档案

浦爱德档案(Ida Pruitt Papers, 1850s—1992)保存在哈佛大学施莱辛格图书馆(Schlesinger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浦爱德比较注意保存自己家族和她本人的档案文献;其一生,不管生活在中国或在美国,基本上没有大波大折,鲜有意想不到的毁坏,所以积存很多。浦爱德档案总共有69盒,外加近50个大文件夹和超大文件夹,300个文件夹的照片,以及一些银版、玻璃干板和铁版照片。时间跨度长,内容非常丰富。

[1] FBI, Potentialities of Chinese Communist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May 1954. Declassified in 1999.

哈佛大学施莱辛格图书馆的全名为亚瑟·施莱辛格和伊丽莎白·施莱辛格美国妇女历史图书馆(The Arthur and Elizabeth Schlesinger Library on the History of Women in America),原为雷德克里夫女子学院(Radcliffe College)图书馆,专重女性和女权主义有关的馆藏建设。1908年成立,历史已有近百年,档案收藏非常有特色、也很庞大。^[1]其中,与中国近现代历史有关的档案文献不少。比如,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陈香梅(1925—)女士的档案(Anna Chennault Papers, 1939—2004),也保存在这里,有80多盒。

浦爱德档案共有九个系列:1)早期家庭记录;2)浦爱德生平和个人材料;3)通信;4)工作相关记录;5)浦爱德作品;6)其他人作品;7)路易·艾黎档案;8)耿丽淑档案;9)照片。

早期家庭记录含浦爱德父母的日记和自传、传记等材料,以同时也是作家的浦爱德的母亲的档案为主。

浦爱德生平和个人材料,含联邦调查局对浦爱德调查的材料;以浦爱德1932年至1972年的大量笔记本为最多,其中有1959年访问中国各地的异常详细的参观笔记和1972年访华的比较简略的笔记。

通信主要为私人通信,特别是与家人和朋友的通信以及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办公室的信函。

工作相关记录以北京协和医学院和中国工合美国委员会的档案文件为最多;前者包括医务社会工作的个案和笔记,后者包括与工合学校、培黎学校有关的文件、通信等。

浦爱德作品主要以20世纪20、30年代北京时期的文稿以及退休后60、70年代的作品为最多,多为自传和传记类,包括传记文学作品。

其他人的作品,含浦爱德翻译的和任出版代理人的作品,包括王莹的《宝姑》、老舍的《四世同堂》,以及冯伊湄(1908—1976)的和何可(George Hogg, 1915—1945)的书稿,等等。

浦爱德档案的系列七为艾黎档案。有关艾黎的海外的档案文献没有专门单列,只能散见在不同的地方,但以浦爱德档案中的艾黎档

[1] <http://www.radcliffe.harvard.edu/schlesinger-library/about-library>

案比较突出。其中分三个部分：艾黎个人和传记资料，含日记；信函，主要是艾黎与浦爱德的大量通信，涉及到工合运动和很多其他主题；文稿和著作，包括发表的诗作、散文和出版的著作等，特别是浦爱德任编辑和经纪人得以出版的艾黎的著作。

浦爱德档案的系列八为耿丽淑档案。海外的耿丽淑有关的档案自然也比较少，但集中在浦爱德档案和陆慕德档案中。浦爱德档案中的耿丽淑档案也比较突出，主要为耿丽淑和浦爱德的通信，以及与中国工合有关的文件，包含报告、备忘录和会议记录等，这些文件多有耿丽淑的注释。

艾黎档案和耿丽淑档案，如浦爱德档案一样，可随时自由研究使用，对深入地研究中国国际友人和宋庆龄国际友人来说，重要性自不待言。

最后是照片，主要是早期的家庭照片，浦爱德的照片，以及艾黎的照片；照片的数量很大，涉及人、物、地和事非常多。但时间、地点和事件尚未明确，并且没有注释的也不少。

需要指出的是，整个浦爱德档案只有经过浦爱德本人生前简单分类，以及浦爱德研究者金敏博士及其学生认真的、但略显简单的处理，尚没有经过图书馆专业人士和中国近代史专家的处理。无奈之下，不少文献和照片等没有任何题名和标注，或只能注之以问号。所以档案的组织、处理、鉴别和标注等很多方面尚需改进。这些档案，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学者来说，是很好的有待探究和考证的原始材料。

北美是否还有其他的浦爱德档案？就在哈佛大学施莱辛格图书馆，还有浦爱德和金敏档案（Papers of Ida Pruitt and Marjorie King, 1891—1994），总共五箱/盒，含很多浦爱德本人的和与她有关的信函、文章、照片、通讯、工合文件和其他材料，所幸的是，已经全部扫描数字化，并对外免费开放。^[1]

另外，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1] Papers of Ida Pruitt and Marjorie King, 1891—1994, 浦爱德和金敏档案，档案全部内容扫描件对外开放，网址为：http://www.flickr.com/photos/experimental_archives/collections/72157629840700987/，其中也含大量与贝特兰来往信函。

Stanford University) 藏有浦爱德档案 (Ida Pruitt Papers, 1911—1948), 量很小, 只有一个文件夹。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档案——中国工合美国促进会档案 (Indusco, Inc. Records, 1938—1985), 由浦爱德本人捐藏哥伦比亚大学巴特勒图书馆善本手稿图书馆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 Butler Library, Columbia University)。总数有 200 多盒和大文件夹, 这应该是研究中国工合最全、最大的档案文献。^[1]其中有宋庆龄、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等人的信函。除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复旦大学的少数学者之外, 知道和使用的人很少。

浦爱德档案中的宋庆龄

浦爱德档案中的宋庆龄档案为一个文件夹 Soong, Ching-ling (Madame Sun, 1934—1981), 含档案文献资料约一百来件。包括手写和打字的花信、实物, 以及宋庆龄从 50 年代、“文化大革命”和 70 年代后期签写的新年贺卡, 等等。宋庆龄给浦爱德的花信都是亲手所书。从宋庆龄和浦爱德的花信和文件看出, 二人是亲密的战友、患难与共的朋友。彼此能深深理解对方, 彼此甚至托付私人事情。档案中一些反映生活方面的内容的花信, 在笔者看来, 最能反映宋庆龄的仁爱、幽默和大度, 最能反映她平凡而又伟大的一面。每一份文献, 甚至“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片言只语, 后面都有动人的故事。

因篇幅有限, 本文仅选其中两份文件为例。

第一份文件为浦爱德 1939 年写的标题为《宋庆龄, 1939》(Soong Ching-ling, 1939) 的文章, 上有宋庆龄亲笔加的按语。全文打字机打印、隔行, 共三页。文章的引子是在香港, 浦爱德受宋庆龄之邀去喝下午茶。文章开始写道: “孙中山夫人邀我去吃茶。她和艾黎是我们上海时期以来的老朋友。那天我满心高兴。我要去见全中国最敬重的女性、中国人民未来希望的象征、他们最崇高美德的代表, 为孙先生毕生的中国人民民生事业而活着的忠诚遗孀。” (Madame Sun Yat-Sun invited me to tea. My heart felt highly that day. I was going to meet the most

[1] 中国工合档案 (Indusco, Inc. Records, 1938—1985) 网上档案使用指南: http://findingaids.cul.columbia.edu/ead//nnc-rb/ldpd_4079544。

loved woman in China, the woman who was to the Chinese people the symbol of their future, their aspirations, the embodiment of their highest and most admired virtues, the dedicated widow who lived for the cause in which her husband had spent his life, the cause of freedom and advancement for the Chinese people.) 接着写孙夫人既承接伟大的中国传统, 又代表现代中国, 同时最接近中国土地上辛勤劳作的最普通的人民。文章马上直接指出宋氏三姐妹的不同: 孙夫人拒绝住孔夫人的海边别墅; 孔夫人和蒋夫人都不来看孙夫人; 孙夫人在香港只住仅有三室的普通公寓。

然后, 文章描述孙夫人与客人相见, 写孙夫人的素雅的装束和敏捷的举止。但孙夫人的美丽的头发让浦爱德特别注意: “她的头发以传统方式从她的额头向后梳, 因为她结婚的那个时候, 新娘额头上的头发仍要拨去。她细腻光滑的头发卷进她脖子后面的传统的发髻里。” (Her hair was combed back from her forehead which had been plucked in the traditional way, for she had been married when the foreheads of brides had still been plucked. The hair, smooth to her head, was coiled into the traditional chignon at her neck.) 随后, 文章继续描写宋庆龄外在和内在的美丽: “她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女性之一……我非常强烈地感到, 完美就在我面前。” (She was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women I have ever met... Imperatively, I felt that I was in the presence of complete integrity.) 文章接着写到他们谈工合、谈保盟等。接近最后, 作者写道: “我鼓足勇气告诉她, 很多年以前她在佐治亚州梅肯镇威斯里安女子学院读书时, 有一次她到我们家吃周日晚餐。‘来,’ 她说: ‘现在就回请晚餐。我们都去市里, 庆贺一下’。” (I had plucked the courage to tell her that I had met her many years ago when she was a student at Wesleyan College in Macon, Georgia, and she had once had Sunday dinner in our home. “Come”, she said, “that merits a return dinner. We will all go downtown and celebrate.”) “我们走下小山。她将一只胳膊挽这边我的胳膊, 她另一只胳膊挽另一边的廖梦醒的胳膊。廖梦醒是孙夫人最忠贞的朋友和秘书, 同时看护她, 为她挡险。” (Down the hills we walked to restaurant. She slipped her arm in mine on one side and in Cynthia Liao's on

the other. Cynthia was Madame Soong's most devoted friend and secretary, guardian and shock absorber.)

很有意思的是,在写头发的一句下面,有一蓝色划线,边上加惊叹号;夹在文章最后的一小片纸上也有蓝色的手迹:“注:艾达搞错了。我从未拔额头头发。其实,我额头头发长的是‘寡妇发型’,一些朋友说我应该拔去,但我不迷信,我喜欢是什么样就什么样,因为我生来如此……)”(N.B.: Ida is mistaken. I had never plucked my forehead, in fact, I had a “widow's peak” which some friends said I should pluck out, but I did not believe in superstition and I liked as it was, because I was formed that way ...). 这自然是宋庆龄的批注手迹。

艾达是浦爱德的英文名。浦爱德1906年至1909年入读佐治亚亚特兰大寇克斯学院(Cox College)。宋庆龄在佐治亚州梅肯镇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就读的时间应是1908年至1913年。梅肯离亚特兰大不远,他们的父母都是著名的教会人士。二人从大学就开始有交集。我们同时看出,浦爱德中国对文化和民俗所知甚详,了解过去娶亲拔新娘额头头发的仪式。宋庆龄自孙中山去世,很早就守寡,但一点也不忌惮谈自己“寡妇发型”。宋庆龄的简注显示了她非常坚定和刚毅的性格。

第二份文件是宋庆龄写给浦爱德和陆慕德的短信。可能是在“文革”之前,也可能是在“文革”开始后写的。这封信碰巧完全是与头发有关的事。这里照录全文:“亲爱的艾达、慕德:请为我帮个大忙好吗?帮我弄三瓶‘欧吉维姊妹’牌干性头发液和四小罐染发膏(黑色)。我的头发掉得快。用这些对付,很有效。”(Will you please do me the great favour of getting me 3 bottles of the Ogilvie Sisters preparation for Dry Hair and 4 small jars of the Hair Cream (black colour)? My hair is falling rapidly and this remedy is excellent.) 宋庆龄甚至将很可能是她以前用过留下的商标剪下一小片纸,附在信上。另外又在一张纸上专门写上英文的“慕德和艾达:‘欧吉维姊妹’牌发液”几个字。

不用说,浦爱德和陆慕德不仅全力照办,而且一定为宋庆龄买了远不止三四瓶。另一封宋庆龄致浦爱德的信,日期为1959年8月21

日,字里行间感谢浦爱德几经转折送达的包裹。信中没提包裹是什么东西,或许是护发品,或许不是;信中,宋庆龄坚持一定要付款,不为别的,是因为事先说好的。

头发好坏对很多人、特别是有些政治家来说很重要。但对宋庆龄来说,找异国好友买护发品,不外乎是像几乎所有女性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力去爱护头发。

结 语

浦爱德的著作和金敏写的浦爱德简传最近几年开始在国内得到翻译和出版。但浦爱德作为宋庆龄亲密的战友和患难与共的朋友,尚不大为人所知。为更深入地研究宋庆龄,如果上海宋庆龄研究会能与哈佛大学施莱辛格图书馆合作,将浦爱德档案中的一个文件夹的宋庆龄档案,以及艾黎档案和耿丽淑档案重新整理、考证,乃至数字化,对于更深入了解和研究宋庆龄、宋庆龄和国际友人、乃至二十世纪中美关系,都很有意义。

(作者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部负责人)

永远的怀念

史美芬

宋庆龄是我丈夫倪吉文的姑表姐，我丈夫家的兄弟姐妹们习惯将三姑妈倪珪贞的三位女儿宋蔼龄、宋庆龄和宋美龄称呼为大阿姐、二阿姐和小阿姐，这样的称呼大约和他们的祖父倪蕴山牧师遗留的浦东川沙口音有关。

倪吉文的父亲倪锡纯（1881—1932），1901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加入姐夫宋耀如效力的阜丰面粉厂当翻译，1904年到南京工业学院教英文。1907年获公费赴美留学，同船一起赴美的还有他的两位外甥女，即宋庆龄和宋美龄。带领他们出国的清政府官员便是倪锡纯的小姐夫温秉忠。倪锡纯先后在耶鲁大学、宾州大学和雪城大学就读，获得土木工程学士、硕士学位。1912年回国，先任铁路工程师，不久即加入洋务运动行列，颇得盛宣怀看重，进盛宣怀旗下汉冶萍煤矿公司任商务所长。之后他的外甥宋子文也进入汉冶萍，巧的是我的父亲史以济从英国留学回来后也进入了汉冶萍，都成了他的下属。后来倪锡纯和朋友合股在天津开办振华造纸厂，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任南京特别市参事。但是，倪锡纯临终前曾一再告诫他的子女：“不从政，不经商。”

倪锡纯夫人曹惠英（1887—1949）是第一代留美幼童曹吉福的幼女，共育有三子一女，长子倪吉士、女儿倪吉贞、次子倪吉明，幼子便是我丈夫倪吉文。

倪吉文于1940年代初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物理系，后又入东吴大学进修化工。1943—1944年，太平洋战争已爆发，上海和美国之间不能直接通航，倪吉文为实现去美国留学的梦想，不得不到重庆办理护照手续去美国。在重庆期间，他和宋氏姐妹，特别是宋庆龄有较多接

触。倪吉文幼时不慎从楼梯上摔下，从此留下腿疾，故其母亲写信给宋蔼龄，要求照顾她身体残弱的小儿子。他遂由宋蔼龄介绍入住“中美文化协会”，正好在宋庆龄寓所斜对面不远处。在等待办理手续期间，他多次去她寓所拜望，饮茶、聊天，听她讲陈炯明叛变时的惊险往事。曾有一次和她一起去郊游，他一路上上下下采摘野花。她跟随一旁“小心、小心”地喊着，并说道：“今天你再摔坏腿，我不好向舅妈（倪吉文母亲）交待。”倪吉文不一会就采集到一束鲜花，送到她面前，也没叫她“二阿姐”，就俏皮地说道：“鲜花送女士”。她格格地直笑道：“谢谢，谢谢。”这次和她一起无拘无束的郊游，为他留下了一生的美好回忆，也为她留下了吉文左腿有残疾的深刻印象。还有一次印象特别深刻的是1944年3月跟随她去电台，她为在美国举行的孙中山纪念日作广播演说。他是她唯一的现场观众。

倪吉文办妥一切赴美手续去向宋庆龄告别时，她深情地鼓励道：“你带着病残的腿已跨出了艰难的一步，以后就要勇往直前。”并让她的汽车送他去机场。倪吉文心中满载着对她的感激和崇敬离开她，踏上了赴美留学之路。他从重庆经昆明、印度，然后再乘船赴美。

到达美国，进入麻省理工学院，那时的他年轻、富有理想和抱负，特别是在重庆的这段时间里深受宋庆龄表姐人格魅力的感染，当同学们推举他当亚洲同学会主席时，他居然会上台激情满怀地讲道：“我们亚洲同学要努力学习科学技术，将来建设富强的新亚洲。”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演说。

1947—1948年间，倪吉文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化工硕士、博士学位后，就进入纽约陆军医院，对他从小留下的腿疾进行外科整型手术。出院前后收到了杜邦公司的录用通知，但当他出院时，也在美国的二哥吉明告诉他母亲患癌症的不幸消息，他在“世上有很多大公司，而母亲只有一个”的思想指引下毅然踏上回国之路。守候在母亲病房，细心照料，然而孝心没能留住母亲的生命，母亲于解放初病逝。

吉文和吉贞姐都是单身，姐弟俩同住作伴，他们和宋庆龄表姐时有往来。宋庆龄曾给吉文介绍过一位女友，听说是杭州一个官员的女儿。她还把她的好友黎照寰老先生介绍给他们姐弟俩作朋友。

全国解放后,由于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缺乏了解,吉贞、吉文姐弟俩商量后觉得还是去请教二姐好。她对吉贞说:“你们姊弟俩有什么好害怕的?如果怕就搬到我这里住,住到不怕了再搬回去。”这话使姐弟俩安下了心来。自宋庆龄担任政府工作,工作繁忙,倪吉文就再也没能见到她。吉贞姐和她略有书信往来。在孙中山纪念日,姐弟俩常会联名合送一只花篮表示慰问,他们将花篮送至门口,由警卫收下后便离去。大约在1962年,吉贞姐曾去她家饮下午茶,见过一面。

倪吉文曾是我华东师范大学的老师,我于1959年毕业,1963年和他结婚,婚后仍和吉贞姐住在一起。婚后吉文给宋庆龄表姐去一信并附寄一张照片,让她分享我们新婚的喜悦。因已有多年未和她联系,所以信中很客气地尊称她“Dear Cousin Madam Sun”。她很快就派人送来一对漂亮的日制塑料水壶作礼物,并附带一封祝贺信,信中关照以后写信别这样称呼她,还是称她“二姐”,信中还写道:“总有一天,我要见你的美丽新娘。”自我结婚后,孙中山纪念日送花篮一事就由我担任,也按他们的惯例,将花篮送至门口交警卫,只是花篮由一只变成了两只,吉贞姐一只,我们夫妇俩一只。大约是1964年,她从斯里兰卡访问归来,派人送来2只当地木制储物盒,送给吉贞姐和我们各一只,并在信中写道:“我一回到上海就会想到这里有我的亲人——你们在。”

1966年夏,“文革”开始,第一个来我们家抄家的是长宁区的遵义中学。这些学生在青年教师带领下人分工有序、训练有素,他们好像没有找到什么期望的东西,也没有破坏“四旧”类物品。以后复旦附中红卫兵多次来抄家,先后抄去了照相本、英文证件、书信、摆件和衣服等所谓“四旧”物品,也有银行存款单、保管箱钥匙等。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在我房里抄到了我珍藏的那封宋庆龄表姐祝贺我们新婚的英文来信,当着我们的面就给撕毁了。在吉贞姐房里还抄走了她在“文革”开始时特地从银行取出留作生活费用的2000多元现金。她的发髻还被他们“破四旧”剪掉了。大约因为有几个青年教师在场掌握政策,所以我们都没受皮肉之苦。

在此期间,华师大红卫兵也多次来抄过家。

最后一次，复旦附中红卫兵把吉贞姐、我们夫妇俩及一位同住的侄女在一天时间里“扫地出门”，将此房屋作为复旦附中红卫兵的司令部。在这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经我和我的大姐商量后，我们四人一起搬到我大姐家（淮海西路）的客厅暂住。吉士大哥一家在此前也已被“扫地出门”了。

吉士、吉文兄弟俩都很胆小怕事，我们在给宋庆龄的信中总表示愿意接受冲击，改造自己，不愿向远在北京的宋庆龄表姐多说什么，以免她担心。但吉贞姐在给她的信中会流露出遭受的苦难和悲观情绪。她一再来信开导和鼓励大家，要大家忍耐、挺住。1968年春节期间，她给三人来信，特别在“就是说你们是人民，不是人民的敌人”这句话的下面划线强调。

亲爱的吉士、吉贞、吉文：

你们好！得知你们生活上的情况，很挂念。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涉及人们生活，也触及灵魂。我们受到了教育，生活上也有所改变。对于你们，生活上的改变很大。相信你们一定多从大处想。

你们从未参加什么政治活动，不属于“反”，应该属于人民内部一类——就是说你们是人民，不是人民的敌人。很可能，工作单位、里弄或派出所有不了解的地方或看法。可以看运动进展情况自动地说明或要求他们及早搞清楚。这场革命，也是一次四清。你们不是敌人，到该说话的时候，要机智地说明。

远在北京，对上海情况不太了解。目前，仅作这样的建议。希望你们就近根据情况进行。祝你们

新春好

二姐

1968—2—4日

同时她还在生活上关心大家。记得有一次，一位中年女干部模样的人寻到淮海西路我们的暂住处，问清倪家姐弟确住此地后，就留下一个信封袋匆匆离去。袋中装有150元钱，一封写给吉贞姐的英语短信，信中还是几句安慰她的话，也提到吉士、吉文身体都不好，两位

妻子要辛苦多加照顾,然后便是带上150元钱 to you。时隔不多久,她又从邮局寄钱到同一地址,即我们在淮海西路的暂住处。这次她用吉士、吉贞、吉文三个名字,分写成三张汇单,每张100元。她的细心关怀真令人感激又感动。她的真情不是能用金钱来衡量的。但所有这些仍未消除吉贞姐的悲观和绝望念头。

我的大姐也是一位中学教师,早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此时也正在校中接受“改造”。我们四人挤住在她家,彼此和睦相处,得到暂时的安宁。

大约是在1968年前后,宋庆龄表姐在一次来信中用带有忧伤的口气诉说她在沪的父母坟墓也被破坏掉了。当时红卫兵、造反派的斗争锋芒转向当权派,对我们这些“牛鬼蛇神”相对比较放松,我们得到了暂时的喘息。吉文过去生活中一直有摄影爱好,所以收到她来信后的一个周末,我和吉文就带上照相机去万国公墓。临近坟地时,由我先前往探明情况,看到新坟已建成,由原来宋氏六姐妹兄弟共同立碑改成由宋庆龄一人立碑。几个为新坟作最后平整的解放军士兵正在收拾工具准备离去,我赶紧上前问道:“我们可以前来看看并照相吗?”他们答道:“可以。”我再转回身引领吉文上前拍了几张相片迅速离去。回家用土法冲印放大,选出一张最为清晰的寄去。其余所有底片、照片马上全部销毁以防后患。她收到照片后回信告诉我们,上海市革会也有新坟照片给她。信中还提到吉文左腿不好,去坟地拍照一定很辛苦。还告诉我们外国友人给她拍照,当即就可以取出五彩照片给她,很神奇,以后有机会她要给吉文一个这种照相机。她的关爱真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我们住在大姐家时,白天大家各自上班,只有吉贞姐一人在家,她几次回去张望,看到红卫兵已离去,门户敞开,任人出入,于是她觉得挤住在别人家客厅总不是办法,产生了搬回去住的念头。她和我们商量,但我们夫妇俩及侄女都表示不敢回去,也劝阻她暂不要回去。此时她的一位朋友及女儿、女婿一家两代人也“扫地出门”挤住在—间汽车间,小夫妻俩愿意陪她同住,于是三人悄悄地搬了回去。平静地度过了几个月,房管处的造反派还是找上门来,经过几次交涉,于1968年4

月30日，赶走了小夫妻，将整幢房屋查封，并对吉贞姐进行批斗，勒令她交出房票簿，并把她赶到汽车间住。这导致了她的彻底绝望。

5月1日劳动节，我们放假在家，她来我们处吃午饭，看她情绪消沉，我们大家（包括我大姐一家人）都劝说安慰她。饭后吉文休息，我要去看望吉士大哥，叫她一起去，她不愿意，说昨天去过了，吉士说的也是你们今天说的这几句话，她不要再听。她说她要去看一位朋友，于是我们一起出门后便分手了。在吉士大哥家，我们正说起她情绪消沉的事情，吉文赶来，告诉我们说吉贞姐在武康大楼跳楼自尽了。

几天后，我们联名写信告诉宋庆龄表姐吉贞跳楼自尽的事。不久，我们收到她写给我们四人的联名信，她写道：

Dear Cousins 吉士、蕙珍、吉文、美芬：

你们五月九日来信已收到。我原就感到肠胃不舒服。自从知导[道]她的去世后，胃痛增加，血压也就高了。现在治疗中。我想过几天就会好些的，请你们放心。

每次写信，我都尽力劝说她要开朗，要达观。每封信中，我总是说，等我能回到家（虽然是和过去一样在政府工作，但绝不能像过去那样随便离开工作岗位），一定为她解决住处，或者上级许可，让她住在我处，或不准，再找一个比较合适的地方让她住，暂时要忍耐，不要计较目前住处的环境，一定要勇敢地接受改造……千言万语，我尽最大的努力想消除她那个悲观念头。岂知她仍然走了这一步路！

吉文的情况，当然作为亲人，知导[道]他左腿有残疾，为他的体力不支而担心着。但是，他思想上能接受，这是好的。你们还是多从思想上给予帮助。

吉士血压高，弟妹的事，增加精神上的负担，必将影响健康。请注意，放开一切。

最后希望你们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并祝

你们

近好

二姐

1968—5—13晚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她还是时常来信，甚至一周来几封信，想要寻找“答案”，还问我们有没有去收尸。我回信说吉贞姐跳楼自尽被说成是抗拒改造、畏罪自杀，我们没有人敢去收尸。她也许会觉得我们有点绝情，也许会体谅我们在这特殊年代的苦衷和恐惧。还有一次来信说起她的一个朋友连睡觉的床也没有，可否来取吉贞留下的床。我又遗憾地告诉她，房屋已被查封，什么东西都拿不出来了。“文革”中她不仅为她的表亲，她还为更多受难的人们担忧，她的心在备受煎熬！

此后不久，我大姐的房子也被造反派没收。我们被第二次“扫地出门”赶往北京东路一个亭子间。吉贞姐的自尽，华东师大对吉文没完没了的审查和批斗，红卫兵、工宣队、革委会一次次令人寒心的审查结论，再加上体力不支，吉文也几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他曾多次对我说：“哪一天早晨出去后，晚上不再回家，你也不要太伤心。毛主席说过有的人的死轻如鸿毛。”我也只得咬紧牙对他说：“这个社会真容不得你这样一个人，非要置你于死地，那么我也会让你无牵无挂走得安心，我也不必伤心，让我们一起去死！”

在这段日子里，宋庆龄表姐还是一封又一封地寄信到我们北京东路亭子间，一百又一百地寄钱来，还有以林泰为名带给我们的butter、tomato和北京土产。她在给吉士大哥的信中曾担心地写道：“我已失去一个表妹，不能再失去一个表弟。”她所给予我们的生的力量已远远超过文字、金钱和物质本身，我们终于生死与共相互支撑着挺了过来。

大约在1973—1974年，吉士哥家一家和我们的住房都有了改善，我们搬到延安西路一幢花园洋房中的一大一小两居室内居住。

“文革”结束不久，大约是1978年，宋庆龄表姐来沪小住，在家里整理出一大包衣服，写信叫吉士家女儿前去取，居然还放置了一些改制衣服的工钱在内，并关照其中四套西服要送去给吉文、美芬夫妇改制穿着。她还是想得那么周到、关照得那么仔细，我们真不知用什么样的语言向她表达！

1980年某一次，她寄《中国建设》杂志时，在其中夹了一本《儿童时代》给我们6岁的儿子，但在信中写道“your little daughter”。吉文看完信脱口而出说：“二阿姐怎么把我们的儿子说成女儿了。”我随即自

圆其说道,是我们把儿子穿红衣服的照片寄给她,误导了她!

以往看到她在国务活动或外事活动中出场总是那么端庄、挺拔,在1981年5月9日我们第一次惊讶地看到她坐在轮椅上接受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授予她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她真的衰老了!

1981年5月15日传来她的“病情危急”公告,5月16日我们收到她寄来的最后一本《中国建设》。5月29日她终于结束了伟大而艰辛的一生!她虽已离去,却永远活在她所热爱的中国人民和外国友人的心中,永远活在我们这些被她时刻牵挂的亲人们的心中!

(作者为宋庆龄表弟倪吉文的妻子)

二姑宋庆龄和我家

牛恩美口述 李纯涛整理

我的祖母倪珪金是倪家三姐妹中的老大，宋耀如夫人、宋家婆婆倪珪贞是老二，最小的是温秉忠夫人、温家婆婆倪秀贞。宋庆龄是我表姑妈，平时我称呼她二姑，她在给我的信里也常会署名“二姑”。

一、牛家和宋家的渊源

我祖父牛尚周，是第一批留美幼童之一，据说他小时候读《圣经》可以过目不忘。他在美国认识了宋耀如，后来还为他做媒娶了倪珪贞。牛家和宋家等于是亲上加亲，两家的关系本来一直很好的。

我爸爸牛惠霖他们年幼时，我家和宋家住在隔院，距离只有十来步路。有一次大风刮倒了宋家的树，把我家的铁门砸坏了。两家的房子样子差不多，后面还有个花园，所以那时候两家的小孩子都在一起玩。我叔叔牛惠生最喜欢和表叔宋子文，还有我小舅公倪锡纯一起玩，和隔壁邻舍的小孩子“打仗”。为这事情，两个人没少被他们的妈妈打。有时候，两家其他更小的孩子也会来和他们一起玩，尤其是美龄姑妈和我大娘娘牛惠珠。

后来，二姑和惠生叔叔在离家不远处，就是现在虹口区三角地那里的一所教会小学一起上过学。子文表叔和惠生叔叔是圣约翰的校友，因为他小两届，所以惠生叔叔说子文表叔是他的“保护对象”；后来他们先后去美国留学时都在哈佛读书，惠生叔叔学医，子文表叔学经济。惠生叔叔毕业以后，在美国New Bedford的圣路加医院工作，子文表叔还专程赶去祝贺他。

我的祖父和宋家公公一样，把自己的四个孩子全部送到国外留学，这在当时是非常少见的。那时候，除了惠生叔叔和子文表叔他们两个，还有舅公倪锡纯、宋家的三个姑妈和我大娘娘惠珠，都在美国读书。他们之间经常有书信来往，有时候也会见面。大娘娘惠珠去美国留学，也是由温家公公提议的，和二姑、美龄姑妈她们一起的。

祖父祖母费尽心思她才得以成行，因为她和美龄姑妈一样是自费留学生。

祖父回到上海以后，先在电报局工作，后来在江南制造局供职，一直做到帮办的职位。1914年，因为反对袁世凯，宋家的人都跟着孙中山先生逃亡去了日本。祖父是个谨慎的人，非常担心因为卷入政治而失去工作，所以后来宋家婆婆、二姑和美龄姑妈她们回到上海时，即使两家相距只有十来步路，他还是避而不见。祖父还接连写了好几封信，关照在美国的叔叔和大娘娘，包括在英国的我爸爸，劝告他们不要和宋家的人联系和来往，并提醒他们温家公公就是因为支持孙中山先生而失掉饭碗的事情。当然后来，形势很快发生了变化，两家人还是像原来一样亲密，但是不久祖父就在大概1917年底1918年初的时候去世了。

二、二姑同我家的往来

我爸爸牛惠霖留学英国，获得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地救护，和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的灾区救援工作。回到上海后继续行医。惠生叔叔是哈佛医学院的博士，两度留美后也回到上海。因为他们医术高、医德好，很快都成了当时上海滩有名的医生。后来叔叔创办了儿童骨科医院，我爸爸创办了霖生医院。霖生医院就是用他们兄弟俩的名字命名的，因为他们两人的关系非常好。

那时候二姑生病，都由我爸爸负责治疗。有一次，二姑得了阑尾炎，我爸爸请了当时上海最好的一位外国医生来动手术，之后还一直陪在旁边照顾她。这件事情，二姑在给一位亲戚的信里也写到过。十九路军在上海抗日的时候，我爸爸和叔叔帮助二姑设立伤兵医院，组织战地救护工作。他们还受二姑的委托，秘密治疗在南昌起义中腿部负了重伤的陈赓将军，以他们高超的医术把已经打断并接歪的腿重新接好，满足了陈赓将军不想截肢的愿望，彼此也成了很亲密的朋友。陈赓将军多年以后，每每提及此事仍然赞不绝口。

那段时间两家的关系相当密切。我祖母70岁大寿的时候，二姑

和子良、子安两位表叔，以及子文表叔的夫人等都亲自到场祝寿。惠生叔叔去世的时候，宋家三个姑妈和子文表叔都赶来吊唁。我爸爸妈妈结婚的时候，孙中山先生送了一面银盾作为贺礼。银盾上面刻着：“惠霖先生 义基女士 鸾凤和鸣 孙文敬贺”。孙中山先生去世后，每年的3月12日和11月12日，我们家都会准备好花篮送到二姑家里，不管她人在还是不在都要送去，二姑也会很快写信来道谢。二姑一直说她配不上和孙先生一起葬在中山陵，所以她想和父母一起葬在上海。1981年初，她还在给我的一封信里告诉我：孙先生的衣物，之前每年都是由李妈帮她翻晒保管的，现在李妈走了，今后她要自己担当起这项具有重要价值的工作。

抗战胜利以后，二姑在上海为救济孤儿举办各种筹款活动，我们也去过几次。有一次是在Marble Hall，就是现在的少年宫，是我妈妈带着我和妹妹恩德一起去的。温家婆婆那次也去了。我的两个哥哥没有去，因为他们1946年9月份就出国了。那时候这种慈善活动的门票，对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也是挺贵的。平时我们轻易也不会参加，但因为那是二姑举办的，而且她也会到现场主持，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我妹妹恩德记得还有一次，是在二姑家的后花园找复活节鸡蛋，找到最多的孩子获得一等奖。那次也是妈妈带着我们两个去的。当时妹妹和我都在学钢琴，偶尔二姑到我家来，我和妹妹就弹琴给她听。后来妹妹开音乐会，二姑每次都会来，还送花篮祝贺。1977年妹妹回国，和二姑见了一面，她送给妹妹一幅徐悲鸿的奔马图，还有一本荣宝斋的纪念册，上面写了鼓励妹妹的话。多年后，二姑的秘书张珏告诉我，那本纪念册上的名字是二姑自己签的，前面的文字是张珏代她写的。

二姑和我妈妈一直保持着书信联系。妈妈后来患了白内障，二姑一直惦记着这件事，为妈妈介绍医生治疗。妈妈后来在美国动了手术，二姑来信也经常问及妈妈的情况。

三、二姑关心我的生活

我中学毕业后，1952年考进上医大。当时正值抗美援朝，需要大

批的医生，于是我们都是短期速成，学习三年后即上前线，比正规医科少学了两年。但是我毕业的时候，朝鲜战争结束了，所以我们这批学生没有进军队，还是全国统一分配了。我被分配到河南安阳的妇幼保健院工作，那里的条件非常差，非常需要医生。因为我工作积极认真，被评为了先进工作者。1957，我妹妹出国了，二姑看我家没有小辈在上海，我妈妈没人照顾，就想办法把我调回上海来。我妈妈1962年去美国定居以后，二姑就直接和我联系了。

在上海，我一直在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工作，前后有30年。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当时的江兆菊院长还带着我参观了医院。我和二姑的亲戚关系也只有她知道，保健院的其他同事都不知道，我也不想让他们知道。所以二姑来视察保健院的那次，也没有人安排我去见她，我只是远远地看她一眼。直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抄家，同事们就很惊奇，怎么你是宋庆龄的亲戚？

1969年10月，我儿子出生后，二姑特地写信来祝贺，还托亲戚送了100元钱给我。这在当时是笔巨款，而她自己的经济其实也不宽裕。她说想看看我的儿子，可是我后来也没有机会带儿子一起去看她，非常可惜。

1978年，我在北京协和医院进修了半年，新年没过就去了，在那里待了六个月。当时正好二姑在北京，所以那六个月我和她接触比较多。因为北京条件没有上海好，协和医院的伙食我也吃不惯，二姑怕我营养不够，就经常派人过来给我送吃的东西，肉松、饼干、糖果之类。有一次，她给我送了一罐她的外国邻居做的山楂果冻，还有一盒糖果。她为此特地写信来仔细关照我怎么贮藏才不会变质，还教我用一大勺果冻放在一大杯冷水里，做成夏天的饮料。后来我每天晚上都做一杯这样的饮料，很好吃。我告诉二姑知道后，她非常高兴，说这样可以补充维生素。二姑每次送东西来都是用牛皮纸包好，上面都是她亲笔写的字，诸如牛恩美同志什么的，签名写的是“林泰”。

除了送东西给我，二姑还让我到她那里吃过好几次饭，补充营养。每次她都派车由张珏到协和医院接我。那时候非常严格，见二姑一面

也很不容易。因为是亲属，而且是早先已经联系好的，门口的警卫才会放行。

那时候我没有照相机，所以也没能和二姑拍过照片。但是，应该有一张中国福利会成立40周年纪念活动时二姑和我合影的照片。那是1978年6月14日，在北京后海北沿46号的故居里，活动非常隆重，事先还发了请柬。二姑坐在客厅前面，客人们依次上前和她握手，聊天。二姑座位的后方放置了一架照相机，所有和她见面的人都会拍下照片。当时，我趁周围没人的时候上前和二姑单独聊了一会儿天。我记得她还问我，今天你怎么那么安静啊？因为在场的客人都是大官，我一个也不认识，所以我一声不响。那架照相机专门有人拍照，所以我上前的时候肯定会拍下照片。之前我那么多次和二姑见面也没有一次机会和她拍照，真是非常可惜。那时候很讲究保密，1977年我妹妹去看二姑的时候也没让拍照。

二姑在上海的时候，我也去过她家好几次。二姑家里有个男管家叫周和康，有时候送信、送吃的东西都是让她的男管家送来。我妈妈和妹妹都在上海的时候就是他送来的，以后只有我在上海的时候也是他送来的。

二姑上海的家里黑洞洞的，光线不是那么明亮。她家有一张圆桌子，黑颜色的木头，螺钿镶嵌得很漂亮。我去二姑家的时候，总是先在沙发那里坐着说话，到了吃饭的时候二姑就领我到餐厅去，就我们两个人吃饭，饭菜也比较简单。我每次去见她，看见她穿的衣服都比较朴素，头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这一点和美龄姑妈不一样。

二姑一直非常惦记她在海外的家人们，她在国内消息比较少，所以她总是要我们多告诉她一些他们的情况，也经常托我们转达她对他们的问候。1977年我妹妹回来的时候，二姑就悄悄问起美龄姑妈的情况。后来我们去曼哈顿美龄姑妈家吃饭的时候，找了个机会转达了二姑的问候。其实我们开始也找不到美龄姑妈。她从台湾过来住在长岛，离我们太远我们没办法去。后来她住到曼哈顿市区，我也住在曼哈顿，我住的地方离她家大概只有十几条街，我在63街，她大概是在87街。因为住得近所以我们见过好几次面，每次都是一个姓宋的副官

打电话联系好什么时候去。我和妹妹都是一起去的，还有两次是和小姑娘惠珍、哥哥恩安以及大娘娘惠珠的长子过惠生一起去的。每次去都要一起吃饭。美龄姑妈每次都打扮得很漂亮，穿的衣服都不一样。她同我们讲她以前的事情，还讲我爸爸给她看病的事情。她称呼我爸爸“惠霖哥哥”，我爸爸还有我叔叔她都记得。那时候她已经90多岁了，但肯定不到100岁。

四、二姑要求我成为最优秀的医生

1978年下半年，我赴美探亲，并开始在斯隆—凯特琳中心和康奈尔大学进修。因为我的专业的缘故，非常希望能够继续留美进修。这件事1977年我妹妹恩德回国时曾经和二姑说起过，她认为这是让我“为我们的医疗工作做贡献”的好事，因此竭力促成。二姑在国内帮我转递申请书等材料给相关的政府主管部门，帮我联系西奈山医院的罗森大夫夫妇争取让我在他们的医院继续进修，真可谓是尽心尽力。当得知我的申请获得批准，二姑第二天就给我写信，高兴地告诉我这个好消息，在信中她鼓励我“专心致志地，全力以赴地进行学习，以行动来证明你是我国最优秀的女医生之一”，并预祝我成功。之后，二姑仍然关注着我的学业。当我完成了在斯隆—凯特琳中心的进修之后，我把中心的刘易斯博士写的推荐信寄给二姑看，她看后非常高兴，认为“这份文件值得保存”，特地寄还给我让我好好保管。二姑平时也非常关心我的学习。她经常寄外文版的《中国建设》给我，帮助我提高外语水平。我出国以后，还一直收到她寄来的杂志，还有国内医学科研动态的剪报，直到她病重为止。有一次她因为吃了大把的土霉素导致药物过敏，痛苦持续了很长时间，她就在给我的信里提醒我一定要注意这种磺胺药物的使用。

二姑一直认为做医生一定要有高度的时间概念，所以她托朋友带给我一块带闹钟的精工表，让我掌握时间。结果被那个朋友不小心遗失了，她很生气，就在信里说怎么可以这样不负责任。结果她又另外送给我一块全自动的瑞士表，还有一副袖扣。但我收到礼物后没有多久二姑就去世了，可见她在重病期间还惦记着亲戚们，要给我们留一

件纪念品。

二姑去世的时候，我们都在美国，我和妈妈、妹妹就到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驻地去吊唁，我们还参加了在纽约唐人街容闳小学的礼堂里举行的追悼会。追悼会是由美国的对华友好民间组织筹办的，有很多花圈，也有人上台讲话，我妹妹还弹了两首二姑喜欢的曲子。那次追悼会罗森夫妇两个也在，我们也一起拍了照片。他们是二姑很好的朋友，受二姑之托照顾在美国读书的永洁，也经常带东西给我们。

二姑去世至今已经三十多年了，她是非常好的一个人，她对我的恩情我终生难忘！

（口述者牛恩美为宋庆龄表侄女，

整理者李纯涛为宋庆龄陵园管理处文物保管部主任）

我所知道的宋庆龄

黄浣碧^[1]口述 沈海平整理

我祖籍广东中山，荣幸地与国父孙中山先生是同乡人。我自小生长于中山，做梦都未曾想到有一天会来到我们祖国的首都；也未曾想到会从国父的家乡进入国母孙夫人创办的机构里工作，并且一直干到退休；更不曾想到会亲眼见到孙夫人，与她握手、谈话并与她合影。当然，也绝不会想到在丧夫多年即将步入晚年时，会与孙夫人的挚友，我曾经的领导，一个外国血统的人结为夫妇，并且协助他为我们共同崇敬的伟人孙夫人写传。

我与宋庆龄照了相

我是1960年进入宋庆龄主席创办的《中国建设》杂志社的，在杂志社办公室工作。这时的杂志距离创办已将近十周年了，我没有经历杂志创建初期的艰苦。

我到杂志社工作不久，就赶上了杂志社建社十周年的大庆活动。1962年1月6日，《中国建设》杂志社举行创刊十周年纪念活动。这一天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因为我不但见到了孙夫人、周总理，还与他俩照了相。我至今完好地珍藏着当日的合影。

建社十周年的社庆纪念活动隆重而简洁。我们没有到外面去借场地庆祝，而是就在社里举行纪念活动。十周年大庆的活动主要是办了一个招待会和一个图片展览。

记得纪念活动刚开始计划时，我们发出通知，邀请方方面面，然后电话落实。起初，被邀请方几乎都说没空或有其他安排等等。后来我们透露说，宋庆龄主席和周总理都将出席，于是各方面都不再说没有空了。大家在活动当天，全都赶了过来。

[1] 黄浣碧，女，1934年4月生，广东中山人。中共党员。1949年1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3年转业至公安系统。1960年调入《中国建设》杂志社办公室，1985年与爱泼斯坦结婚，1991年退休。现任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名誉理事、国际友人研究会理事、工合国际委员会委员等职。——整理者按

我们中建社的办公场所很简陋，房间都不大。我们出版组地方相对大些，又是朝南，2月份温度不会低于18度。于是我们就腾出了较大的出版组，摆上沙发、茶几，在北京饭店订了简单的点心，作为接待宋庆龄主席的贵宾室。

那天，部长们都早来了，在由三间紧挨着编辑办公室临时改成的休息室等着。金仲华、唐明照、鲁平则在楼下大门口迎候。宋庆龄、周恩来、陈毅到后，先在金仲华、唐明照的陪同下参观杂志社的成就展览，然后一起进入出版发行组改成的临时贵宾室。我很荣幸地被安排担任签到工作。当我手捧签到本走到宋庆龄主席身边，宋庆龄提笔签名时，记者抓拍了一张珍贵的照片，我也被摄入镜头。虽然这不是刻意安排的合影，但这是唯一一张只有我和宋庆龄两个人的照片，也是我平生第一张与宋庆龄的合影。

我与宋庆龄主席等领导的第二张合影，是领导们要离开时的集体合影。记得宋庆龄主席将要离开时，敬爱的周总理主动招呼我们一般工作人员说，来来来，大家都过来，来与宋主席照张相，总理这一说，道出了我们的心声，我们多么希望与宋庆龄主席一起照相啊，但这只是我们在心里暗暗的期盼，根本不敢奢望，更不敢说出口。总理一开口，大家高兴极了，于是互相招呼着在走廊里忙碌着的其他工作人员，大家兴奋地呼啦一下就围了过来。我们围聚在一起，或蹲、或站，与宋庆龄、周恩来、陈毅等领导照了相。在这张珍贵的照片上，没有那些部长们，因为此时他们并不知道我们这里发生的一切，还在贵宾室等着呢。镜头的中间和前排这些显眼醒目的位置，都是我们这些很随意地围聚在一起的杂志社的普通工作人员，而大领导们都在旁边或后排。我的位置很好找，在敬爱的孙夫人下面那个蹲着的人，就是我。每每看到这张照片，都会让我们激动万分，也不由地让我们想起总理体贴细致的关心和善解人意。总理对我们普通工作人员的爱护，实在让我们非常感动，也令我们终生难忘。

宋庆龄关心杂志社的外国专家

中建社是我国较早获得政府批准聘用外籍工作人员的单位。根

据档案记录,1953年1月26日,宋庆龄主席专门做了如下指示:1、《中国建设》暂出双月刊。2、经周恩来总理同意,中国福利会可以聘请外籍工作人员。

为了工作的需要,《中国建设》从创刊开始,就陆续聘请各语种专家及外籍工作人员,前前后后,总计有90多人。但在早期,外籍员工的人数还是较少的。当时有爱泼斯坦和邱茉莉夫妇,还有南格林和克艾文等。外籍雇员主要担任编译和改稿工作,但是他们不管内容,主要针对语言与文法。

建国初期,找外国专家不是很容易,除了要有文字工作经验外,还比较强调政治观点,强调要与我党之间有联系的。因为政治观点不同,很难做好杂志工作。在早年,社里聘请的外国专家,一般都是通过中央对外联络部或是我国驻外使馆介绍,先由社领导看一看此人写的东西,心中有底后才谈录用的事。被录用的专家大多数是所在国的共产党员。

后来对政治观点的要求放宽了,逐步转变为只强调与中国友好即可,不要求政治观点相同。慢慢地,中国的声望、地位提高了,愿意来华工作的人也就多了起来。“文革”后,又新增加了葡萄牙语和阿拉伯语,友好的、有能力的,原来做过文字工作的人,都可以考虑聘用。合同一般签1—2年,工作表现好、愿意续签的就再续签。

我们社里来来去去的外国专家挺多的。办公室里有人专门联系外国专家,我人在出版组,但也一直参与这项工作,所以与专家们很熟悉。

为了帮助他们了解中国,熟悉稿件反映的内容与信息,胜任杂志工作,我们经常组织他们外出参观、考察,也陪着专家去采访。那时候,在中国的外国人少,所以很稀奇,外国专家们一出去,不管走到哪,老有一帮老百姓围着看热闹。

英国人南格林是早期来社里工作的专家。他是通过中联部找来的。1954年来工作,1960年回国。

美国人费兰德1963年来社里工作,直到1989年去世,在中建社工作较长时间。他夫妇去世多年后,他子女又回到北京工作。

美国人克艾文的丈夫是中国人,她50年代就到社里来工作了。

她性格挺倔，她经常与编辑发生争吵，不为别的，主要是为了稿件。她很坚持自己的观点，总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当然，她一旦认为自己错了，也就马上道歉。克艾文吵归吵，对社里的同志还是很信任的。她回国探亲离开中国时，总把存折等贵重东西都交给我，请我替她保管。不过奇怪的是，外国专家局2008年设立以后，我们为克艾文争取老专家待遇，外国专家局居然一直未批。直到1986年她退休时，外专局才向她补发了老专家待遇，也买了套房子。

早期的专家人员变动不快，年纪偏大。记得最年轻的一位，是叫苏裕，大约20—30岁，他是在中国学习中文后留下工作的。他的中文很好，还会古文，但是脾气也很倔。后来他娶了位英国华侨。他的父亲苏曼是《中国日报》的专家。

外国专家挺有意思的，他们性格各异，都很敬业，大多数人很友好随和，但也有人很傲慢。一般而言，美国人比德国人随和、爽快。我最不喜欢的一个外国专家就是德国人，他妻子是我们这儿的著名影星。

宋庆龄对在中建社工作的外籍专家都很关心，尤其关心他们在中国的生活是否习惯。1978年聘用秋迪事就很能体现宋庆龄在这方面的为人与行事风格。因为这件事是我经手的，所以我至今记忆犹新。

记得我当时在办公室工作，外文局说要推荐给我们一位德语专家，让我去看材料。我去了以后，一看材料，感到完全不符合我们的要求。这位叫秋迪的专家，并没有从事文字工作的经历。从履历表里反映出的情况看，她曾经学习的专业是护士。而我们聘用的专家，必须有从事文字工作的经历，并且还要由社领导确认其写作能力。秋迪显然过不了必须要过的文笔这一关。于是，我在一开始时就拒绝了她的材料。我婉转地对外文局说，我们社里庙太小，她来不合适。

过了一段时间，外文局又通知我，坚持要安排秋迪到我们社里来工作。我只得直言相告，说这个人的条件不符合我们社里的要求，主要是没有文字工作经历，我们不能要。这时，外文局告诉我，这个专家必须收下，并且说，这是孙夫人的意见，而且一定要妥善安排好秋迪在中建社的工作。当时，我并不知道其中的原因，只是想，夫人执意做出的决定一定有她的道理。以后，我才逐步了解到，秋迪夫妇都曾为中

国革命做出了很大贡献甚至是牺牲。

秋迪为中国人民和革命的奋斗与付出，至今很少有人知道。秋迪是德共党员，全名秋迪·卢森堡。她曾经在上海隐蔽战线默默地工作，而且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秋迪1933年和波兰籍德国新闻记者、德国共产党员汉斯·希伯结婚后，就随同丈夫一起来到中国上海，目睹满目疮痍、饱受战乱的中国，她决定尽自己的一切努力来帮助中国人民。在其丈夫的联系下，她很快同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

1937年中国抗战全面爆发后，她在潘汉年的直接领导下，在八路军驻沪办事处担任收发报的工作。她的工作热情非常高，吃苦耐劳，有一段时间痔疮发作，连坐在凳子上都有困难，但她照样坚持工作。1937年11月，上海沦为“孤岛”后，八路军驻沪办事处撤销，潘汉年等撤离上海之前，委托她保管一个藤箱，箱内存有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的捐款收据和一些马列书籍，还有一颗木制的“潘汉年印”。

1939年9月潘汉年回到上海，在上海重建情报站，秋迪将自己保管的物品如数奉还。潘汉年1941年在上海租界里秘密设立了第二处通讯电台，这处电台就是由秋迪负责掩护的。当时，秋迪在一个犹太人开的私人诊所里当护士。

然而，当秋迪默默地为中国人民工作时，她的丈夫汉斯·希伯在为报道八路军在山东敌后抗日情况而随军采访时，于1941年11月30日晨在大青山与敌人遭遇，他同八路军指战员一起同敌人展开殊死决战，最终壮烈牺牲，时年44岁。在上海等待丈夫归来的秋迪，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才从有关部门得知希伯已牺牲的噩耗。二战胜利后，秋迪回到德国。

在宋庆龄的直接关照下，我们把秋迪安排到了德文部，并给予关心和照顾。

秋迪在中建社一直工作到退休。她对宋庆龄充满感情。在宋庆龄去世后，她担任了宋庆龄基金会的理事，对有关宣传宋庆龄的工作，她都积极支持并热心参与。

2008年，秋迪逝世。根据她的遗愿，她的骨灰被送到了汉斯·希

伯埋骨的沂蒙山革命根据地，与汉斯·希伯合葬在一起。

宋庆龄对爱泼斯坦的关心

宋庆龄是个对人很细致周到、体贴入微的人，她的心里总是记挂着老朋友，特别是在困难时期与她并肩奋斗过的老朋友，她总是尽可能予以周到温馨的帮助与照顾。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我们国家物质匮乏的年代，她更是想方设法关心照顾大家，希望尽自己之力，为老朋友的生活做些许改善，让这些为了帮助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自愿放弃优越的物质生活与享受来到中国，坚持在条件相对艰苦的环境工作的外国朋友们感受到家的温馨。

宋庆龄与爱泼斯坦及邱茉莉夫妇的感情很深。相比较而言，在日常的交往中，宋庆龄与邱茉莉的往来更多。爱泼斯坦夫妇经常收到宋庆龄送的东西，无论物品贵重与否，体现的都是她的一份关怀与爱心。有时是从国外带回的一罐最好的爪哇咖啡、一个自控的电咖啡壶，有时是几只朝鲜大苹果、几瓶酒或鲜美的一打大闸蟹，有时是一双毛袜、一条领带、一块衣料、几条手绢……

1952年的五一节，是爱泼斯坦与邱茉莉应宋庆龄的邀请返回中国的第一个劳动节，他们收到了宋庆龄送来的节日礼物。这份礼物是宋庆龄的朋友送给她品尝的粽子，可是她马上想到了艾培夫妇，并立即送去。她对邱茉莉说：“在这里祝你和艾培五一节愉快！这些粽子是一位朋友专门为这个节日做的，因此你们一定要和我分享。”她还细心地关照：“吃之前必须要煮15至20分钟。对了，而且要边喝咖啡边吃，这会使两者的味道都更好。”

爱泼斯坦珍藏着一个电饼铛，是宋庆龄1963年五一节送给他们夫妻做早点用的。宋庆龄十分了解他们的生活与饮食习惯，知道他们早餐喜欢吃烙蛋奶饼。1963年5月3日，宋庆龄在致爱泼斯坦夫妇的信中说：“你们好吗？我又搬家了，新址在后海北沿28号。因为忙，没有时间给你们送去这个烙蛋奶饼的电饼铛。我知道你们会喜欢的。这是我专门为你们准备的。”

在知道自己赠送的电饼铛已被爱泼斯坦夫妇使用后，宋庆龄非常

高兴，她于1963年5月12日又写信给邱茉莉说：“我很高兴知道你在使用烙蛋奶饼的电饼铛，我希望你今天早晨又在享用这种蛋奶饼。”

这个电饼铛一直在爱泼斯坦家里使用，1985年我同他结婚以后还在用，共计用了40年。2005年艾培去世后，我把它捐给了中国福利会。因为在赠送电饼铛的信中，宋庆龄还谈到了中国福利会即将庆祝25周年的事。她在信中说：“尽管搬家、杂事和参加五一的节庆活动使我很疲惫。但仍希望在庆祝中国福利会成立25周年时能在这里见到你们。”我觉得，这个电饼铛不仅见证了宋庆龄与爱泼斯坦一家的真挚情谊，而且还见证了爱泼斯坦与邱茉莉夫妇追随宋庆龄，在她领导下，为中国革命，为中国人民的福祉努力奋斗的过程。

爱泼斯坦是在宋庆龄领导的机构里，从创建起就参加，并且工作时间最久的人。这个电饼铛，既是宋庆龄与爱泼斯坦夫妇友谊的象征，也是他们一起为共同的理想、为热爱的事业奋斗的象征。我希望中国福利会的后来人，通过这个特殊的物件，记住宋庆龄以及他们这一代曾经的奋斗历程与精神。

（口述者黄浣碧为爱泼斯坦夫人，《中国建设》杂志社原工作人员；

整理者沈海平为中国福利会宋庆龄工作室研究员）

英国国家档案馆藏关于邀请宋庆龄访英的 英国外交部档案

郑培燕 译注

[译者按]

英国国家档案馆现存有标题为“Invitation to Mme. Sun Yat-sen to visit the United Kingdom”的档案,编号FO 371/53727,由三部分卷宗(F4634/4634/10、F5065/4634/10、F14712/4634/10)组成,是英国外交部处理此事的公文行文,包括正式发文的草稿在内共23页。本译文仅录正式发文。

这份档案主要内容涉及英国大学女性联盟1946年两次意图邀请孙中山夫人宋庆龄访问英国,就该邀请可能产生的政治影响征询英国外交部的意见,英国外交部处理此事的公文行文备忘录以及最后做出的答复等。

—

邀请孙夫人作为英国大学女性联盟的客人访问英国的提议。

想了解外交部就英国大学女性联盟邀请孙夫人作为重要嘉宾访问英国的建议有何指示。

备忘录

详见内附

孙夫人的来访将非常有帮助。在当前政治形势下我认为中国政府对于向孙夫人发出的邀请不会持反对态度。

我提交了一份电报草稿。

史班纳

3月28日

文化关系部(报送)

祈臣^[1]

3月29日

已经发了一份电报。第524号 25/3/46 请与此公文夹放在一起。

*[2]

3月30日

交流部

已经就所附议题发过电报么? 电报应该在3月25日左右已经拟好?

祈臣

3月30日

是的, 参见3月25日第524号, 史班纳^[3]先生致大使的秘密私人信件。

*[4]

3月30日

史班纳先生

关于所附电报。

我起草了一份对此事做出回复的电报, 同时还有给芭索小姐的答复函, 但是它们似乎消失了。我确定电报还没发出, 那样的话这一份就是多余的了?

祈臣

3月29日

[1] 时任英国外交部远东司主理中国事务的科长。

[2] 文字辨识不清, 当为祈臣下属。

[3] 时任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司长。

[4] 同[2]。

我确定已经起草过一份电报稿——大约于3月25日起草给芭索小姐回信的同时。请咨询交流部。

史班纳

3月29日

收文：伊迪丝·芭索致史班纳函（1946年3月22日）

收文

机密

皇家霍洛威学院

（伦敦大学）

恩格尔菲尔德格林

萨里郡

1946年3月22日

亲爱的史班纳先生：

我急于想就一件相当微妙的事情征询外交部的意见，约翰·卡麦隆爵士建议我非正式地问问您的想法。

我是英国大学女性联盟主席，本联盟是一个严格的非政治性组织，附属于同样是非政治性组织的国际大学女性联盟。近日我收到了一封马杰里·弗莱小姐的来信，提出英国大学女性联盟或许可以率先邀请孙逸仙夫人访问本国。孙逸仙夫人，与她的妹妹蒋夫人一样，是中国最杰出的女大学毕业生，也是一位最正直的女性，能够邀请到她将是我们的荣幸。但是我们想知道是否还有我们知之甚少或是一无所知的政治因素。我们知道孙夫人对重庆政府避而远之，尽管有人说她现在似乎比过去有了更多前往国外的自由，但我们不知道这一说法的依据何在，或者我国发出的邀请会被赋予何种信息。我们特别不想令我们的政府为难，或是将我们自己卷入国际政治或战争，这应该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如果您能就这些方面给我一点意见我将非常感谢。

您的真诚的，

伊迪丝·芭索

发文：史班纳致伊迪丝·芭索函（1946年3月27日）

发文

外交部

S.W.I.

1946年3月27日

机密

非常感谢您3月22日关于邀请孙夫人作为英国大学女性联盟的客人访问英国之提议的来信。

正如您所估计的那样，该提议有可能带有政治复杂性，我认为最好先征询一下我们驻重庆的大使。

我已经发电报这么做了，收到薛穆爵士的回复后我会再给您写信。

您的真诚的，

史班纳

3月25日

伊迪丝·芭索小姐

皇家霍洛威学院

伦敦大学

恩格尔菲尔德格林

萨里郡

发文：外交部致重庆电（1946年3月25日）

发文

[密码电报]

外交部致重庆电

第524号

1946年3月25日

1946年3月26日下午2：10

DEDIP码

秘密

以下为史班纳先生致大使私信。

英国大学女性联盟主席就一项邀请孙逸仙夫人作为联盟客人访问本国的提议咨询我的意见。该联盟是一个严格的非政治组织，联盟主席想了解可能引起的政治影响。

如您能给我一些意见我将非常感谢。我们部门的第一反应是如果孙夫人接受邀请（对此我们持怀疑态度），她将很难拒绝在这里发表政治演讲的机会，尽管一直以来她都是拒绝的，如此便会令主办方以及中国政府难堪。基于该原因中国政府很可能会怀疑该邀请背后有什么政治动机，所以我们认为更好的办法是建议该联盟选一位政治上更“安全”的人，例如吴贻芳博士。

二

邀请孙逸仙夫人访英的提议

关于史班纳先生的524号电报：建议吴女士替代（尽管怀疑她是否会接受）

备忘录

大使认为就中国政府而言该邀请在政治方面也不是无可疵议的，还说他个人愿意看到孙夫人被邀请。我也不认为孙夫人的访问会让我们有什么尴尬。我认为她不是共产党，但可能被说成是中国某种开明的“政界元老”。中国政府迟早会向左倾，而且可能很快。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英国大学女性联盟中的一员向孙夫人发出邀请没有什么不必要的风险，我还认为她的访问将是非常有帮助的。大使怀疑她可能不会接受邀请，但那并不妨碍向她发出邀请。我认为邀请吴贻芳博士作为替代人选并不是很合适，因为（a）她不如孙夫人那样享有盛名，（b）去年在她从美国返回中国的途中已经邀请过她，但是因为身体欠佳未能前来（事实上她刚刚回到中国，由于金陵女子大学要从成都迁回南京，她可能一段时间内都来不了）。

史班纳

4月3日

我认为我们得将这个问题丢给芭索小姐，由她的联盟来做决定。

因此请起草回复，就说薛穆大使个人赞同邀请孙夫人的想法，但是也提醒我们，如果她到这里，不能够绝对保证她不参与政治演说或其它政治活动，这就将令主办方难堪。而如果联盟愿意担这个风险，我们认为孙夫人是绝好的人选。如果不能邀请到她，也可以邀请吴贻芳博士。薛穆爵士怀疑两位都不会接受。

祈臣

详见内附：

1) 芭索小姐4月9日致斯科特^[1]先生信

收文：英国驻华大使薛穆致英国外交部电（1946年4月2日）

[密码电报]

重庆致外交部

薛穆爵士

1946年3月29日凌晨4：45发

第475号

1946年3月29日

1946年4月2日凌晨7：50收

秘密

致史班纳私信。

阁下的第524号电报。

由于该联盟将政治上的安全放在首位，我很遗憾地同意孙夫人从政治的角度而言不是绝对安全，尽管我本人很乐意看到她被邀请来访。

2. 吴博士是个非常合适的人选。

3. 我估计她们二人谁都不会接受。

[复件送史班纳先生]。

发文：斯科特致伊迪丝·芭索函（1946年4月8日）

发文

外交部，S.W.I.

[1] 时为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官员。

1946年4月8日

亲爱的芭索小姐：

关于提议英国大学女性联盟邀请孙逸仙夫人访问本国的问题，由于史班纳先生不在，因此我根据史班纳先生3月27日的信，代他给您回复。就这一议题发给薛穆爵士的电报已经得到了答复。

薛穆爵士个人很欢迎邀请孙夫人的想法，但还说不能绝对保证她来了之后不利用这一机会发表她的政治观点；从您的来信中我得知如果这种情况出现的话会令您的联盟陷入尴尬境地。然而，如果你们愿意承担这一风险，我们认为孙夫人是非常好的人选。如果请不到她，您或许可以考虑邀请金陵女子大学的吴贻芳博士，也是一位杰出的女大学毕业生（虽然不能与孙夫人相提并论）。不过，薛穆爵士怀疑目前她们二人均不会接受邀请。

您的真诚的，

A. L. 斯科特

伊迪丝·C·芭索小姐

皇家霍洛威学院

恩格尔菲尔德格林

萨里郡

收文：伊迪丝·芭索致斯科特函（1946年4月9日）

皇家霍洛威学院

（伦敦大学）

恩格尔菲尔德格林

萨里郡

1946年4月9日

亲爱的斯科特先生：

非常感谢您和史班纳先生费心回答我关于英国大学女性联盟邀请孙逸仙夫人来我国访问这一提案的问题。您的来信以及薛穆爵士的回复将有助于我们的委员会更好地考虑该项提议。

您的真诚的，

A. L. 斯考特

外交部

S.W.1

三

邀请孙逸仙夫人访问英国的提议

说明在克里普斯夫人^[1]动身前往中国以前已经与她讨论过该事宜。大致的意见是将该事宜留给中国政府决定。

参见F 5065/4634/10 F 4634/4634/10

备忘录

详见内附。

斯科特

10月11日

s/s 10月1日上午8:11会见**先生^[2]

9月25日在中国学院为克里普斯夫人和伊丽莎白·米勒夫人^[3]举行的招待会上,克里普斯夫人向我提出了英国大学女性联盟邀请孙逸仙夫人访问英国的问题(我认为中国运动委员会的塞尔温—克拉克^[4]夫人是该项提议的推动者)。

我建议克里普斯夫人应该就这件事情先听一下驻南京的大使阁下的意见。但是她坚持要在这里解决并称如果必要的话她准备直接去见贝文^[5]先生。我说我会将此事上报并在她(10月4日周五晚上)离开英国之前告诉她结果。

[1] 时为英国援华联合会会长。1946年10月曾访问延安。

[2] 此为史班纳手写体。**先生名辨识不清。

[3] 时为英国联合援华会秘书长。

[4] 香港的医务总监司徒永觉的夫人,曾担任保卫中国同盟的名誉秘书。

[5] 时任英国外交大臣。

该联盟以前曾于3月就邀请孙夫人一事征询过我们的意见。当时将此事汇报给了大使阁下,他的答复也已经转达给了该联盟。最终没有发出邀请。

我觉得这项邀请的提议背后无疑是有政治动机的,那就是煽动这里的舆论反对中国政府。此外,如果孙夫人来了这里,几乎可以肯定她会发表严厉谴责国民党和有关中国政府总体现状的观点,事实上她在中国一向是这么做的。这就可能使得我国政府与中国政府的关系陷入尴尬的境地。不过,孙夫人能不能出国应该由中国政府说了算,如果他们让她来了,不管产生任何后果他们都不应该归咎于我们。能不能将事情处理好取决于他们。

因此我认为我们应告知克里普斯夫人的是,尽管该邀请有可能在我国与中国政府的关系方面令我们很尴尬,但是我们也不提出反对的建议,我们也应这样告知大使阁下。

A.L.斯科特

1946年9月26日

私人秘书。

此事我希望了解更多一些。我不满意。我应该同意**的意见。告诉我更多详情。史班纳

我国有很多人相信共产党人与国民党相比更值得押注。这与我们以及美国人都希望看到的中央自由集团的出现完全不是一回事。

如果孙夫人来到我国并发表谴责国民党的演讲,无疑令我们难堪,也会煽动无知民众在不了解事实的情况下发表观点。另一方面,我认为中国政府一定深谙孙夫人在这方面的能力,因此不会同意她出行。

因此存在以下可能:(a)孙夫人将拒绝邀请,(b)中国政府不让她出行。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同意斯科特先生备忘录的最后一段。

贝文

1946年9月26日

我已告知克里普斯夫人的是，我们已将此事汇报给了外交大臣，贝文先生认为外交部既不应支持也不应反对该项邀请，是否发出邀请应留给英国大学女性联盟决定。我提醒他们关于此事的利弊在我们4月8日致芭索小姐的信中都已经向联盟说明了。(F5065/4634/10)

克里普斯夫人非常理解并赞赏这一立场，提出将此事留给联盟解决，正如我们所建议的那样。她证实有人(我认为是亲共的塞尔温—克拉克夫人)让她亲自发出该邀请，但她现在不会这么做。

克里普斯夫人称已向她的丈夫全面说明了这一立场。

祈臣

4/10/46

私人秘书斯科特

贝文

5/10

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Invitation to Mme. Sun Yat-sen
to Visit the United Kingdom owned by The National Archives

I F4634/4634/10

Proposal to invite Madame Sun Yat sen to U.K.as guest of British Feder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

Wishes to know whether F.O have any information to give regarding the suggestion that the British Feder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 should invite Madame Sun Yat sen to the UK as key guest.

(Minutes.)

See within

A visit by Madame Sun should be very useful, and in present political conditions I do not think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ould take any exception to the issue of an invitation to her.

I submit a draft telegram.

JCSB

28/3

Cultural Relations Dept (a.a.)

GVK

29/3

A tel. has already gave---No. 524 25/3/46. Pl. put within this jacket.

GVK

30/3

Commun Dept

Has a telegram given off on the attached subject? It would have been drafted about March 25?

G. V. Kitsou

Yes, see No.524 of March 25, a secret & personal message for the ambassador from Mr. Sterndale-Bennett.

*

30/3

Mr. Sterndale-Bennett

Reg. attd. telegram

I drafted a telegram reply about this. Along with the reply to Miss Batho, but it seems to have vanished. I assure it has not already given off, in which case this further draft would be redundant?

GVK

29/3

I am sure I have initialed a draft Tel already --presumably on March 25 when I initialed the letter to Miss Batho. Please make inquiries of Communication Dept.

JCSB

March 29

Confidential

ROYAL HOLLOWAY COLLEGE,
(UNIVERSITY OF LONDON)
ENGLEFIELD GARDEN,
SURREY

22 March 1946

Dear Mr. Sterndale-Bennett

I am anxious to find out the opinion of the Foreign Office on a rather delicate matter, and Sir John Cameron has advice me to consult you informally.

I am President of the British Feder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 which is a strictly non-political organization and is affiliated to the equally non-political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 Recently I received a letter from Miss Margery Fry, suggesting that the B.F.U.W. might be willing to take the lead in inviting Madame Sun Yat Sen to visit this country. Madame Sun Yat Sen is the

most distinguished women graduate of China, not even excepting her sister Madame Chiang Kai Shek, as well as a woman of the highest integrity, and we should be honored by receiving her as our guest. We wonder, however, whether there may be political factors of which we know little or nothing. We know that Madame Sun Yat Sen has held aloof from the Chung King Government, and though it is suggested that she might now be allowed greater freedom for going abroad than in the past, we do not know what foundation there is for the suggestion, or what information might be put on any invitation from this country. We are particularly anxious not to embarrass our own government, or to appear to involve ourselv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r war, it might be, in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 If you can give me any information bearing on these points, I shall be most grateful.

Yours sincerely,
Edith C. Batho

Foreign Office,
S. W. 1.

(F 4634/4634/10) OUT FILE

27th March 1946

Confidential

Thank you for your letter of the 22nd March about the proposal to invite Madam Sun Yat-sen to visit this country as a guest of the British Feder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

As you surmise, the proposal is not without possible political complications, and I think it best to consult our Ambassador at Chungking in the first place.

I am doing so by telegram and I will write to you again on receipt of Sir Horace Seymour's reply.

Yours sincerely,
(Sd.) J.C. Sterndale-Bennett

Miss Edith C. Batho,
Royal Holloway College,
Englefield Green,
Surrey.

(CYPHER)

FILES

FROM FOREIGN OFFICE TO CHUNGKING

No: 524

25th March 1946

D. 2.10.p.m. 26th March 1946

DEDIP

SECRET

Following personal for Ambassador from Sterbdale-Bennett.

President of British Feder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 has asked my advice about a proposal to invite Madame Sun Yat-sen to visit this country as the federation's guest. Federation is a strictly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and President is anxious about possible political implications.

I should be grateful for your views. Our first reaction in the department is that if Madame Sun Yat-sen accepted (which we doubt) she would have difficulty in resisting opportunity, so long denied her, to make political speeches here, and this would be as embarrassing for her sponsors as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or that reason Chinese Government would probably suggest some political motive behind the invitation, and we think the Federation might accordingly be better advised to select someone more politically "safe", such as Doctor Wu Yi-fang.

II F5065/4634/10

Proposal to invite Madame Sun Yat-sen to U.K.

Refers to Mr. Sterndale-Bennett's tel 524: Suggest Madame/Miss Wu instead though doubtful of her acceptance.

(Minutes.)

The Ambassador does not suggest that the invitation so undeniable politically as far a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concerned, and he says that he personally would like to see her invited. Nor can I see that a visit by Madame Sun would be embarrassing to us here. She is not, I think, a communist, but may facing be described as a sort of liberal "elder Statesman" of China.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bound sooner or later, and probably sooner, to move leftwards. In the circumstance I do not think it would be unduly venture as one of the B.F.U.W. to issue an invitation to Madame Sun, and I still think that a visit by her might be very useful. The Ambassador does not think it likely that she would accept, but that need not prevent the issue of an invitation. I do not think an invitation to Dr. Wu Yi-fang would be a suitable substitute as (a) she is not in the same class as far as distinction is concerned. (b) she was invited last year, on her way back from U.S.A. to China, but failed to come owing to ill health. (She has in fact only just returned to China, and will certainly be prevented for some time to come with the move of Gingling Women's College from Chengdu back to Nanking).

JCSB

3/4

I think we must now put the problem to Miss Batho and leave the decision to her Federation.

Pl.dft accordingly saying that Sir H. Seymour personally welcome the idea of inviting Madame Sun, but warns us nevertheless that there is no absolute guarantee

she would not indulge in political speeches or other political activities if she came here, and this would probably be embarrassing to her sponsors. If however the Federation are willing to take the risk of this, we think the choice of Madame Sun would be otherwise an admirable one. Failing her, Dr. Wu Yi-fang might be invited. Sir H. Seymour doubts however whether either would accept.

GVK

3/4

Mr. Bennett

☐ ☐ herewith

* 4/4

See within:

1) Letter from Miss Batho to Mr. Scoot of 9/4.

[CYPHER]

FILES

FROM CHUNGKING TO FOREIGN OFFICE

Sir H. Seymour.

D.4.45 a.m. 29th March, 1946.

No. 475

29th March, 1946.

R. 7.50 a.m. 2nd April, 1946

333

SECRET.

Personal for Sterndale-Bennett.

Your telegram No. 524. —(FA634)

As association attaches such importance to safety first from a political point of view, I regretfully agree Madame Sun could not be absolutely guaranteed though I should personally like to see her invited.

2. Dr. Wu would be a very suitable choice.

3. I doubt whether either would accept.

[Copy sent to Mr. Sterndale-Bennett].

(OTP)

OUT FILE

FOREIGN OFFICE, S.W.1.

8th April, 1946.

(F5065/4635/10).

Dear Miss Batho

With reference to Mr. Sterndale-Bennett's letter of the 27th March, on the subject of the proposal that the British Feder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 should invite Madame Sun Yat-sen to visit this country, I am writing in Mr. Sterndale-Bennett's absence to inform you that a reply has now been received from Sir Horace

Seymour to the telegram sent him on the subject.

Sir Horace personally welcome the idea of inviting Madame Sun, but adds that nevertheless it cannot be absolutely guaranteed that she would not utilize the occasion to voice her political opinions if she came here; I assume from your letter that if this did occur it would be embarrassing to your Federation. If, however, you are willing to take this risk, we think that the choice of Madame Sun would otherwise be admirable. Failing her, you might care to consider inviting Dr. Wu Yi-Fang, Principal of Ginling Women's College, who is also a distinguished Chinese woman graduate (if not quite in the same category as Madame Sun). Sir Horace Seymour, however, thinks it doubtful whether either would accept an invitation at present.

Yours sincerely

Sd. (A. L. Scott)

Miss Edith C. Batho,
Royal Holloway College,
Englefield Green,
Surrey.

ROYAL HOLLOWAY COLLEGE,
(University of London)
ENGLEFIELD GREEN,
SURREY.

9 April, 1946

Dear Mr. Scott,

I am most grateful to both you and Mr. Sterndale-Bennett for the trouble you have taken in answer to my question about the proposal that the British Feder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 should invite Madame Sun Yat-sen to this country. Your letters and the reply of Sir Horace Seymour will make it much easier for my Committee to consider the suggestion.

Yours sincerely,

Edith C. Batho

A. L. Scott, Eng.
Foreign Office
S.W.1

III F14712/4634/10

Proposal to invite Madame Sun Yat-sen to U.K.

States the matter was discussed with Lady Cripps, prior to her departure for China. It is the general opinion that this matter be left in the hand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fers to F5065/4634/10 F 4634/4634/10

(Minutes.)

See within.

A.L.S. 11/10

s/s Meeting with Mr. * 8-11am 1/10

At the reception at the China Institute in honour of Lady Cripps and Mrs. V. Elizabeth Miller on 25th September, Lady Cripps raised with me the question of an invitation to Mme. Sun Yat Sen to visit this country from the British Feder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 Ltd. (of which Mrs. Selwyn Clarke of the China Campaign Committee is I understand the moving spirit.)

I suggested this was a matter on which Lady Cripps might first have a word with H. M. Ambassador in Nanking. But she was insistent on its being dealt with here and said if necessary she was prepared to go straight to Mr. Bevin. I said I would submit the matter and let her know the result before she left the U.K. (evening Friday 4th October).

The Federation consulted us in March last bout an invitation to Mme. Sun Yat Sen. The matter was then referred to H.M. Ambassador and his reply communicated to the Federation. In the event no invitation was issued.

I feel that there is undoubtedly a political motive behind the proposed invitation and that it is designed to mobilize public opinion here agains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Moreover if Madam Sun Yat Sen comes here she is almost certain to air views highly critical of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generally, as indeed she has been in the habit of doing in China. This might prove somewhat embarrassing to H.M.G's relations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Nevertheless, it is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say whether or not Madam Sun Yat Sen can go abroad, and if they let her go they can hardly blame us for any consequences. It is up to them to put their own case better.

I am therefore of the opinion that we should tell Lady Cripps that while the invitation may be somewhat embarrassing to us in our relations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e do not wish to advise against it and that H.M. Ambassador should be informed according.

A.L. Scott

26th September, 1946.

Private Secretary.

I should like to learn more about this. I am not satisfied. I ought to agree with

the *. Give me more particulars. B

Quite a number of people in this country believe that as compared with the Kuomintang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re a better bet. This is quite a different thing from the emergence of a Central Liberal Group which both we and the Americas would hope to see.

If Madame Sun Yat Sen came to this country and delivered speeches condemning the Kuomintang, it would undoubtedly be embarrassing and would encourage the ignorant to raise their voices without any real knowledge of the facts. On the other hand, it seems to me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must be well aware of Madame Sun Yat Sen's capabilities in this direction and that they would therefore not consent to her journey.

There are therefore the possibilities (a) that Madame Sun Yat Sen will decline the invitation; and (b)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ould refuse to allow her to go.

In these circumstances I agree with the last paragraph of Mr. Scott's minute.

E. Bevin

26 th September, 1946.

I have informed Lady Cripps that we referred this matter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nd that Mr. Bevin preferred that the Foreign Office should not be committed either to supporting or discouraging the invitation, the issue of which should be left to the discretion of the British Feder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 I remind that the fors and cons of the matter had already been put before the Federation in our letter to Miss Batho of April 8th(F5065/4634/10).

Lady Cripps said she quite understood and appreciated the position and proposed to leave the matter to the Federation, as we suggested. She confirmed that she had been asked (I understand by the pro-communist-Mrs. Selwyn Clarke) to deliver the invitation herself, but she would not now do this.

Lady Cripps said she had explained the position fully to her husband.

G. V. Kitsou

4/10/46

Private Secretary A. L. Scott

Ernest Bevin 5/10

(译者 为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文物资料保管部文博馆员)

上海市档案馆藏虹口宋氏老宅档案选录

邢建榕 董婷婷 整理

〔整理者按〕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虹口宋氏老宅的档案,主要分布在行政院分配上海各机关房屋委员会、上海市警察局、上海地方法院等档案全宗内,时间集中在1945年至1946年。本选录以时间顺序进行编排,档案形式包括:函件、调查报告、诉讼状、答辩状、宣判笔录等,主要内容有:上海市警察局关于东余杭路宋氏老宅情况的调查报告,行政院分配上海各机关房屋委员会为余杭路530号及526弄25、27、31号房免于分配事致宋子安的复函,上海地方法院关于宋子安诉沈炳泉等迁让案的相关资料等。

第一部分:上海市警察局刑事处关于战时生产局提取东余杭路530 封存之敌产烟业案

1. 经济部战时生产局苏浙皖区特派员张兹树致上海市警察局宣铁吾函(1945年 11月19日拟)

经济部战时生产局苏浙皖区特派员办公处

中华民国34年11月20日

事由:据报,中支业〔叶〕烟草株式会社藏匿烟业〔叶〕,经查获一部分,请飭提篮桥分局将东余杭路五三〇号屋内剩余烟业〔叶〕全部移交,并提讯幅岸利喜松,严追有无其他逃避物资,仍希见复由。

拟办:拟飭提篮桥分局核办。

上海市警察局宣局长^[1]勋鉴:据本处烟草组接收委员邝兆祁报

[1] 宣铁吾,字惕我,又名蒋石如,时任上海市警察局局长。

告内称,进〔近〕据密报,日资中支叶烟草株式会社在虹口东余杭路(东有恒路)神户商会仓库藏匿烟叶约一千包,前日前往,未能寻到。今日(十四日)先向该社业务部长幅岸^[1]查询,始承认有烟叶一千零十四包存储于东余杭路五三〇号房屋。据称,在和平之初已被九十四军查封云。当着该日人陪同前往,见该五三〇号系临街破旧房屋,并非正式仓库,三面门上贴有上海市警察局提篮桥分局十月十四日封条,自门窗破隙窥见烟包凌乱,大部份已被人运去。当以该屋门窗破旧,裂口巨大,剩余烟叶随时有被窃之可能,亟赴提篮桥分局晤见行政暨司法两股股长,说明该批物资应由本组接收,在接收之前请其派警日夜看守以防再有走漏等情。据称,因警士人数不足,碍难专人驻守,惟当尽力设法,希望本组早日前往接收云。又据称,该分局曾于九月二十七日发现有长江下游挺进军第十一纵队第三十六支队队长(上校)顾祝天、(中尉)虞玉清、张正淞串同奸商詹大椿等私自出卖该处烟叶(当时认为军用品)情事,当场扣留烟叶三十二包,并已追回售与福华烟公司凤阳烟叶二十六包,大新烟公司六十五包又八百八十五磅(共计一百二十三包又八百八十五磅,现存提篮桥分局内)。该案号数为提篮桥警察分局三四年提刑字六八八号,案中入犯已解交淞沪警备司令部(警察总局移解警备司令部,该案公文号数为十月字警司字九十号),讯办在案。又该中支叶烟草株式会社业务部长幅岸利喜松对存货不肯从实报告,必俟本组查得线索严加追问证明某处藏匿烟叶,迹近逃避物资时,方支吾承认,殊属可恶。除目前已查出者外,是否尚有其他逃避之货,请严加审讯,以免拖延时日,加重损失,请裁夺等情。前来查东余杭路五三〇号屋,既破损防备不周,拟请查照转饬提篮桥分局,迅将该屋内剩余烟叶全部移交本处接收,以免再有损失,并提讯该日人幅岸利喜松,严迫有无其他逃避物资,毋任狡延以重功令□。希惠予办理,见复为荷。经济部战时生产局苏浙皖区特派员张兹树。皓^[2]。

档案号: Q131-5-220-0001~0003

[1] 即幅岸利喜松。

[2] 为节省电报字数,用韵目代日来表示日期,“皓”表示19日。

2. 提篮桥分局致上海市警察局的报告(1945年12月8日发)

上海市警察局呈 总字第一百十号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八日发

事由：为呈报奉令飭办关于战时生产局电请移交东余杭路五三〇号屋内烟叶，并提讯幅岸利喜松有无逃避物资一案办理情形，仰祈鉴核转咨由。

案查接准经济部战时生产局苏浙皖区特派员办公处发字第一五〇〇号代电，略以据报中支叶烟草株式会社藏匿烟叶，经查获一部份，请飭提篮桥分局将东余杭路五三〇号屋内剩余烟叶全部移交，并提讯幅岸利喜松，严迫有无其他逃避物资，仍希见复等由。经奉钧座批交核办在案。查东余杭路五三〇号系前日敌中支叶烟草株式会社所管理堆置烟叶仓库之一，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十七日有长江下游挺进军十一纵队第三十六支队长顾祝天等五名串通盗卖，经当场截获，除将该仓库予以查封以防走漏外，人犯业已奉令连同本分局刑字第六八八号调查书解送淞沪警备司令部法办，所截获之证物计有烟叶一二三包及散装八八五磅，因运输不便，出立证单留本分局保管，现正由总务处派员集中管理，陆续搬运中。至于该社业务部长日人幅岸利喜松有无其他逃避物资，将于本年十二月五日传案严讯。据称，该社所有存余烟叶数量以及贮藏地点已于十月十三日缮造清册，送交江西路一一五号烟草接收组办理在案，除此之外，实无藏匿及逃避物资情事等语，并交呈该项清册副本一份。再查东余杭路五三〇号屋内所查封之剩余烟叶，如有正式机关予以接收派员办理，自当协助全部移交管理。奉此前因，理合检同原电一份及烟叶清册原副本一份，备文报请鉴核，赐予转咨该处查照，实为公便。谨呈

局长 宣^[1]

副局长 俞^[2]

计附呈：(一)经济部战时生产局苏浙皖办公处代电一件；

(二)中支叶烟草株式会社存烟清册

[1] 指宣铁吾。

[2] 指俞叔平，浙江诸暨人，时任上海市警察局副局长。

提篮桥分局局长 张人佑

提篮桥分局副局长 王希文

档案号: Q131-5-220-0005-0006

3. 上海市警察局收文摘要 (1945年12月14日)

来文机关: 提篮桥分局

事由: 为呈报奉令飭办关于战时生产局电请移交东余杭路五三〇号屋内烟叶, 并提讯幅岸利喜松有无逃避物资一案办理情形, 仰祈鉴核转咨由。

拟办: 东余杭路五三〇号屋内烟叶应否移交战时生产局, 拟向市政府请示再核。十二、十四

档案号: Q131-5-220-0004

4. 上海市警察局关于余杭路530号的报告 (1945年12月20日)

上海市警察局 呈

市警行(三四)字第二八三五号

中华民国卅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发

事由: 为东余杭路五三〇号屋内烟叶业经提篮桥分局查封, 应否移交经济部战时生产局, 呈请鉴核示遵由。

案准经济部战时生产局苏浙皖区特派员办公处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发字第一五〇〇号代电, 以据报中支叶烟草株式会社藏匿烟叶, 业经查获一部份, 尚有其他烟叶一千余包存储于东余杭路五三〇号房屋内, 现由该管提篮桥分局封存, 请飭该分局将该屋内剩余烟叶全部移交本处接收以免损失, 并提讯中支叶烟草会社业务部长幅岸利喜松, 严迫有无其他逃避物资, 仍希见复等由。准此, 经飭提篮桥分局办理, 具报去后, 兹据该分局呈称: 案查东余杭路五三〇号系前日敌中支叶烟草株式会社所管理堆置烟叶仓库之一, 因于本年九月十七日有军人五名串通盗卖, 经当场截获, 除将仓库予以查封以防走漏外, 人犯业已奉令解送警备司令部法办, 至于业务部长日人幅岸利喜松于本年十二月五日传案询问。据称, 存余烟叶数量以及贮藏地点已于十月

十三日缮造清册,送交江西路一一五号烟草接收组办理在案,除此以外,实无藏匿及逃避物资情事等语。再查东余杭路五三〇号屋内所查封之剩余烟叶,如有正式机关予以接收派员办理,自当协助全部移交管理,理合备文报请鉴核,赐予转咨该处等情。据此,查该东余杭路五三〇号屋内剩余烟叶应否移交战时生产局接收,本局未敢擅专,理合备文呈请。仰祈鉴核示遵,谨呈

上海市市长 钱^[1]

上海市警察局局长 宣铁吾

档案号: Q131-5-220-0022

5. 上海区敌伪产业处理局公函(1945年12月26日)

沪三字第5232号

中华民国卅四年十二月廿六日

事由:请转飭提篮桥分局迅将东余杭路五三〇号内藏烟叶移交经济部特派员办公处烟草组接管,并提讯幅岸【利喜】松严追有无其他逃避物资情事,办理见复由。

案准经济部特派员办公处发字二六二二号函开:“案据本处烟草组接收委员邝兆祁十一月十五日报告内称‘近据密报,日资中支烟草株式会社在虹口东余杭路(东有恒路)神户商会仓库藏匿烟叶约一千包,前日前往,未能寻到。今日(十四日)先向该社业务部长幅岸查询,始承认有烟叶一千零十四包存储于东余杭路五三〇号房屋。据称,在和平之初已被九十四军查封。当着该日人陪同前往,见该五三〇号系临街破旧房屋,并非正式仓库,三面门上贴有上海市警察局提篮桥分局十月十四日封条,自门窗破隙窥见烟包凌乱,大部份已被人运去。当以该屋门窗破旧,裂口巨大,剩余烟叶随时有被窃之可能,亟赴提篮桥分局晤见行政暨司法两股股长,说明该批物资应由本组接收,在未接收之前请其派警日夜看守以防再有走漏等情。据称,因警士人数不足,碍难专人驻守,惟当尽力设法,希望本组早日前往接

[1] 指钱大钧,字慕尹,时任上海市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

收。又据称,该分局曾于九月二十七日发现有长江下游挺进军第十一纵队第三十六支队队长(上校)顾祝天、(中尉)虞玉清、张正淞〔淞〕串同奸商詹大椿等私自出卖该处烟叶(当时认为军用品)情事,当场扣留烟叶三十二包,并已追回售与福华烟公司凤阳烟叶廿六包,大新烟公司六十五包又八百八十五磅(共计一百二十三包又八百八十五磅,现存提篮桥分局内)。该案号数为提篮桥警察分局三十四年提刑字六八八号,案中人犯已解交淞沪警备司令部(警察总局移解警备司令部,该案公文号数为十月警司字九十号),讯办在案。特将以上情形呈报乞即:(一)函咨上海市警察总局着提篮桥分局速将东余杭路五三〇号剩余烟叶全部移交本组接收(说明该屋破损情形以免拖延);(二)函咨淞沪警备司令部,声明现存提篮桥警察分局之烟叶一百二十三包又八百八十五磅应归本组接收原委,请其速即行文警察局移交本组接收;(三)中支叶烟草株式会社业务部长幅岸利喜松对存货不肯从实报告,必俟本组查得线索严加追问证明某处藏匿烟叶,迹近逃避物资时,方支吾承认,最属可疑。除目前查出者外,是否尚有其他逃避之货,可否请予设法拘案严加审讯,以免拖延时日反遭损失'等情。前来当经本处以皓日代电淞沪警备司令部,请飭警察局将现存提篮桥分局烟叶移交本处烟草组接收同时,并另代电上海市警察局,请飭提篮桥分局将东余杭路五三〇号房屋内剩余烟叶全部移交,并提讯幅岸利喜松,严追有无其他逃避物资情事各等由。去后至今瞬将匝月,迄未得复,倘稽延日久,恐走漏益多,相应将经过情形函达,即希查照办理,见复为荷"等由。准此相应转达,即希查照转飭迅予办理,并乞见复为荷。此致

上海市警察局

局长 刘攻芸

档案号: Q131-5-220-0014-0017

6. 上海市警察局收文摘要(1946年1月7日)

来文机关:敌伪产业处理局

文 别:函

事 由:事由如文

拟 办：本案前已呈报市府核办，尚未蒙复，顷据经济部特派员办公处特请敌伪处理局来函请飭该分局遵照办理见复等由。准此，是否在未得市府复示前，准将烟叶移交该办公处接收。一月七日。

档案号：Q131-5-220-0012

7. 上海市警察局收文摘要（1946年1月8日）

本案拟具办法如左：

- 一、转飭提篮桥分局公办；
- 二、报请市政府备案；
- 三、复敌伪产业处理局查照。

元、八

此案已压一星期，希注意。

档案号：Q131-5-220-0013

8. 上海市政府指令（1946年1月12日）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一月十二日发

事 由：据呈，为提篮桥分局查封烟叶应否移交经济部战时生产局呈请鉴核一案，除转函处理局核议外，仰候复到再行飭遵由。

拟 办：拟候令到后，再飭提篮桥分局遵办。元、十五

令本市警察局

卅四年十二月廿日市警行（三四）字第二八三五号呈乙件，为东余杭路五三〇号屋内烟叶业经提篮桥分局查封，应否移交经济部战时生产局呈请鉴核示遵由。

呈悉，除据情转函上海区敌伪产业处理局核议外，仰候复到，再行飭遵。

此令

市 长 钱大钧

副市长 何德奎

档案号：Q131-5-220-0023-0024

9. 上海市政府训令 (1946 年 2 月 26 日发)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二月廿六日发

事 由 : 为准处理局函复东余杭路五三〇号屋内烟叶应交经济部特派员办公处接收令仰知照由。

拟 办 : 拟令飭该分局遵照办理。二、廿七

令本市警察局

案准苏浙皖区敌伪产业处理局三十五年一月廿三日沪三字第
九一四七号公函开“案准贵府市接(35)字第五七五号函,为据警察局
呈为东余杭路五三〇号屋内烟叶业经提篮桥分局查封,应否移交经济
部战时生产局一案,函请核议见复等由。准此,查该项物资应请交经
济部特派员办公处接收,除函该处查照办理外,相应复请查照为荷”等
由。准此,查此案,前据该局卅四年十二月市警行(34)字第二八三五
号呈报到府,当经函转在案,兹准函复前由,合行令仰该局知照。

此令

市 长 钱大钧

副市长 何德奎

档案号: Q131-5-220-0031-0032

10. 上海市警察局训令 (1946 年 3 月 6 日发)

主 办 : 刑警一课

文 别 : 训令

送达机关 : 提篮桥分局

类 别 : 敌产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三月五日拟稿,三月六日发。

事 由 : 为东余杭路五三〇号屋内烟叶一案,经呈奉市府训令,准敌
伪产业处理局函嘱移交经济部特派员办公处接收,全仰遵
照由。

案查东余杭路五三〇号屋内封存烟叶一案,经呈奉市政府市接字
第二八三四号训令开“照叙全文”等,因奉此合行,令仰该分局遵照办
理,取据报查。

此令

局长 宣○○^[1]

档案号：Q131-5-220-0025-0026

11. 上海市警察局的调查报告书（1946年3月13日）

提篮桥分局民三五年度杂字第一〇八号

案 由：为奉复东余杭路五三〇号屋内封存烟叶已由经济部特派员办公处派员接收由。

案奉钧局市警刑（35）字第六〇八九号训令开：“案查东余杭路五三〇号屋内封存烟叶一案，经呈奉市政府市接字第二八三四号训令开‘案准苏浙皖区敌伪产业处理局三五年一月二三日沪三字第九一四七号公函开：案准贵府市接（35）字第五七五号函，为据警察局呈，为东余杭路五三〇号屋内烟叶业经提篮桥分局查封应否移交经济部战事〔时〕生产局一案，函请核议见复等由。准此，查该项物资应请交经济部特派员办公处接收，除函该处查照办理外，相应复请查照为荷等由。准此，查此案，前据该局三四年十二月市警行（34）字第二八三五号呈报到府，当经函转在案，兹准函复前由，合行令仰该局知照’等因，奉此合行令仰该分局遵照办理，取据报查”等因，奉此遵即由承办员等通知经济部特派员办公处知照，于本年三月十三日由该处派接收员沈宝琦前往东余杭路五三〇号会同启封，并接收封存之全部烟叶及烟骨三五六包（收据附卷），据此理合检同该处收据具文呈报，仰祈鉴核，谨呈

提篮桥分局第二股长 孙

副分局长 王

分局长 张

承办员股员 鲁建中

便服警士五二二五号 王森林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三月十三日

档案号：Q131-5-220-0028-0029

[1] 即宣铁吾。

12. 经济部战时生产局苏浙皖区特派员办公处烟草组的收条(1946年3月13日)
烟发字第五二三号

今收到东余杭路五三〇号中支叶烟草株式会社存放剩余烟叶及烟茎,全部共计三百五十六包正。此致

提篮桥警察分局

经济部战时生产局苏浙皖区特派员办公处烟草组

中华民国卅五年三月十三日

档案号: Q131-5-220-0030

第二部分: 行政院分配上海各机关房屋委员会
为余杭路530号及526弄25、27、31号房免予分配事致宋子安复函

1. 宋子安致行政院分配上海各机关房屋委员会函(1946年5月8日)

抄录

为请求免予统一承租事,窃东有恒路五三〇号、五二六弄内廿五、廿七、卅一号门牌房屋系属具呈人祖产,曩虽委托徐士浩律师经租受理。嗣抗战期内,先由敌人海军复兴班攫去,委托日本居留民团管理,由敌人居住,继又交伪上海市财政局收租。兹经具呈人查悉,上述房屋现已陈旧,如不急行大加修缮,难免有倒塌之虞,业已委托工程师进行领照,不日动工。为此,伏乞贵会鉴核,准予免除统一承租,以备进行修理工程,实为德便。谨呈

行政院分配上海各机关房屋委员会

具呈人 宋子安

三五、五、八

地址: 江西路一八一号建设大厦

档案号: Q30-1-210-079

2. 宋子安致行政院分配上海各机关房屋委员会函(1946年8月9日)

姓名或机关: 宋子安

文 别: 函

摘 由：为正在修理房屋忽有林君^[1]系奉贵会派来嘱停止装修静候分配等情，请查明免予分配由。

迳 启 者：

查东余杭路（即东有恒路）五三〇号及五二六弄廿五、廿七、卅一号房屋为鄙人等祖产，业经苏浙皖区敌伪产业处理局发还产权在案，前因该屋向来作用香烟工厂，而在抗战期内复被日敌占用，破坏不堪，如不急行大加修理，殊有倾圯之虞，故又具呈贵会请求免予分配在案。兹查修理业已完工多时，昨日忽有林君前来，谓为系奉贵会派来通知停止装修，以便静候分配等语。鄙人等为免除误会起见，特再专函奉恳，应请查明准予免除分配，实纫公谊。此致

行政院上海各机关房屋分配委员会

主任委员 吴^[2]

副主任委员 黄

附上呈文附本一纸。

宋子安启

卅五年八月九日

地址：上海江西路一八一号三楼

档案号：Q30-1-210-077-078

3. 行政院分配上海各机关房屋委员会调查证（1946年8月23日）

被调查人：宋子安

住 址：东余杭路五三〇号、五二六弄廿五、廿七、卅一号

兹派本会督察关英杰前来调查，即希遵照，勿得藉故抗违为要。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八月廿三日

档案号：Q30-1-210-075

4. 关英杰的调查报告（1946年8月26日）

窃于本月廿三日奉派调查东余杭路五二六弄廿五、廿七、卅一及

[1] 指林启云，时任行政院分配上海各机关房屋委员会调查员。

[2] 指吴国桢，字峙之。

五三〇等号房屋事,附发宋子安函呈两件等,因奉此遵,即先至该路五二六弄查询廿五、廿七、卅一号三户,现住人均系战前房客,始终未迁,持有业主协兴地产公司续订租约,一月前经本会派员调查(查讠证已糊糜不清),当时除照表详询外,并无其他情事。旋至五三〇号调查,据现住人合众鸡鸭行行主方昌扬称,于六月底迁入,七月一日与业主协兴公司订约,即开始修理,约在七月中旬(日期忘记)有贵会林君前来调查,询问迁入订约时期,当将契约缴阅后,林君即云此房既系敌侨住过,系在本会分配范围,七月订约亦与定章不合,应转告业主在未奉本会允许,以暂缓修理为宜,俾免无谓损失。嗣经说明,此屋为宋子安祖产,林君即填表离去,即于次日将此情形报告协兴帐房,仍继续修理,现已工竣,亦无人再来调查等语。今晨赴江西路一八一号访晤宋先生代表李冠儒君,据云八月九日之函即因帐房转告而发,宋子安先生现已赴京,临行之时,尚以催询贵会早日核准免于分配为嘱,适日来无晤,请为转达等语。返会后,询之调查员林启云同志,确因奉派调查东余杭路一带敌伪房屋七八十幢至五三〇号查询,情形与现住人所称大致相同,但林同志系按册列户挨号调查,并非专查五三〇号一幢,亦无通知停止装修静候分配之事,乃因见该屋房间甚多,修理工程甚大,而租约订于七月,恐商人无知徒受损失,遂以本会定章约略告知,纯出善意,初未知是宋氏祖产,经方姓声明后,深悔代抱杞人之忧,为多事也。综合以上情形,林同志系普遍按册挨号调查,宋先生原函所陈系出误会,理合将调查情形报请鉴核。谨呈

课长 唐

转呈组长 毕

职 关英杰

八月廿六日

档案号: Q30-1-210-072-074

5. 行政院分配上海各机关房屋委员会致宋子安复函(1946年9月29日拟)

送达机关:宋子安

文 别:函

承办单位：秘书处

事由：为函复东余杭路五三〇号及五二六弄廿五、廿七、卅一号免予分配函复查照由。

中华民国三五年九月廿九日拟稿

子安吾兄大鉴：

八月九日大函敬悉，东余杭路五三〇号及五二六弄廿五、廿七、卅一号房屋，既属香烟工厂并经敌伪产业处理局发还产权存案，自当免予分配，恐劳锦念。特此奉复，专此即请
大安

弟 吴〇〇^[1]启

九月

档案号：Q30-1-210-070-071

第三部分：上海地方法院关于宋子安诉沈炳泉等迁让案

1. 上海地方法院的民事调解状（1946年11月23日）

民事调解状副本

声 请 人：宋子安 广东 江西路一八一号建设银公司，文件由徐士浩律师代收

对 造 人：沈炳泉 东余杭路五二六弄第廿九号

沈志标 同上

毛文海 同上

陈宝海 同上

严铸庚 同路同弄第卅一号

金志良 同上

为声请调解事，查东余杭路（即东有恒路）五二六弄第廿九号及卅一号房屋，系声请人等祖产。抗战时间，声请人离沪至重庆，曾被日敌强占管理，迨胜利后国土重光，声请人等回沪竟发现第一至第四对

[1] 即吴国桢。

造人盘踞于该屋第廿九号内,其第卅一号房屋亦被第五及第六对造人所盘踞,彼辈均与声请人并无租赁关系,显属无权占有侵害声请人之产权,迭经派员通知迁让,迄置不理。为此状请鉴核,准予飭传对造人等依法调解,谕令对造人等迁让出屋,赔偿声请人因此而所遭之一切损害,以维产权,实为德便。谨状

上海地方法院公鉴

中华民国卅五年十一月廿三日

具状人 宋子安

档案号: Q185-3-7057-4~5

2. 上海地方法院执达员任殿棋的报告书(1946年12月4日)

报告书

应送达之文书:陈宝海传票、副本各一件。

不能为送达之事由:职遵即按址送达,查陈宝海已迁往他去以致无从送达,理合具报仰祈民庭李推事鉴核。

中华民国卅五年十二月四日

上海地方法院执达员 任殿棋

档案号: Q185-3-7057-13

3. 上海地方法院的调解笔录(1946年12月9日)

调解笔录

声请人:宋子安

对造人:沈炳泉、沈志标、毛文海、陈宝海、严铸庚、金志良

右开当事人因迁让一案(卅五年度调字第二八三号),本院于民国卅五年十二月九日下午二时〇分,在第六法庭公开调解,出席职员如左:审判长推事蔡晋、书记官高维翰,书记朗读案由。

沈炳泉,五七岁,宁波人,住东有恒路五二六弄二九号;

金志良,四八岁,苏州人,住东有恒路五二六弄卅一号。

声请人未到,案件调解不成立。

中华民国卅五年十二月九日

上海地方法院民事庭

书记官 高维翰

推 事 蔡晋

档案号: Q185-3-7057-16-17

4. 宋子安的民事委任书 (1946年12月25日)

民事委任

委 任 人: 宋子安, 籍贯广东, 住址江西路一八一号建设银公司, 文件
送达, 由徐士浩律师收转

被委任人: 徐士浩^[1]律师、高君湘律师、蔡成桂律师, 住址九江路
二一九号三楼

为诉沈炳泉等无权占有迁让出屋一案委任代理事。今将委任代
理之原因及其权限开列于后:

一、原因: 依法委任。

二、权限: 依《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并但书特权之规定。

谨呈

上海地方法院 公鉴

中华民国卅五年十二月廿五日

具状人 宋子安

被委任律师 徐士浩

高君湘

蔡成桂

档案号: Q185-3-4553-007-008

5. 宋子安的民事诉讼状 (1946年12月25日)

民事诉讼

原 告: 宋子安, 广东, 江西路一八一号建设银公司, 文件送达, 由
代理律师转

[1] 徐士浩 (1899—1961), 民国时期著名律师。

代理律师：徐士浩律师、高君湘律师、蔡成桂律师，九江路二一九号三楼
被告：沈炳泉，东余杭路五二六弄廿九号

沈志标，同上

毛文海，同上

陈宝海，同上

严铸庚，同路同弄卅一号

金志良，同上

为无权占有，状请判令迁让出屋并负担讼费事。窃东余杭路（即东有恒路）五二六弄第廿九号及卅一号房屋系原告祖产。抗战时期，原告离沪迁至重庆，曾被日敌海军复兴班居留民团强占管理，后又移交伪上海市财政局接管。迨胜利后，国土重光，原告回沪竟发现第一至第四被告盘踞于第廿九号房屋内，其第卅一号房屋亦被第五、第六被告所占有，彼辈均与原告并无租赁关系，显属无权占有侵害原告之产权。迭经派员通知迁让，迄置不理，调解又不成立。为此，状请钧院鉴核，判令被告等迁让出屋并负担诉讼费用以维产权。对于迁让部份，原告愿提供担保，请求宣示假执行，实为德便。谨状

上海地方法院 公鉴

中华民国卅五年十二月廿五日

具状人 宋子安

撰状代理律师 徐士浩

高君湘

蔡成桂

档案号：Q185-3-4553-004-005

6. 上海地方法院文书送达报告书（1947年1月4日）

报告书

应送达之文书，陈宝海传票、副本各乙件。

不能为送达之事由，窃询，据共同被告等称，陈宝海已于一年前迁移无踪，未便代收等语，故无从送达，理合具报。仰祈

蒋推事^[1] 鉴核

中华民国卅六年一月四日

上海地方法院执达员 任慕陶

档案号: Q185-3-4553-012

7. 上海地方法院的审理笔录(1947年2月2日)

审理笔录

原告宋子安未到,诉代蔡成桂律师到。被告沈炳泉到。被告沈志标、毛文海、陈宝海均未到。被告严铸庚、金志良均未到,共同诉代马楠庚律师到。

右开当事人因迁让一案(卅五年度诉字第四〇九六号),本院于民国卅六年二月六日下午二时五十分在第七法庭公开审理。出席职员如左,审判长推事:蒋应杓、书记官:郑维勤。书记官朗读案由。

推事问(沈炳泉):年、住等项。答:年五十八岁,住东余杭路526弄29号,鸡鸭商。

问(蔡律师):代理原告请求如何判决?答:请求判令被告等迁让出屋,并愿提供担保,请求宣示假执行。

问:事实理由。答:(无陈述,照起诉状宣读。)

问:被告陈宝海传票无从送达,有何意见?答:请求公示送达。

推事谕知在案,诉讼标的价额□应为乙千二百万元,原告应于五天内补缴裁判费六万五千元。

问(马律师):代理被告严铸庚、金志良么?答:是的。年、籍详载委任状。

问:诉主声明。答:请求驳回原告之诉。

问:有何理由?答:查系争屋系原告租给李华萱的,第五被告严铸庚是李华萱之亲戚,第六被告金志良是李华萱之老佣人。抗战后,该屋始终由第五、六被告代为看管,李华萱已于去年十二月由重庆来沪,已住入该屋,在原告与李华萱之租赁关系未消灭前,第五、六被告

[1] 指蒋应杓。

并非无权占有（提出租约三件）。

原代起称：租约是不错的，但早在民国廿七年已满期。

被代马律师起称：租约虽满，但原告并未通知，况在敌伪时期定有租约。

原代起称：敌伪时期之租约不能拘束原告。

问（沈炳泉）：原告请求判决要你迁让，有何意见？答：我是已住十年以上之战前老房客，本来是租住 27 号，这 29 号是向敌人租的。

问：有无房票？答：房票有的，胜利后已撕毁。

推事谕知在案，改期四月廿二日下午一时十五分续审，原告及到案被告均不再发传票通知，退庭。

中华民国卅六年二月二日

上海地方法院民二庭

书记官 郑维勤

推事 蒋应杓

档案号：Q185-3-4553-030~033

附件 1：李华萱和宋子安的经租人徐士浩律师订立的租约（1935 年 3 月 8 日）

租约

立租约人：李华萱

本约条件如下：

一、房客愿向房东租赁上海东有恒路五二六弄第三十一号门牌住房一所，房东亦愿意出租与房客，订明每月房租洋七十元正，于每月一日凭房东房票照付，不得拖欠。如至次月五日尚未清付，则房东有权立行取消本约，收回房屋，并得即向房客追偿所欠租金及损失。

二、水电费及房租等一切费用由房客自理，与房东无涉。

三、房客所租房屋应由自己使用，不得冒名顶替或擅行转租与人，倘有违犯，房东得立即取消本约。

四、该屋系租作住家之用，不得另营别业，并不得改作工厂、工场或堆放任何式样之机器马达，惟先得房东书面之许可者，不在此例。

五、房屋一切内部装修，除油漆粉饰之外，如有所更改，必须报明

房东取具书面同意。退租迁让时,必须修复原状交还或照赔损失。

六、本租约以三年为期,自民国念肆年三月十六日为始,至念柒年三月十五日止,期内租金不得增减,房东不得收回房屋,房客亦不得退租,到期时,房客应立即迁让将房屋交还房东。

七、房客如积欠租金而私自离开房屋者,愿听凭房东将屋内动产留置,请公证人点验后堆放房东所择定之处所,以待法院判决执行,房东并得即时将上述房屋另行召租,房客不得要求任何损失。

八、本租约内房客所租房屋不得供作房客联合会或其他同样或类似之机关之用,否则房东有权取消本契约,收回房屋。

九、保租人李汉一君对本租约房客所应负责任,保租人自愿完全负责,并愿抛弃先辩抗辩权。又倘房东随时有宽限房客情事,保租人亦不得据为脱卸保证责任之主张,如欲退保须得房东书面允许方为有效,爰一并署名于后,以资证明。

十、兹于念肆年三月十二日收到房客李华萱交来洋七十元,作为保证该房客对于房屋损坏时赔偿或违反租约时之损失费用,如有不足,再由保证人负完全赔偿责任。待至租约期满,经房东认为房客对于租约条件已完全履行終了,房屋依照原样并无损坏时,得如数发还,但不起利息。

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存照。

中华民国念肆年三月八日订

立租约房东 徐士浩律师事务所经租部

房客 李华萱

档案号: Q185-3-4553-117-118

附件2:李华萱和上海特别市财政局订立的租约(1935年5月1日)

房屋租赁契约

出租人:上海特别市财政局

承租人:季[李]华萱,职业:西药

保证人:屠燕珊,职业:西药,住址:大上海路一〇〇六弄二四号

右承租人因有正用央保与出租人订立租赁契约如左:

(一)租赁房屋为东余杭路五二六弄第三一号房屋二间及屋内外

附属物。

(二) 每月租金经双方议定为一千二百元,于每月一日凭房票先付后住,不得拖欠。

(三) 租期定为半年,自民国三十四年五月一日起至民国三十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止。

(四) 地捐、年捐均归出租人支付,其余水电捐税均归承租人自理。

(五) 房屋一切大小修缮均由承租人负担,至于屋内外原有装修,未经出租人核准不得变更,如有变更,应于退租时装还原样。

(六) 屋内已装有之水电、电铃、自来火及卫生设备或其他设备者,应保持清洁、完整、效用各状态,设有污损、缺少、失效等情事发生,应按照原状赔偿,如由承租人自行装置者,退租时得由承租人拆除回复原状,但有特殊情形经出租人特许者,得变通办理之。

(七) 房屋不得转租或顶让。

(八) 屋内严禁贮藏危险品及危〔违〕禁品暨容留匪类。

(九) 房屋里弄内卫生、清洁、公益等事,须绝对遵守警局颁布章程则办理。

(十) 承租人如有违反本契约各项者,出租人得通知承租人解约立即迁让。

(十一) 本契约乙式二份,正本存出租人处,副本交承租人收执。

出租人 上海特别市财政局

承租人 季〔李〕华萱

保证人 屠燕珊

住 址 大上海路一〇〇六弄二四号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五月一日

附:收纸张费,国币一百元。

档案号: Q185-3-4553-115

附件3:李华萱和上海特别市政府渝产管理委员会订立的租约(1944年4月1日)

租约

出租人:上海特别市政府渝产管理委员会

承 租 人：李华萱，职业：商

右保证人：屠燕珊，职业：西药，住址：大上海路一〇〇六弄二十四号

陈培芝，职业：商，住址：洛阳路五三五号

右承租人因租赁房屋央保与出租人订立租约如左：

（一）租赁物约定为东余杭路五二六弄三十一号房屋及屋内外附属物。

（二）每月租金定为国币三百元，于每月一日凭收据先付后住，不得拖欠。

（三）租期定为半年，自民国三十三年五月一日起至民国三十三年十月三十一日止。

（四）租赁物约定为承租人自己之用，未经出租人核准，绝不变更使用方法。

（五）除地捐、年租归出租人支付外，其余水电捐税等均归承租人负担。

（六）租赁物一切大小修缮归承租人自理负担，租赁物之构造装修未经出租人核准不得更动。如因修缮或更动而增加租赁物之价值者，出租人不负偿还之责，交还房屋时应回复原状。

（七）屋内装有卫生、水电、电话、电铃、自来火及其他设备者，承租人应保持原有清洁、完整、效用各状态，如有污损、缺少、失效，应照原状赔偿，如承租人装置者交还房屋时，由承租人拆除回复原状，但特殊情形经出租人特许后，得变通办理之。

（八）租赁物不得转租或顶让。

（九）屋内禁藏违禁物、危险物暨容留匪类。

（十）房屋里弄卫生、清洁、公益等事均须绝对遵照警章办理。

（十一）出租人得随时派员于日间视察租赁物。

（十二）承租人如不遵照本约条款时，出租人得通知承租人解约立即迁让。

（十三）承租人不履行本约各条义务时，保证人代负履行之责。

（十四）本约正副各一本，正本存出租人处，副本交承租人收执。

租 人 李华萱

证 人 屠燕珊

陈培芝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四月一日

档案号：Q185-3-4553-114

8. 严铸庚和金志良的民事委托书（1947年2月6日）

民事委任

委 任 人：严铸庚，年龄四十八，籍贯松江，住址东余杭路五二六弄卅一号，职业商

金志良，年龄四十九，籍贯吴县，住址同上，职业商

被委任人：马楠庚律师，住址中正东路九六〇号

为宋子安诉迁让一案委任代理事。兹将委任代理之原因及其权限开列于下：

原因：依法委任。

权限：依照《民诉法》第七十条及具特权之规定。

谨状

上海地方法院 公鉴

中华民国卅六年二月六日

具状人 严铸庚

金志良

被委任代理人 马楠庚律师

档案号：Q185-3-4553-026~029

9. 上海地方法院布告（1947年2月12日）

案查宋子安与沈志标等因迁让事件，被告陈宝海之所在不明，原告声请公示送达，业经照准，兹定于本年四月廿二日下午一时五十分审理。除传票粘贴于本院牌示处外，所有应送达之书状、缮本交由本院书记官保存，该被告得随时来院领取，仰即遵期到场，倘有违误，得由对造声请一造辩论而为判决。本公示送达自布告粘贴于本院牌示处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发生效力，并仰知照，此布。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二月十二日

院长 查○○^[1]

档案号：Q185-3-4553-035

10. 上海地方法院文书送达报告书（1947年2月15日）

报告书

应送达之文书，毛文海传票乙件。

不能为送达之事由，窃询，据原告声称，该毛文海已于一个月前迁移，传票无法指传等语。理合报请

蒋推事 鉴核

中华民国卅六年二月十五日

上海地方法院执达员 任慕陶

档案号：Q185-3-4553-036

11. 宋子安的民事委任书（1947年4月10日）

民事委任

委 任 人：宋子安，籍贯广东，住址江西路一八一号建设银公司

被委任人：徐士浩律师、高君湘律师、蔡成桂律师，住址九江路二一九号三楼

为卅五年诉字第四〇九六号诉请迁让追加施阿康、林治^[2]、李华萱等为被告一案委任代理事，今将委任代理之原因及其权限开列于后：

原因：依法委任。

权限：依《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并但书特权之规定。

谨状

上海地方法院 公鉴

中华民国卅六年四月十日

具状人 宋子安

被委任律师 徐士浩

[1] 指查良鉴（1904—1994），字方季，时任上海地方法院院长。

[2] 应为林怡。

高君湘

蔡成桂

档案号: Q185-3-4553-040~043

12. 宋子安的民事诉讼状(1947年4月10日)

民事诉状

原告:宋子安,籍贯广东,住址江西路一八一号建设银公司,文件
送达由九江路二一九号三楼代理律师收转
被告:施阿康,住址东余杭路五二六弄廿九号
林治,住址东余杭路五二六弄卅一号
李华萱,住址同上

为卅五年诉字第四〇九六号一案追加被告状恳传案审理事,窃原告所有东余杭路五二六弄第廿九号及卅一号房屋,在原告离沪期间为人强占,曾诉请钧院判令无权占用人迁让在案。兹查该案正在诉讼繁属之际,忽于最近,而原告又查悉另有被告施阿康、林治、李华萱忽于最近分别占居东余杭路五二六弄廿九号及卅一号房屋内,原告为使诉讼合一确定,计用特具状追加开被告,伏恳钧院鉴核,迅传被告施阿康等到案,俾便同时审理,并恳判令被告等立即迁让占用房屋,交还原告。对于迁让部份,原告愿提供担保,请求宣示假执行,至纫德便。谨状

上海地方法院 公鉴

中华民国卅六年四月十日

具状人 宋子安

档案号: Q185-3-4553-044~047

13. 上海地方法院的审理笔录(1947年4月22日)

审理笔录

原告宋子安未到,诉代高君湘、蔡成桂律师均到。被告沈炳泉到。被告沈志标、毛文海、陈宝海均未到。被告严铸庚、金志良均未到,共同诉代马楠〈庚〉律师到。

右开当事人因迁让一案(卅五年度诉字第四〇九六号),本院于民国卅六年四月廿二日下午二时十分在第七法庭公开审理,出席职员如左,审判长推事:蒋应杓、书记官:郑维勤。书记官朗读案由。

原代高律师起称:请求追加施阿康、林治、李华萱三人为被告。

问(沈炳泉):有何话说?答:没有话说(提出租约等件)。

问(原代蔡律师):被告毛文海传票无从送达,有何意见?答:被告毛文海部份,请求撤回。

问(被代马律师):有何意见?答:容下庭陈述。

推事谕知在案,展期五月廿四日下午二时续审,到案当事人不再发传票通知,被告沈炳泉交案证件发还,并命下次开庭。本案退庭。

中华民国卅六年四月廿二日

上海地方法院民事第二庭

书记官 郑维勤

推事 蒋应杓

档案号: Q185-3-4553-049-051

附件1:蒋维安和上海特别市政府渝产管理委员会订立的租约(1944年5月1日)

租赁契约

出租人:上海特别市政府渝产管理委员会

承租人:蒋维安,职业:鸭业

右保证人:方昌杨,职业:同上,住址:东余杭路五九四号

黄纪发,职业:同上,住址:东余杭路德裕里六十九号

右承租人因租赁房屋央保与出租人订立租约如左:

(一)租赁物约定为东余杭路五二六弄二十九号中式房屋一幢及屋内外附属物。

(二)每月租金定为国币一百五十元,于每月一日凭收据先付后住,不得拖欠。

(三)租期定为半年,自民国三十三年五月一日起至民国三十三年十月三十一日止。

(四)租赁物约定为承租人自己之用,未经出租人核准,决不变更

使用方法。

(五)除地捐、年租归出租人支付外,其余水电捐税等均归承租人负担。

(六)租赁物一切大小修缮归承租人自理负担,租赁物之构造、装修未经出租人核准不得更动,如因修缮或更动而增加租赁物之价值者,出租人不负偿还之责,交还房屋时应回复原状。

(七)屋内装有卫生、水电、电话、电铃、自来火及其他设备者,承租人应保持原有清洁、完整、效用各状态,如有污损、缺少、失效应照原状赔偿,如承租人装置者交还房屋时,由承租人拆除回复原状,但特殊情形经出租人特许后,得变通办理之。

(八)租赁物不得转租或顶让。

(九)屋内禁藏违禁物、危险物暨容留匪类。

(十)房屋里弄卫生、清洁、公益等事,均须绝对遵照警章办理。

(十一)出租人得随时派员于日间视察租赁物。

(十二)承租人如不遵照本约条款时,出租人得通知承租人解约立即迁让。

(十三)承租人不履行本约各条义务时,保证人代负履行之责。

(十四)本约正副各一本,正本存出租人处,副本交承租人收执。

承租人 蒋维安

保证人 黄纪发

方昌杨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五月一日

档案号: Q185-3-4553-164

14. 上海地方法院布告(1947年5月2日)

案查宋子安与沈炳泉等因迁让出屋事件,被告陈宝海之所在不明,前经原告声请公示送达,业经照准,兹定于本年五月廿四日下午二时审理。除传票粘贴于本院牌示处外,所有应送达之书状、缮本交由本院书记官保存,该被告得随时来院领取,仰即遵期到场,倘有违误,得由对造声请一造辩论而为判决。本公示送达自布告粘贴于本院牌

示处之日翌日起发生效力,并仰知照,此布。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五月二日

Q185-3-4553-053

15. 林怡和李华萱的民事委任书(1947年5月24日)

民事委任

委 任 人:林怡^[1],卅四岁,籍贯宁波,住址东余杭路五二六弄卅一号

李华萱,四十八岁,籍贯上海,住址同上

被委任人:马楠庚律师,住址中正东路九六〇号

为宋子安诉迁让一案委任代理事,兹将委任代理之原因及具权限开列于下:

原因:依法委任。

权限:依照《民诉法》第七十条及其特权之规定。

谨状

上海地方法院 公鉴

中华民国卅六年五月廿四日

具状人 林 怡

李华萱

被委任代理人 马楠庚律师

Q185-3-4553-058-061

16. 上海地方法院的言词辩论笔录(1947年5月29日)

言词辩论笔录

原告宋子安未到,诉代高君湘、蔡成桂律师到。

被告沈炳泉到。被告沈志标、陈宝海均未到。被告严铸庚、金志良、林怡、李华萱均未到,共同诉代马楠庚律师到。被告施阿康未到。

右开当事人因迁让一案(卅五年度诉字第40九六号),本院于民国卅六年五月廿四日下午二时廿分在第七法庭公开审理,出席职员如

[1] 即林治。

左,审判长推事:蒋应杓,书记官:郑维勤。书记官朗读案由。

推事〈问〉(原代高律师):诉主声明?答:除毛文海部份已撤回外,请求判令被告等立即迁让东余杭路526弄29及31号房屋,并愿提供担保,请求宣示假执行。

问:事实理由?答:已详载起诉状,被告林治、施阿康、李华萱是本年一月十日搬入,可见是在起诉后占住东余杭路526弄29号房。

问(沈炳泉):年住等项?答:年五十八岁。

问:原告请求判决要你搬场,有何意见?答:无处可搬,请宽限一年。

问(马律师):代理什么人?答:代理被告严铸庚、金志良、林怡(起诉状误书林治,请更正)、李华萱等四个人,代任详载委任状。

问:诉主声明?答:请求驳回原告之诉及假执行之声请,如钧院认原告之诉为有理由,对造愿提供担保,请免予假执行。

问:有何理由?答:原告主张被告等为无权占有,查李华萱已住卅年之久,抗战后系争屋沦陷因而逃出,损失浩大,后在后方工作,所代之人一系佣人,一系亲戚。被告严铸庚已迁出,毋需起诉。李华萱是在去年年底,由重庆归来继续居住,既与原告立有租约,何能说是无权占有(提出房票及水据等帐)。

问(沈炳泉):你向什么人租的?答:我是外甥蒋维安让给我的,他欠我六百多万元伪币让我此屋,我并加修理,花费很多。(提出租约乙件,转让据乙件,通知乙件,信乙件)。

问:蒋维安向谁租来?答:向东洋人居留民团租的,房票也有。

问(原代高律师):对于严铸庚部份,据说已经迁出,有何意见?答:被告林治请更正为林怡。被告严铸庚既已迁出,请撤回。被告沈志标、陈宝海部份,请求依一造辩论而有判决。关于沈炳泉部份,他说是向蒋维安转让,蒋维安系向日本居留民团租来,当然不能承认。关于李华萱、林怡、金志良部份,租约是廿四年订的,到廿七年三月十五日租满,可见租赁关系早已消灭,近一步言,为何又与日本居留民团订约,况其本人不在上海,何能用他名义订约,原告当然不受其拘束。根据司法院解院字第三一五〇号解释,应请依原先之请求而为判决(提出抄司法院快邮代电乙件,信稿乙件)。

被代马律师起称：李华萱本人虽不在上海，惟其家属在上海，严铸庚是佣人，当然可以代理。

原代高律师起称：调查户籍仅李华萱一人户口，（提出户籍登记乙件）。

被代马律师起称：抗战后，他女人一度赴重庆，死在重庆，所以仅有一人。

问（沈炳泉）：还有什么话说？答：他若收回，我损失太大。

推事谕知在案，辩论终结，定本月廿九日下午二时宣判，退庭。

中华民国卅六年五月廿九日

上海地方法院民事第二庭

书记官 郑维勤

推事 蒋应杓

Q185-3-4553-062-067

附件1：解院字第三一五〇号文件（1946年7月18日）

司法院快邮代电

解院字第三一五〇号

卅五年七月十八日

首都地方法院暨本年二月十一日代电，悉所请解释一案，业经本院统一解释法令会谈，解决战前承租之房屋因首都沦陷迁避后方不能使用，承租人迁都后有无租赁权应分别情形定之。一、租赁定有期限而其期限在还都时未届满者，如期内无终止契约之原因或难有之而未为终止之意思表示，则承租人在还都后仍有租赁权。二、租赁定有期限在还都前已届满者，承租人之租赁权于期限届满时即已消灭，在还都后自无租赁权。三、租赁未定期限者，承租人于战事发生后迁避后方，如可认其有不再使用房屋之意思，即为终止契约之默示意思表示，以出租人可了解时发生效力，租赁契约既经终止，承租人在还都后即无租赁权。合电知照司法院。巧^[1]印。

Q185-3-4553-094

[1] 用韵目代日来表示日期，“巧”表示18日。

附件2：蒋维安致沈炳泉函（1947年2月11日）

舅父大人尊：

前接来函，一切均悉。谅在申定卜，福体康健，阖家顺吉，欣慰。甥居乡均多安善，勿念。今特附上补立字据一纸，并伪市府租约一纸，望即查收。专此奉达，敬请

福安

甥 蒋维安叩上

二、十一

Q185-3-4553-116

附件3：蒋维安给沈炳权补立的房屋居住权据（1947年2月11日）

立补立转让房屋居住权据。东余杭路526弄29号房屋确属敝人向伪市府租下居住，民国卅四年一月敝人因回乡务农，故将该屋转让于沈炳泉君居住，该屋内二层搁及窗户等系敝人自装，亦作价让与沈炳泉君，当即立有字据，但因沈炳泉君遗失前据，故今特再补立，以资为凭。

中华民国卅六年二月十一日补立

蒋维安

Q185-3-4553-111

附件4：查询户籍登记函（1947年3月26日）

迳启者：查敝律师承办宋子安君关于东余杭路五二六弄卅一号房屋诉讼案内，为求事简易明瞭起见，亟须查阅该屋现住户口，以便办理，为特专函烦请鉴核，赐予抄录上开房屋内全部户口底册及各户口、报进日期，掷寄敝事务所为感。此致

第十八区区公所 吴区长英

第二十五保 丁保长谒荣

律师

卅六年三月廿六日

Q185-3-4553-109

附件5：户籍登记证明（1947年3月26日）

查本保五甲六十户居民李华萱系本年一月十日声请迁入。

提篮桥区二十五保保长 丁谒荣

三十六年三月廿六日

Q185-3-4553-096

17. 上海地方法院的宣判笔录（1947年5月29日）

宣判笔录

原告：宋子安

被告：沈炳泉等

右列当事人等因迁让涉讼一案（卅五年度诉字第四〇九六号），本院于民国卅六年五月廿九日下午二时〇分在第七庭公开法庭宣示判决，出庭职员如左，推事：蒋应杓，书记官：郑维勤。当事人等经按名点呼毕，两造均未到。审判长起立宣示判决主文。

中华民国卅六年五月廿九日

上海地方法院民庭第二庭

书记官 郑维勤

推事 蒋应杓

Q185-3-4553-068-069

18. 上海地方法院的民事判决书（1947年5月29日）

上海地方法院民事判决

卅五年度诉字第四〇九六号

原告：宋子安，住江西路一八一号建设银公司，文件送达，代理人转
诉讼代理人：徐士浩律师、高君湘律师、蔡成桂律师

被告：沈炳泉，住东余杭路五二六弄廿九号

沈志标，住同右

陈宝海，住同右

施阿康，住同右

金志良，住东余杭路五二六弄卅一号

林治,住同右

李华萱,住同右

右三人诉讼代理人:马楠庚律师

在当事人间请求迁让事件,本判决如左。

主文

被告沈炳泉、沈志标、陈宝海、施阿康应各于六个月内迁让东余杭路五二六弄廿九号房屋,交还原告。

被告金志良、林治、李华萱应各于六个月内迁让东余杭路五二六弄卅一号房屋,交还原告。

原告提供担保法币一千万后,前二项判决准予假执行。被告金志良、林治、李华萱如提供担保法币一千万后,第二项判决准免假执行。

诉讼费用由被告等平均负担。

事实

原告代理人声明,请求判令被告沈炳泉、沈志标、陈宝海、施阿康迁让主文第一项所示之房屋,被告金志良、林治、李华萱迁让主文第二项所示之房屋,并请就全部宣告假执行,及令被告等负担诉讼费用。其陈述略称:东余杭路五二六弄第廿九号及卅一号房屋系原告祖产,抗战时期,原告迁至重庆,该二屋曾被日海军复兴班居留民团强占管理,后又移交伪上海市财政局接管,胜利后原告回沪,竟发现被告沈炳泉、沈志标、陈宝海盘踞于第廿九号屋内,第卅一号房屋亦被被告金志良所占,彼等均与原告无租赁关系,显属无权占有,迭经通知迁让,迳置不理。本年一月十日,时已在起诉之后,又有被告施阿康占住第廿九号屋内,被告李华萱、林治占住第卅一号屋内,其中被告李华萱虽曾于民国廿四年与原告订约承租第卅一号系争房屋,但租约早于民国廿七年期满,租赁关系已不存在,即依司法院解院字第三一五〇号解释,亦应认为租赁关系消灭,请求判令被告等迁让,原告并愿提供担保,请求宣告假执行云云,提出司法院代电及户口表等为证。

被告沈炳泉声明,请求为适当之判决。其陈述略称:所住系争之第廿九号房屋,原系外甥蒋维安向日人居留民团承租,嗣蒋维安欠被告伪币六百余万元,于民国卅四年一月将该屋转让与被告,曾加修缮,

如令迁移损失太大,且现无处可搬,请求宽限一年云云,提出租约、转让据等为证。

被告沈志标、陈宝海、施阿康均未于言词辩论期日到场,亦未提出准备书状,其声明及陈述均无可纪载。

被告金志良、林治、李华萱之代理人声明,请求驳回原告之诉。其陈述略称:系争之第卅一号房屋系原告出租与被告李华萱,租约虽于民国廿七年满期,但原告并未通知。抗战后,李华萱逃往重庆,至去年年底归来,继续居住,在此时期中,该屋始终由其亲戚,即被告金志良代管,且亦曾向伪特别市政府渝产管理委员会及伪上海特别市财政局订立租约,租赁关系既未消灭,自非无权占有。至假执行部份,如钧院认原告之诉为有理由时,被告等并愿提供担保,请免予假执行云云。提租约、房票等为证。

理由

查本件被告沈炳泉、沈志标、陈宝海、施阿康所住之东余杭路五二六弄廿九号之系争房屋,据被告沈炳泉陈明,系其外甥蒋维安向日本居留民团承租后转让与彼,该项租约既非原告所订,自不能拘束原告,则原告请求并无租赁关系而居住于该屋内之被告等迁让,即非无理。至同弄卅一号之系争房屋,虽曾由被告李华萱向原告订约承租,惟租赁期限至民国廿七年即已届满,有被告代理人所提之租约记载可证,亦为被告李华萱所不争,则租赁关系当然于租赁期限届满时消灭,固不必定须通知后始生效力。该被告向伪上海特别市渝产管理委员会及伪上海特别市财政局续订租约,自不能对原告生效,则该被告主张租约虽已满期,原告未有通知及房屋始终由亲戚,即被告金志良代管,并与伪方订有租约各节,均不足据为租赁关系尚未消灭之理由。又查,该被告在抗战后即离沪前往重庆,直至去年年底始返屋居住,原告主张即依司法院解院字第三一五〇号解释,首都战前房屋租赁人因首都沦陷离屋他往,至还都后始返,而租赁契约在还都前即已满期者,其租赁关系消灭之同样情形,原告与该被告间之租赁关系亦应认为消灭等语,亦不无可采,从而原告主张被告李华萱、林治、金志良等居住屋内系属无权占有,请求迁让还屋,不得谓非有理。惟现在觅屋不

易,如责令被告等即时迁让,亦属过苛,爰依《民法》第三百十八条,于无甚害于原告利益之范围内,予被告等以相当之履行期间,又原告声请假执行,既据陈明愿供担保,应予准许,但亦许被告李华萱、林怡、金志良愿供担保,免为假执行,以资兼顾。再本件被告沈志标、陈宝海、施阿康未于言词辩论期日到场,查无《民事诉讼法》第三百八十六条各款情形,并依原告之声请,由其一造辩论而为判决,特此证明。

据上论结,本件原告之诉及假执行之声请为有理由,应予准许并依《民事诉讼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项、第三百九十二条、第七十八条、第八十五条第一项,前段判决如主文。

中华民国卅六年五月廿九日

上海地方法院民事第二庭

推事 蒋应构

学习司法官 郑今昇拟

Q185-3-4553-070~077

19. 金志良等的民事上诉状(1947年7月12日)

民事上诉

上 诉 人:金志良,四十九岁,籍贯江苏吴县,住址本市东余杭路五二六弄三十一号

林怡,三十四岁,籍贯宁波,住址同上

李华萱,籍贯上海,住址同上

被上诉人:宋子安,文件由徐士浩律师转

为提起上诉事。案奉钧院于本年六月廿五日送达卅五年诉字第四〇九六号民事判决书,主文内略开“被告金志良、林怡、李华萱应各于六个月内迁让东余杭路五二六弄卅一号房屋,交还原告,诉讼费用由被告等平均负担”等因。奉此,查该项判决,上诉人对之实难甘服,为特于不变期间内提起上诉,状请钧院转送上海高等法院鉴核,准予变更原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在第一审之诉及其假执行之声请,并令负担第一、二两审诉讼费用,实为德便。谨状

上海地方法院 转呈

上海高等法院 公鉴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七月十二日

具状人 金志良

林 怡

李华萱

Q185-3-4553-171~174

20. 上海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947年7月28日)

三十五年度诉字第四〇九六号

上 诉 人:金志良,住东余杭路第五二六弄第三十一号

林怡,住同右

李华萱,住同右

右上诉人与宋子安因迁让事件不服本院第一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应缴裁判费国币十一万七千元,未据缴纳,其上诉状亦未依《民事诉讼法》第四百三十八条表明上诉理由。兹限该上诉人于接受本裁定之翌日起五日内向本院如数补缴,如逾期尚未遵行,第二审法院即行驳回上诉,切勿违延自误。特此裁定。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上海地方法院民事第二庭

推事 蒋应杓

Q185-3-4553-175

21. 上海地方法院书记室公函 (1947年8月22日)

民庭字第二二四七六号

案查卅五年度诉字第四〇九六号宋子安与沈炳泉等迁让一案,业经本院依法判决送达在卷,兹据被告金志良等,于法定期间内具状提起上诉,到院相应检齐卷证,函送贵室查收核办。此致

上海高等法院书记室

计:函送卷乙宗、上诉状乙件、才〔裁〕定原本乙件、送证二件、印纸乙件、判决正本乙件(证物详套)。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八月廿二日

Q185-3-4553-170

22. 上海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947年9月8日)

三十六年度上字第一五三五号

被上诉人:宋子安,住江西路一八一号,文件由徐士浩律师转

右被上诉人与金志良等为迁让事件,经本院核定诉讼标的价额为国币五千万元,依法应征收第一审裁判费六十五万元,除已缴纳十五万六千元外,尚欠四十九万四千元。兹依《修正民事诉讼法》第四百六十条第二百四十九条第一项规定,命被上诉人于收领本裁定之时起,十日内补缴到院,慎毋延误。特此裁定。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九月八日

上海高等法院民事第一庭

审判长 李 良

Q185-3-4553-179

23. 上海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947年9月8日)

三十六年度上字第一五三五号

上 诉 人:金志良,住东余杭路五二六弄三一号

林怡,同上

李华萱,同上

右上诉人与宋子安为迁让事件,经本院核定诉讼标的价额为国币五千万元,依法应征收第二审裁判费九十七万五千元,除已缴纳十一万七千元外,尚欠八十五万八千元。兹依《修正民事诉讼法》第四百四十一条第一项规定,命上诉人于收领本裁定之时起,十日内补缴到院,慎毋延误。特此裁定。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九月八日

上海高等法院民事第一庭

审判长 李 良

Q185-3-4553-180

24. 宋子安的民事委托书 (1947年12月)

民事委任

委任人:宋子安,籍贯广东,住址江西路一八一号,职业建设银公司
经理

被委任人:高君湘律师、荣桢隆律师、蔡成桂律师,住址九江路二一九
号三楼

为三十六年度上字第一五三五号迁让上诉事件委任代理事,今将
委任代理之原因及其权限开列于后:

一、原因:依法委任。

二、权限:依《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并但书特权之规定。

谨呈

上海高等法院 公鉴

中华民国卅六年十二月

具状人 宋子安

被委任律师 荣桢隆

蔡成桂

Q185-3-4553-193~196

25. 李华萱和金志良的民事委托书 (1947年12月26日)

民事委任

委任人:李华萱、金志良,住址东余杭路五二六弄卅一号

被委任人:马楠庚律师,住址中正东路九六〇号

为与宋子安因迁让上诉一案委任代理事,兹将委任代理之原因及
具权限开列于下:

一、原因:依法委任。

二、权限:依照《民诉法》第七十条及具特权之规定。

谨状

上海高等法院 公鉴

中华民国卅六年十二月廿六日

具状人 李华萱

金志良

被委任代理律师 马楠庚

Q185-3-4553-197-200

26. 李华萱的民事上诉状 (1947年12月26日)

民事上诉

上 诉 人:李华萱,四十九岁,籍贯上海,住址本市东余杭路五二六弄第三十一号

被上诉人:宋子安,年藉在卷,住址本市江西路第一八一号建设银公司
为与宋子安请求迁让上诉一案补呈上诉理由事

查本案除已声明上诉并补缴上诉费用外,谨补呈上诉理由于后:

一、不能续订租约之责任须由被上诉人负之

窃上诉人于民国二十四年向被上诉人订立租约,租赁本市东余杭路五二六弄第三十一号房屋,至民国二十七年满期,但至民国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上海发生战事,虹口区域顿成军事区,上诉人当时避难于租界亲友处,仍命男仆金志良(于初审中亦被列为被告之一)看守房屋中留存之家具、杂物,始终未离寸步。嗣后虹口开放,上诉人仍返故居安住,后上诉人赴内地服务,任西北防疫处驻渝办事处主任之职,仍留金志良在内看守。此后因敌伪清乡骚扰民间更烈,同事中之亲属有在沦陷区之“清乡地区”者,自乡间逃避上海,因觅屋困难,经上诉人之主管长官杨处长永年囑由上诉人函谕金志良准予迁入数户合住。此为抗战期中权宜之计,此为国家民族当临大难我人应有之互助精神,更绝无租赁顶让之事实。胜利后,上诉人随杨处长来沪接收敌伪之制药事业,当时又因同事中无屋可以住宿,临时指拨一部份余屋为职员宿舍。上诉人所居中之同僚亲属在后即陆续迁出,早已只剩上诉人及男仆金志良在内居住,别无他人。此点为被上诉人之管业人员所洞悉,上诉人岂可随意胡言。且在敌伪时期,上诉人迫于环境向伪市政府渝产管理委员会登记立约付租(证件已在第一审卷中),仍用上诉人之名义。根据上述之事实而推论,即可获以下之结论:(一)上诉人对于所居之房屋始终无抛弃之意志;(二)缘于战事状态而发生之

后果不能单独归咎上诉人之一方面,而使上诉人独受损害;(三)对于上诉人迫于环境用原来名义向伪市府登记纳租一节,被上诉人显然已有默认之意思表示,否则为何在初审中被上诉人从未提及数年来之租金问题,盖已承认上诉人已向伪市府纳租之举也;(四)合同于战事状态发生之后二十七年始告满期,但租界中之各级法院仍在威海卫路智仁勇女校照常开庭,各种中央机关均未撤退,直至二十八年下半年始,因敌伪压迫加重,逐渐向后方撤退,迨至民国二十九年未及三十年春,租界中之法院始被敌伪接收,至民国三十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开始,租界及全部沦陷。可见在民国二十七年间,租界中之法院极端在正常状态中,被上诉人既于租约满期之际无意继续出租,尽可用书面通知(邮政情形始终正常)或向法院提起诉讼,最低之限度亦可在《新》^[1]、《申》^[2]二报登载一广告通知全弄房客(包括上诉人在内)租约均在满期日起作废。其时被上诉人毫无举动,显然默认租赁已在无形中延长成为不定期限租赁契约,实为当然之解释。

二、原判决引用司法院解释院解字第三一五〇号之不当

原判决根据被上诉人主张引用上项司法院解释,以决定租赁关系已不存在,上诉人认为本案之情形与上项解释之要旨并不符合。至该解释之缘起,乃因于出租人先将房屋租与甲,甲因首都沦陷而避往后方,出租人乃将房屋出租与乙(或敌伪占用),还都后甲向出租人要求租赁权,而乙同时亦已有租赁权,此种情形首都特多,故司法院认为甲之避居后方即为抛弃之默示意思表示,其与本上诉案件之情形显然不同之点如下:(一)上诉人自始至终派人看守此房屋,亦从未被敌伪占用,则与首都地方法院代电中所称“出租人业将房屋另租他人或于沦陷中被敌伪占用”一节根本情形不同;(二)上诉人从未将此屋出顶,尤其被迫向伪市政府登记时仍用上诉人名义,可以证明上诉人毫无抛弃租赁之默示意思表示,缺乏司法院原解释之必要条件,且司法院之解释要旨开始即谓“因首都沦陷迁避后方不能使用”,而上诉人则并非迁避后方,仍可安居上海,乃因职业而自动赴渝,而房屋则始终在使

[1] 指《新闻报》。

[2] 指《申报》。

用中,而非“不能使用”; (三) 上海为局部陆续沦陷者,中央机关在抗战初期仍可推行公务,当二十七年租约满期之际,在司法行政上并无足以使被上诉人之行为有丝毫限制之处,故该项解释之构成原意及环境,上海根本与首都不同; (四) 总之,该项解释必须于原承租人向出租人要求继续租约,而出租人已将房屋另租他人无从应命之情形下,方得沿用。易言之,即出租人在原承租人诉请确认有租赁权之时,方可引用,以对抗原承租人,但不能于出租人作为解除租约之理由,而为压迫原承租人之武器,显属曲解。

三、被上诉人无收回自用之意思

查被上诉人宋子安乃党国要人宋子文之介弟,在本市旧法租界置有花园洋房,且其本人现在美国安居,而目前所争之房屋乃一非常陈旧之中式房屋,甚至连卫生设备亦付缺如,决无收回自用之理,将来亦不过仍以转租他人为目的,并不能获任何巨大利益。而上诉人则无辜遭受重大之损害,何况在战事初期,上诉人代被上诉人照顾房屋不无微功,同一地段之空屋,其门窗多为歹徒窃去,彼此相较之下,被上诉人受益非浅。及至战事末期,盟国飞机在虹口掷弹,其落点与上诉人所居近在咫尺,门窗脱框,玻璃尽碎,甚至前后大墙均有倾倒之象,上诉人代为——修理,所费不貲。今被上诉人毫无情谊,采取断然处置,希图将上诉人驱逐,实属大背人情。

四、调解经过足证被上诉人之真意所在

本案经初审判决后,上诉人仍以诚恳态度托人调解,诂被上诉人方面开具条件: (一) 初审律师公费一千万; (二) 初审诉讼费二百万元(事实上不过数十万元); (三) 以后自民国三十六年十二月一日起,房租每月六十万元(左右邻居为伍万元,见所附证件); (四) 补交二十六年八一三战事开始至三十六年之房租,共计一百二十个月,每月亦必须依六十万计算,共计七千二百万元。其条件之苛刻,非上诉人之普通公务人员身份所能负担。由此亦可证明,被上诉人虽在国外,亦曾任要职,当明事理,此种不合理之条件完全系被上诉人之管业人员所杜撰。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之代理人提出证明(即被上诉人在美所寄关于和解条件之函电),否则即可推测本案完全为被上诉人之管业人员希图收取巨大费用,故不惜将上诉人陷入讼累。

综上所述,原判决将不能续订租约之责任委责上诉人,更采取被上诉人对于司法院院解字第三一五〇号解释之断章取义,本末倒置,谬误主张,而作为解除租约之惟一法律根据。上诉人实不甘服,故特补呈上诉理由,伏乞钧院俯赐采纳《民法》第四百五十一条之规定,仍得继续租赁契约居住于所争之房屋,并废弃第一审之判决及假执行之宣示,并令被上诉人负担第一、二审之诉讼费,实为德便。谨状

上海高等法院 公鉴

证物:

一、杨处长永年证明函件乙件

二、左右邻居之租赁合同及最近租票之相片各一张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十二月廿六日

具状人 李华萱

Q185-3-4553-201~210

附件1:杨永年的证明书(1947年12月)

证明书

为证明事,查李华萱一员于民国三十二年一月曾任前西北防疫处所属重庆办事处主任之职,该员沪寓东余杭路五二六弄三一号,即留充该员眷属及同事之眷属居住。迨抗战胜利后,该员随同本人来沪办理接收敌伪之制药事业工作,当即拨一部分房屋作为职员宿舍,原住于上述地址之同事眷属一部迁出,仍由李华萱及其眷属住用,其间经过毫无强占或顶让情事,其初次涉讼适本人奉派赴美未返。兹据陈报,经查确属实情,特为证明。

前任西北防疫处处长、现任中央生物化学制药实验处处长 杨永年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十二月

Q185-3-4553-260

27. 上海高等法院的言词辩论笔录(1947年12月26日)

言词辩论笔录

上诉人:金志良等

被上诉人:宋子安

右列当事人间因三十六年度上字第一五三五号迁让事件,于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十二月廿六日上午九时卅分,在本院公开法庭言词辩论。出席职员如左,审判长推事:高其迈,推事:卢重明,推事:胡景清,书记官:周竞生。

点呼事件后庭到者如左,上代:马楠庚律师,被上代:高君湘律师。

审判长问(上代):如何声明?答:请求废弃原判,驳回被上诉人在第一审之诉及假执行之申请,并令负担第一、二两审诉讼费用。

问(被上代):如何声明?答:请求驳回上诉,并令负担第二审诉讼费用。

问(上代):代理人代理几人?答:代理李华萱和金志良二人。

问:还有林怡呢?答:本人未受林怡之委任,而事实上他已搬出系争房屋。

问(被上代):上诉人林怡经本院合法传唤不到,有何请求?答:请依一造辩论而为判决。

问(上代):第一审辩论之结果及上诉之理由如何?答:(其陈述与上诉状所载同)。

问(被上代):如何答辩?答:综合上诉人上诉之理由,不外二点。一为租期届满以后,被上诉人并未有即时反对之意见表示;一为原审曲解司法院第三一五〇号解释。兹就此二点分别加以答辩。查租赁定有期限者,租期届满,租赁关系消灭,法有明文规定。本件上诉人李华萱在敌伪时期,身在后方,由他人向伪市政府渝产管理委员会登记立约付租,此种行为,当与被上诉人无关。盖本件为宋子安与李华萱之租赁关系,而彼二人间之租赁关系早因租期届满而消灭,今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并未即时有反对续租之意思表示,为其立论之张本,显非有理。至司法院第三一五〇号解释,文义至为明显,原审引以为判决之基础,实若至当,况复于判决理由栏内载叙綦明,乃上诉人空言抨击原审引用失当,殊不足采。且上诉状载:李华萱于抗战后即赴内地服务,改由金志良入内居住,今则谓渠与金志良为亲戚关系,偏面主张,何足令人凭信。于今时隔十年,上诉人尚再思入住系争房屋,于法自嫌无据,又查

李华萱是在诉讼系属后始行报入户口,用意所在,不攻自破。

问:系争房屋在何时被伪市政府没收的?答:大概在伪市政府成立以后,至于确切日期,则不详。

问:没收是在期满前还是在期满后?答:不太清楚,大概是在期满后被没收的。

问:在期满以后,被上诉人有否通知上诉人迁让?答:当时李华萱与宋子安都不在上海,即使履行通知,手续方面也殊感困难。

上代起称:李华萱系于民国廿九年离沪,当时租期业已届满,自三十三年五月一日起直到胜利之日止,该屋一直由渝产管理委员会经管。

问(上代):李华萱在民国廿九年离开上海,有何证明?答:可从李华萱赴内地后向服务机关报到日期以间接证明。

问:金志良是李华萱的亲戚还是佣仆?答:是寒戚,简操佣仆事务。

问:金志良在系争屋内住了许多年,有何证明?答:有敌伪时之户口证可资证明。

问:卷里没有?答:如钧院认有参考之必要,可以提出。

审判长命于宣判前补递到院。

问:上诉人现在还有家具放在里面吗?答:还有。

审判长宣告本案辩论终结,定于本月卅一日上午九时宣判。

谕知两造代理人届时自行到庭听判。

中华民国卅六年十二月廿六日

上海高等法院民事第三庭

书记官 周竞生

审判长 高其迈

Q185-3-4553-212~218

28. 宋子安的民事答辩书(1947年12月29日)

民事答辩

答 辩 人:宋子安,住址江西路一八一号建设银公司,文件送达由九江路二一九号徐士浩律师转

上 诉 人:李华萱,住址东余杭路五二六弄卅一号

金志良,住址同上

为补具答辩理由,事缘与李华萱等请求迁让被上诉一案,昨日已由钧院审理,辩论终结,定本月卅一日宣判,并奉钧院当庭发下上诉理由状一份,兹特补具答辩理由于后。

查上诉人李华萱所租赁之东余杭路五二六弄卅一号房屋于民国廿七年三月满期,在期满之前,即民国廿六年八月间,上诉人李华萱更由其自己意思脱离租赁物,先则住于上海之旧租界,继即离沪内迁,凡此事实非特有租约可查。抑且由李华萱于其上诉理由状内陈述綦明,(请参阅李之上诉状前段),是则上诉人李华萱与答辩人间之租赁关系非特因期满而消灭,抑且因其脱离租赁物而可推定其为抛弃使用,原属显然,乃上诉理由状谓答辩人并未即时表示反对云云。殊不知,当租期届满之日在廿七年三月间,上海方面虽已免于炮火,然系争房屋坐落虹口一带,正在日敌势力炽烈之时,该处房屋或则阒无一人,或被日敌占住,故答辩人于李华萱租期届满之日可谓已达不能通知之地步,而况李华萱既已脱离租赁物,且在抗战期间始终并未回去,则在答辩人方面根本尤无通知之可能。抑且在事实上,即无通知其租赁关系,依法亦已当然消灭,因昨日庭讯时钧院对于此点曾经询及,故详述于上。并随状附呈答辩人所委托经租人员之报告书,俾钧院可明瞭当时一切情形,尤足见上诉之毫无理由矣。应请钧院依法驳回李华萱、金志良等之上诉,并令负担上诉费用,实为德便,谨呈

上海高等法院 公鉴

物证:经租员报告书一份,计两纸。

中华民国卅六年十二月廿九日

具状人 宋子安

撰状代理律师 高君湘

Q185-3-4553-219~223

29. 李华萱的民事声明书(1947年12月30日)

民事声明

声明人:李华萱,四十九岁,籍贯上海,住址本市东余杭路五二六弄

卅一号

为声明事,窃卅六年上字第一五三五号,声明人与宋子安因迁让上诉一案,业蒙钧院审理终结,定期于本月卅一日上午宣判在案。兹经声明人向十八区第廿五保保长办事处查得系争房屋之户口移动情形如下:

一、金志良始终未离开租赁房屋,廿九年伪保甲成立时即报入户口。

二、杨美豫为中央防疫处杨处长之太太,于卅年三月自渝陷区撤退迁入暂住。

三、严铸庚(李华萱之戚,原审即列入被告),卅五年一月十八暂住,卅六年四月迁出。

四、林怡(李华萱之戚)于卅五年五月迁入暂住,卅六年十一月迁出。

五、李华萱卅六年一月六日复员,返沪迁入居住。

上开户口移动情形足以确证声明人绝无不再使用系争房屋之意思,如钧院认为有传证之必要,该保甲处当能以公文书加以证明,为此具状。恳请钧院鉴核,准予判决如声明人之请求,实为德便。谨状

上海高等法院 公鉴

中华民国卅六年十二月卅日

具状人 李华萱

Q185-3-4553-224~229

30. 上海高等法院的宣判笔录(1947年12月31日)

宣判笔录

上诉人:金志良等

被上诉人:宋子安

右列当事人间因卅六年上字第一五三五号迁让案件,于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十二月卅一日上午九时,在本院民事五庭公开法庭宣告判决。出席职员如左,审判长推事:高其迈,推事:卢重明,推事:胡景

清, 书记官: 黄绍元。

点呼事件后, 两造均未到庭。

审判长起立, 宣告判决主文。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十二月卅一日

上海高等法院民事第三庭

书记官 黄绍元

审判长推事 高其迈

Q185-3-4553-230~231

31. 上海高等法院的民事判决书 (1947年12月31日)

上海高等法院民事判决

三十六年上字第一五三五号

上 诉 人: 金志良, 住东余杭路五二六弄三一号

李华萱, 住同上

共同诉讼代理人: 马楠庚律师

上 诉 人: 林怡, 即林治, 住东余杭路五二六弄三一号

被上诉人: 宋子安, 住江西路一八一号

诉讼代理人: 高君湘律师、荣桢隆律师、蔡成桂律师

右当事人间请求迁让事件, 上诉人对于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上海地方法院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本判决如左。

主文

原判决关于上诉人部份废弃。

被上诉人前开废弃部份之诉及假执行之声请均驳回, 第一、第二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

事实

上诉人代理人请求如主文所示之判决, 被上诉人代理人请求驳回上诉, 并令上诉人负担第二审诉讼费用。

上诉人代理人陈述略称: 上诉人李华萱于民国廿四年向被上诉人承租本市东余杭路第五二六弄第三一号房屋, 至民国廿七年期满。民国廿六年八月十三日沪战发生, 上诉人李华萱迁避于旧租界内, 命仆

人即上诉人金志良看守该屋，家具、杂物仍留置屋内。嗣后，虹口开放，上诉人李华萱仍返该屋居住，后虽赴内地服务，但上诉人金志良始终留沪看守该屋。沦陷期内，虽将该屋之一部暂借于内地逃沪之难民居住。胜利后，临时借于后方来沪接收之同事居住，但现在均已撤出，并无顶让之事实。况沦陷时期，上诉人李华萱迫于环境，仍以上诉人名义名向伪市政府渝产管理委员会登记，立约付租，足征〔证〕并无不再使用该屋之意思。再查民国二十七年租约期满时，上海邮局及各法院均尚能行使职务，被上诉人并未通知或诉请迁让，显已同意延长租约成为不定期租赁，被上诉人在沪置有花园洋房，其本人现在美国亦无使用系争房屋之必要云云。被上诉人代理人陈述与第一审判决所载相同，兹引用之。

理由

上诉人林怡于言词辩论期日不到场，查无《修正民事诉讼法》第三百八十六条所列各款之情形，应依被上诉人代理人之请求，由其一造辩论而为判决。次查系争房屋系上诉人李华萱于民国廿四年三月八日向被上诉人之经租人徐士浩律师承租，定定期三年至民国廿七年三月十五日期满，有该上诉人提出之租约可证。虽据被上诉人代理人陈明，当时被上诉人业经迁避后方无法通知上诉人迁让，但经租人徐士浩律师并未离沪，对于上诉人继续使用系争房屋并未即时为反对之意思表示，依照《民法》第四百五十一条之规定，应视为不定期限继续契约。嗣后，该屋由伪上海特别市政府渝产管理委员会接管，上诉人李华萱仍向该会承租，按月缴纳租金，亦有该上诉人提出之租约及缴款收据（领收证）可稽，且该上诉人李华萱虽至后方服务，但仍留其仆人，即上诉人金志良看守该屋，既未脱离该屋达于不能使用之程度，亦无终止租约之默示意思表示，则两造间之租赁关系并未终止，事实颇为明显。原审认上诉人李华萱就系争房屋之租赁关系已因期限届满而消灭，金志良等之居住该屋为无权占有，准被上诉人代理人之请求，判令上诉人等迁让，法律上之见解难谓恰当，应予废弃改判。

据上论结，本件上诉为有理由，应依《修正民事诉讼法》第

四百六十条、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项、第四百四十七条、第八十七条第二项、第七十八条判决如主文。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上海高等法院民事第三庭

审判长推事 高其迈

推事 胡景清

推事 卢重明

Q185-3-4553-232~236

(整理人邢建榕为上海档案馆编研部研究馆员,

董婷婷为上海档案馆编研部助理馆员)

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法租界公董局警务处 关于纪念孙中山活动情况的报告

朱玖琳 徐世熙 译注

[编译者按]

上海法租界公董局警务处原存有标题为“孙逸仙(Sun Yat Sen)”的专档,编号 $\frac{1-B-81}{1}$,页码至少在500页以上。

经过1969年的整理,现卷宗标题为“上海法租界公董局警务处关于纪念孙中山活动情况及有关宋庆龄的言论和行踪”,时间跨度从1922年至1942年,档案形式主要是工作报告、剪报和照片,包括内容相同的档案副本在内,仅存130页。主要内容有:各地纪念孙中山诞辰和逝世的情况;孙中山移葬情况;有关宋庆龄言论和行踪的报告。

本篇译文是各地纪念孙中山诞辰和逝世的情况以及孙中山移葬情况两部分内容的合成。

法文档案由徐世熙翻译,朱玖琳译审;英文档案由朱玖琳翻译;注释朱玖琳。

1. 1928年2月28日

1928年2月28日

上海特别市政府同意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特派交涉员公署^[1]以及上海总商会的意见,为3月12日孙逸仙逝世三周年筹备一个纪念仪式。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通知当地各组织为该纪念仪式做准备。一旦日程安排制定出来,我们将立即转告。

档案号: V38-2-929-107

[1] 即外交部特派驻沪交涉员公署,中国政府于1911年至1929年间设立于上海,是负责处理上海地区对外事务的政府派出性机构。交涉员公署前期命名为外交部驻沪通商交涉司,期间一度更名为外交部驻沪交涉使。1929年,国民政府外交部统一裁撤各口岸派出机构,交涉员公署因此结束。

2. 1928年3月10日

1928年3月10日

为纪念孙逸仙逝世三周年,将于本月12日在特派交涉员公署、国民党特别市党部及上海总商会办事处所在地召开会议。

我们获悉,位于蓬莱路(西门)的上海工人总工会打算号召上海工人于本月12日上午10时在西门体育场和青云路(闸北)的空地上举行集会。

另一方面,仍然一直听说,中国当局将不允许工人举行这些集会。

档案号: V38-2-929-108

3. 1928年3月12日

1928年3月12日

3月12日(孙逸仙逝世三周年纪念日)

男子将佩黑纱,妇女戴黑花。所有的旗降半旗。工人和学生放假。

上午9时 在特派交涉员公署召开国家行政机关(警察局、中国市政当局、国民党特别市党部等)负责人会议。

上午9时 工人工会联合会(南市分会)成员将在小西门中华路(南市)的少年宣讲团^[1]所在地召开会议。

上午9时 工人工会联合会(闸北分会)成员将在闸北的世界大戏院召开会议。

上午9时 闸北各棉纺厂的工人将在闸北的会文路召开会议。

上午9时 商人将在总商会所在地(北河南路)开会。

上午9时 所有学校的学生将在各自的学校内集会,向孙逸仙遗像致敬,并发表演说。

上午9时30分 军舰鸣33响礼炮。

9时30分至晚上6时 上海市民将前往国民党特别市党部向孙逸仙遗像致敬。

[1] 青年团体。1912年元旦由汪龙超等发起成立,初为“课余之暇从事宣讲”,后来成为励志和公益性的青年社团,团员从20余人发展到数百人。上海分6个区活动,并设苏州支部。1920年在南市中华路尚文路口自建团所及通俗演讲场。1925年五卅运动时,团所成为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所在地。1937年八一三事变中团所被炸,停止活动。

上午9时30分 各同业公会代表和大学生代表在特派交涉员公署对面的空地上集会。熊式辉、郭泰祺等将在会上发表。

中午12时 全体市民将默哀三分钟。

1928年3月12日

国民党市级各机关代表昨天上午10时在国民党市党部所在地西门召开会议,并决定通知全体成员在本月12日(孙逸仙逝世三周年纪念日)佩戴黑纱。

在此次会议上,一位姓周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农业处秘书宣布,奉上海卫戍司令部的命令,西门体育场上将不举行集会。

档案号: V38-2-929-104-106

4. 1928年3月13日

1928年3月13日

昨天上午9时在特派交涉员公署前的空地上举行了一个纪念大会(孙逸仙逝世三周年纪念日)。在约3 000名与会者中,有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海关专员李景曦、上海特别市市长张定璠、外交特派交涉员郭泰祺^[1]、上海公安局局长戴石浮、上海特别市政府秘书长周雍能等。出席这次大会的还有:龙华司令部150名宪兵、公安局100名警察及30名侦探、海军司令部及上海公安局的一些乐师、1 000名大学生、500名当地各组织的代表以及50名南市志愿者组织成员。9时40分鸣33响礼炮。大会由张定璠、熊式辉和郭泰祺主持。会上他们作了关于孙逸仙学说和经历的演说。然后与会者在熊式辉、郭泰祺、李景曦、张定璠、周雍能、戴石浮等的带领下,去特派交涉员公署附近的华界地区小木桥进行植树以纪念孙逸仙。纪念仪式在11时30分结束。

档案号: V38-2-929-101

[1] 郭泰祺时代理外交部部长职务,亦为江苏特派交涉员。

1928年3月13日

约300名当地各组织代表于昨天上午10时在位于中华路(西门)的少年宣讲团所在地召开会议,纪念孙逸仙逝世三周年。一切正常,没什么值得报告的事。

1928年3月13日

昨天上午10时召开纪念(孙逸仙逝世三周年)大会的地点有:1)位于蒲柏路479号的法科大学;2)位于霞飞路352号的南光学校;3)位于同一条马路(即霞飞路)834号的商科大学;4)位于蓝维葛路德祥里12号的唐家湾商界联合会等。

在这些大会中,没有作出任何决定,没有讨论任何政治问题,没有发表任何讲话。一切正常,没什么值得报告的事。

档案号: V38-2-929-102

1928年3月13日

约1000名上海男女大学生昨天上午9时去特派交涉员公署参加孙逸仙逝世三周年纪念大会。下午1时30分全部活动结束。一切正常,没什么值得报告的事。

1928年3月13日

沪西各棉纺厂的工人工会各派一名代表去位于青云路(闸北)的世界大戏院参加孙逸仙逝世三周年纪念仪式。

档案号: V38-2-929-103

5. 1928年5月3日

1928年5月3日

5月5日是孙逸仙在广东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的周年纪念日,当地各组织将各派1至2名代表出席由少年宣讲团召集的会议。

档案号: V38-2-929-100

6. 1928年5月5日

1928年5月5日

今天,5月5日(孙逸仙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的周年纪念日),上海大学生代表将于上午10时在西门少年宣讲团为这个周年纪念日举行纪念大会。上海警备司令部将于今天同一时间在总商会所在地召开会议,庆祝克复济南。各商店将在今天升旗。大学生放假,但不得召开会议。至于工人,他们照常上班。

档案号: V38-2-929-099

7. 1928年5月7日

上海, 1928年5月7日

巡捕房

警备队

第三分队

情况通报

政治局势

约200名当地各组织代表于本月5日上午10时在总商会所在地举行会议,庆祝孙逸仙就任广东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周年纪念日。会议于12时30分结束。会上发表了关于孙逸仙革命功绩、攻克济南府、日本帝国主义以及谋杀外交部山东交涉员^[1]事件的演说。

会议结束时高呼下列口号:“继承总理遗志”、“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革命万岁”。

档案号: V38-2-929-098

8. 1928年9月13日

9月13日

巡捕房代理总巡致法国总领事先生

上海

[1] 即蔡公时。

兹复1928年9月12日通知如下：我荣幸地向您汇报，已向巡捕房各部门下达命令，禁止在公共场所演出名为“领袖孙逸仙之死”的喜剧。

档案号：V38-2-929-096

V38-2-929-097

9. 1928年11月12日

28年11月12日

11月11日-12日（孙逸仙诞辰周年纪念日）纪念活动日程安排：

本月11日16时至24时，在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向孙逸仙遗像致敬。

12日当天 上海各学校放假。

上午9时 上海各政府部门人员在南市的中华国货展览会的礼堂开会。

10时 在龙华司令部开会（鸣33响礼炮）。

16时 在总商会所在地和西门公共体育场举行公众集会。

19时 在总商会所在地举行文娱演出和晚宴。

各学校的学生和上海的国民党人将前往孙逸仙寓所（莫利爱路）向孙逸仙遗像致敬。

档案号：V38-2-929-091

28年11月12日

今天上午，上海各学校的学生本该来莫利爱路29号（法租界）向孙逸仙遗像致敬，但门上张贴的一纸通告劝阻他们，使他们放弃了这一做法。

今天上午10时将在位于西门林荫路上的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所在地召开纪念大会。

档案号：V38-2-929-092

28年11月12日

本月12、13、14日上海各学校将在西门体育场举行运动会。

各项竞赛将于今天上午10时开始。

今天14时当地各组织将在总商会所在地召开纪念孙逸仙大会。

档案号：V38-2-929-093

1928年11月12日孙逸仙诞辰周年纪念日日程安排：

12时：中国军舰在锚地鸣21响礼炮。

14时：在西门体育场举行公众集会，在闸北、南市以及北河南路的总商会、在北四川路的中央大会堂有文娱演出。

档案号：V38-2-929-094

10. 1928年11月13日

上海，1928年11月13日

巡捕房

警备队

第三分队

情况通报

政治局势

昨天上午将近9时，在中华国货展览会所在地召开了一个纪念孙逸仙诞辰63周年大会。在700人左右与会者中有上海特别市市政府张定璠市长、铁道部长孙科、教育部长蔡元培、工商部长孔祥熙、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委员吴铁城、上海公安局局长戴石浮等。

会议由陈德征、张定璠、任光宇、熊式辉和冷欣主持。会上向国旗、国民党党旗和孙逸仙遗像三鞠躬，并为孙逸仙默哀三分钟。孙科、孔祥熙、蔡元培、吴铁城、张定璠、陈德征等发表了演说，讲述了孙逸仙革命的丰功伟绩。

大会结束时高呼下列口号：“庆祝孙逸仙诞辰周年纪念日”、“纪念孙逸仙的英勇精神”、“实现三民主义”、“建设一个独立的政府”、“完成孙逸仙先生的未竟事业”、“中国国民党万岁”，“中华民国万岁”等……

大会在11时40分结束。

昨天14时各组织在位于北河南路的总商会所在地为孙逸仙诞辰周年纪念日举行纪念大会。

会上DANG-ZI^[1]发表了关于孙逸仙生平的讲话。会上高呼下列口号：“庆祝孙逸仙诞辰周年纪念日”、“贯彻孙逸仙的方针”、“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的政府”、“中国国民党万岁”、“中华民国万岁”等。

大会于15时结束。

值孙逸仙诞辰周年纪念日之际，昨天晚上将近7时，在北河南路的总商会所在地举行了一个纪念大会。

此次纪念大会在今天凌晨2点结束。会上一些与会者发表了关于孙逸仙生平的讲话，并举行了文娱演出。约700人参加了纪念活动。上海公安局派了十余名警察去现场维持治安。

纪念仪式中没有散发任何共产党的传单。

档案号：V38-2-929-085~088

昨天，值孙逸仙诞辰周年纪念日之际，工厂、学校悬挂彩旗，工厂的工人照常上班。

档案号：V38-2-929-089

28年11月13日

昨天，值孙逸仙诞辰周年纪念日之际，上海兵工厂的工人以及码头工人放假。

档案号：V38-2-929-090

11. 1929年3月11日

29年3月11日

3月12日是孙逸仙逝世周年纪念日。为此，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

[1] 下午在总商会演讲者分别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宣传部长陈德征、市指导委员冷欣、市妇女协会代表陈振权。

部下令：

- 1) 上海特别市所有的机关、学校和工厂将一律关门。
- 2) 所有的办公机关、学校和商店将降半旗。
- 3) 上海的人民群众将在上午 10 时默哀三分钟。
- 4) 上海各法定社团的代表将于上午 9 时在南市国富路的新普育堂内召开纪念孙逸仙大会。
- 5) 下午 2 时将在闸北中山路植树, 以纪念这一日子。

档案号: V38-2-929-084

12. 1929 年 3 月 12 日

29 年 3 月 12 日

今天 3 月 12 日是孙逸仙逝世 4 周年纪念日。上海特别市国民党机关(林荫路)将与当地各法定社团的代表一起于今天上午 10 时在南市国富路的新普育堂举行例行仪式进行纪念。

各政治、军事组织、各学校和工厂放假一天。

今天下午将在闸北的中山路进行植树活动。

档案号: V38-2-929-083

13. 1929 年 3 月 13 日

昨天上午 9 时, 在南市国富路的新普育堂举行了一个纪念孙逸仙的例行仪式。纪念仪式由宣传处处长、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委员陈德征主持。出席仪式的有中华邮政总办林实、社会局局长潘公展、特派交涉员金问泗、公安局局长黄伯樵、国民党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范争波、钮长铸、邓通伟以及一些学生和工人(总共约两千人左右)。

纪念仪式的安排如下：

- 1) 奏乐；
- 2) 向国旗、国民党党旗和孙逸仙遗像致敬；
- 3) 由陈德征恭读孙逸仙遗嘱；
- 4) 默哀三分钟；
- 5) 由朱炎之和钮长铸敬献花圈；

6)由陈德征读贺词。

会上高呼下列口号：

誓遵总理遗教、取消不平等条约、扑灭中国共产党、肃清一切反动势力、努力训政建设、完成国民革命、拥护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理精神不死、三民主义万岁、中国国民党万岁、中华民国万岁。

大会于10时15分结束。

约20名中国警察局的武装警察确保纪念仪式的秩序维持。

昨天上午9时50分，中国海军一百人左右在南市中国海军司令部举行例行的纪念孙逸仙的仪式。纪念仪式由中国海军代总司令陈季良主持。

陈季良恭读了孙逸仙的遗嘱，全体人员向已故国民党创始人的遗像致敬。

仪式在11时结束。

档案号：V38-2-929-080-082

14. 1929年4月20日

29年4月20日

蒋介石于3月26日派出以孙逸仙的儿子孙科和国民政府委员李济深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西山（北京）碧云寺，以便将孙逸仙遗体通过北京—天津—浦口线运送到南京。^[1]

档案号：V38-2-929-079

15. 1929年5月11日

29年5月11日

北平政治分会前主席张继本月9日前往泰安（山东）与山东省政府主席陈调元就某些十分重要的问题进行讨论。张于本月10日从泰安回到南京，与蒋介石就孙逸仙遗体迁移至南京的有关事宜进

[1] 时孙科正在南京参加国民党三大第十三次会议，而李济深则被蒋介石软禁于汤山。

行商议。

档案号：V38-2-929-078

16. 1929年5月21日

29年5月21日

孙逸仙的遗体迁移仪式将不会推迟。

灵柩将于本月25日晚运离北平。

档案号：V38-2-929-077

17. 1929年5月22日

29年5月22日

蒋介石因不能前往北平，指定了蒋锄欧作为中央政府的代表出席孙逸仙遗体迁移到新首都的仪式。蒋将于今天离开南京。被指定担任奉安总指挥的何应钦因正在出差，由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代替。

南京特别市政府发出通告，要求各组织、商行、银行等从5月26日至6月1日降半旗，并命令所有娱乐场所关门停业。

1号中午12点南京将停止一切活动3分钟，市民在同一时段默哀3分钟。

档案号：V38-2-929-077

29年5月22日

本月23日上午10时，孙逸仙的遗体将被安放到铜棺中。现在美国医生史蒂文斯（STEVENS）正在（北平）碧云寺负责做准备工作。仪式将在那里举行。

档案号：V38-2-929-076

18. 1929年5月24日

29年5月24日

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第一分部成员将于本月27日中午12时在位于南市中华路上的少年宣讲团举行舞台演出。

由国民党特别市党部散发的关于孙逸仙奉安大典的海报于本月26日张贴在位于霞飞路923号的上海法政大学的大厅内。

档案号：V38-2-929-075

19. 1929年5月28日

29年5月28日

商务印书馆工会的DAI-HOEI-ZIANG、报界工会的WANG-TSONG-GNEU、旅栈轮埠车站招待员工会的TSANG-YAO-MING、英美烟厂工会的KOU-ZAH-FANG以及邮务工会的ZING-KING-ZE由国民党市党部出资，于昨晚动身去南京参加孙逸仙的奉安大典。

档案号：V38-2-929-072

杭州委员会各宣传小组昨天下午2时抵达上海。他们在南市散发宣传孙逸仙学说的传单。

由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和浙江、江苏省党部组成的宣传列车于本月25日离开杭州，于昨天抵达上海。

昨天14时国民党市党部一区党部在少年宣讲团所在地召开会议，欢迎从杭州前来上海的宣传员。百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由上海国民党一区党部宣传处处长朱鉴清主持。会上向孙逸仙遗像、国旗和国民党党旗三鞠躬；总理奉安委员会第三宣传处处长黄濬及该宣传处成员KOU-DANG、ZENG-TSENG、DAO-PAH-TSOUT、SENG-LOH-DANG和WANG-ZENG在会上作了关于革命的演说。^[1]

整个活动在17时30分结束。

国民党闸北六区党部决定于今天上午在更新舞台欢迎从杭州来的宣传员。

档案号：V38-2-929-073~074

[1] 是日在会上演讲的分别是黄濬、刘百川、郑震宇、程子敏、陈侃、孙乐陶。

29年5月28日

住在拉法耶特·泰拉斯70号拉法耶特公寓17号房间的中国驻日公使汪荣宝和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乘坐上海丸轮船从日本前来参加孙逸仙的奉安大典,于昨天下午2时20分抵达上海。

外交部驻沪办事处主任陈世光、日本驻沪总领事重光葵以及北京的日本公使馆一位随员都在汇山码头迎接他们。

档案号: V38-2-929-071

29年5月28日

暨南大学约300名学生于昨夜12时出发去南京参加孙逸仙的奉安大典,该校位于沪宁线上的真如。

档案号: V38-2-929-070

20. 1929年5月29日

29年5月29日

值孙逸仙先生遗体迁移之际,约500人参加了昨天上午9时30分在位于闸北蒙古路19号的更新舞台召开的宣传大会,与会者中有闸北“Bei-Zeng”学校和“Dao-Tseng”学校的学生。

在会上,主持大会的宣传委员会成员江季子、姜怀素、(周)永年发表了讲话,会上高呼了下列口号:

- 1) 打倒帝国主义者,
- 2) 支持中央政府,
- 3) 打倒军阀,等……

纠察队由上海国民党童子军、闸北志愿者及公安局警察来担任。

全部活动于12时40分结束。

没有任何值得报告的事件。

档案号: V38-2-929-068-069

29年5月29日

运送孙逸仙灵柩的专列于昨天上午10时55分进入浦口火车站。

国民政府各委员会全体成员在灵柩前三鞠躬，并默哀三分钟。

档案号：V38-2-929-066

29年5月29日

中午12时，当灵柩被运送到威胜舰上时，所有外国船只均鸣21响礼炮。

12时10分，当威胜舰抵达下关后，灵柩被安放到专门的灵车上，并被送往国民党中央党部所在地。孙逸仙先生的遗体将在那里停放3天。

档案号：V38-2-929-067

29年5月29日

昨天零点40分宣传列车驶离北站，前往昆山。

档案号：V38-2-929-065

21. 1929年5月31日

巡捕房

警备队

电话：W 4505

副警探亨利（HENRI）致

警备队队长

夏泽尔（CHAZELLE）先生

我很荣幸地向您汇报，所附单子上提到的所有舞厅都被要求在孙逸仙先生国葬时关门停业。银龙（Silver Dragon）今天将关门，至于朱葆三路上的机构（指舞厅），都表示要继续营业的意愿。

孔雀东华（Peacock Orient）也表示，它仍将开门营业。

档案号：V38-2-929-060

上海，1929年5月31日

巡捕房

警备队

第三分队

明天孙逸仙先生奉安大典之际关门停业的公共娱乐场所

大世界 (Grande Monde)

共舞台 (Théâtre Touranne)

新开河影剧院 (Théâtre Cinéma Place de Chateau D'Eau) ^[1]

吉祥街中华大戏院 (Cinéma Rue Petit)

恩派亚影戏馆 (Empire Théâtre)

里维埃拉电影院 (Cinéma La Riviera) ^[2]

逸园 (Canidrome)

安乐宫西饭店 (Palais-Café) (现已不再营业)

第一咖啡馆 (Premier Café) ^[3] (舞厅不复存在)

可能照常营业的娱乐场所：

孔雀东华 (Peacock Orient) (电影院)

派利西饭店 (Plaza Hotel) (舞厅)

朱葆三路上的舞厅 (查尔斯顿 [Charleston]、大都会 [Métropole]、阿尔卡法尔 [Alcafar])

哈迷斯敦马戏团 (Cirque Harmston)

欧洲人的公共娱乐场所将照常开门营业

档案号：V38-2-929-061

风化大队3号副监察员提供的报告

因孙逸仙先生国葬，下列场馆（娱乐场所）将于明天6月1日关门停业。

招牌

东南大戏院

地址

法华民国路71号

[1] 中文名不详。

[2] 中文名不详。

[3] 中文名不详。

中华大戏院	吉祥街 105 号
恩派亚影戏馆	霞飞路 81 号
共舞台	郑家木桥街
“Vi-Yang” Camponais 剧场	安纳金路 62 号
“Ze-Yi-Leu” 歌厅	公馆马路 416 号

所有其他场馆在上述日子不打算关门停业。场馆名称和地址如下：

<u>招牌</u>	<u>地址</u>
“Vé-Li-Tseng” 歌厅	小东门大街 6 号
“Long-Zi-Leu” 歌厅	法华民国路 17 号
“一乐天” 歌厅	贝当路 973 号
“得意楼” 歌厅	徐家汇路 151 号
Camponais 剧场	菜市路 437 弄 25 号
“爱庐” 书场	敏体尼荫路 206 号
“雅庐” 书场	格洛克路 48 号
“Gni-Ou-Leu” 书场	喇格纳路 54 号

3 号副监察员汇报说, 这些场馆今天 1929 年 6 月 1 日将关门停业。

档案号: V38-2-929-062

上海, 1929 年 5 月 31 日

巡捕房

警备队

第三分队

明天孙逸仙先生奉安大典之际关门停业的公共娱乐场所

大世界

共舞台

新开河影剧院

吉祥街中华大戏院

恩派亚影戏馆

里维埃拉电影院

V38-2-929-063

上海, 1929年5月31日

巡捕房

警备队

第三分队

情况通报

政治局势

昨天早晨7时在西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举行纪念五卅惨案四周年大会。国民党各区党部以及各工会组织约150名代表出席纪念大会。会议由国民党市党部宣传部长陈德征、国民党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钮长铸以及社会局局长潘公展主持。会上为5月30日死难英雄默哀三分钟,并向国旗、国民党党旗及孙逸仙遗像三鞠躬。

大会最后决定致电外交部,请求它就南京路事件与有关当局开始谈判。

会议在早上8时30分结束。

档案号: V38-2-929-064

22. 1929年6月1日

上海, 1929年6月1日

巡捕房

警备队

第三分队

情况通报

政治局势

今天,6月1日,是孙逸仙先生遗体落葬的日子。(市)军政机关以及国民党(市)党部将于今天上午九时在位于南市国富路的新普育堂的会议厅举行仪式。应邀参加仪式的有行政机关和各工会的代表。其他组织已接到通知,获准纪念孙逸仙先生,但明确禁止开大会,禁止游行和发表演说。

我们获悉,商务印书馆的职工今天不上班,租界的绝大多数剧场关门。

档案号: V38-2-929-059

23. 1929年6月3日

1929年6月3日

本月1日上午九时,(市)军政机关及国民党(市)党部在南市国富路的新普育堂的会议厅举行了纪念孙逸仙先生的大会。国民党(市)党部代表范争波、施公猛、海军司令部的ZENG-TSE、社会局的郭永熙、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王之南、上海总商会改组委员会的KOU-CHING-YI和国民党各区党部、各组织及各工人工会的代表约400人出席了纪念仪式。纪念大会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代表施公猛、范争波、市政府代表奚鸿鈞、社会局代表郭永熙和上海总商会改组委员会代表KOU-CHING-YI主持。在纪念仪式上默哀三分钟,向孙逸仙遗像和国旗三鞠躬,并由施公猛发表了关于革命历史的讲话。

纪念仪式于上午9时45分结束。

没有任何值得报告的事件。

档案号: V38-2-929-057

24. 1929年6月4日

1929年6月4日

昨天上午将近8时30分在霞飞路929号的上海法政大学附属中学举行了一个纪念孙逸仙先生的仪式。约三十名大学生出席了纪念仪式。GNI-KUIN教授主持仪式,他追述了孙逸仙先生的生平,并向与会者介绍了张学良^[1]被英国士兵杀害的情况。

会议于9时结束。

昨天上午11时在位于金神甫路450号的上海法政大学大礼堂举行了一个纪念孙逸仙先生的仪式。仪式由TSU-TSANG-PAO教授主持,约90名该大学的学生出席纪念仪式。没有什么值得报告的重要情况。

档案号: V38-2-929-056

[1] 张学良系沪西新嘉坡路一53岁的老虎灶主,1929年5月19日其子被英兵欺负,张学良赶往营救,被英兵殴伤毙命。

25. 1929年7月13日

1929年7月13日

北京青年和各商会要求将首都重新迁到北京。蒋介石召见上述商会代表并告诉他们，南京是孙逸仙遗嘱中规定的首都。他要求他们停止活动。

档案号：V38-2-929-047

26. 1929年9月9日

上海，1929年9月9日

巡捕房

警备队

政务室

上午的分析

中国报刊摘录

新闻

《新晚报》

9月9日的节日

最大的城市上海的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将于今天上午9时在它位于西门的所在地举行会议，纪念孙逸仙在广东举行的第一次反满清政府起义35周年。

档案号：V38-2-929-048

27. 1929年9月10日

上海，1929年9月10日

巡捕房

警备队

第三分队

情况通报

政治局势

昨天上午9时在西门林荫路的国民党市党部内举行了纪念孙逸仙

第一次革命起义 55 周年的仪式。

200 名当地各组织的代表出席了纪念仪式。

在纪念仪式中，向国旗、国民党党旗和孙逸仙遗像三鞠躬并默哀三分钟。

主席陈德征以及施公猛、HSU-SHING-TSOU 等详细讲述了孙逸仙先生第一次革命运动的沿革。

会上高呼下列口号：

“打倒帝国主义者”。

“废除不平等条约”。

会议于 11 时结束。

档案号：V38-2-929-046

28. 1929 年 9 月 24 日

上海，1929 年 9 月 24 日

巡捕房

警备队

第三分队

情况通报

政治局势

昨天，本月 23 日，南京举行了一个纪念孙逸仙的仪式。仪式由蒋介石主持。约 400 名国民政府及南京各行政机构的要人出席了仪式。

在大会期间，蒋声明：

“有传闻说国民政府处境不利，改组派十分活跃，说我不日之内将退出政坛。这个谣言是由被国民党左翼分子收买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散布的，而我呢，我决心不抛弃政府。我不是留在政府中，就是去死。”

档案号：V38-2-929-044

29. 1929 年 10 月 12 日

上海，1929 年 10 月 12 日

巡捕房

警备队

第三分队

情况通报

政治局势

昨天上午10时在位于西门林荫路的国民党机关所在地^[1]3楼举行了一个纪念孙逸仙的大会^[2]。会议由陈德征主持。约二百人出席了大会。会议期间就孙逸仙1896年在伦敦被捕一事并就中国革命进行了座谈。

会议在11时30分结束。

档案号：V38-2-929-043

30. 1929年11月13日

29年11月13日

昨天上午10时，在国民党机关所在地举行了一个纪念孙逸仙先生的仪式。仪式由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委员陈德征主持。约200人（地方政府、社会局、国民党及当地各组织的代表）参加了纪念仪式。

在纪念仪式中，与会者向国旗、国民党党旗和孙逸仙先生的遗像三鞠躬。（会议）主席发表了关于革命历史的讲话。

散会时大家高呼下列口号：

打倒军阀冯玉祥，消灭改组派和共产主义者。

废除不平等条约。

三民主义万岁。中华民国万岁。

仪式于11时30分结束。

档案号：V38-2-929-042

31. 1935年8月17日

1935年8月17日

内务部禁止商人使用带有孙逸仙先生名字的商标

内务部16日向地方政府下令，命令地方政府敦促商店和工厂不

[1] 指国民党上海市党部。

[2] 即孙中山伦敦蒙难34周年纪念大会。

得再使用带有孙逸仙先生名字的商标。该命令还指出,中国产品将同时禁止使用外文商标。

档案号: V38-2-929-040

32. 1935年11月4日

1935年11月4日

孙逸仙先生诞辰周年纪念日

11月12日将是孙逸仙先生诞辰周年纪念日。市党部将召开由当地各组织代表参加的会议。

档案号: V38-2-929-039

33. 1935年11月8日

1935年11月8日

孙逸仙先生诞辰周年纪念日

11月12日,值孙逸仙先生诞辰周年纪念日之际,市党部决定于上午10时在南市文庙路215号的民众教育馆召开会议。已要求当地各组织派代表出席这次会议,并在各自机构所在的建筑物上悬挂彩旗。学校、工厂和政府机构将于这天放假一天。

档案号: V38-2-929-038

34. 1935年11月13日

1935年11月13日

孙逸仙先生诞辰周年纪念日

12日,值孙逸仙先生诞辰周年纪念日之际,市党部于10—11时在南市文庙路215号的民众教育馆召开了一个纪念大会。

170名当地各组织的代表出席了大会,主持会议的市党部代表黄造雄^[1]先生在会上赞扬了孙逸仙先生。

随后与会者高呼下列口号:

[1] 时任上海教育会会长。

1. 孙中山先生精神万岁。
2. 继承孙中山先生的未竟事业。

档案号：V38-2-929-037

35. 1936年3月13日

1936年3月13日

孙逸仙先生逝世周年纪念日

昨天全国都为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逸仙先生逝世的周年纪念日举行纪念活动，孙先生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

在首都收到了关于在长沙、南昌、安庆、汉口、兰州、苏州等城市举行的纪念仪式的详细报告。

在南京，8 000人参加了在中山陵举行的纪念仪式。纪念大会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先生主持，考试院长戴季陶先生发了言。他回顾了已故总理的生平，并鼓励与会者继承他的建设事业（中央社）。

北京将12日这一天宣布为假日。学校关门并降半旗（中央社）。

档案号：V38-2-929-035

36. 1936年11月13日

1936年11月13日

孙逸仙先生诞辰周年纪念日

11月12日全中国庆祝了孙逸仙先生诞辰71周年纪念日。

在南京，纪念仪式于上午8时在中山陵举行。数百名官方人士出席了纪念仪式，其中有林森主席、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冯玉祥将军、立法院副院长叶楚伦先生、军政部长何应钦将军、内政部长蒋作宾将军等。

在洛阳，数千人参加了纪念仪式。蒋介石将军在纪念仪式上发了言。最高统帅叮嘱大家，特别是叮嘱大学生们，要为救国而加倍努力。

在广州，6 000人出席了纪念仪式。

值此孙先生诞辰周年纪念日之际，国民政府在11月12日向752名官员、军官和国民党党员授予勋章。立法院院长孙科先生、司法院院长居正先生、考试院长戴季陶先生、监察院长于右任先生、行政

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博士、立法院副院长叶楚伦先生、司法院副院长谭振先生、考试院副院长纽永建先生、监察院副院长许崇智将军、宣化活佛章嘉呼图克图、西藏活佛班禅喇嘛、全国建设委员会主席张静江先生、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博士、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宋子文博士获得一等采玉勋章。

授予二等勋章的有：实业部长吴鼎昌先生、前铁道部长顾孟余先生、铁道部长张嘉璈先生、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先生、蒙（蒙古）藏（西藏）事务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先生、司法行政部长王用宾先生、最高法院院长焦易堂先生、铨叙部长石瑛先生、审计部长林云陔先生等。

宝鼎勋章授予总参谋长程潜将军、训练总监部总监唐生智将军。

一等云麾勋章授予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将军及第三路军总司令兼广东大元帅司令部参谋长陈诚将军。

还有众多人士被授予北伐纪念章。

据中央社消息，蒋介石夫人获得三等云麾勋章，上海市长吴铁城将军获得了三等采玉勋章，上海中国银行公会秘书长林康侯先生获四等采玉勋章，上海市公安局长蔡劲军将军获四等云麾勋章，淞沪卫戍司令部司令杨虎将军获三等云麾勋章。

档案号：V38-2-929-033

37. 1937年5月15日

1937年5月15日

韦玉先生逝世

中央社5月14日从广州报道说，孙逸仙先生的前（法文）秘书韦玉先生于5月12日在香港去世，享年56岁。

档案号：V38-2-929-024

38. 1937年6月1日

纪念孙逸仙先生落葬八周年

1937年6月1日

6月2日将在南京纪念孙逸仙先生落葬八周年。中央执行委员会

和监察委员会委员将前往中山陵祭奠孙先生。

档案号：V38-2-929-023

39. 1937年6月17日

纪念孙逸仙逝世15周年

1937年6月17日

16日上午9时在国民党中央所在地南京举行了孙逸仙先生逝世15周年纪念仪式。700多人出席了纪念仪式。

司法院院长居正先生主持了大会，他回顾了孙逸仙先生1925年的不幸逝世。

16日上午在市党部^[1]也举行了纪念活动。

纪念仪式于10时开始。200多名当地方组织的代表出席了这一纪念仪式。

档案号：V38-2-929-022

40. 1939年3月10日

N° 881 / SP. 1

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上海，1939年3月10日

给警卫部与治安部部长的公务通知

中国报纸今天早晨发表了市党部为12号这个日子制定的计划安排，该计划包括悬挂彩旗。

市党部已被解散，因此它违反了1937年9月2日的领事条例。

该组织利用其成员在外国租界中找到的藏身处和靠山来达到政治目的，这是不能容许的。

请您务必采取必要措施阻止悬挂彩旗，悬挂彩旗无论如何都不能被视为一种自发的行动。

法国总领事

[1] 指国民党上海市党部。

签名：Marcel BAUDEZ^[1]

档案号：V38-2-929-013

41. 1940年3月13日

上海，1940年3月13日

警务处

政治科

报告

事由：在纪念孙逸仙先生逝世15周年之际散发的、署名为国民党原上海市党部的亲民族主义传单

主题词：地方党部

政治性周年纪念日

此附一份传单的译文，该传单鼓励上海民众遵循孙逸仙先生的原则，恢复中国独立、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

此传单署名为原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按照官方的说法，该机关现已不存在，但是其先前的成员继续在上海秘密进行活动。

一些传单昨天已通过邮政途径寄往租界的大部分中国学校，其他少量的张贴在马路的墙壁上和电线杆上。

档案号：V38-2-929-008

V38-2-929-126

亲爱的上海同胞：

任何一个爱国者都不会忘记孙逸仙先生逝世的周年纪念日，尤其是在抗战进行了两年零六个月后的今天更不会忘记这个纪念日。

孙先生所确定的目标是要把中国从满清专制的手里争回来，使中国从军阀和帝国主义手中摆脱出来。孙先生奋斗了四十余年。因此为了纪念这个日子，我们应当走复兴和抵抗之路。

当前中国人民正经历着一场空前的民族危机。如果孙先生还活

[1] 中文名鲍黛芝。

着的话,他定当更加坚信必须继续抗战,而且,只要中国尚未获得领土完整和独立,抗战将永远不会停止。孙先生的目标是“救中国”,也就是说,永远不向一切侵犯中国领土的敌人屈服。不管怎样,我们应当始终遵循孙先生的原则,因为遵循孙先生的原则就是对他逝世周年紀念日的紀念。

孙先生热爱和平,但是这是一种体面的和平。此外他希望通过斗争来获得这种和平,因为他知道:经过斗争获得的和平是一种真正的和平,而妥协换来的和平是一种可耻的和平。

我们坚信,日本怀有侵略中国的野心已有几十年了。我们以抵抗进行回击,我们的抵抗必将取得最终的胜利。

亲爱的同胞,全民族的抵抗运动一定会胜利。然而越是接近胜利,困难越大。我们唯有遵循孙先生的原则才能对付这些困难;我们的工作也将会变得轻松。

起来,大家起来!把侵略者赶出我们的国土,把他们豢养的叛徒统统消灭掉。^[1]

签名: H. BOUFFANDEAU

[1] 1940年3月12日,《申报》刊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告民众书”,原文如下:“亲爱的全市市民同胞们:每个有知觉、有思想、有血、有泪的人们,决不会忘记这哀痛而庄严的总理逝世忌辰,尤其在抗战了两年又六个月后的今天,必更加深一重悲愤,填塞住每个人的心胸。总理一生的工作和目标,是要把中国从满清专制的手里争回来,最后则从帝国主义的手里救回来。由赤手空拳开始,奋斗了四十多年,乃至弥留之际,一息仅存的几分钟内,还不断喘息着发出‘救中国’的呼声。我们纪念今日,缅想当时,怎得不令人可歌可泣,由颓废而兴奋,由愁苦而激昂,并且更英勇、更坚决的踏上抗战建国的途程。现在中华民族正遭着亘古未有的灾难,中华民国正受着空前的惨痛,倘使总理还健在的话,他必然更坚的领导我们一致抗战,一直到土地主权完整独立为止。总理一生奋斗的目标是‘救中国’,是对外求国际上之平等,对于蹂躏中国国土、奴隶中国的敌人,他是绝对不妥协不投降,自然更不会被软化的。而抗战正是遵循总理遗教,同时,抗战也就是国民革命的继续,是争取国家独立自由的过程,每个纪念总理的人们,都应该切实把握住这一个信念,更知道完成总理遗志,才是纪念总理最好的方法。总理爱和平,然而不是屈辱的和平。总理一生的历史充溢着奋斗的精神,他是要从奋斗中求得真正的和平,也惟有用奋斗得来的和平。我们承认日本储蓄国力有几十年,也承认日本阴谋侵略中国有几十年。然而我们的抗战到底发动了,并且深信抗战必得到最后胜利的。我们所信的根据很简单,因为这正和总理当初毫无凭借的倡导革命,而终能推翻清室、建立民国的理由是一样,总理所恃以成功的是领袖的才能、奋斗的精神、坚决的信念、鲜明的主义、时代的背景和全民的支持和同情。抗战所恃以必胜的,除全部继承总理开国的规模外,还再加上列祖列宗艰难缔造,所遗留下的广大国土和无尽宝藏两种优越无比的条件,我们如果怀疑抗战前途那就等于否认总理开国的历史,果真存有这样疑念的人,非愚即妄,在这纪念总理忌辰的日子,必需一番澈底的猛省。亲爱的全市市民同胞们,抗战的前途是绝对光明的,然而越是接近胜利,越多艰苦。惟有坚持总理遗教,效法总理精神,才能扫除一切障碍,克复任何困难。”

副 本：

我们的 1

2

3

4

5

6

档案号：V38-2-929-009

V38-2-929-127-128

42. 1940年11月9日

机密

司令部特别分部

1940年11月9日

已故孙逸仙先生诞辰日暨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地区日——11月12日

11月12日是已故孙逸仙先生诞辰日，当地中国民众打算升国旗庆祝这一纪念日。

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地区也适逢这一天^[1]，但没有迹象表明当地民众要借此机会举行集会或进行宣传活动。当地学校将关门，学生将放假。

分送

长官

D.C. (Divisions)

D.C. (Crime)

D.C. (A. & T.R.)

D.C. (Specials)

A.C. (Traffic)

[1] 1937年11月12日，中国军队全部撤离上海，日军攻入南市区，上海失陷。

D.O.s

D.D.O.s

O i/c Districts

Reserve Unit 预备役部队

U.S. Marine Corps 美国海军陆战队

Italian Marines 意大利海军陆战队

French Police 法国警察

档案号: V38-2-929-007

43. 1942年2月5日

上海, 1942年2月5日

第51号

领事命令

我, 法国驻上海总领事, 骑士级荣誉勋位勋章获得者, 马杰礼 (Roland de Margerie), 根据上海法租界公董局组织章程第13条, 命令:

第 I 条 宣布下列日子为法租界的假日:

1月1-2日	元旦
2月16、17、18日	中国新年(春节)
3月12日	孙逸仙逝世周年纪念日
4月6日	复活节后的星期一
5月1日	劳动与社会和平节
5月5日	广州革命政府成立日
5月14日	耶稣升天节
5月25日	圣灵降临节后的星期一
7月14日	法国国庆节
8月15日	圣母升天节
10月10日	中国国庆节
11月1日	诸圣瞻礼节
11月12日	孙逸仙诞辰周年纪念日
12月25-26日	圣诞节

第Ⅱ条 废除1941年4月24日第134号领事命令。

1942年2月5日于上海领事府邸

法国总领事

签名：R. de MARGERIE

抄件证明与原件相符。

上海，1942年2月5日

副领事

签名：J. BEAUROY

档案号：V38-2-929-002

（译注者朱玖琳为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研究室副研究员，

译者徐世熙为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

宋庆龄致牛恩美函(1962—1980)

郑培燕 李纯涛 译注

[编者按]

宋庆龄表侄女牛恩美女士现旅居美国。2013年8月,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研究室工作人员朱玖琳与回国探亲的牛女士建立了联系,牛女士当时提供了若干牛家史料,这些史料有助于推动宋氏家族早期历史的研究,尤其是宋庆龄诞生地的研究。牛恩美女士于当年10月再次回国时,带回来31封宋庆龄写给她的信。这31封信件中,头3封是英文打字件,由宋庆龄亲笔签名;第4封中文信件系宋庆龄秘书遵照宋庆龄嘱咐致牛恩美函;之后的信件除1978年11月15日、12月8日、12月25日的中文信为宋庆龄秘书张珏代笔外,其余均为宋庆龄亲笔手写的英文信件。牛女士同时带回的还有宋庆龄给她的7张贺卡和6张名片。目前,这些信件、贺卡和名片均由宋庆龄陵园管理处代为保管。

1. 1962年1月20日

Jan.20, 1962

Dear Cousin En Mei:

Thank you for your letter. I am very glad to learn of your new happy life, and that your dear Mother's health is improving under good medical attention, and hope that she will soon be able to rejoin you.

I am here on urgent duty for a few weeks but am afraid will not be here when your Mother returns.

Affectionately yours,
Soong Ching Ling

1962年1月20日

亲爱的恩美表妹[侄女]^[1]：

感谢你的来信。非常高兴得知你幸福的新生活，以及你亲爱的母亲^[2]的健康状况也在良好的医疗照料下正趋好转，希望她不久就能和你团聚。

我在此尚需几周时间处理紧急事务，但恐怕到你母亲回来时我已不在这里了。

挚爱你的，

宋庆龄

2. 1962年2月3日

Feb.3, 1962

Dear Cousin En-Mei:

Many thanks for your thought of me. The pot of greenery will be a lovely table decoration for a long time.

I am sending you this rather interesting automatic calendar which has just arrived from HK, and wish to share with you some New Year cakes and sweets. If I did not have a severe cold and cough I would have invited you to spend some time with me during the holidays, but hope I may see you before long.

Wishing you a very joyous spring holiday, and please give my warmest regards when you write to your Mother.

Affectionately yours,

Soong Ching Ling

1962年2月3日

亲爱的恩美表妹[侄女]：

非常感谢你想到我。这盆绿色植物会作为可爱饰物在我桌上放很长时间。

我送你一个刚从香港收到的相当有趣的自动日历，也希望和你一起分享那些新年蛋糕和甜点。要不是得了严重的感冒和咳嗽，我会邀请你在春节里来和我共度一些时光，但我希望不久就能见到你。

[1] 牛恩美 1933 年出生，比宋庆龄低一个辈分，是宋庆龄表哥牛惠霖（1889—1937）的大女儿，应为表侄女。

[2] 即刘义基（1897—1989），英文名凯瑟琳（Catherine）。1962 年赴美定居，1981 年回国安度晚年。

祝你春节快乐,并请你在致信你母亲时,转达我最热切的问候。

挚爱你的,

宋庆龄

3. 1962年3月6日

Dear Cousin En-Mei:

Your wedding gift has taken a long time to arrive, but I am glad that it came during my stay here or it would have to wait some more months for me to send to you! I hope that you will enjoy using this bathroom set, along which goes my heartiest wishes for your happiness.

My state of health prevented me from seeing those I wish this time, but hope upon my next trip home, I shall be able to see you and your Mother, who, I hope, is in better health now.

With all good wishes.

Your affectionately,

Soong C.L.

March 6, 1962

亲爱的恩美表妹[侄女]:

给你的结婚礼物花了很长时间才送到,好在送来的时候我还在这里,否则我得等上好几个月才能把它送给你。希望你会喜欢这套卫浴用品,它也带去了我对你幸福生活的衷心祝愿。

这一次我的健康状况让我无法见到我想见的人,希望下次回家时,能见到你和你母亲,期望她现在身体好些了。

致以一切美好祝愿。

挚爱你的,

宋庆龄

1962年3月6日

4. 1963年3月12日^[1]

牛恩美同志:

承你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三十八周年纪念日送给宋副主席花篮一

[1] 原件为中文。

只,宋副主席十分感谢你对中山先生的怀念,特囑函致谢意。

专达 并致

敬礼

宋庆龄副主席住宅秘书室

1963年3月12日

5. 1969年10月

Dear En-mei:

As you must be back from 下乡, I wish to congratulate you heartily on the addition of a baby to delight your family. I request Cousin Chester to forward you 100元 to buy what you need for yourself & baby, since I am not able to send you anything at this time.

Have you heard from your mother and is your Aunt 惠珍 still living in Long Island? Hope you will give me some news of the home folks as I cannot correspond with any of them. I've only heard that my beloved third brother Tse An died recently in Hong Kong (from the friends).

With much love to you and your mother.

Aunt SCL

Oct. 1969

亲爱的恩美:

你一定已经下乡回来了,我要衷心地祝贺你添了一个让你全家欣喜的宝宝。我请切斯特^[1]表弟带给你100元钱,买些你自己和宝宝需要的东西,因为现在我无法送你任何东西。

你有你母亲的消息吗?还有你惠珍^[2]姑姑还住在长岛吗?希望你能告诉我一些家人的消息,因为我无法与他们任何一个人通信。我只(从朋友们那里)听说我心爱的三弟子安最近在香港去世了。

向你和你母亲致以亲切问候。

姑妈SCL

1969年10月

[1] 即宋庆龄舅舅倪锡纯(1881—1932)的长子,中文名倪吉士(1914—1996)。

[2] 即牛惠霖的小妹妹牛惠珍(1898—1999)。

6. 1970年11月20日

20 XI

Dear En Mei:

Thank you for your letter which Chester kindly forwarded. I am glad to know you have rec'd the 钴源 for treating cancer patients. Cousin 惠珠's daughter-in-law may now be treated, but, as you must know, there is no medicine yet for curing cancer, only to prolong the patients' life a little longer. I am sorry that I had never met your brothers, cousins and other relations. But should they be in need of help which I can render, please let me know.

It is a relief to know your savings & clothings have been turned back to you for the weather is dreadfully cold this year. We are having 刮风 and the thermometer keeps dropping that by nightfall, we may be 10 degrees below zero.

Take good care of your health.

Affectionately,

二姑

11月20日

亲爱的恩美：

感谢你由切斯特好意转送来的信。我很高兴得知你已收到用于治疗癌症病人的钴源。惠珠^[1]表妹的儿媳现在可以得到治疗了。当然你也肯定知道，目前还没有什么药物能够治愈癌症，只能稍稍延长病人的生命而已。我很遗憾从未见过你的哥哥们^[2]、表兄弟姐妹们以及其他亲戚。但如果他们需要帮助且是我力所能及的，请告诉我。

得知你的存款和衣物已经发还给你让我如释重负，因为今年的天气特别冷。我们这里正在刮风，傍晚开始气温不断下降，可能有零下10度了。

保重身体。

挚爱你的，

二姑

[1] 即牛惠霖的大妹妹牛惠珠（1895—1936）。

[2] 即牛恩美的哥哥牛恩安（1927—2010）、牛恩健（1931—2008）。

7. 1970年12月11日

Dear En Mei:

Thanks for your letter which Chester has just forwarded. I am glad that all are well. Hope I may have the pleasure of seeing you & your baby next year.

Meantime with best wishes to you & your family.

Affectionately,

二姑

1970-12-11

亲爱的恩美：

感谢你经由切斯特刚刚转送来的信。我很高兴（得知你）一切安好。希望明年能有机会见到你和你的宝宝。

向你和你的家人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挚爱你的，

二姑

1970年12月11日

8. 1971年11月13日

My dear En-mei:

I am very glad to hear from you and wish to thank you for remembering the dates that concern me. It was so good to receive your nice pictures taken at the 中山陵园. I am sure that you walked all the way up, despite the long steps. I have not been there for several years as my arthritic knees cannot climb so many steps and I would not like to use a sedan chair. You understand I'm sure.

It is good to know that your dear mother is in good health. I trust her eyesight has greatly improved after the operation.

May this find you and your family enjoying good healths!

Affectionately,

二姑

1971-11-13

亲爱的恩美：

收到你的来信我非常高兴，也感谢你记着那些我关注的日子。收到你在中山陵园拍的美妙照片真是太好了。我相信尽管台阶很长，你

还是拾级而上的。我已经好几年没去那儿了，因为我的关节炎让我无法爬上那么多的台阶，而且我也不喜欢坐轿子。我知道你能理解的。

获悉你亲爱的母亲身体健康，真好！我相信手术以后她的视力会有很大改善。

祝你和你全家身体健康！

挚爱你的，

二姑

1971年11月13日

9. 1971年底

Dear En-mei:

This is to wish you & your family a new happy 1972, and the best of healths. Aunt Kin-may has just returned from abroad and found all your folks in good healths. Owing to much reading, my eye are not so healthy as hitherto. There are white specks on my upper eyelids, so cannot do much reading, 8 hours a day now.

Come from 二姑母

亲爱的恩美：

祝你和你家人1972年新年快乐，身体健康。金梅^[1]姑姑刚从国外回来了，她得知你的家人们身体都很健康。由于阅读过多，我的眼睛至今都不太好。我的上眼睑上有白斑，所以不能做大量阅读，（尤其在）现在一天8小时（的阅读之后）。

二姑母 字

10. 1972年3月6日

My dear En Mei:

I am very glad to receive your letter and to hear about the coming settlement of your mother's property & deposit in the bank. It would be really wonderful if she would come back again for she is not considered a “战犯” like others of the family. If she were here, Jessie would not have committed suicide, which was such a tragedy.

It is not yet known when the 人大 will convene again. But after attendance, I

[1] 即温金梅（1902—1988），是宋庆龄小姨母倪秀贞的女儿，宋庆龄的表妹。

may request to return home for the dry, harsh climate is not suitable for my health.

Thank you for the picture of your son, who looks so healthy and cute.

When I return home next time I hope to see you all.

Meantime I send my best wishes, and the hope that this will find you in good health.

二姑母

1972-3-6日

亲爱的恩美：

非常高兴收到你的来信，并获悉你母亲的财产和银行存款的问题即将解决。如果她能再回来就真的太好了，因为她不像家里的其他人那样被当成“战犯”。如果她当时在这里，杰西^[1]就不会自杀了，这真是一个悲剧。

现在还不知道人大会有什么时间再召开。但是参会以后，我会要求回家，因为干燥恶劣的气候对我的健康很不利。

谢谢（寄来）你儿子的照片，他看上去健康又可爱。

下次回家的时候，我希望能见到你全家。

同时，致以最美好的祝愿，祝你们健康。

二姑母

1972年3月6日

11. 1973年1月4日

Shanghai

Jan 4, 1973

My dear En-mei:

Thank you for your letter. I do hope your dear mother will be able to return soon. There are some excellent eye-specialists in Peking who may prove to be better than those she consults.

I have been suffering from intense itches for about 2 years, as result from taking 24 tablets of terramycin (土霉素) to bring down a high fever. This sulfa drug is among those now forbidden by the U.S. Health Dep't to sell or manufacture, due to many casualties—death and heart troubles, after taking them. As you are a doctor I

[1] 即宋庆龄舅舅倪锡纯的女儿倪吉贞（1915—1968），1968年5月1日自杀身亡。

wish to warn you about this particular sulfa drug.

Here I am taking injections into my veins to expel the poisonous substances left by the terramycin tablets. Each injection requires 2 hours and half. After undergoing this treatment I feel too tired, so will not be able to receive any one. When I feel better, I shall let you know.

Your son's snapshot is very nice and healthy and I am sure he will be able to withstand the harsh winter we are having.

Wishing you and your family a very happy 1973.

Affectionately yours,

Aunt SCL

Please destroy this after perusal.

看后即销掉!

上海

1973年1月4日

亲爱的恩美:

感谢你的来信。我非常希望你亲爱的母亲能很快回来。北京有一些优秀的眼科医生,应该比她现在就诊的医生更好。

我已经被强烈的瘙痒折磨了快两年了,是服用了24片土霉素治疗高烧导致的。由于服用后造成的人身危害——死亡或者心脏方面的危险,这种磺胺药物现在已经被美国卫生部门列为禁止销售和制造的药物。因为你也是个医生,我希望提醒你注意这种特殊的磺胺药物。

我一直在接受静脉注射,来清除土霉素药片残留的毒素。每次注射需要两个半小时。在经历了这样的治疗之后,我觉得异常疲惫,无法接待任何人。如果病情有好转,我会告诉你。

你儿子的快照非常好,也很健康,我相信他能受得住这个严冬。

祝你和你全家1973年新年快乐。

挚爱你的,

姑妈SCL

看后即销掉!

12. 1976年3月17日

March 17, '76

My dear En-mei:

I am very glad to hear that your home has started repairing work and that you are occupied with works 大批判. Our hospital needs constant reminder of improving their service to the people.

I am at present undergoing diathermy treatments & massages for my backbone after the accidents, as well as my arthritic joints give me much trouble.

I hope you will excuse me for using this broad pen for the sake of my eyes. How is your mother? Can she see now after the operation? And how about your brother who wanted to come in?

May this find you & your family in good healths.

With much love.

二姑

1976年3月17日

亲爱的恩美：

获悉你们家的维修工作已经开始，你也正忙于大批判运动，我很高兴。需要不断提醒我们的医院提高他们为民服务（的水平）。

那次意外之后，我现在正接受电疗和脊椎按摩，我的关节炎也给我添了不少麻烦。

我希望你能原谅我用这种对我的眼睛有益的粗头笔写信。你母亲还好吗？动完手术后她眼睛能看见了吗？另外，你那位想回来的哥哥还好吗？

祝你和你全家身体健康。

致以亲切的问候。

二姑

13. 1978年3月8日

Peking

March 8, 1978

My dear En-mei:

Thank you for your letter. I was really exhausted by the frequent meetings, morning, noon and night even (to listen to 小组讨论). My 皮肤症 again flared up causing

intense itching and my face is swollen and red like a ripe tomato! After consulting doctors and rest up a while I shall hope to see you again in the near future.

Thank you for attending to my request regarding 永洁's 裤子. She has written down again her measurements and asks me to thank you for your kindness, but please remember not to get expensive material, for all the students wear ordinary materials.

With much love to you.

二姑

北京

1978年3月8日

亲爱的恩美：

感谢你的来信。我已经被频繁的会议搞得精疲力竭，从早晨、中午甚至晚上（都在听小组讨论）。我的皮肤病又发作了，导致强烈的瘙痒，我的脸又肿又红，像个熟透了的西红柿！咨询过医生并休息一段时间后，我希望能在不久之后再见到你。

感谢你为永洁裤子的事花费心思。她把她的尺码重新写了一下，并让我感谢你的好意，但请记住不要买昂贵的面料，因为所有的学生穿的都是普通面料。

向你致以亲切的问候。

二姑

14. 1978年3月26日

March 26, 1978

My dear En-Mei:

It was most kind of you to make this fine pair of trousers for 永洁 (or Jeanette). We never thought this would be possible in Peking! You are cleverer than all of us!

I am unable to go down stairs yet as my legs are still wobbly. The meetings at the congress were long and I had to get 永洁 to hold on to me to cross the long winding corridors each time. Perhaps you saw us on the television?

Herewith I am sending you some tins of food which will help you to supplement the tiresome food of the 北方食堂. Don't keep these please, as this weather is not good for storing food long.

As so on as I feel better, I shall ask the driver to come and fetch you home for a

change.

With much love.

Yours Affectionately,

二姑

1978年3月26日

亲爱的恩美：

多谢你为永洁（Jeanette）做了条很好的裤子。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在北京也有可能做到！你比我们所有人都聪明！

由于腿脚不稳我还是无法下楼。人大开会的时间很长，每次我都得靠永洁搀扶着我穿过那弯曲的长廊。也许你在电视上看到过我们俩？

随信送给你一些罐头食品，帮助你调剂一下北方食堂单调的伙食。请不要一直放着，因为这个气候下食物不适合长期存放。

一旦我感觉好些了，我会要司机开车接你来我家换换口味。

致以亲切的问候。

挚爱你的，

二姑

附：同日隋永洁致谢的字条

牛阿姨，

您好！非常感谢您代我做的裤子，裤子穿着非常舒服，也很合适，样子也非常好，再一次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

永洁

1978年3月26日

15. 1978年4月4日

Dear En-mei:

You need not be too excited by news of your relatives coming, for it will take time (September) just get 2 rooms cleaned up for them. They know how occupied you are with work.

I forgot to tell you to leave that bottle or jar of crab-apple jelly in a cool place, so it will not be spoiled. Take a big spoonful in a glass of cold water will give you a very

pleasant drink in the hot months, or spread it over your bread. This is made by a competent jelly maker. I feel you must get very hungry in Peking, where you are not accustomed to the northern food. The box of candy can stored for a longtime but not the jar of jelly.

So many American friends are coming to visit China, so I shall have a tiresome time, altho' I wish I could be allowed to rest instead from the long sessions recently.

With my love to you.

二姑

1978-4-4日

亲爱的恩美：

你不必为了你的亲戚们即将回来的消息而过于兴奋，因为（到9月）还有一段时间，为他们整理出两个房间就行了。他们知道你工作也挺忙的。

我忘了告诉你要把那瓶山楂果冻放在阴凉的地方，那样才不会变质。天热的时候在一杯冷水里放上一大勺果冻就能调成一份爽口的饮料，也可以把果冻涂在面包上吃。这是一个擅长做果冻的人做的。我觉得你在北京一定非常饿，因为你不习惯北方的食物。那盒糖果可以保存得长久一些，但那罐果冻不行。

那么多美国朋友要来华访问，所以我得忙累一阵子了，尽管我希望能从冗长的会议中抽身得到休息。

向你致以亲切的问候。

二姑

1978年4月4日

16. 1978年4月27日

April 27, 1978

Dear En-mei:

I am so glad you used that crab-apple jelly to make some nice drinks in the evening, for it contains vitamins. A good foreign neighbour has some crab-apple trees in her garden, so she preserves the fruits and serves it on toasts. She always remembers my "big family" who love to eat it on bread. As for that box of candy, it was given to 永洁 on her birthday. She was so grateful to you for the 呢裤 you had

made for her that she insisted upon presenting it to you.

I don't think people here would let you go to U.S. with your mother. If she comes, she had better fly via HongKong instead of Tokyo, as Cousin Kin May is there to help her in case of need.

There are some foreign friends coming to see me, so I am uncertain whether I shall be able to attend the CWT's 40th anniversary in Shanghai, shall let you know if I do go and bring you along if I go.

With love from me and the girls (永清&永洁)

二姑 SCL

1978年4月27日

亲爱的恩美：

我很高兴你晚上用山楂果冻调制了爽口的饮品，因为它含有维生素。一个很好的外国邻居在花园里有几棵山楂树，她把这些果子做成果冻涂在烤面包片上。她总是记得我的“大家庭”喜欢将它们涂在面包上吃。那盒糖果是给永洁的生日礼物。她非常感谢你为她做的呢裤子，所以坚持要将这盒糖果送给你。

我认为这里的人不会让你跟你的母亲一起去美国。她如果要来的话最好别从东京过来，而是取道香港，因为金梅表妹在那里，需要的时候可以提供帮助。

有一些外国朋友来看我，所以我不确定是否将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中国福利会40周年纪念活动。如果我去的话会告诉你并带你一起去。

致以姑娘们（永清和永洁）和我的问候。

二姑 SCL

17. 1978年5月11日

May 11th

My dear En-mei:

I am most sorry to inform you that I will not be able to attend the 中福会四十周年的庆祝会。届时上海电视台将会各单位放映彩色电视：那一天将演出节目。

With much love to you.

二姑

P.S.

When we meet, I shall relate some matters to you. Just now am most occupied.

5月11日

亲爱的恩美：

我很抱歉地通知你我不能去参加中福会四十周年的庆祝会了。届时上海电视台将会在各单位放映彩色电视：那一天将演出节目。

向你致以亲切问候。

二姑

又及，

在我们见面时，我会跟你讲些事情。现在我忙极了。

18. 1978年7月6日

July 6, 1978

My dear En-mei:

I am very happy to hear that you will soon be visiting your dear ones in America. Please give my love to your mother and En Teh! If you see Aunt Kin May, please be sure to give her my love as well.

You look so lovely on the evening of the 14th June! You have gained some weight and I hope you will not lose it on the trip so your family will be delighted.

These days visitors from abroad seem to drop from the sky! Some of whom I have to receive despite my physical condition. I get urticaria (荨麻疹) and the itches cause much discomfort and insomnia. Also, I have an obstinate sty on my left eyelid which the doctors are afraid to cauterize. Friends from U.S. keep sending me the Lubriderm lotion and other medicines to ease the itching.

By the way, I cannot wear the beautiful lace and nylon blouses ym and En-Teh kindly sent me, so I had to give to my wards. So please don't get me anything. There are few materials I can wear now and in my position, I must not wear anything elegant. I am sure you understand.

If I get an opportunity to see you, I shall phone you.

Meantime much love to you.

二姑

1978年7月6日

亲爱的恩美：

很高兴知悉你很快将去看望你在美国的亲人们。请向你母亲和

恩德^[1]转达我的问候！如果你见到金梅阿姨，也请送上我的问候。

6月14日晚上你看上去非常可爱！你胖了一点，我希望你别在旅途中瘦下来，这样你的家人们会很开心的。

这些天外国来访者仿佛从天而降！尽管我身体状况不太好我还是得会见他们中的一些人。我得了荨麻疹，瘙痒令我非常不适并导致失眠。我的左眼皮上还长了个顽固的麦粒肿，医生不敢将它烧灼掉。美国的朋友一直给我寄来可以缓解瘙痒的露比丽登乳液和其他药物。

顺便说一句，我不能穿你母亲和恩德送给我的漂亮蕾丝和尼龙衬衫，所以不得不送给我监护的人^[2]了。所以请别再送我任何东西了。现在我能穿的料子很少，而且在我这个位置上，我不能穿任何考究的衣服。我相信你懂的。

如果我有机会见你，我会打电话给你的。

向你致以亲切问候。

二姑

19. 1978年9月25日

Peking

Sept. 25, 1978

My dear En-mei:

I was delighted to get your welcome letter of the 25th August yesterday. What a long time it took to come! Usually, my friends in U.S.A. sent me letters which took only 4 days to arrive! Perhaps there was a postal strike your way? I am happy to know that your dear mother and En-Teh are in good healths. When you left here, I was in the midst of busy activities so that I couldn't even send you a note and I did wish to send a remembrance to En Teh who so kindly gave me her cassette. Now, all 3 of us have one, but I seldom have time to listen to the beautiful recordings, alas!

What pleased me most is that you will be attending the Sloan-Kettering Center for research study, as well as the Cornell University's refresher course in gynecology. Do you know that Dr. Ma Hai-teh (马海德大夫) was supposed to be suffering from cancer and was given only 3 weeks to live by the doctors here, is now enjoying good health and travelling & lecturing in the States?

[1] 即牛恩美的妹妹牛恩德（1934—2012），是著名的钢琴家。

[2] 指时受宋庆龄监护的隋永清、隋永洁姐妹。

Dr. and Mrs. Rosen of the Mount Sinai Hospital will visit me during the 国庆节. I shall ask them whether they would let you spend some time in their hospital. They learned acupuncture here and taught this method in U.S.

I feel very tired after the long meetings recently of the 妇女会, meetings morning and afternoon for 1 week, listening to all the interesting delegate reports. We are emphasizing 卫生工作 this time. And now the various visitors from abroad will be knocking at our gate.....

Do take good care of your health! I shall be so glad when your mother returns, as there had no news of my family. But she must know I think, how they are and what they are doing.

Pardon my hasty letter but hope you can make out my "hieroglyphics".

With much love to you and your family.

二姑

北京

1978年9月25日

亲爱的恩美：

昨天收到了你8月25日的欢迎信我非常高兴。信件送达花了那么长的时间！通常，我的美国朋友给我的来信4天就能到！或许你那边邮政工人罢工？得知你亲爱的母亲和恩德身体都很健康，我很高兴。你离开这里的时候，我公务繁忙都没能给你写点什么。恩德将她的录音机送给我，我是非常想送个纪念品给她的。现在我们三个人^[1]都有了一个，不过我很少有时间听那些美妙的录音磁带，唉！

最让我开心的是你即将开始在斯隆—凯特琳中心研究学习，并在康奈尔大学进修妇科学课程。你知道吗？马海德大夫曾被这里的医生认为得了癌症且只能活3个礼拜，而现在他很健康，正在美国旅游并讲学呢。

西奈山医院的罗森大夫及其夫人国庆节期间会来拜访我。我会问问他们是否可以让你在他们的医院待上一段时间。他们在这里学针灸，然后在美国传授这项技能。

参加近期妇女会的长会以后我感到非常疲劳，一个礼拜都是上午

[1] 指宋庆龄、隋永清和隋永洁。

开会,下午也开会,听取那些代表的所有有意思的报告。这次我们强调卫生工作。现在各种来访者都要来敲我们的大门了。

一定要照顾好你自己的身体!你母亲回来我会非常高兴,因为我没有得到过我家人的任何消息。但我想她一定知道他们怎么样了,在做些什么。

请原谅此信写得匆忙,希望你能认得出我的“象形字”。

问候你和你的家人。

二姑

20. 1978年11月15日^[1]

恩美:

信收到。根据你信中所说,写了两封信。一封是给教育部李琦副部长,附给他你的申请书和Dr. Robert A. Good 的批准书副本。一封是给卫生部钱信忠副部长的(他是中福会执行委员之一)。

希望这两封信能生效,给你继续进修创造条件。

问候你母亲并问Lili^[2]等好。

祝

好

二姑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21. 1978年11月17日

Peking

Nov. 17, 1978

My dear En-mei:

Enclosed notes will assure you that I am trying my utmost to get you the chance for further research work to enable you to contribute to our work in the medical field.

Just now I am not as well as I'd like to be, as bronchitis is bothering me. Peking's winter is always a problem for me and Shanghai is too damp for my rheumatic knees.

[1] 原件为中文。

[2] 即牛恩德。

Keep well and know that I shall help all I can. Love to you and your mother & sister.

二姑

北京

1978年11月17日

亲爱的恩美：

随信附上的两张条子是告诉你我正尽我最大努力帮助你争取进一步进修的机会，好让你为我们的医疗工作做贡献。

眼下我身体不太舒服，正受支气管炎的困扰。北京的冬天对我来说总是个大问题，而上海又太潮湿不利于我患风湿的膝盖。

多保重，我会尽力帮忙的。问候你、你的母亲和妹妹。

二姑

附：请示便条两份

首长：

根据教育部同志的电话，为牛恩美的事，有写信给CWI^[1]的必要。因此，写好一信，请审阅签名。

那位同志问，牛恩美工作单位什么意见？我回话：妇幼保健院是您以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创办的。

张珏

1978年11月17日

首长：

教育部电话：您的信收到了。李琦部长现在在国外，要本月20几号回，方可处理牛恩美的事。

张珏

1978年11月17日

[1] 即中国福利会。

22. 1978年12月8日^[1]

恩美：

今天接到教育部李琦副部长十二月六日来信说：“您推荐牛恩美医生在美进修，列入国家派出名额内，我和部里有关同志研究，决定按您的批示办理。至于具体手续等有关问题，将由我部派出留学生领导小组承办”等语。

我高兴地函告你知道，可在美国多留日期，学习更多的医学知识的渴望获得教育部的批准。希望你专心致志地，全部精力以赴地进行学习，以行动来证明你是我国最优秀的女医生之一。

预祝

成功

二姑宋庆龄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八日

P.S.

I may return to Shanghai for reoperation end of this month, as I feel exhausted by the recent attack of bronchitis which required 20 injections in 10 days. Antibiotics caused me much discomfort. The extremely dry weather here also reacts upon my sensitive skin.

Wishing you all the best.

又及，

我这个月底可能回上海再接受治疗，因为近日患支气管炎需要接受10天共20次的注射治疗，这让我筋疲力尽。抗生素令我非常不适。这里极端干燥的天气也让我皮肤敏感。

祝你一切顺利。

23. 1978年12月25日^[2]

恩美：

关于你在美进修一事，我在十二月八日给你的信中，已抄知李琦

[1] 原件为中文。

[2] 原件为中文。

副秘书长给我的回信,想已收到。教育部在十二月十二日以(78)教外字1341号文件通知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协助办理。现将文抄一份附后。

你十二月十五日来信收到。我想,上述文件已经抄送妇幼保健院等单位,你可就近和联合国常驻代表按照文件所说办理。不多写,祝新年快乐!

二姑SCL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附:教育部文件抄件

(78)教外字1341号

安排牛恩美在美进修事

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78)联发字第345号已悉。

关于上海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牛恩美同志申请留美进修事,经研究,我们同意安排牛恩美同志自一九七九年一月起列入国家派出名额,作为医学客座学者(Visiting Scholar)在美国进修一或二年,其费用与负担办法与我派出第一批五十名赴美进修者相同。有关进修事宜,请你团协助安排。牛恩美同志现在纽约一肿瘤医院(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学习。

教育部公章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抄送:宋庆龄副委员长办公室,驻美联络处,国家科委,上海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24. 1978年12月26日

Peking

Dec. 26, 1978

(左侧写:上海淮海中路1843号林泰收)

My dear En-mei:

Your letter of the 17th has reached me. Next time please address my letters to 1843 Huai Hai Lu, Shanghai for I am going home for a much needed rest on the

30th. Should have left 2 weeks ago but new duties came up to prevent my departure. Meantime, my urticaria and knee arthritis give me much trouble. My friends in U.S. have sent me some Lubriderm and Sardoettes which help me much.

I am distressed that just when everything is prepared for your further stay to study medicine, your mother wants to return home. She does not know that it's difficult to procure a maid to attend her now-a-days (all women want to work in stores and factories now) and food is not so easy to buy now either. The climate in California is so mild and pleasant. However, she will have no lack of company. My housekeeper, who has been with me almost 50 years is a "Cantonese", and feels very lonely at home will be so glad to chat with her. Lack of a guestroom in my small house prevents me from inviting your mother to stay with me.

Do you think Mrs. Chang Suing-mei, who knows your mother well, will let her maid accompany your mother home, and release you from having to stop your medical work? Or better still, let your own brother accompany her home? I am sorry I am unable to help, as I haven't the money to help along. 永清 & 永洁 are growing fast. The former attends the film studio and needs "fancy" clothes, while the latter is studying English and also likes to wear foreign clothes which means skirts, blouses & nylon stockings! Many of my friends are helping to provide for them, otherwise I cannot afford their needs, as I get only 500 yuan p.m. Jeanette may get a scholarship to attend Stanford University next year. This will release me from supporting her in so far as clothing is concerned, since scholarship means she'll have money to look after food & clothing. Both these sisters are bright in their studies, otherwise I'd not sponsor them.

Just now I heard from Chester Nie, who writes that his brother Jimmy and wife will be coming to visit them. In this case, they can surely, as relatives, give a helping hand and accompany your mother home! Please investigate this matter. I never met Jimmy, but believe he is independent.

I must pack now. My books etc. will have to remain here, and I shall only doing along clothings.

With much love to you, your mother and En-Teh.

As always yours,

二姑

北京

1978年12月26日

亲爱的恩美：

你17日的来信我已经收到。这段时间我的荨麻疹和膝关节炎给

我添了许多麻烦。我在美国的朋友们给我寄来一些露比丽登和萨尔多润肤剂，帮了我不少忙。

让我苦恼的是，在为你（出国）深造学习医学的事情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你的母亲却想要回国。她不知道现今要找个女佣来照顾她是很困难的（现在所有的妇女都想在商店和工厂工作），而且食品也不是那么容易买到。加利福尼亚的气候是那么的温和怡人。但是，她（回来后）不会缺少人陪伴的。我的管家跟了我近50年，是一个“广东人”，在家里感到很孤单，会乐意与她聊天的。我的房子缺少一间客房，这让我无法邀请你母亲来与我同住。

你认为与你母亲熟识的张湘眉^[1]夫人会让她的女佣陪伴你母亲回家么？那样你就不必暂停你的医学工作了。或者更好的办法是让你自己的哥哥陪她回来？我很抱歉我帮不上忙，因为我没有钱可以帮忙。永清和永洁长得很快，永清进了电影制片厂要穿“高档的”衣服，而永洁在学英语也喜欢国外的衣服，诸如裙子、衬衫和尼龙丝袜！我的很多外国朋友帮我为她们提供这些，否则我是满足不了她们的需要的，因为我每个月只有500元的收入。永洁明年或许能获得奖学金去斯坦福大学学习。这可以帮我减轻为她供给衣服负担，因为奖学金意味着她可以有钱解决自己的吃饭和穿衣问题。这两姐妹读书都很好，否则我也不会资助她们。

刚才我收到切斯特的来信，他说他的弟弟吉米^[2]夫妇要来拜访他。既然这样，作为亲戚，他们一定能够帮忙陪伴你母亲回来！请查一下这件事。我没见过吉米，但我相信他很独立。

我现在得打包去了。我的书籍等物品将会留在这里，我只带衣服。

问候你、你的母亲和恩德。

你永远，

二姑

[1] 即张歆海夫人韩湘眉（1901—1984）。张歆海（1898—1972）是民国著名外交家。张歆海夫妇与宋庆龄关系亲密。

[2] 即倪锡纯的次子倪吉明（1916—2001）。

25. 1979年6月7日

Beijing PRC

June 7, 1979

My dear En Mei:

I was delighted to hear from you and to know that you have met Jeanette and Dr. and Mrs. Rosen at a picnic. Particularly glad I was to read Dr. Lewis' recommendation, showing how well you have done your work. This paper is worth keeping so I am sending it back for you to keep yourself. You can show it to the C.W.I. staff and the Maternity outfit later, for Sloan-Kettering is a very famous institution.

It was good to send your dear mother to a Convalescent Home in California, where the weather is excellent. Mrs. Chang Hsin Hai told me that she is anxious to return home. David Chang is here trying to do some business as he is an architect and well able to build hotels etc.

Soon our meetings will take place, starting on 17th inst., so I shall be very much occupied. But my arthritic knees give me trouble. When Jeanette was here she always accompanied me, helping me to walk steadily. I do miss her! Her sister Yolanda is busily engaged in film work, and we will be able to see her first film next week.

May this find you in good health!

With love to you and your family in U.S.

Affectionately,

二姑

中国北京

1979年6月7日

亲爱的恩美：

很高兴收到你的来信并得知你已经在一次野餐会上见过永洁和罗森医生夫妇。特别令我开心的是我读了刘易斯博士的推荐信，这封信说明了你的工作做得有多么的出色。这份文件值得保存，所以我把它寄还给你自己保留。你以后可以拿给中国福利会的员工以及产科的人看，因为斯隆—凯特琳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学院。

将你母亲送到加利福尼亚的疗养院很好，那里气候非常好。张歆海夫人告诉我说她急于回家。大卫·张想在这里做点生意，因为他是个建筑师，善于建宾馆等。

我们的大会很快就要召开了，17日开始，所以我会很忙。我的膝

关节炎给我添了很多麻烦。永洁在这里的时候总是陪着我，搀扶我稳稳地走路。我真想她呀！她姐姐永清忙于电影工作，我们下周就能观看她的第一部电影。

祝你身体健康！

问候你和你在美国的家人。

挚爱你的，

二姑

26. 1979年6月11日

46 Pei Ho Yen

June 11, 1979

My dear En Mei:

Jeanette Sui is very homesick so I hope you will find time to see her at Room 638 International House on 500 Riverside Drive. Every time she has menstruation she suffers from severe pains. I do not think it is good for her to take Saridon and Belladonna tablets all the time. Although at weekends she goes to the home of Dr. and Mrs. Rosen, I don't know why she doesn't consult them. Perhaps she feels too shy.

Our 人大会 will soon hold sessions to discuss about the new 法律, so I shall have to attend meetings daily. So much to do these days, besides my regular writing work.

I hope this will find you in the best of health and with much love to you, your mother and Lily.

Affectionately,

二姑

P.S.

Please let her know that you wish to help cure her 月经痛病 and she must not feel shy before you.

北河沿 46 号

1979年6月11日

亲爱的恩美：

隋永洁非常想家，因此我希望能找个时间去看看她。她住在河滨大道 500 号留学生宿舍 638 房间。她每次来月经都痛得厉害。我认为她总是吃散利痛和颠茄片不好。虽然她每个周末都去罗森夫妇家，但我不明白为什么她不咨询一下他们。也许她太害羞了。

我们的人大会很快就要召开了，要讨论我们的新法律，因此我每天都要参会。除了日常的写作以外，这些天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希望你身体健康，并问候你、你的母亲还有恩德。

挚爱你的，

二姑

又及，

请让她知道你愿意帮助她治疗痛经，她在你面前一定不会害羞的。

27. 1979年8月27日

Beijing

Aug. 27, 1979

My dear En Mei:

I am so happy to hear from you and to know that you will keep an eye on Jeanette, 永洁 for me as I learned she had fainted twice in the classroom during her menstrual period! The Rosens found a good woman doctor for her but she refused to be examined. So what can be done? I am buying some Chinese medicine for her which I shall try to forward to her soon.

This p.m. Jimmy Nie, brother of 倪吉士 and his wife and daughter will call. I shall try to ask them deliver the parcel to her.

Jeanette is going to move to another place to live in as the room in the International House is not convenient and she finds travelling by subway is not so good. Two of my American friends wrote me that they were knocked down by some negro after robbing them of their handbags. So you must be careful and not carry too much money in your bag. Purse-snatching seems to be very common in N.Y. city!

The Rosens are coming next week so you won't have chance to send anything. I'd like to have a little jar of mentholatum and 2 small bottles of dental floss which are not available in China.

For weeks I have been suffering from a severe chest cold, feverish & coughing which no medicines seem able to relieve me. I am also unable to use penicillin, etc, as they give me urticaria! I'm taking oxygen to relieve my chest.

Muriel Siebert of New York is calling so I must go down to hear what I care of Jeanette's life in N.Y. From her recent photo she seems to have lost weight lately. She is unable to eat beef, butters & even drink milk! So what else can one eat in the dormitory.

Take good care of your health dear En Mei!

With love from

二姑

北京

1979年8月27日

亲爱的恩美：

收到你的来信并得知你将留意永洁我很开心，因为我获悉她在月经期间有两次在教室里昏倒了！罗森夫妇为她找了个很好的女医生，但是她拒绝接受检查。那么还能做些什么呢？我给她买了些中药，很快会托人带给她。

今天下午倪吉士的弟弟吉米·倪和他的妻子以及女儿要来。我会试试请他们将包裹带给永洁。

永洁要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住，因为留学生宿舍的房间不太方便，她觉得乘地铁出行不太好。我的两个美国朋友写信给我说，有些黑人抢了他们手袋之后把他们打倒在地。抢夺钱包的事情在纽约很常见！

罗森一家下周就要来，因此你没机会寄什么东西了。我想要一小罐曼秀雷敦和两小瓶牙线，这些中国买不到。

我患严重的支气管炎已经两周，发热，咳嗽，似乎没什么药可以缓解。我也不能服用盘尼西林等药物，因为会引发荨麻疹。我在吸氧以缓解胸痛。

纽约的缪丽尔·希伯特来电话了，所以我得下楼去听听我关心的永洁在纽约的生活情况。她近期的照片看上去胖了一点。她吃不惯牛排、黄油，甚至喝不惯牛奶！那么一个人在宿舍里还能吃些什么呢。

亲爱的恩美，好好照顾你的身体！

爱你的，

二姑

20. 1979年12月30日

Beijing

30 XII 1979

Dearest En-mei:

Thank you for your letter and greetings. I have been wondering why I have not heard from you for so long. When Helen Rosen brought me your gifts I wrote you a

long letter in return thanking you for your thoughtfulness and generosity in getting me the beautiful material & the medical aids I requested. So when she returned to America I sent you a Seiko watch (with alarm) by her with a letter. I was happy I could send that alarm watch to you as the friend who presented me said it was "so correct" and useful—But as I already have a Seiko wrist watch, I thought you would certainly find it useful in your work. I gave it to her in a box which I enclosed in a strong envelope with your address on. I also sent Jeanette a sweater at the same time. I can't understand why she did not turn it over to you, as I gave her your address. I am so perplexed. She is a forgetful person I know for when I presented her with an ancient vase, she left it in the hotel room which was picked up by Dr. Ma Hai Teh and carried to his own home. I heard about it from the hotel so I wrote to 马 about it. He replied that she left in a hurry at 6 am. and forgot it behind in trying to go to the airport. "As it was so nice", he took it to his home, which is next to my house. So I made him return it to me! Now, I shall write and ask her about the envelope enclosing a note and a watch which I sent her to forward to you. I am so shocked that she is such a disorderly person! From her looks & talks, she is very careful, and 细心 but the story about my lovely vase makes me think she is not so careful.

I don't know why Jeanette has become wary of her recently. I know you are careful so will tell you what Jeanette wrote me. Jeanette needed a warm overcoat and Helen said she would buy one for her, but she never did. Then she got angry when a friend of mine in California sent J a woolen sweater and a woolen night gown! All these things cause me to wonder about Helen, whether she is in her right mind. Shall write her & inquire about the gift to you. Better not go to see her often as Jeanette lives in the International House No. 638 & has a telephone. She may enter Barnard as it is for girls only.

Love to your mother, Lily and yourself.

Affectionately,

二姑

北京

1979年12月30日

亲爱的恩美：

感谢你的来信和问候。我很困惑为什么那么长时间都没收到你的信。海伦·罗森将你的礼物带给我时我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给你，感谢你体贴慷慨地送给我这么漂亮的衣料和我要的医疗辅助器具。因此她回美国的时候我请她随信带一块（带闹钟）的精工手表给

你。很高兴能将那个带闹钟的手表送给你，因为送表给我的朋友说它走得“非常准”而且很有用。但是我已经有一块精工腕表了，我觉得你工作上会用得到它。我把它装在盒子里并放进一个写有你地址的结实信封后交给她了。同时我还给了永洁一件毛衣。我不理解为什么她没有转交给你，因为我给了她你的地址的。我很困惑。我知道她是个健忘的人，因为我曾送过一个古董花瓶给她，她落在宾馆的房间里然后被马海德大夫拿回自己家去了。我从宾馆那里听说后写信给马问这件事。他回信说她早上6点匆匆忙忙赶去机场，花瓶就忘了。“因为这个花瓶很好”，他就把它拿回家了，他家就在我家旁边。所以我让他把花瓶还给我了！现在我要写信问问她关于我请她带给你的那个装着一封短信和一块手表的信封。她是这样一个没有条理的人让我真是很震惊！从她的外表和谈吐来看，她很仔细，也很细心。但是我的那个漂亮花瓶的事件让我觉得她不是那么仔细的人。

我不知道为什么永洁最近对她有点戒心。我知道你很仔细所以告诉你永洁来信中说的事。永洁需要一件厚的外套，海伦说会给她买一件，但却从没买过。后来我的一位在加利福尼亚的朋友送给永洁一件羊毛衫和一件羊毛外套，这让她很生气。所有这些事情让我对海伦有些不理解，不知道她是否正常。我会写信给她询问给你的礼物。最好不要经常去看她，因为永洁住在留学生宿舍638房间，有电话。她将就读于巴纳德学院，那里只收女生。

问候你的母亲、恩德还有你。

挚爱你的，

二姑

29. 1980年8月22日

Dear En Mei:

Sending you a Swiss watch this time with a pair of cuff-links with my love. Sorry, I have bronchitis and can't write at length, but Jeanette will tell you all the news.

Affectionately,

二姑

August 22, 1980

亲爱的恩美：

此次送给你一块瑞士手表还有一副袖扣。我得了支气管炎不能写长信，抱歉，不过永洁会告诉你所有的消息。

挚爱你的，

二姑

1980年8月22日

30. 1980年9月22日

Sept. 22, 1980

My dear En Mei:

I hope that by this time you have seen Jeanette who had only 1 day in New York city, as she has chosen to study at Trinity College at Hartford, which is one of the finest schools in U.S. and several good friends believe she will be happy there and be more with Americans and learn more about American life.

From Jeanette you will hear the home news. She has been a most wonderful help to me & took over all the wedding preparation for her elder sister, who chose to marry an actor working in the same film company as she does, so they commute by bikes from their small flat to their film company. Naturally, I had hoped she would choose another suitor, but she was of another mind. It is her life after all, so I must not interfere.

I hope to see you & your dear mother in the spring. Many old friends came back and were able to collect their confiscated goods & money (which must be spent within this country, however)

With warm regards to you all.

二姑

1980年9月22日

亲爱的恩美：

我希望此时你已经见过永洁了，她在纽约只能待一天，因为她已经选了哈特福德市的三一学院，那是美国最好的大学之一，（我的）几位好朋友相信她在那里会很开心，也会多与美国人交流，多了解美国生活。

从永洁那里你可能听说了国内的消息。她曾是我最好的帮手，接手了她姐姐婚礼的一切准备事宜。她姐姐选择嫁给了一个与她同一

家电影公司的演员，他们每天骑自行车从他们的小公寓去电影公司上班。自然，我希望她选择另一位追求者，但她不这么想。毕竟这是她的生活，所以我不能干涉。

我希望春天能见到你和你的母亲。很多老朋友回来了，他们可以将那些被没收的财物领回来了（但是只能在中国使用）。

向你们大家致以深切问候。

二姑

31. 1980年10月30日

Beijing
Oct. 30, 1980

My dear En Mei:

Thank you for your lovely gifts of white silk material for Yolanda and the five pair of gloves for me. You must not spend your much needed money on us for you have yet to travel this coming summer. 永清 has moved to a small 2 room flat with her groom. It has only cement floor and no bathtub but a bowl to wash clothes and there is only a slit on the floor for a "W.C.". All the new buildings are built this fashion, as we lack wood. Lack of housing is a big problem indeed!

永清 lives on the 11th floor and sometimes she and her husband have to work until 3AM. This causes much trouble for they live on the 11th floor and the elevator stop at 9p.m.! So they have to climb all the stairs after a heavy day's work! She will thank you herself later when she is free. At present they are working on a film called "Moonlight".

I hope when you come back your own home will be free entirely. Many of my friends have strangers living in their house causing so much trouble to the real owners.

My housekeeper who has been with me for over 50 years is suffering cancer and altho' we bought the best injections for her from U.S., her case is so complicated that she may die any day. I have asked that she be moved to my place in Beijing where we can better look after her. I wish you were here. She suffers pains, her legs are swollen and she can't eat much. It is most sad for me, as she has been so loyal to me all these years.

I heard Jeanette went to N.Y. to see some friends, but she herself has not written me. Please be careful as I hear so many accidents happening to old friends in daylight on the street being knocked down by robbers! I hope you will be careful!

With much love to you, your mother and sister.

Affectionately,
二姑

北京

1980年10月30日

亲爱的恩美：

感谢你送给永清的白色丝绸衣料和给我的五副手套。你千万不要将你急需用的钱花在我们身上，因为你今年夏天还要旅行。永清和她的新郎搬到了一个两房的小公寓，那里只有水泥地板，没有浴缸，只有一个脸盆洗衣服，地上的一条缝就算是“厕所”了。所有新式的建筑都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缺少木头。缺少住房真的是个大问题！

永清住在11楼，有时她和她丈夫工作到凌晨3点。这就带来很多麻烦，因为他们住11楼，电梯晚上9点就停了！所以他们在一天繁重工作之后得徒步爬完所有的台阶！她以后有空的时候会自己向你表示感谢的。目前他们在拍一部叫做“月光”的电影。

我希望你回来的时候你自己的家已经完全腾空了。我的很多朋友家里都住着陌生人，给真正的主人带来很多麻烦。

跟了我五十多年的管家得了癌症，尽管我们从美国给她买来最好的针剂，但她的病情太复杂，随时都可能死去。我把她接到我北京的住所以便更好地照顾她。我希望你在这里。她痛得很厉害，腿部肿胀，也不能吃很多。这是最让我伤心的，因为她这么多年来对我一直是那么的忠心耿耿。

我听说永洁去纽约见一些朋友，但她自己还没写信给我。请多加小心，因为我听说了太多老朋友白天在大街上被抢匪打倒在地的意外事件！我希望你当心一点！

问候你、你的母亲和妹妹。

挚爱你的，

二姑

（郑培燕为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文物资料保管部文博馆员，

李纯涛为宋庆龄陵园管理处文物保管部主任、文博馆员）

“孙文发售债票案”档案文献及相关资料选编

刘 杰 编注

〔编者按〕

笔者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所藏《公债案抄档》汇编中意外发现了十多份内容涉及孙中山建立护法军政府时期发行公债的文件。《公债案抄档》包括“俄管转送巴黎银行法文函案”、“哈尔滨俄银行搭放债票案”、“德国租界局市债利息案”和“孙文发售债票案”。^[1]其中“孙文发售债票案”均系北京政府与各方来往公函,反映的是北京政府对护法军政府公债买卖的态度以及对策。

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后,内外交困,特别是在财政上举步维艰。虽然他采取了很多积极的筹款措施,但是在财政上西南实力派拒绝提供必要资金援助,于是他提出通过发行公债募集资金。9月26日,护法军政府正式公布《军事内国公债令》,同时孙中山亲自发布《承购军事内国公债奖励条例令》,对劝募人员进行奖励。此后孙中山主持的军政府多次派筹款人员赴国内各商埠以及南洋进行筹款,而这一时期北京政府也积极向日本等国举借大额外债,南北双方为此进行了多次交锋。

从现有留存资料来看,护法运动时期南方军政府发行公债来募集革命资金的有关文献资料不是很多,具体的细节很多方面尚不明晰。鉴于此,笔者特辑录“孙文发售债票案”档案文件以及天津和长沙的《大公报》、上海的《民国日报》和《申报》、北京的《晨钟报》等报刊与此相关的新闻报道。以求更加多维、立体的了解孙中山先生所领导护法运动的艰难历程。

[1]《公债案抄档》(2册),1917年。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普通古籍阅览室,编号73622。

一、“孙文发售债票案”档案文件辑录

龙华卢永祥来电 民国七年一月九日

大总统国务总理钧鉴：正密现风闻孙文由粤运来上海公债票壹仟万元，乃实收只三百万元，至其用何抵押无从探悉，惟派党暗中分投兜售，中外人民购买颇多。永祥既有所闻，以为此项公债票若不及早打消，诚恐将来增加国民负担事独小，而发生国际交涉弊无限也。拟请速令，由外交部向公使团预为声明，如此等债票不经华政府允许者，将来华政府概不承认。为思患预防起见，是否有当，仰乞鉴核施行。卢永祥叩。佳。印。

收财政部咨 民国七年一月十一日 盈字第三百三十八号

财政部总长为密咨事：案查本月四日天津《大公报》登载“孙中山贱卖公债票”一条，内称军政府成立后因款项奇绌，由非常会议议决发行军用公债五千万。军政府即派员分赴内地各商埠及南洋一带招募，奈以信用未孚，承售寥寥无几，孙文睹此情形，特派徐季就〔龙〕、戴天仇二人赴沪与某日商交涉，愿减价销售。闻日昨徐、戴由沪回信，谓债票已与日商交涉妥当，票额壹仟万元，以三成兑现，得洋三百万元，此款或兑回粤或存银行请示定夺等语。此等报纸原不足凭，惟孙文系通缉未获之人，擅发公债骗取金钱，难保无此等情事，不先防止将来不免发生交涉。相应咨请贵部查照。希速照会日本公使声明孙文在外所发行之公债，不论数目多寡中央政府万难承认有效。请其电飭各埠领事，晓谕该国商民切勿受愚。是为至要。此咨。

收国务院电函 民国七年一月十四日 盈字第四百三十二号

国务院公函第七十一号：

径启者准：上海卢会办佳电，称闻孙文由粤运沪公债票壹仟万元，中外人民购买颇多，诚恐将来发生国际交涉，请向公使团声明政府概不承认等语。相应抄录原电，函请贵部迅速办理可也。此致。

发驻京各国公使照会 民国七年一月十四日 协字第一百一十一号

为照会事：闻南省伪军政府拟发行公债票，并有由孙文派徐季就[龙]、戴天仇赴沪与外国商人减价商售情事。查伪军政府系乱党机关，孙文通缉未获之人，其所发行之公债票，本国政府万难承认有效。除分行照会外，相应照请贵代公爵使查照。希即通飭各埠领事晓谕。贵国商民切勿受愚，是所至盼。须至照会者。

发复国务院函 民国七年一月十六日 协字第一百三十四号

径复者接准：来函以准上海卢会办，电闻孙文由粤运沪公债票，中外人民购买颇多，恐将来发生国际交涉，请向使团声明政府概不承认等因。查此案先准财政部咨，称报载孙文发行公债票，并派徐季就[龙]、戴天仇等赴沪与某日商交涉，愿减价销售。闻已交涉妥当票额壹千万元，以三成兑现，得洋三百万元等语。请照会日使声明，孙文所发债票中央政府万难承认有效等因。业经本部通照各使在案，兹准前因。相应录稿函复，贵院查照可也。此致。附件。

发复财政部咨 民国七年一月十六日 协字第一百三十六号

为咨复事准：咨以报载孙文派徐季就[龙]等赴沪向日商减价商售债票，嘱照会日使声明，中央政府万难承认有效等因。查此项债票恐不独日商收买，其各国商人亦难保无受骗情事。除由本部通行照会驻京各使转令领事晓谕外商勿受欺骗外，相应照录原稿咨复。贵部查照可也。此咨。附件。

收大西洋使馆照会 民国七年一月二十四日 盈字第八百六十二号

大西洋国特命驻华全权公使符为照复事：接准照称，闻南省伪军政府拟发行公债票各等因前来。本公使均已阅悉，兹特照覆。贵总长查照可也。须至照会者。

收比使馆照会 民国七年一月三十日 盈字第一千一百三号

大比国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来为照复事：接准本月十四日照

开，闻南省伪军政府有拟发行公债票各等事，本国政府万难承认其为有效等因前来。本大臣对此要文已均阅悉，除已饬知各本国领署，晓谕本国商民一体知悉外，相应函复，贵总长查照可也。须至照会者。

收巴西卜使照会 民国七年二月十三日 盈字第一千六百一号

大巴西国特命驻华全权公使卜为照复事：接准照称，闻南省伪军政府拟发行公债票，并有由孙文派徐季就〔龙〕、戴天仇赴沪与外国商人减价商售各等因前来。本公使均已阅悉，相应照复，贵总长查照可也。须至照会者。

收陆军部公函民国七年十月十六日 晟字第四千六十四号

径启者：前据报告探闻，日政府派员来沪购买广东军政府发行公债票不日签字等语。当经密电卢护军，使详查在案。兹准。蒸电复称，统密虞电悉查伪军政府发行之公债券，沪上经发，见日人以廉价购买，本署时有所闻。据称系日本商人组织公司收买，并得其政府许可，已饬密商英捕房设法查办。兹准。电示除仍饬详细侦查外，究竟此项伪政府债券中央以前曾否正式向外交团声明将来决不承认？如未经正式声明，似宜转知外部迅速知照外交团，并向日使切实声明，俾免将来纠葛。如何？希酌核办理等因。到部相应密函，贵部查酌办理为荷。此致。

发复陆军部公函 民国七年十月年三十日 协字第三三零八号

径复者准：函称，前据报告探闻，日政府派员来沪购买广东军政府公债票不日签字，经电卢护军使，查复称，伪军政府发行之公债券，日人以廉价购买，时有所闻。据称系日本商人组织公司收买，并得其政府许可。饬密商英捕房设法查办此项伪政府债券。如以前未经中央正式向外交团声明，将来绝不承认。似宜转知外部，迅速知照外交团，并向日使切实声明。俾免将来纠葛云云。密函查酌办理等因。查本年一月间，曾准财政部来咨，以报载孙文派徐季就〔龙〕、戴天仇赴沪与日商减价议售债票情事，当经本部通行照会驻京各使，请其转饬

驻沪领事晓谕该国商人勿受愚。在案。此时何可无庸再向日使声明。准函前因相应。函复贵部查照。此致。

二、相关报刊报道

孙文拟募公债五千万

孙中山组织军政府后,以军费支绌,特拟举办军事内国公债。昨将军事内国公债局条例及募集军事内国公债条例二件咨交国会非常会议。略云:国会非常会议组织大纲第九条,国会非常会议于军政府有交议事件得随时开会议决。兹因整备军旅,节划出师,需款孔殷,特拟募集内国公债五千万,以济军用。相应将军事内国公债条例一份、承购军事内国公债人员奖励办法一份、募集军事公债票条例一份,咨请贵会开会公决。二十五日国会即开会议决。其咨复交云案准咨交军事内国公债局条例暨募集军事内国公债条例发来。当经本会本日午后二时开会议决计,出席议员二十一省凡八十三人。除将议决全文另行缮送外,其募集军事内国公债条例多数认为财政组织范围之内,毋须交议。应将原案退出。公议妥协所有开会议决缘由,相应咨覆查照,可也。兹将军事内国公债条例附下:第一条:军政府为供给军需募集公债五千万;第二条:此项公债利率定为按年八厘;第三条:此项公债以每年四月十月为给付利息之期;第四条:此项公债自发行之日起二年以内祇付利息,第三年起依附表新列每年汇付本银数目用抽签法偿还,至第八年全数偿清;第五条:此项公债财政部实收九成;第六条:此项公债其最先交之二百万财政部特别减收为八成八;第七条:经手募债人员不另给募债费用,即以折扣充支,但募集多额者另章奖励;第八条:此项公债付息偿本由财政部委托本国外国银行、中国殷实商号支付;第九条:此项公债票面不记名,其有请求记名者亦准为办;第十条:公债票额面数定为四种,如左(一)一千元、(二)百元、(三)十元、(四)五元;第十一条:公债之债票及息票,得自付息及偿本之日起,除海关税外得用以完纳一切租税及代其它各种现款之用;第十二条:经理此项债票之官吏、人民对于此项债票如有非法行为依照法令分别惩罚;第十三条:本条例自公布之日施行。中华

民国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申报》1917年9月30日,第2张第7版)

非常国会拟发行公债数百万

请非常国会通过借债案,闻以此事为最要,因军政府既议招兵所有饷械均未筹备,拟商出外债或发行公债迅速筹备数百万云云。

(长沙《大公报》1917年10月2日,第2张第6版)

军政府派员出洋募债

兹闻孙中山此次募债计划,注重外洋,尤注重南洋、美洲各埠,除分电各侨商踊跃认募外,以华侨参议员谢良牧、冯自由二氏熟悉外情,且与各侨情感素洽,特拟派遣。前赴各埠,认真劝募,以集巨款。港澳两地亦就近派遣专员前往办理。每员拟定先携债票100万元,俟劝募完竣,再行陆续拨付。日内即束装分道出发云。

(《民国日报》1917年10月9日,第2张第6版)

粤军政府实行募债与宣战

孙中山拟以军政府名义募集内国公债五千万,将组织条例咨交非常国会讨议在案。兹闻孙中山以代理财政总理廖仲恺于办理公债事项素著经验,将来公债局长一缺拟即令兼充以资熟手。至进行办法除在本省偏[遍]设支局外,其外省分局拟由西南省份暨上海方面办起。东北各省则俟体察情形徐图推广。其余南洋美洲各埠均遣专员前往,日本方面则拟委张继就近办理。至进行办法南洋、美洲两方面拟募一千五百万元,广西、云贵、湖南各募三百万元,上海、天津暨各省口岸共募一千二百万。

(长沙《大公报》1917年10月11日,第1张第3版)

军政府也募内国公债

财政梁总长以得粤督电,告孙中山有以南方军政府名义发行军事内国公债五千万之议,业经非常国会通过,如果实行,殊与财政统一

有碍,当向府院两方面熟筹办法,一面通电各省不论国内外何项借款,非经财政部核准者中央概不承认,并禁止发行云云。据粤省消息,本月25日孙中山为募集内债事特拟就军事内国公债条例咨交非常国会,并派代理财政总长廖仲恺报告一切。

非常国会召开会议出席议员21省83人,多数认为公债属于财政组织范围之内,勿须交议,将原案退回,公议妥协,相应咨复查照即可。

(长沙《大公报》1917年10月11日,第1张第3版)

政府预防孙文骗人

大总统以孙文现在广东,以中华民国军政府名义发行公债,辱国害民,莫此为甚,决计颁布明令通告国人以免被其所骗。俟得段合肥同意后此项命令即可发表。

(天津《大公报》1917年10月12日,第1版)

军政府募债现状

军政府举办内债经由国会非常会议通过在案,惟发行募集手续时日尚未有定。兹闻现李省长商妥,由粤政府代为担任募集若干,而酌提若干成归粤政府,现两方已有成议,至担任金融,容代续查。

(《民国日报》1917年10月29日,第2张第6版)

孙文在新募债失败

政府昨接新疆督军杨增新来电,谓称孙文派人来新向官场售募债券,业已驱逐并通告各界勿受其欺骗云。

(《晨钟报》1917年11月13日,第3版)

侦查军政府募集公债

上海县沈知事接江苏财政厅胡厅长来电,云转奉财政部令,以粤省军政府近在各省及通商口岸暨南洋美洲各侨埠募集公债五千万。特通令各属严禁购募。倘有私行应募,将来政府概不认偿。请即飭属一体严加防范等因到厅。奉此除训令所属外,合亟电令该知事查照迅

即严密侦查。所辖境内有无前项情事发生以后,从速转呈候核等因。现沈知事正在派员侦查。

(《申报》1917年11月13日,第3张第10版)

伪军政府尚无暗募公债事

孙文等之伪军政府前拟向各省募集公债五千万元,政府深恐该伪政府有在各省潜行诱募债情事,当电询各省等情已见报端。兹闻覆电到者已有十七八省之多,谓境内尚无潜募伪军政府公债之事云。

(《晨钟报》1917年11月16日,第2版)

孙中山贱卖公债票

军政府成立后因款项奇绌,由非常会议议决发行军用公债票五千万元。军政府即派员分赴内地各商埠及南洋一带招募,奈以信用未孚,承售寥寥无几,孙文睹此情形,特派徐季就[龙]、戴天仇二人赴沪与某日商交涉,愿减价销售。闻日昨徐、戴由沪回信,谓债票已与日商交涉妥当,票额壹千万元,以三成兑现,得洋三佰万元,此款或兑回粤或存银行请示定夺云云。

(天津《大公报》1918年1月4日,第1版)

政府不承认南方滥发军用票

政府现以云南、广东、广西、湖南等四省南军统兵长官因军饷无着,竟私印大宗军用钞票,滥向商民强迫使用。据探员报告,近两月来发出数目已达一千三百余万元。此种债票贻害商民,殊非浅鲜,更恐外人受其所愚,引出特大之交涉。闻大总统拟责成外交、财政两部速拟遏止该军票通行之办法,一方面再以政府名义照会驻京各国公使详告中央不承认此票之理由。嗣后无论何国人民使用此票者政府概不负责云云。

(天津《大公报》1918年1月8日,第1版)

警告外人勿购西南公债

外交部现因西南党人有在上海发行公债,再由戴天仇等经手减价

售于外国人之计划,特于昨日上午照会各国驻京公使,转告各该国侨民勿购此项公债致为其所愚云。

(《晨钟报》1918年1月16日,第3版)

战云弥漫之鄂州

民党势力广州孙文曾派员携公债票四十万元来荆,要求商会劝募。石星川以荆军独立之后曾向绅商劝捐军饷一次,未便再募公债。赠给来吏黄某(元帅府参军)川资四百元,黄辞不受,现尚在沙自行设法劝募。

(《申报》1918年1月16日,第2张第6版)

孙文发行公债票之近闻

请看外交部致外交团之公文:孙文在南方发行公债票一节早经各报揭载,闻昨日外交部有公文照会外交团,谓孙文在南方发行公债票,不惟妨害国家统一且与国际信用攸关。谓通告侨民切勿使用并声明政府对于孙文所发行之公债票不负责任云云。

(天津《大公报》1918年1月16日,第1版)

非常国会议长吴景濂致英公使书

以武力压迫民意,闻近日密谋与各友邦缔结种种之契约,期得款项继续战争。按照敝国约法规定,凡缔结国库有负担之契约,非经两院议决不能发生效力。同人等对于此等非法借款万难承认。

(《晨钟报》1918年2月1日,第6版)

孙文也反对七年公债

王克敏等假七年公债蠹国肥私,种种黑幕,实堪发指。北京非法政府根本违法,绝对无发行七年公债之权。尚希诸公对于七年公债,根本否认,以免人民受愚。

(《晨钟报》1918年3月22日,第3版)

非常国会请取消公债电

天津黎大总统、北京冯代总统钧鉴，各省督军、省长、议会、总商会、各报馆、上海商会联合会钧鉴：窃查北京财政部擅定七年内国公债，未经国会议决，违法营私，情弊毕露。经本会议员褚辅成等提案议定。此案经本会出席议员全体赞成。

（《民国日报》1918年3月27日，第2张第7版）

南方又有反对公债者

南方伟人如吴景濂、伍廷芳等日前先后致电外交团反对七年公债。昨闻国会议员褚辅成等十三人亦有联名电致外交团反对此项公债。

（天津《大公报》1918年4月4日，第1版）

军政府之巨额债票

军政府财政总长廖仲恺昨致非常会议公函云：敬启者去年军政成立之初，以军需孔亟、财源无着，不能不设法济此艰难。经由大元帅提出军事内国公债条例咨交贵非常会议议决，于中华民国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公布施行在案。迨本部成立，一面准备债票，而于债票尚未制备之先，印刷票面数额不定之公债收条以期简便而应急用。嗣为防弊起见，将该项收条仍依债票例分为千元、百元、十元、五元四种，以凭换取同额债票。一面于内地外埠劝募公债发行债票。综计此项收条或债票其性质约分五类。其一为于本部派员劝募债款发行于内地外埠者共451 790元。其二为偿还讨伐袁氏组织革命军历年所用内外债款。丙辰大局解决后，册报北京北京政府，经部承认而未偿还者及对于督军团叛国后军政府未成立之先经大元帅筹借用。于国会、海军暨粤、闽、苏、浙、湘、鄂、豫、皖、鲁、奉、京、津、汉、沪等处之内外商民债款，特给债票以为凭证者共3 943 210元。其三为交给业经独立之省军以充军费者共5 650 000元。其四为交给前往内地各省招募运动、安抚慰劳各军队之专员以资活动者共5 352 830元。其五为给予军政府职员与大元帅府及行营卫队诸兵士以代俸饷者共148 100元。综计前五项发出债票及债票收条共15 545 930元。当发行前项债票

及收条时,仲恺为慎重起见,特定办法数条以为限制。一、债票不得于公债条例所定八八折之外,再行低折销售;二、债票销售若干,应每月将数目报部,并将所售之债票号码一律呈报;三、债票剩存若干应与报销册及存根一并缴部。办法既定,本部正拟厉行,然而内地外埠或以战事梗阻或以交通窒碍,依所定办法呈报到部者尚属无多。故除上所举二、五两类外,其属一、三、四类实际已发行之债票实数若干,存除若干。应俟各属报效数目到后始能明瞭。现值军政府改组,本部应即办理收束将发出债票数目表、发出债票收条未缴纳存根数目表、注销债票收条号数表各一册送国会非常会议报告以明责任。再者所有经手领去债票及公债收条,诸人当有收据存部。合并声明云。

(天津《大公报》1918年6月5日,第1版)

(《晨钟报》1918年6月6日,第6版)

非常国会抗议北京政府之借款

全体议员赞成,通电中外,反对段政府借款。值此西南讨逆时期,凡段逆违法借债将来国人誓不承认。并通告我国人民,段氏贪一己之权利,不惜将中国之财政权、军政权、铁路权、矿产权拱手让诸外人。

(《民国日报》1918年10月28日,第2张第7版)

(选编者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一位华人洋基佬的脚注 ——牛尚周 1913 至 1917 年的书信

牛康民* 著 朱玖琳 译

[译者按]

牛尚周与宋庆龄父亲宋耀如是连襟。牛尚周、倪珪金夫妇育有四个子女：子惠霖（1889年生）、子惠生（1892年生）、女惠珠（1895年生）、女惠珍（1898年生）。本文作者牛康民系牛惠生之子。1984年，牛惠霖之子牛恩健在其母刘义基的上海家中发现牛尚周1913至1917年的家信，有近百封。牛康民在征得牛恩健同意后，摘录部分家信内容撰就此文，发表在《美亚杂志》（AmerAsia Journal）1984年第11卷第2期上。牛恩健现已在美过世，这批书信原件去向不明。感谢牛惠霖之女牛恩美女士提供本文原英文件。

耶鲁大学汉学教授卫三畏曾长期在华居住，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他提到，在从上海到日本的汽轮上，他遇到一个同路人，此人正准备去纽黑文，是毕业于耶鲁的中国人：

我有容闳做伴从上海启程，一路上我与他有很多愉快的交流。他直接去纽黑文与那里的朋友会面，共同商讨即将前来的中国留美学生的安排问题，其中30名学生将跟随陈兰彬乘下班汽轮前往旧金山。^{#1}

卫三畏教授的同伴容闳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获文学士学位，是毕业于美国大学的第一个中国人，归国后进入政府供职。在为政府工作期间，他一直试图说服各级官吏允许他从事教育事业。他认为中

* 牛康民教授系南佛罗里达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兼教授。作者感谢牛恩健允许出版这些信件，亦向夏晋麟博士致敬，感谢他提供了牛尚周生平的更多细节。——原注

国应该与西方国家通商并建立外交关系。为实现此目的,必须将成批的中国幼童派往海外接受教育。容闳的计划终被接纳,1873年第一批30名留美幼童抵达康涅狄克州哈特福德市。容闳掌管中国留学事务所,1875年,他在哈特福德市的克林街建起了一幢三层楼的建筑,作为中国留学事务所办公之地,还可容纳75名学生居住。其后,又有3批幼童赴美。然而,囿于各种情况,主要是政治原因,中国政府于1881年中断了这一尝试,大约有百余名幼童(其中许多人已年届20)被召回国。#2

一位华人洋基佬^[1]的炼成

牛尚周,第一批30名留美幼童之一,1862年12月4日出生于江苏嘉定。#3当容闳计划把这些少年安顿在新英格兰时,他决定将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作为中心点,“盖斯普林菲尔德地处新英格兰中心,居此易于分配学生”,幼童们被个别或成对地安置到各个美国家庭中。#4牛尚周在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的亨利·瓦利(Henry Vaille)家住了好多年。#5

人们对牛尚周在斯普林菲尔德的早期求学活动所知甚少,只知道他于1879年9月登记入读新罕布什尔州菲利普艾斯特中学(Phillips Exeter Academy),在该校就读一年。这是一所私立学校,在就读该校的这一年间,牛学习了历史、数学、地理、英语和语法等基础课程。牛的成绩单显示他的分数是相当令人满意的,秋季学期平均85分,冬季学期平均89分,春季平均78分。#6

根据成绩单和1882年的一个35人班级合成表的记录,在1879至1880年间,至少还有其他8名中国留美幼童在同一学校就读。其中仅唐国安读到毕业,另有3人又读了一年(1880—1881)。#7容闳最初的计划是定期派遣幼童赴美,让他们在美接受教育,直至大学毕业。

[1] “洋基佬”这一绰号起初被用来称呼在美国北部新英格兰州定居的移民。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方军把北方各州的士兵均称为“洋基佬”。如今,“洋基佬”在全世界都成为了美国人的别称。牛尚周等首批留美幼童当年正是被安置在地处新英格兰中心的斯普林菲尔德市,他们生活在当地的美国家庭中,深受美国文化影响,并因此而被清政府提前召回国。牛尚周的书信从各方面体现出了一个“洋基佬化”的中国人形象。——译注

然而,就在前四批幼童抵美后不久,一些中国官吏便对这些少年是否能切实得到合适的教育提出质疑。因为绝大多数少年正处在个性形成时期(在9至12岁之间),所以他们很容易被“美国化”。容闳观察到了这一点,例如他说:

此多数青年之学生,既至新英格兰,日受新英格兰教育之陶熔,且习与美人交际,故学识乃随年龄而俱长。其一切言行举止,受美人之同化而渐改其故态,固有不期然而然者,此不足为学生责也。况彼等既离去故国而来此,终日饱吸自由空气,其平昔性灵上所受权重之压力,一旦排空飞去,言论思想,悉与旧教育不侔,好为种种健身之运动,跳踯驰骋,不复安行矩步,此皆必然之势,何足深怪。但在陈兰彬辈眼光观之,则又目为不正当矣。#8

陈兰彬认为这一整个计划对华帮助不大。他^[1]在给北京的信中写道:“学生在美国,专好学美国人为运动游戏之事,……又因习耶教科学,或入星期学校,故学生已多半入耶稣教……”换句话说,他们已经被“美国化”了。在这种气氛下,留学事务所于1881年解散,中国政府召回所有在美留学生,并关闭了留学事务所。

虽然牛尚周在1881年从美国回来后从未离开过上海,但是新英格兰对他的影响贯穿了他的一生。上海的江南制造局创立于1865年,是最为重要的兵工厂和造船企业之一。牛尚周有学问,而且英语流利,这使得他在江南制造局谋得帮办一职。#9他担任此职直至1917年12月去世为止。在1887或1888年,牛先生与倪蕴山牧师的女儿倪珪金(1865年生)结婚。#10倪牧师是由基督教新教伦敦会传教士培养的。#11牛氏夫妇育有四个子女:子惠霖(1889年生)、子惠生(1892年生)、女惠珠(1897年生)^[2]、女惠珍(1900年生)^[3]。#12

在牛尚周生平最后几年,他所有孩子均留学海外,他去世时并不知道他们未来的事业会如何繁花似锦。#13 大的三个孩子在1937年的9个月之内相继因病过世。最小的女儿惠珍(夏晋麟夫人)现生活

[1] 误。应为陈兰彬举荐的留学生监督吴子登。——译注

[2] 误。应为1895年。——译注

[3] 误。应为1898年。——译注

在美国东部。^[1]牛尚周夫人1945年12月过世。

书 信

牛尚周的信在近亲之间没有一封保留下来,但是,1984年夏天,牛惠霖之子牛恩健在上海成功地在牛惠霖夫人的家中找到了书信。这些信是牛尚周于1913—1917年间写给他的子女的,他们均在海外留学。**#14** 此外,还有他同英国和美国的各个监护人以及在华商务公司的通信。

虽然这些书信谈论的是家庭事务,但它们的重要性体现在各个方面:

首先,我们对容闳开启的教育工作所产生的直接影响和成果所知甚少,而这些写于牛尚周晚年的书信揭示出新英格兰的经历改变了他的的人生观。人们可以想象,牛尚周在他自己的国家在很多方面都已经成为一个边缘化的人物。他吸收了很多美国的价值观,其中绝大多数是与中国传统相冲突的。

其次,这些书信是一个中国父亲用英文写给他的孩子们的,这在当时很不寻常。不过,牛在他人生的早期就深受基督教传教士的影响,而且同一位新教华人布道员的女儿结了婚。他的两个儿子毕业于上海的圣约翰大学,这是一所著名的美国圣公会教会大学,由长期从事教育的传教士施约瑟博士创办。**#15** 因此,他的孩子们在他们青少年时代就已经接受了一些双语教育。

第三,牛把他的儿女均送往海外留学,这对1900年代早期的中国父亲而言又是一个非凡之举。当时,即使西方教育(在华)正在逐步开展,但是中国父母仍只视送男丁去学习古典经学为要。不过,正是这些最为非凡的父母特别重视让他们的女儿受教育,尤其是去海外留学。

第四,即使子女远在千里之外,牛仍然严密控制着他们的一言一行。他对他们的活动了然于心,因为他非常关心他们的未来,希望他们尽可能地有百利而无一弊。

最后,这些书信非常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牛夫人参与很多决定,

[1] 牛惠珍于1999年1月在纽约长岛去世,与1993年过世的丈夫夏晋麟合葬于纽约郊外风可利夫(Ferncliff)墓园。——译注

甚至是那些与经济事务相关的决定。

写于1913—1917年间的这些书信大约有100封,内容涉及各个方面。本篇论文主要研究的是牛对他子女工作前景的关注、他的教育观,以及他如何对待家族和政治问题。它们展示出在本世纪之初的中国背景下,一位父亲是如何关怀他的子女的。牛的语法文句有很多错误之处,但是信的意思还是很清楚的。

工作前景

出国留学的中国人全部加起来也为数不多,但是对他们那些接受“现代”职业培训而非研读古典经学的人而言,中国的工作机会微乎其微。此外,如果“归国留学生”在外国人经营的企业中找到工作,他们的薪水常常会比他们的外国同事低。牛熟悉很多(工作)机会以及薪水差异。在当时,他运用“传教士关系”把他的触角伸向每一个有利于他的孩子们的机会。

他的长子惠霖在英国完成了他的医学学业,牛希望他能就职于戴文波特(Davenport)任院长的仁济医院。这家医院由英国基督教伦敦会开设,在1900年代成为像北京协和医院那样的中国第四大医院。**#16**牛认为他的儿子进这所医院工作一定会成为“名人”。

我们深入了解到,委员会(正在招人)非常需要你去工作,他们知道你有高超的技艺……既然委员会对你有良好印象……那么就毫无障碍了……你会在一两年之内使自己声名鹊起。**#17**

随后前几封信中,牛发现仁济医院可能实行不同的薪水制度,所以他对惠霖写道:

妈妈说要以防仁济医院不支付你同其他人一样的报酬,你还是别管他们了。我们确信你到哪儿都可以挣钱而且是挣大钱。所以,如果你想要最好的,那就不要接受戴文波特医生或仁济医院的聘请,除非他们支付你相同或是更多的薪水。否则,你会使得自己已有的经验贬值……**#18**

牛动用了他的所有“触角”去了解其他机会。1914年,洛克菲勒基金会之中华医学会派出考察团来华考察在上海或是在北京建立医

学院的可能性。另外，基金会亦考虑资助其他“有益事业”。#19 牛一定是获悉了这些可能性，便给惠霖又写了一封信，让他了解相应情况：

……但是，如果洛克菲勒基金会通过拨资金资助医院的计划，而且如果仁济医院也包括在洛克菲勒“托拉斯”之内或者与洛克菲里基金会“托拉斯”合并，那么你就可以要求同其他医生相同级别的报酬，如果医院包括在那个“托拉斯”之内的话，因为我听说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医疗研究（人员）享有高薪水，所以，你不要去想你的薪水会比别人低……同著名医院之一有联系是一个使你在 中国声名鹊起的好机会，尤其是同戴文波特医生一起工作（提醒你，不是在他之下工作）……#20

在 9 月 9 日的信中，牛显示出他认识问题的敏锐性，他意识到关于在外国企业工作的华人雇员待遇平等性的实质问题。在医学领域，仅有的几所著名西医医院均是教会医院。医院里只有少数受过西方教育的华人医生，他们拿的几乎都是低薪，通常约为外国传教士医生的一半。#21 此外，中国人的职位也远比外国医生低，即使他们所承担的责任是一样的。对这一矛盾进行辩解常常又落到中国人自己身上。随后的刘瑞恒博士（1909 年获哈佛大学理学士，1913 年获哈佛大学医学博士）就业事便揭示了这一现状。

中国哈佛医学院位于上海，开办于 1911 年。在其存在的 5 年中，医院一直紧缺受过西方教育的称职的华人医生。1913 年，曾有人企图劝说牛尚周让其次子惠生中断医学学业，回上海在医学院工作两年。牛的决定是不能中断惠生的学业。1915 年，医学院再次试图招聘牛惠生，他那时已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并即将结束实习期；另外，它还向刘瑞恒博士提供助教衔，刘博士已于 1913 年取得哈佛大学医学博士学位。许多年轻的哈佛医学院毕业生进入中国哈佛医学院做助教，这就使招聘刘博士担任这一职衔的提议遭遇到相当多人的反对。资深外科医生赫德布洛姆（Hedblom）给波士顿的中国哈佛医学院办公室秘书长德鲁（Drew）写信道：

我丝毫不反对这一招聘。我个人是喜欢刘博士的，而且我在这件事上面毫无种族顾忌。对于在华居住的普通外国人，不会有同样的说

法。诸如让刘博士协助我为外国人做手术等等这些事情是丝毫没有问题的。但是,我并不是说这种状况应该接受,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是他们并非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他们要的并不是他们可能得到的。#22

事实上,招聘刘博士的提议在上海和波士顿引起如此之争,以至于不得不召开员工大会来正式讨论这件事。

刘博士最终未得到指导学生的职位,后来他于1927年成为国民政府第一任卫生部部长。但是,在中国的许多医院做手术的时候,受过西方教育的华人医生仍然长期处在“后座”地位,站在外国医生之后。

女子教育

中国父母认为送男丁去读四书五经意义重大,这一观念在1900年代早期依旧相当普遍。然而,传教士开始影响到一些女子教育方面的变化。在在华传教士的影响下,石美玉和康成于1892年进入美国密歇根大学医学院学习。#23 著名学者康有为于1902年送他的女儿去美国接受教育。#24 1914年,金陵大学对女子教育敞开大门。#25 但是,总体来说,女子教育还是被极端忽视。因此,牛尚周把他的两个还十分年幼的女儿送到海外接受教育,此举在他的那一代人中是非同寻常的。

不幸的是,关于牛如何、又是为什么要送他10岁的女儿惠珠于1907年去波士顿留学,^[1]我们没有第一手材料。据现仍健在的另一个女儿牛惠珍^[2]回忆,佛蒙特州布拉特爾伯勒市的弗雷德里克·霍尔布鲁克(Fredrick Holbrook)夫妇有过一个女儿名露西(Lucy),少女时代就自杀了。#26 霍尔布鲁克夫妇因而想领养一个女儿。虽然我们对一系列情况并不清楚,但是能够明确的是,牛在1907—1919年将女儿惠珠交给了格蕾丝·霍尔布鲁克(Grace Holbrook)夫人监护。在那12年里,牛惠珠在私立的米尔顿中学(Milton Academy)寄宿了两年;1909—1914年就读于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剑桥女子学

[1] 牛惠珠于1907年跟随姨丈温秉忠赴美留学。温秉忠时带领中国官费留美学生赴美留学,同时赴美的还有倪锡纯(官费生)、宋庆龄(官费生)和宋美龄。牛惠珠和宋美龄一样均非官费生,系温秉忠私人顺带。——译注

[2] 牛惠珍已于1999年在美去世。——译注

校 (the Cambridge School for Girls) ; 以后就读于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 (Radcliffe College), 1909 年获得文学士学位。虽然牛尚周致霍尔布鲁克夫人函的内容大多数都是寒暄, 但是其中一封信尤为特别地表现了他关于如何让女儿接受教育的鲜明观点:

至于西蒙斯学院 (Simmons College), 是否能允许我坦率地谈谈您所提到的那门课程, 这是最为优秀的一门课,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都颇受欢迎, 但是我恐怕这门课对于情况大为不同的中国相当不合适; 我们中国人远没有这么先进, 而且也许再过十年也不行。

我和牛夫人希望的是, 惠珠将来要完成“拉德克利夫”的学业, 并且获得“文学士”学位, 之后, 如果情况允许的话, 再到一所上等的师范学校去学习一年左右, 以便她回国后能胜任执教。

诸如“文学学士”和“文学硕士”这种学位在中国都算得上是很珍贵的, 尤其是在著名学府获得的学位则更为稀罕。如果没有学位, 我恐怕我们的同胞会说三道四, “没获得学位算什么事啊”。我已经写信给惠生, 要他就学位这件事来拜访您, 并让他坦率地告诉您中国的情况等等。 #27

牛已经于 1913 年把另一个 13 岁的女儿惠珍送往英国留学。在一封特别详细的信中, 牛向惠珍的监护人戴维斯 (Davies) 小姐, 不仅就教育而且还就其他方面的行为, 概述了他的愿望和观点:

教育

我们的目的是让她学习医学, 以使她在回国后有朝一日以此为生; 因为只有 13 岁的她只学过简单的英语基础知识, 而且还一直学习中文写作, 所以她的英语学习自然远不如其他像她这样年龄的女孩子来得优秀。因此, 您要为她准备的是医学课程, 您只要挑那些她进英国女子医学院要考的课程。

同伴和社交

一个身处他乡异国的外国人必须特别讲究同谁结交, 对女孩子而言尤其如此。我们希望我们的女儿有好的同伴, 与个性坚强的优秀基督教青年结交。一直以来, 某些出洋者有时候将他们的时间浪费在太多的社交活动和出国旅行上, 忽视了他们的学习。我们愿意让她参加

年轻人的活动,但是不能太多。我们愿意让她在英语国家生活,去了解并观察那些最优秀的事物而非有害于她的健康和学习的東西。您得注意的是,她在外出或者离开学校的时候必须有女监护人同行。

宗教教育

我们属于英国伦敦会,我们的女儿从小就一直在悉心教导下成长,她的宗教课程必须得到重视,如果可能的话,她应该定期去教堂(公理会的),她非常喜欢神圣的赞美歌,而且还能唱一些宗教圣歌。我们深知她将会接受宗教教育,所以这事我就拜托您了。

朋友

我们认识纳尔逊·布里顿(Nelson Britton)牧师、C. J.戴文波特医生和夫人,我认识我们教会(伦敦会)的莫尔帕斯(E. J. Malpas)夫人,他们现在都在英国伦敦。博克斯(E. Box)牧师及其夫人目前在上海但明年6月将回英国。万一其中有人向我们的女儿发出邀请,邀她去做客,您可以让她去;还有一位博克斯小姐(博克斯牧师的妹妹)住在离伯吉斯希尔(Burgess Hill)有12英里的布赖顿(Brighton)。万一博克斯小姐也来邀请我们的女儿,您就让我们的女儿去拜访她吧。不管是哪一个教会朋友来探望我们的女儿都是非常受欢迎的,但是无论如何您得禁止任何中国青年男子(一般是中国留学生)给我们的女儿写信或打电话。在她启程之前我们已经关照过她这些事情。因为种种原因这么做不好,中国女留学生越少见到中国青年男子就对双方在中国的父母越好,我们这里没有青年人互相见面的习惯,这么做会带来坏名声,我可能会说“丢脸”,除非双方已经订婚他们才能相互见面,但必须得有第三方在场。我这么写是因为在美国有先例,中国年轻人(女孩和男孩)相互见面,听说有人说这么做总归是不好的……#28

既然两个儿子惠霖和惠生已经在学医,牛还想让另一个孩子从事同样的职业就显得奇怪了。不过,中国的一些教会医学院已经在教女子学医;因此,牛能够看到这一向女子开放的领域就不足为怪了。在差会圈子中,医学传教士正在要求他们的母会派女医生来华,因为中国女病人要女医生给她们治病。#29 就惠珍而言,她在1917年牛去世后就不再继续学医,后来她的学业也因回国而中断。

家族和政治

1911年创立中国的共和国时，在袁世凯和孙中山之间产生了许多冲突。虽然孙是名义上的中国领袖，但是为了和谐一致，他把大总统职让位于袁世凯。1912年，孙被任命为全国铁路督办，但是他和他的追随者们不久就丧失了他们的地位。国民党被宣布为非法后，孙和他的追随者逃亡海外。^{#30} 这就意味着与孙和国民党有关系的三亲六戚也处于丢失工作或者更严重的是丢失性命的危险境地。

牛夫人的父亲倪蕴山有三个女儿，倪珪贞嫁给了宋耀如先生，他们的女儿宋氏三姐妹的夫婿均是历史名人——孙中山、蒋介石、财政部长孔祥熙。儿子宋子文教名“保罗”，曾长期担任外交部长。1913—1917年期间，宋美龄和宋子文分别就读于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和哈佛大学。牛惠珠在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牛惠生在哈佛大学医学院。这些表兄妹经常往来。1914年1月，由于孙袁冲突，宋及其家人不得不赴日避难。^{#31} 不过，他们于1914年10月28日返回上海^[1]，但牛在11月7日写给儿子惠生的信中提到他还没有见他们：“原因是我在政府造船厂工作，我不想使自己受到任何一个与政府敌对的政党的牵连……我这么做是对的……因为如果我同叛党有瓜葛，我的‘饭碗’会被敲掉……妈妈知道这件事，而她也害怕如果我同敌对方的任何一个人相聚或者被看到在一起，我的位置将不保……”^{#32}

在国内政局动荡期间，牛最害怕的是失去他的工作。许多在美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支持孙博士和他的事业，这使得牛极为焦虑，因为他害怕他的孩子也卷入其中的一个政治派别。1915年3月和4月，牛给惠生和惠珠写了3封信，要他们牢记如果他们同宋家有瓜葛的后果。在第一封信中，牛提道：“C.J.宋^[2]姨父不久将离开日本去美国……去参加巴拿马博览会和……保罗·宋^[3]6月间取得（哈佛）文学士学位的毕业典礼”^{#33}，所以：

[1] 时宋耀如仍留居日本。——译注

[2] 即宋耀如英文名Charles Jones Soong的缩写。——译注

[3] 即宋子文。——译注

妈妈要求你们……不要去见宋姨父……你们不仅绝不能去见他或者把他介绍给你们任何一个朋友,还得不能让他看到你们……请你们俩仔细斟酌我们的告诫并遵照执行。你们也许知道宋属于孙中山的政党而我是现政府的人。所以,你们必须极其谨慎,如果你们同宋家有任何瓜葛,这就意味着你们父亲事业的毁灭和在造船厂地位的丧失……我们的观点和目标就像南北两极那样完全相反……即使你们的宋阿姨^[1]、蔼龄和庆龄从日本回国,自她们1914年10月28日回来至今,我也一直没有见过她们,虽然我们的住处^[2]仅十步之遥。为什么?因为如果我见了她们并同她们谈话,人们会说我是一个‘叛逆者’而告发我,我会陷入麻烦之中;所以,我同她们保持距离,至今为止我还没有受害,因为我对与人交往是非常谨慎的……

温(秉忠)姨父在孙中山负责的铁路业方面与宋家有联系,他已经逃亡,他未来不会被现政府起用,因为他有与叛党瓜葛的案底。你们要引以为戒。所以,如果我或我家庭中的任何一个成员与叛党有瓜葛,人们会说我和我的家人也是叛匪……#34

第二封信写于3月20日,再次强调了第一封信中的告诫之语。牛建议,如果“宋姨父”提出见霍尔布鲁克夫妇,无论什么理由,惠生应该“简单说不方便,并……要运用一切借口。我们不希望他……‘窥探’到牛家的事务。”第三封信的日期是1915年4月9日,牛恳求惠珠“不要去见你的(宋家)表兄妹或者任何一个中国学生,也不要给他们写信或者有任何联系,同所有人都不要来往。”#35

危机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因为之后再也没有信提及家族卷入突发政治事件之事。

结 语

当容闳把四批幼童带到美国来时,他的宏愿是让这些少年接受一种还不适宜于当时中国的教育,他们学习不同领域的基础知识,这些

[1] 指宋耀如夫人倪珪贞。——译注

[2] 时宋家居虹口东有恒路628号C(即今虹口区东余杭路530号、526弄17—31号),牛家居东有恒路622、623号。——译注

知识有助于中国的近代化。他们回国后,作为中国和外国政府之间的“中介”,会部分改变政府,就像容闳本人在有限的范围内所能够做到的那样。不幸的是,九年之后,各种政治问题中断了他的宏伟规划。

虽然这一实验是短暂的,但是毋庸置疑的是,留学生们在许多方面的观念改变了。像牛尚周这样的归国留学生所遗留下来的信件,证明了这些改变对他的影响。在我们还无法全面掌握资料了解牛尚周生平时,这些遗留下来的信件展示了牛所持的独特见解。他回国后,美国对他的影响仍然持续,以至于他娶了一位信奉基督教的女子为妻,并且将他的所有孩子送往海外留学。这在1900年代早期是非同寻常的。

西方影响还以另外一种显著的方式持续着。牛尚周是西方杂志、报纸和小说的热心读者。在所发现的档案中,除了他的信件外,还有他从美国和英国所订各种期刊的目录。1917年间,他从美国订购的有:《我的宽广世界》(*My Wide World*)、《纽约棒球》(*New York Base Ball*)、《大都会》(*Metropolitan*)、《年轻人公司》(*Youth's Company*)、《乡绅》(*Country Gentlemen*)、《纽约星期日的太阳》(*New York Sunday Sun*)、《斯普林菲尔德》(马萨诸塞州)、《共和党人》(*Republican*)、《每个人》(*Everybody*)、以及《四海为家的人》(*Cosmopolitan*)。如果这些报刊杂志有没送到的,他会立即写信询问为什么这份特定的期刊丢失了。牛常常会要求他在英国的儿子惠霖在位于伦敦帕特诺斯特街(Paternoster Row)的埃利奥特书店出版社(Elliot Stock Bookseller Publisher)存一些钱,那样他就可以购买大量的推理小说,比如《一个流氓的一生》(*A Rogue's Life*)及《法律和夫人》(*The Law and the Lady*)、《闹鬼的旅馆》(*The Haunted Hotel*)等诸如此类,每本书10先令6便士。即使牛自1881年回国后再也没有离开过上海,但是流行杂志和报纸使他能够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能跟上美国和英国的潮流。他同子女和来自美国、英国的传教士的联系为他打开了通向外部世界的窗户。

这批信件——只有少数重要信件被摘录在一张短短的纸片上——鲜明地展示出一个看上去在很多方面都已经“洋基佬化”的中

国人形象。然而,牛尚周能够过上一种相当成功的生活,而且还充分保证了他的妻儿也过上这样的生活。

- #1 卫三畏致夫人函(1872年8月2日),卫斐列(Frederick Williams)著:《传教士、外交家、汉学家卫三畏法学博士之生平及书信》(*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Wells Williams, LL.D.: Missionary, Diplomatist, Sinologue*),纽约,1889年版,第391页。
- #2 容闳著:《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纽约,1909年版,第18、197—215页。
- #3 成绩单上的出生日期,菲利普艾斯特中学,1879。该信息由菲利普艾斯特中学的爱德华多·德罗什(Edouard L. Descroches)于1984年11月20日提供。
- #4 容闳著:《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第189页。
- #5 梁伯华私人来信,1984年11月20日。
- #6 德罗什先生提供的成绩单。
- #7 菲利普艾斯特中学35人班级合成表,发现于牛尚周档案,表上列有其他3名幼童。德罗什提供的信息显示出有5个班级有中国幼童。
- #8 1876年陈兰彬被任命为驻美全权公使,见容闳著:《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第200—203、204页。
- #9 虽然牛尚周健在的女儿不记得她父亲的职业,但是牛的长女惠珠在申请入学拉德克利夫学院时,曾记录她父亲的头衔为“总办”。见拉德克利夫学院档案保管员简·诺尔斯(Jane S. Knowles)提供的记录单。
- #10 在倪牧师的5个孩子中,倪珪金排行老二,倪珪贞排行老三。倪珪贞后来嫁给了宋耀如,他们育有六个子女:蔼龄(1890年生)(孔祥熙夫人)、庆龄(1892年生)(孙中山夫人)、美龄(1897年生)(蒋介石夫人)、子文、子良、子安。见夏晋麟:《牛尚周生平》,1984年致作者私人函;骆惠敏编:《乔·尼·莫理循书信集2:1912—1920》,纽约,1978年初版,第478页。更多关于牛尚周与宋家的关系详见斯特林·西格雷夫著:《宋家王朝》,纽约,

1985年版；夏晋麟私人来信，1984年6月4日。

- #11 施思明著：《中国医疗工作，1934—1941》(*Medical Work in China, 1934-1941*)，佛罗里达州伯克莱顿市出版，第14页；牛康民、Yuet Wah Cheung著：《中国哈佛医学院，1911—1916：中国西医教学史的扩展脚注》(*Harvard Medical of China, 1911-1916: An Expanded Footnote in the History of West- medical Education in China*)，《社会学和医学》(*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第12卷，1982年版，第16页；鲍威尔主编：《名人录》，第三辑，上海，1925年版，第620页。包华德主编：《民国名人传记辞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纽约，1968年版，第3卷，第43—44页；牛尚周致戴维斯小姐函，1913年10月28日；牛尚周档案。作者感谢牛恩健允许摘录书信内容公开出版。多年以来，笔者知道牛尚周在幼童时期来到美国，但笔者从未注意到他在历史上的地位，或者说他是否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且，笔者最近一直在从事1830年代至1937年的医学传教士及其对中国卫生保健贡献的研究。
- #12 我在研究中总会看到我父亲牛惠生的名字。父亲在1915年回国后，成为一名整形外科医生，他积极参与创办中华医学会，并在1930—1932年任中华医学会会长。1937年他逝世时，我年仅9岁。
- #13 我在孩提时代对家族历史仅知道一些皮毛，而我最近的研究使我了解到越来越多，我对牛尚周和牛惠生所处的纷繁复杂的历史背景变得十分敏感。我还意识到某些连续性的事情。当我1941年来到美国时，我和我母亲最初驻留的地方之一是佛蒙特州布拉特尔伯勒(Brattleboro)；当我在新泽西州、马萨诸塞州上寄宿学校，以及之后在新罕布什尔州汉诺威读大学时，卡伯特·霍尔布鲁克(F. Cabot Holbrook)夫妇是我的监护人。卡伯特·霍尔布鲁克是照顾牛惠珠的弗雷德里克·霍尔布鲁克夫妇的儿子，而弗雷德里克·霍尔布鲁克则是佛蒙特州弗雷德里克·霍尔布鲁克州长(1861—1863)的孙子。
- #14 鲜为人知的是，牛尚周早年在华时是个孤儿，他也许从不知道谁是自己的父母(菲利普艾斯特中学的记录单上其“父母”一栏空

白)。他把他早年在新英格兰岁月期间所受到的影响转移到了他子女的身上,其中2人在新英格兰生活多年;这一影响也转移到了他的孙辈身上,其中许多人,比如牛恩健、医学博士夏益荣^[1]和我,也在新英格兰长大并接受教育。

- #15 有关圣约翰大学及其他教会大学的更多细节,详见鲁珍晞(Jessie G. Lutz)著:《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纽约州伊萨卡,1971年版。
- #16 夏晋麟私人来信,1984年9月12日。
- #17 牛尚周致牛惠霖函,1914年2月10日;牛尚周档案。
- #18 牛尚周致牛惠霖函,1914年8月15日;牛尚周档案。
- #19 详见牛康民、Yuet Wah Cheung著:《中国哈佛医学院》。
- #20 牛尚周致牛惠霖函,1915年9月9日;牛尚周档案。
- #21 详见牛康民、Yuet Wah Cheung著:《中国哈佛医学院》。
- #22 赫德布洛姆医生致德鲁函,1915年5月29日;哈佛大学档案馆藏查尔斯·埃利奥特(Charles Eliot)档,第407盒第1页。哈佛大学档案馆批准出版这些书信和会议记录。
- #23 有关石美玉和康成的更多细节,分别见包华德主编《民国名人传记辞典》的第3卷第128—130页和第2卷第225—226页。亦可见简·亨特(Jane Hunter)著:《高雅的福音:世纪之交在美国的美国女传教士》(*The gospel of Gentility American Women Missionaries in the Turn-of-the-Century China*),纽黑文,1984年版,第74—75页。
- #24 罗荣邦著:《康有为评传》,图森,1968年版,第193页。
- #25 详见鲁珍晞著《中国教会大学史》;亦见简·亨特著:《高雅的福音:世纪之交在美国的美国女传教士》。
- #26 有关Hollbrook家族的更多细节,详见《美国名人传国立百科全书》,第8卷,纽约,1924年版,第323页,关于佛蒙特弗雷德里克·霍尔布鲁克州长(1861—1863)的条目。同书第18卷,

[1] 牛惠珍与夏晋麟之子。——译注

1922年版,第359页,关于格蕾丝·霍尔布鲁克夫人之夫弗雷德里克·霍尔布鲁克的条目。

- #27 牛尚周致格蕾丝·霍尔布鲁克夫人函,1915年5月4日;牛尚周档案。
- #28 牛尚周致戴维斯小姐函,1913年11月10日;牛尚周档案。
- #29 详见Yuet Wah Cheung、牛康民:《医学传教士与中国病人之争:教会医护服务的可信度在二十世纪早期中国》(*Missionary Doctors Versus Chinese Patients: Credibility of Missionary Health Care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hina*),《社会科学与医学》(*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即将出版。
- #30 陈志让著:《袁世凯,1859—1916:取得皇位的布鲁图斯》(*Yuan Shi-k'ai, 1859-1916, Brutus Assumes the Purple*),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1961年版,第196—218页;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第2卷,纽约,1975年版,第550—591页。
- #31 “他(宋)和他全家人都在日本……”,出自牛尚周致布里顿先生函,1914年1月7日;牛尚周档案。
- #32 牛尚周致牛惠生函,1914年11月7日;牛尚周档案。
- #33 牛尚周致牛惠生和牛惠珠函,1915年3月8日;牛尚周档案。
- #34 温秉忠娶了牛尚周夫人最小的妹妹。根据骆惠敏书:“温秉忠,留学美国的归国留学生,长期担任端方的秘书和翻译。一度掌管过南京临时政府的外交事务,但后来弃政从商。他于1916年被暗杀。他本人署名B. C. Wan。”(骆惠敏编:《乔·尼·莫理循书信集1:1895—1912》,纽约,1976年初版,第692页注释2。)夏晋麟对温于1916年被暗杀提出异议。按照夏的说法,温在1943年自然死亡。夏晋麟与作者私人谈话,1984年12月25日。
- #35 牛尚周致牛惠生和牛惠珠函,1915年3月12日;牛尚周致牛惠生函,1915年4月9日;牛尚周档案。

(著者牛康民教授已故,系牛尚周次子牛惠生之子;

译者朱玖琳系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研究室副研究员)

《最后的女皇——蒋介石夫人和现代中国的诞生》

选译

宫洁菁 译注

[译者按]

本书作者海纳·帕库拉(Hannah Pakula)是美国著名传记作家,与书中的主人公宋美龄是美国威尔斯利学院的校友。帕库拉耗费10余年撰写此书,于2009年出版,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推崇这本传记是“盖棺定论的权威之作”。

本书撰写采用编年体形式,从1864年宋美龄的父亲宋耀如在海南岛出生写起,一直写到2003年宋美龄在纽约病逝,跨越三个世纪,中间穿插了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的战乱和宋氏家族的兴衰。

书中作者引用的材料除了当时公开的文件、报刊文章之外,还有当事人的回忆录(主要是外国记者、顾问等人的记录,包括宋子文在美期间的文件)。这些材料有的是公开出版的,有的保存在美国各地的博物馆、图书馆。

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出现的大量宋美龄写给爱玛·米尔斯(Emma Mills)的信。爱玛·米尔斯是宋美龄在威尔斯利的同学,最好的朋友。两人书信往来频繁。宋美龄写给爱玛的信十分坦诚,以至于她多年后要求爱玛销毁一些过于私密的信。这些信现在已经公开,并且出版了一本书《蒋介石夫人和爱玛·米尔斯小姐》(*Madame Chiang Kai-shek and Miss Emma Mills*)。书中有关宋庆龄的叙述和描写多引用埃德加·斯诺和文森特·希恩的原文,对于宋氏家族的介绍,不乏一些鲜为人知的新材料和独特的新视角。

本书的中译本已由东方出版社于2012年出版,但译者林添贵先生对原著内容有所删减和修改。因此,本人本着绝对忠于原著的宗旨,节选其中一些与宋庆龄、宋氏家族密切

相关的章节译成中文，以飨读者。

11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美龄去广东拜访姐姐庆龄以及庆龄的丈夫孙逸仙。战胜当地的军阀，废止军政府之后，孙正在建立与北京的政府对抗的革命政府，似乎是庆龄邀请美龄过去住一个月左右，帮她的忙。美龄跟爱玛解释广东“不像上海那么洋化，”又告诉她山上孙逸仙的房子俯瞰

士兵的军营，那是我姐夫的士兵。我想下面驻扎了他们中的5 000人。我们整天听到他们的军号声，还能看到他们在操场上操练……如果要进城的话，我们必须得穿过所有军营和总统府，很多人耐心地等在那里，想要采访孙博士……连接总统府和我们房子的是一条私人的隐蔽通道，像是一座天桥……两端都有卫兵，要有孙博士给的通行证才能通过！这条通道只有我们和我们的来访者使用。

和庆龄住在一起，更让美龄觉得自己没用，因为庆龄已经全身心地投入到丈夫的改革事业中去。“我想你是我的朋友和亲人中唯一一个可以让我吐露心扉的人，我承认，如果说要完成一些有价值的事情的话，我过去那五年完全是在做无用功。”她1921年4月写信给爱玛说。

……如果我真有决心的话，就应该克服和清除一切障碍，离开舒适的家，到内地去，“靠我自己的力量”做一些工作，离开那些知道我的家庭的人——尤其要离开上海，在这里，因为家庭的关系，我做的所有社会服务都能得到公众的认可……我以热心公益事业和有执行力而出名……我也被公认为“高智商”、“脑子灵活”，对此我觉得很骄傲又很高兴……但是由于我家族的地位，我有些脱离“普通民众”了……我穿得很漂亮，穿西式服装，以汽车代步，不需要为了生计而教书……哦，达达^[1]，我怎么了？有时候我觉得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自我

[1] 英语里“达达”(Dada)即儿语“爸爸”，亦指“达达主义”。在这些毕业后不久写的信中，美龄称爱玛为“达达”，自己署名为“女儿”。在她们大学四年级的时候，“达达”这个词从欧洲传到了纽约，它来源于先锋派的反战运动。后来“达达”主要用来指一种倡导无政府主义的艺术和文学流派，其基本特征是追求不受情理约束或理性干扰的自然随兴而无意义的境界。一些敢于挑战的开放女性领导这场运动来反对艺术领域里的偏见，反对妇女的唯诺顺从。这些正符合了爱玛叛逆的个性，因此，她选择“达达”作为自己的标签，而比爱玛小2岁半的美龄就将“女儿”当作了自己的代名词。——译注

放逐,做一个基督教修女,放弃一切……过一种没有私欲的生活。也有时候,我想要结婚,了结所有事情,随波逐流,不让自己思考……你知道,男人看待人生的观点当然是和女人不一样的。或许他们暂时没有外遇,但最终一定会有。我遇到过很多我以为很可靠的男人,他们其实都有这种事……这种情况在中国尤其泛滥,这里的道德标准和美国的区别太大了。

然而,一个月后,美龄被她的哥哥从南方“拽”回家,她写了封信向爱玛介绍说“我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B先生。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她继续写道:

我非常喜欢他,他也喜欢我。乘船离开香港的前一个晚上,我在一个朋友家里碰到了他,尽管只是一起在船上待了三天,我们还是成了很好的朋友。我们到上海的那天是他的生日;所以尽管已经离家三个星期了,我还是花了一整天和他在一起,我们在一起过得非常愉快,我真高兴能在自己的人生中冲动一次。不用说,家里人对我不大光其火……他们也因为他是个外国人而发火……星期六下午离开后,他马上就发来两个电报,诉说他有多想念我。家里人想把电报藏起来,不过没成功……你知道我的家人有多保守,一定要维持“纯正”的家族血统,他们宁肯我死也不让我嫁给外国人。一般情况下我会坚持自己的选择——但是——现在我在认真考虑是否接受另一个男人。我喜欢他;他是最成功的年轻人之一,有很好的家世、素养、教育背景等。但我还在做思想斗争。你知道大多数时候,人们对于一个明智的建议会在理智上被说服,但情感上还是不能转过弯来……不过请不要告诉任何人,因为我打算自己解决。同时,如果B先生去找你,一定要对他很好;可千万不要告诉他我跟你讲的事情。

夏天,炎热让美龄变得沮丧,她又陷入了低谷。“我知道,朋友们、亲戚们,认识的人们都嫉妒我,”她写信给爱玛:

因为他们觉得我拥有人生所需的一切好东西,一切需要的东西!……我的确是我的朋友中最有钱的。但是为什么……我不知道感恩,反而那么厌倦生活呢?……我试着去从事“社会服务”,或者“自我提升”,甚至“游手好闲”,事实上所有富裕、充实的生活能做的事

情我都试了。可我失败了!!现在我要尝试一些新鲜的,至少对我来说是新鲜的……

达达你知道,我不是一个虔诚信教的人。我实在太独立了,做不到很温顺,或者谦逊,或者唯命是从。也许你也知道,我的姐姐孔夫人,比我还要独立。她比我热情,是个很杰出的女性,并且善于交际——两三年前一直都是社交界的领军人物,她甚至否认上帝的存在,如果她在场的时候有人提到宗教,她要么回避这个话题,要么坦率地说这只是旧式女人们无聊的行为,等等。但是现在,她变得很虔诚,她告诉我她之所以改变是因为她意识到了自己以前对待上帝的方式和态度是错误的。她说她曾经经历的那段时间比我现在还要痛苦得多,面对这些苦痛她求助于上帝——现在她找到了生命的慰藉和信念。我希望你认识她,因为她无疑是我们家最杰出的女性,她特别热情、机智、活泼、敏捷,而且充满活力。她绝对不是那种很狂热的人,但是她深深地信奉宗教,现在总是祈祷上帝帮助她解决问题。而且,她找到了平静,之前从来没有想象过的平静……

她告诉我克服疲累的唯一方式就是信教,真正跟上帝亲密地交流。你知道,她从很早以前就开始跟我这么建议。我以前总是会发火,因为她的话激怒了我,我总让她不要管我。但现在我尝试接受她的建议,到现在为止还不能说是否见效。但是我想说,自从听从她的建议,我真的快活起来了,祈祷的时候觉得好像不再是独自一个人背负重担。这样说吧,现在我乐于接受了。我无法跟你解释这一切;但我真希望你在这里跟孔夫人谈谈。你知道信教并没有改变她平时的生活方式,她还是很愉快,出去参加派对等,就跟从前一样,但是总有某个方面,变了。她不那么严苛了,思考问题更周全了,对别人的缺点也不是那么无法容忍了。

与上帝亲密交流最本质的一点就是相信上帝总是与你同在。那些表象的东西,例如去教堂做礼拜,读《圣经》什么的,只是帮助你更接近上帝。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相信上帝的爱是万能的……我希望你自己也尝试一下。我发现跟上帝交流的最好途径就是选择一首赞美诗,诗的意境要完全符合你的需要,然后诵读或者唱这些文字,直到

它们渗入你的意识,这样你就会感到你的心灵已经准备好与上帝交流了;接下来,就开始祷告,就像跟你的父亲或者一个很亲密的朋友讲话一样。当然每个人祷告的方式都不一样;但对我来说,这是个好方法……这样我能强烈地感受到上帝的存在。

也许你会觉得我疯了,但是真的,达达,别的我什么都试过了。也许你认为我现在变得“伪善”了,但是不!此时此刻我正坐在我房间外面的阳台上,边给你写信边抽烟,我很享受烟草的味道。

12

尽管孙的顾问们力劝他不要去北方,他还是在1924年11月12日离开了,随行人员中包括颇具传奇色彩的侍卫双枪马坤,加拿大来的小流氓,他最好的特质就是忠心耿耿地追随孙和庆龄。北上之前,孙、庆龄,还有他们奇怪的随从组合,在黄埔岛作了停留,在军校待了一晚。陈洁如陪伴庆龄,蒋则在孙面前进行了一次正式的阅兵。^[1]临走之前,孙告诉蒋他要去北京了,“不确定”还能不能回来。事实是,孙感觉不是很好,一定已经猜到自己活不了多久了,所以想趁着还有力气,开始他梦想已久的北方考察之行。11月底他到达神户,他这次去日本的重点是作一次演讲,呼吁同种族之间团结一致对抗西方,还提醒他的听众1905年日本战胜了俄国。庆龄也作了一次演讲,以妇女解放为题。日本政府忽视孙的到来,没有邀请他们去东京。

在去天津的路上,孙的病已经很严重了。12月4日到达后两天,他被要求卧床。这一年的最后一天,他终于到达北京,一开始他住进北京大饭店,然后搬进被认为全中国最好的北京协和医院。1月26日由外科主任医师为他进行手术,手术结果诊断为无法医治的肝癌。

两个星期前,还呆在北京打算下个月回家的爱玛·米尔斯收到美

[1] 误,孙中山、宋庆龄是日并未在黄埔军校留宿。1924年11月13日晨,宋庆龄陪同孙中山由大本营乘坐电船至永丰舰。10时许,永丰舰鸣号启锚,各军政人员及各机关团体代表数百人分立东堤天字码头,为孙中山送行。下午3时余,永丰舰抵黄埔,孙中山、宋庆龄受到全体师生的热烈欢迎,随即登岸入黄埔军校视察一周。复由蒋介石等导往鱼珠炮台检阅第一期毕业生演习战术实施等。检阅毕,与军校师生一同聚餐。约5时50分,永丰舰在苏联巡洋舰“波罗夫斯基”号护卫下,离开黄埔驶往香港。黄埔师生1000余人列队热烈欢送。——译注

龄的一封信，里面附了封给庆龄的信，让她亲自转送。结果爱玛送完信就在那里和庆龄一起用晚餐：“她（庆龄）认为（孙）博士好起来了，但是城里大多数人的观点都是认为他活不下去了，”爱玛写信回家。“……当然，我还没有见到他。他们有两个护士，还有所有的医生……他们希望美龄能来，但我怕将是我启程以后的事了。”

二月份爱玛回美国的时候，孙病得越来越重了。西医放弃之后，决定采用古老的中医疗法。由于在西式医院里使用中药不合道理，所以孙被移至著名外交家、前外交总长顾维钧的家里。顾在北京的宅子占地四公顷，包括一个中西式结合的宫殿，以前住的是一个舞娘，她是明朝最后一个皇帝的岳父的情人。

病危期间，孙身旁有忠诚的庆龄、他成年了的儿子和女儿（他们的母亲不在），以及包括鲍罗丁在内的好几个政治方面的随行人员。在场的还有美龄和葛龄，她们乘火车从上海过来。火车上没有食物，没有喝的，也没有暖气。水都结冰了。“我们又渴又饿，还很冷，”多年后美龄在给一个国民党元老之子的信中写道。“离开上海前，我们就知道这次旅程会危险重重，很难估计我们什么时候能到达北京。然而，我们是出于对总理的爱而去的，这是我们给予二姐物质和精神支持的一种方式。”

陪伴在孙病榻边的除了亲戚之外，还有老朋友和国民党的合作伙伴，他们听从鲍罗丁的指挥，决定仿效列宁被偶像化的做法替孙办理后事。为了让他永远留在民众心中，他病重期间被鼓励给他的追随者写下一些指示，其中包括一份广为流传的遗嘱，由汪精卫起草，然后读给他听征询意见。据孙的姐夫孔祥熙说：“某一天我们觉得孙博士的状况好一点了，几个人就聚在床边，把遗嘱读给他听。孙夫人……跑进房间，开始哭泣。这使遗嘱阅读没法进行下去。但是我们必须有孙博士的签名。后来，孙博士虚弱得没法写字了，我们就叫孙夫人托着他的手腕签署遗嘱。”这个场面发生在1925年3月11日，第二天孙就去世了。

孙逸仙去世后，获得了他生前没能达到的地位——被尊奉为“革命圣人”。男孩子们以他为名，马路、医院、大学，甚至赛马都用他的

名字。到处都挂着他的照片——豪宅华厦里、农舍里、办公室里、工厂里。大型海报、城墙都印刷他的肖像。就连他最后的遗嘱也被使用在一种类似宗教的仪式上，军营、工厂、集会大厅里都举行这种仪式，参与者们脱帽聚在一起，对着他的照片三鞠躬，然后肃立，恭读遗嘱。“过世的领袖以前重复的话在被宣读，没有人讲话，甚至没人敢咳嗽，”一个看到其中一场仪式的记者说。宣读结束后，有三分钟的静默时间，让人“自我检查和揭露”，“思考三民主义”，“自己决定是否适合参加国民党的工作”。就像一个观察员所总结的，“事实是，孙逸仙死后比生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意义更大。”

15

庆龄仍然拒绝改变立场或逃避。7月14日，她发表了一篇文章谴责蒋介石和他的国民政府：

一切革命都必须……以社会的基本变革为基础，否则便不成其为革命，只有改换政府而已……孙博士……下了决心，认为中国农民的生活不该长此这样困苦下去……但今天自命为孙中山信徒的人，口里谈的是阶级，心里想的却是一种实际上漠视中国千百万贫困农民的疾苦的“革命”。孙中山的政策是明明白白的。如果党内领袖不能贯彻他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

文章发表没多久就立即被禁止了^[1]——在此之前宋庆龄回到了上海莫利爱路的寓所。在那里，她继续谴责蒋介石政府——据希恩说，换了任何别的人这么做，都会招来“杀身之祸”。据说有一天国民党内一名并不得志的成员来拜访她。“如果你不是孙夫人，我们就把你的头砍下来了，”他阴沉地说。“如果你们才是真正的革命家，”她笑着回敬，“不管怎样你们都会砍下它的！”宋庆龄的家里人不断施压让她加入蒋介石的阵营，她又没有办法阻止别人利用她丈夫的名义去粉饰反

[1] 这篇文章英文稿于1927年7月14日发表在汉口的《国民论坛报》上。这是由宋庆龄的亲密朋友、美国新闻记者雷娜·普罗梅负责编印的该报最后一期，但被没收。18日又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上刊登。中文稿则以传单的形式广为散发，并由《晨报》于7月21日作了简要介绍，又于24日全文刊登。——译注

革命的行为,在决定去莫斯科之前,她度过了痛苦挣扎的十天。她安排与一个名叫雷娜·普罗梅的美国朋友碰头,在某一天凌晨3点秘密启程。与她同行的还有陈友仁以及他的两个女儿,一辆苏联派出的火车在海参崴迎接他们去莫斯科。“我想她是最令人困惑的人,”庆龄的朋友对她进行了一番评论。“我一直无法确定革命对她到底意味着什么,是因为她对丈夫的盲目效忠,还是她内心的积极动力。如果是后者,那就有更多的需要克服的东西:从交际中退缩的本能,对人与事两方面存在的肮脏所持有的病理一般的厌恶,希望总是由美好事情环绕自己的欲求。”

然而,从各种环境来看,据庆龄的一个摄影师Sun Chang所说,这是庆龄访苏“最不合适的时机”。斯大林即将与托洛茨基分裂,他“严重地错误估计了中国的情况,在寻找替罪羊……可以是所有去过中国的人,或者与中国革命有关的人。”在庆龄之后抵达苏联的鲍罗丁,“被限制言论,还降了职务”,而苏联派去中国的使者越飞则自杀了。庆龄在中国的收入被切断了,她又不愿意接受帮助,希恩说她现在是“最孤独的流亡者”。只剩下几个中国朋友的庆龄跟陈友仁一起去面见斯大林,斯大林敦促他们回国跟蒋介石合作。庆龄没有接受他的建议。在苏联停留了6个月后,她去布鲁塞尔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及殖民压迫斗争大同盟”的一个会议^[1],然后去了柏林。直到1929年5月她才回国。

28

一开始就打破家族团结的人是庆龄——先是嫁给孙中山,后来是扛起共产主义的旗帜。庆龄被认为是家里的美人,作家赛珍珠这么描述她:“一个伟大的妇女……苗条但不瘦弱”,有着“细腻的皮肤,眼睛又大又漂亮,眼神真诚,轮廓美丽”,“黑头发闪耀着光芒”。日本入侵前,庆龄一直都跟宋家其他人分开住——至少是这么公开的。虽然政见和经济背景不同,她和姐妹们的联系并没有减少。《民族》杂

[1] 误,宋庆龄并未于1927年12月10日参加布鲁塞尔会议。1927年12月10日,宋庆龄在莫斯科致电布鲁塞尔反帝大同盟会议,对因故未能参加会议表示十分遗憾,并强烈呼吁会议支持中国革命。该电英文原件藏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译注

志(Nation)的记者兰德尔·古尔德(Randall Gould),描述了一个他在1930年代初^[1]看到的场面:“我在孙博士莫利爱路的房子里等待……忽然门开了,三姐妹结伴进来……像女学生一样边笑边聊。这段时间孙夫人被南京政府派出的便衣监视……夜里她家发出打字机打字的声音,有人便跟政府报告说是‘跟莫斯科联络的秘密电台’。”

然而,引用埃德加·斯诺的话,庆龄“拥护革命,她依靠个人的力量营救了很多。”但是,她没能救下邓演达和以鲁迅为首的六个左翼作家。据斯诺说,鲁迅是“是当代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但绝对不是共产党员。即便如此,他和他的五个追随者被迫挖一个大坑,手脚都被绑住,然后被扔进坑里活埋。^[2]庆龄说:“正是信奉基督教的委员长把我们最优秀的青年活埋了。显然,他修读圣经,还没有读到哥林多书哩。”

少数幸运一些的囚犯被关押在渣滓洞^[3],那是一幢小楼,曾经是个煤窑,离重庆大约一小时路程。16个男囚室2个女囚室,墙上有一些训诫,譬如新生活运动的四个好处等,企图让那些误入歧途的人悔改。为了促使人们变节,那里还保留了一个行刑室,里面有一个大椅子、一个实行绞刑的装置、一个火盆、各种各样的刑具、棍子、钩子等。

庆龄是蒋的妻姐,虽然一再发表反对政府的言论,特务机关也不敢抓她。她搬去香港一个小公寓,1938年发起了保卫中国同盟,这个救济组织成了解放区物资的主要来源。“她给我们的东西里有制造盘尼西林的原料和配方——当时在全世界来说都是领先的,”一个美国医生充满感激地说。据为她写传的张戎说,庆龄为了救济工作卖掉了她母亲留给她的首饰。“对她来说,在中国这样一个处于战争中的穷国家,奢侈是一种犯罪。”张说。“在这方面她与她那过分奢华的妹妹蒋夫人划清了界限。”直到珍珠港事件发生,庆龄才重返家庭,公众可以看到或者拍摄到她和她的姐妹们在一起的场面,而且,尽管她没有改变对蒋介石的看法,还是愿意偶尔跟他合个影。

[1] 误,宋庆龄1930年初已在德国柏林。兰德尔·古尔德于1929年8月在上海采访宋庆龄,他的文章于1930年1月22日发表在纽约出版的《民族》杂志上。——译注

[2] 误,鲁迅于1936年10月因病在上海去世。——译注

[3] 误,渣滓洞监狱设于1939年。——译注

日本人袭击珍珠港的时候,美龄的两个姐姐都在香港。双枪马坤试图让庆龄立即离开这块英国殖民地,可是庆龄拒绝了,说“如果这里有战争”她可以帮助难民。日本空袭香港后,马坤又劝她离开,解释说她必须知道“她在某种程度上是国家的女英雄”,如果她留下,很多人会因为要救她而死去。这次她同意“一旦有飞机”马上就走。尽管英国坚持了17天没有把香港放弃给日本,子文还是很担心庆龄。“二姊在哪?”12月8日他发电报给美龄。“盼即复。”当天又发了第二封电报:“港危。可黑夜派机设法使二姊出险否,盼复。”

在英国投降前庆龄得以离开香港。“要不是葛龄姐碰巧也在香港,我是不可能那么快出来的,”她一个月后写信给子文。“……我们是乘坐最后一班飞机逃走的,在机场从夜里12点等到第二天凌晨5点,每分钟都可能被炮弹、炸药炸死,我们周围的战火非常猛烈。机场里六架被毁的飞机和两个弹坑随时在提醒我们所面临的危险。……九龙至港岛间的轮渡服务停止了,只有那些持有特别军事通行证的人才能上船。所以我一直等到8号夜里灯火管制的时候,才在中央银行钟秉铎^[1]的帮助下到达港岛,钟为了救我冒了很大的生命危险。”

姐妹逃离香港之后,关于葛龄的一个糟糕的故事在重庆传开了。一辆特殊的飞机被派去营救她和她的随从,包括她妹妹。登机的时候,葛龄坚持要带上她最喜欢的宠物,一条达克斯狗。飞行员答复说飞机已经超重了。葛龄居然就让她的一个警卫留下,以致这个可怜的男人被抓住杀害。一条小狗的重量不可能危害到飞行安全,所以飞行员一定是非常讨厌孔夫人,想要毁坏她的名誉。这个故事有另一个更糟的版本,是约瑟夫·艾尔索普(Joseph Alsop)^[2]讲的,他声称葛龄的狗——一只“巨大的,肥胖的”动物——占了他在航班上的位子,导致他被留在香港,被日本的监狱拘留。第三种说法,据一个住在上海的美人说,葛龄,一个“强硬,贪婪”的女人,在离开香港的最后一

[1] 孔祥熙下属,时为中央银行广州分行经理,广州陷落后迁港办公。——译注

[2] 美国记者,作家。1941年来华,任美国志愿航空队队长陈纳德的副官。——译注

架飞机里装满她的家具，而弃她的佣人们不顾。不管这些故事是真是假，当姐妹们到达重庆时，就像庆龄所说的，“一篇中伤人的社论指责我们携带了大量行李、七条喝牛奶的洋狗，还有一大批佣人。事实是我们的飞机上有23个人，这样你可以想象每个人能带多少行李。我想对那篇社论作回应，它写的很狡猾，没有点名但直指我们，不过别人劝我应保持尊严和沉默。与此同时，谣言四起。葛龄姐说她受到太多指责，现在她都不在乎去澄清那些谣言了。我连我的文件和其他无价之宝都没办法带上，更别提我的狗和衣服了。”

到达重庆后，庆龄搬进了葛龄的大房子——30年代有位将领因为有四房妻妾，盖了这户有四栋楼房的豪宅。庆龄在那里住到1943年初，子文为她安排了一处政府的房子。一幢普通的两层楼房，里面有个小花园，下面有一个下水道，上面有座木桥。配有防空洞。重庆的防空洞被划分成各个不同等级——给农民的，给城区居民的，给官员的，依次类推——但庆龄邀请她所有的邻居跟她共用这个防空洞，不管他们是哪个阶层的。她和她的两个姐妹有私人的通话线，直接连到她们家里，战时在重庆她们常常通电话。

（译者为首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文物资料保管部文博馆员）

天津《大公报》载孙中山北上史料汇编(下)

葛培林 辑录

孙中山致东各省军民长官马电

△派员宣传国民会议

分送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奉天、吉林、黑龙江、察哈尔、绥远、热河、内蒙古各军民长官均鉴：

文对于时局主张，以国民会议为解决方法。日前发表宣言，谅承鉴察。兹特选派同志，分赴各省区，向民众宣传。每一省区约二三人，务使国民咸瞭然于会议之性质及关系。其宣传范围，以此为限，不涉及地方政事及军事。所选派之同志，皆有文署名盖印证书为凭。诸希鉴察是荷。

孙文 马^[1]

(天津《大公报》1924年12月22日)

促进国民会议之专电

杭州来电：

孙中山先生并转北京段芝泉执政钧鉴：

国民会议在军阀崩坏中发现，极易被有力者窃据，转为列强利用。故本会公议废除国际间不平等条约，废除军阀以清乱源，并公议收复海关，定劳动法等九个案件为会议目的。主张由各阶级自出代表，组织预备会议，庶嘉会不致为奸寇劫持。案邮寄，先电闻。

杭州工人协会 删^[2]

[1] 即21日。

[2] 即15日。

广东来电：

孙中山先生、汪精卫先生、段芝泉先生钧鉴：

民国肇造，祸变相交，民无宁岁，教育事业，益叹消沉。军阀、官僚、政客把持国是，以致真正民意，无从发舒。乃者天心悔祸，强迫和平。本正滴源，端在民治。国民会议，诚为解决时局之不二法门。于基本组织，详慎规画，不足以昭大公而达民意。中山先生尽虑周详，主张先由各种职业团体，组织预备会议，为根本救国之计。粤省学界，极表同意。诚恳一致主张，以慰民望，而端治本。盼切祷切。

广东省教育会 铤^[1]

韶州来电：

天津孙中山先生、北京段执政钧鉴：

元凶失败，政局革新。中山先生对时局主张，有召集国民会议，并由团体组织预备会议之宣言。韶州各界人士，认为救国良方。舍此无他道，誓以群策群力，一致拥护此项主张。当经即日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冀以全力，促其成功，如有阻挠此项救国大计者，愿与国民共去之。特此宣言，伏祈鉴核。

韶州国民会议促成会 巧^[2]

（天津《大公报》1924年12月22日）

中山至迟在阳历年前入京

明星社云：中山于本月四日抵津时，即曾宣言定七日入京。旋以胃病缠身未果。而北京段执政又复派代表敦促。中山本意，亦极愿早日入京，得与段执政及北京各方面要人把晤，磋商国是，以副全国人民之愿望。终以病躯未得完全痊可，医生又坚嘱尚须多养数日，以致一再迟延，实无可奈何之事也。日前又因多食水果，致患呕吐，且温度实增。故已定十三日之入京期，有不得不暂为展延。现中山预计至迟当在阳历年前入京。愈早愈妙。平日晚间读书至晚十时半始止者。但日来提早休息，非

[1] 即16日。

[2] 即18日。

重要来宾,概不自行接见。接见时,亦不过交谈数语而已。停止阅读日报,实非其所愿。然为希望早日入京计,故不得不暂为牺牲。昨早曾与汪精卫、孙哲生等计议,入京期,以能在二十五六日为最佳。因阳历年中,各机关放假,京中诸友或得有暇以畅叙一切。如无特别阻碍,决不延期。

(天津《大公报》1924年12月22日)

郑洪年前晚来津

交通次长郑洪年因某项要务与中山先生有所接洽。于前晚专车来津,寓英界马厂道云。

(天津《大公报》1924年12月22日)

国内专电

北京电(二十二日):许世英今日(二十二)与叶恭绰、曾毓隽、朱深等专车赴津。据许语人云:中山确系抱病,外传因某项问题不满意说,殊非事实。

(天津《大公报》1924年12月23日)

孙中山先生近状

中山先生抵津后,卧病兼旬。关于入京,商榷国事,各方属望既殷,本人尤为焦灼。昨日特电邀小管勇^[1]博士,自北京来诊视。博士为日本名医,且新自德国归,今晨已赴张园详细诊视,拟明晨再诊视一次,即可将病状发表云。

(天津《大公报》1924年12月25日)

本埠特讯

日本小管勇医学博士,自北京来诊孙中山先生病。昨今两次诊

[1] 关于“小管勇”之名,当时的天津《大公报》、《益世报》等,均称此名。而《邵元冲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3页1924年12月25日日记云:“午前后在张园。本日约日本医生小管勇来视疾,据言甚沉重。”而“管”与“菅”字之区别,一为竹字头,一为草字头。很容易混淆。余以为似以《邵元冲日记》为准。因为从日记来看,是邵元冲约其而来,当知其确切名字。

视,结果发表如左:

本病系肝脏疾患,如肝脏之肿大,表面之凸凹等。虽常觉疼痛,于摇动身体之际,尤觉增剧。故安静治疗,殊为必要。心脏及肺脏虽强健,然脉搏较平常为多(今朝一分间至九十),本日无热。

食思不良,便通与普通无殊。

照若此之肝脏症状从今日起,至少须有三星期之安静治疗。

(天津《大公报》1924年12月27日)

国民会议促成会之发起

本埠学生联合会、救国牺牲团等二十余团体近特发起天津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会,函请各团体加入一致进行。兹志其原函如下:

迓启者:

民国肇造,祸乱相寻。考厥原因,无非武人军阀,窃政弄权。真正为国家主脑之人民,反无权以参与国是所致。今者大憨已去,海内喁喁望治。各派首领,亦多以尊重民意,召集以职业团体为单位之国民会议,解决国事相号召。此真拨乱定国,实行民治之良机。凡我同胞,均应一致极力主张,俾使真正代表民意之国民会议,早日得以实现。今各处均有国民会议促成会之组织,上海百余团体且有专函致本埠各团体,请求发起此项组织。本埠各公团历年对于各项内政外交运动之成绩,为全国冠,独此次尚付寂然。本埠学生联合会、学术讲演会、公民救国牺牲分团、青年问题讨论会、志诚救国团,及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联盟、良心救国团、印刷工会、平教第二唤醒团、沈王庄基督教会、青年同志社、青年救国团、社会科学研究会、南大水沟教会同志团、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津保青年社、西门北工商自决团、布包同业公会、学生同志会、同志新剧社、科学研究社等廿一团体。有鉴于斯,业于十八日成立本会,先为筹备。素仰贵公团热心国事,不肯后人,望请早日加入本会,一致进行,俾使此项会议早底于成。国利民福,实利赖之。专此布达,顺颂公祺。

(天津《大公报》1924年12月27日)

德医石密德^[1]对孙中山先生之病状书

孙博士之病症非急性者，而为年代日久之肝症（或由于工作与旅行之劳伤，以及滋养与气候之变更）。延至本年十二月初，始行加剧者也。

然至十二月五日，病人抵天津之次日以后，其情况遂渐入佳境。而自十二月十日以后，则尤胜。不过病况之改良为缓愈与有规则者。是以本医生曾预言病人须有数星期之休养，与禁止最近加剧病症之一切烦恼。

今日之情况，仍属普通佳境。不过因以前之体温稍高（三七·二）与脉数稍多（九〇）。是以病人须受劝告，对于入京之计划，至少须延迟三日。

（天津《大公报》1924年12月28日）

段执政致中山感电

孙中山先生鉴：

静仁旋京，备述清恙近情，良深驰系。改革伊始，庶政待商。此间已预备适宜行馆，望速驾来都，早聆教益，并乞赐复。

祺瑞 感^[2]

（天津《大公报》1924年12月29日）

孙中山致段执政勸电

北京段执政勋鉴：

感电敬悉。远承存问，至感厚意。文四日抵津，本拟七日入京，早图良晤。肝病偶发，濡滞兼旬，良用惆怅。数日前曾有人京养病之意，嗣因医生劝告，所患已有转机，务须静养。车行摇动，于病体未宜，且连日热度升降无定，尤虞冒寒，是以不果。国事未定，固惓惓于心。而病状如此，只能暂屏万虑，从事疗养。容俟告痊，再图承教。专复并谢。

孙文 勘^[3]

（天津《大公报》1924年12月29日）

[1] 又译施密特。

[2] 即27日。

[3] 即28日。

国民党各省区宣传委员已派定

由津刻日出发

国民党欲在北方十三省区，公开宣传该党总理孙中山所提倡之国民会议一节，已志前报。自孙中山马电发出后，鲁、郑曾电段执政，略露拒绝该宣传委员入鲁之意。但国民党方面对此事仍然积极进行。兹探悉该中央执行委员已将派赴各省区之宣传委员决定如左：

直隶：于方舟、叶善技、于永流、江浩。

山西：韩麟书、王振钧。

河南：阎鸿钧、张善兴、延瑞祺。

陕西：屈乃武、董如诚。

山东：王乐平、阎容德、王尽美、王仲裕。

甘肃：海明清。

奉天：王志安、刘国增。

吉林：傅汝霖、董年、朱际清。

黑龙江：王钟文、邹桂五。

热河：陈印谭、杜真生。

察哈尔：白荣轩、张良翰。

绥远：王祥、韩麟符、崔柏亭。

内蒙：白云梯、乌文献。

该委员等由孙直接委派，并给与证书。连日来在北大第一院开宣传委员会议，由吴稚晖主任讲演宣传性质及方法，并劝勉各委员，勿过问地方军政事件。又孙因目下不能来京，故电约该委员等，一律赴津一行，即由津刻日出发云。

（天津《大公报》1924年12月29日）

孙科南下之任务

孙科感日^[1]抵上海。来电报告，于一星期后，前往广州履行重大任务，不久仍行回京。至前日北京顺天时报载孙科到沪后，暂作寓公，不

[1] 即27日。

作归计云云者，绝对不确也。

（天津《大公报》1924年12月29日）

各地国民会议促成声

近日各地纷电报局，拥护国民会议。兹将昨日张园所得赞成电多件汇志于左：

△南美柏巴克来电：

孙大元帅、段芝泉、张雨亭先生鉴：侨等赞成孙大元帅之国民会议主张。柏巴克中国国民党叩。

△墨国来电：

北京孙中山、段芝泉先生：转上海民国日报各团体公鉴：请即开国民会议，解决国是，速奠邦基。墨国华侨救国团叩。

△墨西哥来电：

北京孙中山、段芝泉先生、上海民国日报转全国报界各团体公鉴：中山先生十一月十日，宣言国民会议，解决国是。侨等一致赞成。墨国彦迫古埠中国国民党、惠群阅书报社等叩。

△广东来电：

孙大元帅钧鉴：年来内乱日甚，外侮频侵，国是日非，危在旦夕。大元帅主张之国民会议，实为救济时局之惟一办法，亦为革命之要道。敝会极表赞同，且将更进一步，以谋民众之大联合，促此会议之早日实现。但国民会议之召集方法，及其讨论问题，但应按照大元帅对时局宣言所主张者为根据。尚有人心存破坏故意阻碍，倘一息尚存，敝会誓与奋斗，以作大元帅之后盾。特此电达，伏希垂察。国立广东大学国民会议促成会。简^[1]。

△萧山来电：

孙中山先生并转段芝泉执政鉴：国民会议，为国民国是之枢机。当依时局宣言所列各团体代表组织，以解决国际及军阀之压迫为先决问题。萧山已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为公等助，盼急进行。萧山农工

[1] 即21日。

商学各界。有^[1]。

(天津《大公报》1924年12月29日)

孙中山仍服德医石密德之方剂

顷据孙中山先生秘书处发表,谓孙中山先生到津以后,因患肝脏病,即请德医石密德君诊视,并服其方剂。日前有友人带日医小管勇博士前来诊视,不过作为一种参考。至服药则仍始终用石密德之方剂,并极见效。至近日有某某等报载孙中山先生因疾速愈,而改延他医诊治者,实为传闻之谈云。

(天津《大公报》1924年12月29日)

国民会议促成会开筹备会记

天津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会,于前日(二十七)晚八钟,假学界俱乐部,开第二次筹备会。到会者四十余团体,计约百余人。

首由临时主席李逸报告:今日到会者,四十余团体,较第一次开会,又多一半。可见国民对于国民会议之热心。民治政治,很有达到之希望。国民会议促成会,多各大都会,皆已成立。天津为通商大埠,亦应筹备,曾于欢迎孙中山先生时,马千里先生提议,即有二十一团体赞成。上次开会又推六代表,向各团体联络。今天居然到会团体,如此之多,可见民意之所在。先请各代表报告联络各机关情形。江著元报告:因与于方舟君赴京,未得向各方接洽。马千里报告:律师公会,均皆赞成。惟候开会,公推代表。故今日未到。余如省教育会、省农会、县教育会,今天皆已到会。又报告借县教育会地址开会,已经该会承认。无论何日开会,均可。惟开会前预先去函通知。宋朝义报告:联络各同业会,已有六会今日到会。刘铁庵报告:商会须开会公议才能派代表加入。邓颖超报告: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已派代表来会。书记安毓文宣读,加入该会来函共六件。王卓忱提议:请孙中山先生讲演。邓颖超主张先讨论本会开大会办法。王卓忱之提议保留。众

[1] 即25日。

赞成。于方舟提议：在三日后开成立大会，并登报。有团体加入者，务在三日内来函加入，仍由各代表向各方联络。王卓忱提议：十四年一月一日开成立会。马千里提议：下礼拜开会审查草章。下礼拜开成立会可多加入团体。江著元提议：下星期六开成立会。一月一日开审查章程会。主席付表决。江著元提议，多数赞成。通过下礼拜六开成立会，一月一日开审章程会。主席又提议举员，拟定会章。公举马千里、邓颖超、于方舟、江著元、张寺晨，五君为起草委员。于方舟提议：开成立大会后，应发宣言及通电各省，并联合各省促成会，或在上海，或在京、津，组织一联合机关。众赞成，并仍请五位起草员担任拟稿。于方舟又提议：将章程宣言，寄送直隶各县、各团体，请其组织促成会。众赞成。又举安毓文君起稿。于方舟又提议：本会发出函电及开大会，应需经费如何筹划。有主张每团体纳会费一元者，有主张量力捐助者。结果公决不规定会费。拟会章时，仅定经费由各团体捐助在开大会前之用款。自今日闭会后，有愿捐者，即捐。今日不交者，可举员往讨，并举宋朝义向各团体催收。又举陈祖香、江韵卿女士保管。辛璞田提议：多联合团体，一面仍请各代表，向未加入团体接洽。一方面登报通知。众赞成，并举李散人担任向各报登载义务广告。又举王卓忱、宋则久加入联合各团体之代表。陶某提议：北京政府颁布善后会议，于国民会议抵触，本会应表示否认。公决俟开成立会后，再讨论办法。主席提议、王卓忱提议：拟请孙中山先生讲演，应如何解决。安毓文提议：开成立会日请到会讲演。于方舟提议：仍以欢迎会名义，请汪君讲演。本会成立后，再另请讲演。公决先由欢迎会请汪君^[1]讲演。请欢迎会主席与总指挥出名去请，日期地点亦由主席与总指挥商定。惟定期在一星期内。安毓文提议：向各讲演所讲演，以资宣传。马千里主张：开成立会后，由宣传股去作。议毕至十一点余钟闭会云。

（天津《大公报》1924年12月29日）

孙中山先生入京期

中山先生病已痊愈。现汪精卫、邵元冲、黄昌谷、陈友仁等，据医

[1] 即汪精卫。

生所云：休养之期已过，决定于本月三十一日入京。德医某随行。惟精神尚不能公开讲演而已。

（天津《大公报》1924年12月30日）

李烈钧已赴上海

国民党重要份子李烈钧，前定绕道日本赴沪。因孙中山病况，暂行中止。日昨李氏始由招商局奉天号轮船，包定房舱，去往上海。同行者有日本顾问井上千吉云。

（天津《大公报》1924年12月30日）

善后会议之急进

△召集各省代表电已拟就

△段执政电促孙中山来津

善后会议经中央明令许世英筹备后，许氏因促孙中山来津，并与筹商一切，又复于一度赴津，业于前晚回京。当以一切亟待进行，俾得提前开幕。业将召集各省代表电稿拟就，大意谓：善后会议条例业经公布，所有军事、财政两项，急待共同研讨。其他诸事，亦急待解决。务希各省区军民长官，届时亲自来京列席。如政务羁身，不克前来，请派遣全权代表，克日启程，至为盼祷云云。此项电稿，俟呈段氏过目后，即可拍发。段氏并以中山病状，近日已见痊愈，昨（二十八）复电津，敦促即日来京。录其原文如左：

天津孙中山先生鉴：顷由骏人转述，贵恙渐告痊愈，良用欣慰。比来时局革新，庶政待商，京中业已备妥行署，务盼速驾，即日来京。（二十八日）。

（按中山已定十二月三十一日入京。见本省新闻第一条。则此项善后会议，当可拭目而待也。）

（天津《大公报》1924年12月30日）

孙文启事

文此次到津，备荷各界各团体盛意欢迎，深滋惭感。乃以卧病兼

旬，不能分别接见，稍罄鄙意，岂胜歉怅。兹医者谓京中休养为宜，故于三十一日晋京疗养。俟贱体稍愈，再当返津与诸君把晤，商榷国事。临行匆匆，未及遍辞，伏冀鉴谅。

（天津《大公报》1924年12月31日）

论评

欢送孙中山先生赠言（丹荣）

我国自鼎革以还，为人中求忠于共和而始终弗渝者，合肥外中山一人而已耳。项城当选为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彼时中山曾一北顾，自后国事日乖，政局屡替，南北战之不已。而南与南互斗，北与北交谪。甚或一省之内，毗睚诟评，亦复剑拔而弩张。诚如冯焕章前次通电有云：试一问当事者究之因何而战？恐舍自谋权利外，彼亦无第二精义，可以自圆其说也。此次张冯卢义师奋起，曹吴势蹙。合肥人都维持临时政府现状，中山抛弃尊荣，二次北来，共商国是。北京于一月前，已与中山预备行署。车站各处，均高搭彩棚。市民欢迎之忱，尤为热烈。不意好事多磨。中山先生抵津之翌日，即抱恙张园，一病匝月。不惟北京市民望眼欲穿，即析津素目倾向中山先生丰采与演讲者，无不殷忧于色。祈祷于天，以祝先生早占勿药，而一接音容为快。

顷据张园确息，及孙中山先生启事，知中山先生以滞津已久。现值小痊，将于今日移京养痾矣。余以中山先生在津苦疾，未得往谒不次，一谈政治前途之新生活，究抱有何种希望与程度。当兹欢送，不可无一言以赠别。敢贡蕝莛，幸垂鉴纳。

民国成立，十有三载。兵匪水旱，灾侵更造。不可谓创巨痛深矣。然假使自此予吾民以宁息之会，则吾民生之养之，疮痍自复。故此次合肥所主张之善后会议与善后会议后之国民会议，关系至为重大。反对者或目善后会议无此会之必要，不如迳开国民会议为愈。然余则认为善后会议为国民会议必经之途径。例如国民会议应如何召集，其手续若不经善后会议公决，试问国民会议之一切条例细目，一一由政府厘订，较经善后会议者为何如乎。即此一端，已可概见有开善后会议之必要矣。第先开善后会议。善后会议一日不能够开，即国民会议一

日不能产生。国民会议一日不能产生，即巩固政府一日不能实现。巩固政府一日不能实现，则省省长官一日不能固位，人民一日不能乐业。省省长官一日不能固位，人民一日不能乐业，则督不能真废，兵不能真裁。督不能真废，兵不能真裁，而民穷财敝，日甚一日矣。是以为今之计，欲开国民会议早日产生者，必须先于善后会议中各自牺牲党见。但求不大背谬。和衷共济，黽勉则成。则是真此。以国家为念矣。反此，若仍各自营丘壑，吾知今日之创巨痛深，不得谓之。来日大难，正未艾也。心所谓危，不敢不告。愿与先生共讨之。

（天津《大公报》1924年12月31日）

孙中山先生入京纪详

△十点二十五分在东站上车

△市民在总站欢送者一千余人

孙中山先生病体虽未痊愈，然以久滞天津，外间因而发生若干之误会，加以天津无好医院，养病亦非所宜。孙氏二十九日下午决定三十一日入京养病，并报告北京段执政及各机关。路局闻讯，于三十日即预备压道车一列、及专车一列。专车与钢车两辆、头等客车四辆、餐车一辆、三等车及行车三辆，组合而成，停东车站。许世英、叶恭绰、林长民、曾毓隽、郑洪年^[1]等，于三十日下午来津欢迎。昨早八时半，所有随行人员，一律齐集张园早餐。九时十分，即将行李运至车站，一部分随员亦至车站照料一切。车站已有保安队员五十人，军乐队一队及便衣侦探多人。站口均有警察保护。至十点二十五分，中山先生始与其夫人宋庆龄及德医施密特，同坐二号汽车来站。汽车直开至花车门旁，由副官扶手上车。中山先生着大狐皮外套、黑色皮冠，面貌较抵津时尤形憔悴，一望而知为病人。一时军乐大作，保安队举枪致敬。许世英、郑洪年亦随车入京。在东车站相送者，均纷递名片。压道车头十点十八分开行，专车十点五十分始行。在新车站扬旗外不知何故，停数分钟始入站。甫入站，即闻“国民会议万岁”、“孙中山先生

[1] 即郑洪年。

万岁”之声，洋溢于耳鼓。月台上，红字白地旗如小林之站立，乃天津市民各团体代表千余人在车站欢送也。车停后，孙中山先生因病不能出见，由汪精卫代表向大众道谢云：“孙中山先生因病不能出来与大家见面，今天承诸位到站相送，特此由兄弟代表谢谢”云云。市民代表十人请上车见中山先生。汪精卫表示无论何人，都不能见面。由黄昌谷、邵元冲、马超俊诸君与各代表略事周旋。车在新车站仅停五分钟，即西去。群众欢送之呼声，直至车身不见始止。中山先生即有传单一，向欢送诸人散发。其文有堪特别注意者，特录如左：

中华民国主人诸君：

兄弟此来，承诸君欢迎，实在感谢。兄弟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为争权利，是为特来与诸君救国的。十三年前，兄弟与诸君推倒满洲政府，为的是求中国人的自由平等。然而中国人的自由平等，已被满洲从不平等条约里卖与各国了。以致我们仍然处于次殖民地之地位。所以我们必要救国。关于救国的道理很长，方法亦很多，成功也很容易。兄弟本想和诸君详细的说，如今因为抱病，只好留待病好再说。如今先谢诸君的盛意。

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孙文

（天津《大公报》1925年1月1日）

中山抵京后之多谣

（北京特约通信马松）

北京自中山入都后，一般市民，多感受一种恐怖。其恐怖为何？有谓中山左右，已将京都市民之较为殷实者，均调查清楚，行且按图索骥，一一绑票者；有谓孙至京即将转赴西山与冯^[1]携手，于大局影响甚巨者；又有谓中山已无形深入牢笼，或且再发生变化者。杯弓蛇影，不一而足。究之此等谣言之起因，不外无知市民，误认中山为赤色化，有一部分直系余孽，惟恐合肥中山同心合作，致造成此种浊恶空气。实则此次之事，段对孙既异常尊重，而孙之对段，亦非常谅解与退让。中山本人，乃纯系一

[1] 即冯玉祥。

老国民党之领袖，断无此时牺牲向来主义，而自坠赤化之理。至绑票之说，尤属荒谬而不可信。盖合肥在京执政一日，以其威望，绝不能有此也。现在合肥中山两方面，所略有意见不同者，惟合肥自始即主张先开善后会议，后开国民会议。而中山则急于国民会议之观成，主张仅须开一筹备会已足。其实筹备会视善后会为简而性质实同也。但目下已不能成问题，均能以国为重，委曲求全矣。愿市民勿轻信谣言，自扰扰人也。

（天津《大公报》1925年1月5日）

民党内部风潮之昨讯

△但已有出而调停者

关于此间各省区旅京民党护党同志会与汪精卫、邵元冲间之误会，现因于树德被派为招待处之社会各团体招待员，又起一度之纠纷。护党同志会中人谓：于树德有共产党嫌疑。今又被派为招待员，可见汪、邵实不能辞袒护共产党之咎。曾于本月二、三、四、三日，在东安市场某肆开会三次，讨论办法。结果决由到会者，全体署名致书汪、邵，要求汪、邵自动的离京，并于未离京以前将前此所为之不稳事件，负责了结。并决计于昨夕将此项警告书发出。但事为卢师谛等所闻，当力劝护党同志会中人暂勿发出警告书，一面并向汪、邵处磋商所以和缓同志会感情之方法。故双方之间，似又有可以转圜之方法云。

（天津《大公报》1925年1月6日）

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大会之盛况

△团体代表到者四百余人 通过章程及宣言

选出干事四十人 来宾到者三千 汪精卫、顾孟余等均有演说

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昨日下午一时，假北大第三院大礼堂开成立大会。各团体代表自十二时起，即陆续到会。合计到会团体约二百余，代表人数在四百以上。全国成立大学联合会代表易培基、北京教育会顾孟余、京兆教育会代表、民国大学代表雷殷等，皆亲自出席。会场极其庄严华丽。代表及特请来宾席之后，为各界参观席次。计到者愈三千之数，会场拥挤。由筹备处宣布开会，推定临时主席，报告筹

备经过,并由起草委员会提出章程及宣言草案。略加讨论,全体通过。重新选出干事四十人,分五股办事。顾孟余等当选。嗣于二时起,开始讲演。首由汪精卫先生登台,群众欢呼,声震屋瓦。汪先生演说,略谓十三年来,中国变乱之真因,在外国帝国主义者与军阀之为患。而南北政府之实际状况,一言以蔽之曰:北方卖国,南方殃民。但南方受帝国主义之压迫,以至如此。而从来不借外债,是可告无罪民众者。又谓国民会议之真意,在民众自己起来解决国是。末谓当下使武力与民众结合,而最后始武力为民众之武力云云。

次谭仲逵、顾孟余、雷殷诸先生相继演说。蒋梦麟、于右任因时间已愈五钟,未及演说,即摄影而散。洵一时盛会也。

(天津《大公报》1925年1月6日)

中山派定北京宣传国民会议人员

△罗驭雄等九名

孙中山先生所主张之国民会议,现正积极向各地民众公开宣传,以期国人了解国民会议之意义,及其重要。俾各方合力促成此举。闻中山先生前委定之十三省区宣传委员,已经分途出发,惟北京地方,为文人荟萃之地,全国政治中枢,关系格外重要。故又特遴选党员九人,加以委任,令向各界接洽,实行宣传。其九委员,则为罗驭雄、郭春涛、黄日葵、纪人庆、于国桢、姜绍谟、刘瑛、王冬珍、王师曾云。

(天津《大公报》1925年1月6日)

段执政昨访中山未果

△中山仍不会客,段拟改期再访

段执政于昨日亲赴北京饭店,访问孙中山等情,已志昨报。兹闻昨日段氏未能前往。因中山所患之病,最恶劳顿,故医生禁止会客与谈话。不但他人不能与会晤,即孙夫人,亦不能常见,均由医生看护妇守视。病名为肝脓疡。前晚已开刀,毫无危险。惟在病未愈以前,实不能见客。故医生临时电段宅挡驾。段拟改日亲往访问云。

(天津《大公报》1925年1月7日)

国民党对于善后会议之意见

民治通讯社云：召集善后会议通电发出后，民党方面，对于召集该项会议之意见，颇关重要。本社记者，昨特以此事往铁狮子胡同访问接近中山方面诸要人。时值汪精卫代表中山前往答拜各方面欢迎慰问之人物，邵元冲等亦因事外出，由黄昌谷接见，谈话颇久。兹节录其答词如次：

问：中山先生之病状，据克礼大夫云，已逐渐就痊。病愈后，当久住北京饭店乎？

答：病愈后，必然来此（顾宅）居住。外传有赴西山之说，可谓绝无其事。

问：南北两政府，以中山先生之意见，当处于何等地位？

答：现下两方系处合作地位。至中山先生此次北来，并不用大元帅名义，但以国民资格协助北京政府。

问：中山先生对于现政府，所主张召集之善后会议何以始终不表示意见？

答：第一系因事先中山先生并未与闻。第二系因事后又正在彼患病期内。对于该项会议之内容并未尝有所考虑，故不能表示耳。

问：中山先生所主张之国民会议，是否根本上发生冲突？

答：善后会议，但可代表各方面领袖式之名流政客军阀等少数人之意见，比之由农工商学各团体及全国人民所召集之国民会议，能代表真正民意者截然不同。

问：善后会议开成时，中山先生能否加入？

答：中山先生之加入与否，第一须以病体之能否速愈为前提，且必须以该会议是否确能解决各种纠纷为断。

问：北伐军之攻赣，闻系得中山先生之同意。段曾去电阻止。其间二人之意见有冲突否？

答：北伐军之行动，虽得中山先生之同意，但此举纯系对方本仁^[1]个人，与北京政府并无冲突。

问：南北政府既已表示合作，何以外、农、教等总长，始终不就？

[1] 方本仁，中将，湖北黄冈人。曾任江西督军、国民革命军第11军军长，代理省主席，兼民政厅长。

答：唐、杨、王^[1]等不就职之原因，乃民党对于北京政府，但愿以国民资格帮助，而不欲居于官吏之地位耳。

（天津《大公报》1925年1月7日）

国内专电

北京电：孙文经医诊治后，已能安眠。外传解剖说不确。

（天津《大公报》1925年1月8日）

本埠特讯

建国第四军总司令顾忠琛特派秘书林子和慰问中山病，并面陈一切。林于今（七日）午由沪乘奉天轮抵津，闻定明（八日）专车晋京云。

（天津《大公报》1925年1月8日）

孙中山对清室优待条件真确态度

△认清室先已违反优待条件第二第三两款之规定

故已再责民国政府践行优待条件之理

清室优待条件改定后，清室方面，仍多方运动，力图恢复。近复由宝熙、绍英等用清室内务府名义，致函孙中山，请为维持。中山即命秘书处复函，大加驳斥，而认改订为合理的行为。兹录双发往返函文如下：

△清室内务府宝熙、绍英、耆龄、荣源致孙中山函

中山先生执事、敬启者：

辛亥之役，停战议和，其实公在临时总统任内，双方订定优待清室条件，暨满蒙回藏待遇条件，正式知照各国驻京公使，转达各国政府，因有十二月二十五日之诏，共和政体，于焉成立，载在盟府，中外咸闻。次年台从莅京，亲在那园欢迎席上，对众宣言，孝定景皇后让出政权，以免生民变，实为女中尧舜。民国当然有优待条件之报酬，永远履行，与民国相始终。皇天后土实闻此言，复经列入约法第六十五条，明载优待条件永不变更其效力。铁案如山，谁可动摇。不意本年十一月五

[1] 即唐绍仪、杨庶堪、王九龄。

日变生意外，致乘輿仓卒出宫。先生远在海南，一时无从赴诉。夫优待条件为民国产生之根本，自宜双方遵守，垂诸无穷。但十三年以前最初之信条，非曾经当事人，不知始末，或不免有所误会。今幸旌麾远莅，众望咸归，一国之信用所关，即列邦之亲听所系。以公有保持信义之责任，英等翘首以俟。专函奉布，伏乞主持公道，力践前言。息壤在彼，知公必有以处此也。恭候台绥。

清室内务府宝熙、绍英、耆龄、荣源谨启

△孙中山秘书处复清室内务府宝熙、绍英等函

瑞辰、越千、寿民^[1]诸先生钧鉴：

近奉惠书，闻于十一月间修改清室优待条件，及清室移宫一事，已呈中山先生阅悉。中山先生对于此事之意见，以为由法律常理而论，凡条件契约义在公守。若一方既已破弃，则难责他方之遵守。民国元年之所以有优待条件者，盖以当时清室既允放弃政权，赞成民治，消除兵争，厚恤民生，故有优待条件之崇报。然犹以国体既易民主，则一切君主制度仪式，必须力求芟除，一以易民群之视听，一以杜帝制之再见。故对于优待条件第三款载明大清皇帝辞位以后，暂在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又于民国三年清皇室优待条件善后办法中第二款载称，清皇室对于政府文书及其他履行公权私权之文书契约，通用民国纪元，不通用旧历及旧时年号。第三款载称，清帝谕告及一切赏赐，但行于宗族家廷以其属下人等，其对于官民赠给以物品为限，所有赐谥及其他荣典概行废止。凡此诸端所以杜渐防微者至为周至，非但以谋民国之安全，亦欲使清室之心迹有以大白于国人也。乃自建国以来，清室既始终未践移宫之约，而与公书契券仍沿用“宣统”年号，对于官吏之颁给荣典赐谥等亦复相仍不改，是于民国元年优待条件及民国三年优待条件善后办法中清室应履行之各款，已悉行破弃。逮民国六年复辟之举，乃实犯破坏国体之大咎，优待条件之效用至是乃完全毁弃无余。清室已无再责民国政府践履优待条件之理，虽清室于复辟失败以后，自承斯举为张勋迫胁而成。斯言若信，则张勋乃为清室之罪人。然张勋既死，清

[1] 即宝熙、绍英、耆龄。

室又予以忠武之谥，是实为奖乱崇叛，明示国人以张勋之大有造于清室，而复辟之举，实为清室所乐从。事实具在，俱可覆按。

综斯诸端，则民国政府，对于优待条件，势难再继续履行。吾所以认十一月间摄政内阁之修改优待条件，乃促清室移宫之举，按之情理法律，皆无可议，所愿清室诸公省察往事，本时代之趋势，为共和之公民。享受公权，翼赞郅治，以消除向者之界限。现五族一家之实，使国人泯猜嫌之踪，遏疑乱之萌，较之徒拥一无谓之虚名者。利害相去，何啻万万。且溥仪先生，年富识瞻，若于此时，肆力学问，以阅其造就，则他日之事业，又讵可限量。以视局踣于深宫之中，瞢然无所见闻者，为益实多。此尤望诸公之高瞻远瞩，以力务其大也。特命代为奉复，希裁察为幸。此颂公祉。

孙中山先生秘书处启

（天津《大公报》1925年1月10日）

孙中山最近病状

孙中山之病状，日来颇有起色。前日经医生用爱克斯光诊察后，断定可以不用手术开割，用打针注射足以疗治，痊愈之期当在十天半月之后云。

（天津《大公报》1925年1月11日）

中山办公处消息

△并未指定何人专任何职

铁狮子胡同孙中山办公处，其中所有人员，闻有秘书及参军副官等名义，少将以上者为参军，少校以下者为副官。对于职务上之分配，除由秘书办理函电外，其余各事，由各员分担责任，并未指定某某专任接待新闻记者或何项事务云。

（天津《大公报》1925年1月14日）

孙中山辞谢执政府招待

△汪精卫致许、梁函

孙中山为在京一切招待等事，特于昨日面谕汪精卫，致书许俊人、

梁众异云：顷奉中山先生面谕：

此次来京，承执政盛意，预备行馆，招待殷渥，至深铭感。惟念国事艰难，库款拮据，受此厚赐，心甚不安。特命弟转达座右，敬祈执政，深致谢意，并请自今日为始，所负行馆内一切膳食零用及汽车等项，概由敝处自备，不必仰劳招待。至于行馆厚备，远人栖止，教拜嘉惠。行馆内供张各物，暂时借用，将来当照天津行馆办法，如数点还。凡此项屑诸端，一以志嘉惠于无穷，一以为盘桓时日远久之图。谅承莞诺，专此布臆，敬候公安。

汪兆铭 谨启(一月十三日)

(天津《大公报》1925年1月15日)

国民党无反对善后会议宣言

△汪精卫电告许世英

△民党要人之一谈话

日前中山先生之秘书韦君，以中山先生反对善后会议一稿，嘱北京中英合璧之东方时报发表，詎发表后韦君又在京中各报上大登启事，谓中山先生并无此项宣言，并声称东方时报误译某外报评论，视为中山先生宣言。而东方时报为报纸名誉关系起见，连日迭有类似证据之辩论与来函刊发，铮铮不屈。必欲一实其所载之不虚。本报以为此事两方皆无须深相争执。总之事实俱在，决非宣言所能取信。如中山先生果不加入善后会议，即无宣言，认为反对，先为代拟宣言，不亦更为省事乎。如中山先生果加入善后会议，则东方时报虽引证多条，亦与中山先生何害。中山先生诚病矣。但非必亲身莅会者，何不派员参与。方今国事多艰，倘使无关大节，甚盼各方合作，毋再持汝我为政之见，更毋再持国民与善后之分。同一谋国，只求有补于国家，即吾人之所馨香祈祷者。兹读国民社国民党无反对善后会议宣言一稿，记者无任鼓舞。用亟披露，以待参考焉。听松附识。

国民通讯社云：昨日某报刊载国民党将发出反对善后会议宣言后，各方均予以严重之注意。本社记者特为此事往访善后会议筹备处长许俊人氏。据云：昨日午后二时左右曾接汪精卫氏电话，大意谓：某

报所载,系根据某外报评论而来,一误评论为宣言,再误外人评论为国民党宣言。全非事实。现在中山先生尚在病中,一切均无表示。刊发宣言,自属无稽。深恐因滋其他误会,故特电知云云(按汪氏电话大意如此。此并非汪氏原话。特此郑重注明)。本社记者,又往访民党要人某氏,据云:中山先生主张,以国民会议,解决一切国是,以为各方公认为唯一方法。善后会议之与会各代表,诚能以冲突于疆场之手段,改变为樽俎间之折冲,且能诚意召开国民会议,服从国民会议,中山先生当然亦无所用其反对。不过中山尚在病中,不能有所表示。故民党中无论反对与赞成之主张,均只可谓为私人之意见,非民党之共同意见,不能命之为民党主张云。

(天津《大公报》1925年1月18日)

徐季龙口中之孙中山与冯焕章

据一月九日上海字林报载称:徐谦氏为冯玉祥之密友,又曾久充上海中山代表。近日曾语往访之本报记者云:冯将军决非如世所传之谋叛者。此次不过实行革命手段而已。氏敢实行道德的革命,方始为谋中国之真利益者也。惜国人大半皆不能理解。外人更勿俟言。推而至于氏之友人中,亦殊不少懵懵者。此所以最为可悲也。冯氏久已慨叹国家之腐败,而对于北京政界为尤甚。自信此际一扫国家之腐败,乃最适宜之处置。故毅然决然出此革命举动。在外人中多以冯氏为曹、吴之旧部下,为曹、吴之军队也。此谬误最甚。盖冯氏本人虽为其部下,然不能以直派党徒目之。彼常自思即为中华民国军人,即应为国效劳,万不能为一党一系驱使等语。徐氏又谓:冯氏当战前,曾忠告吴氏曰:若必固执武力统一,则将来恐无良好结果。盖即讽示对于吴、张两方面皆无加入之意。不意吴氏竟充耳不闻。又谓孙中山与冯玉祥之间,并无何等协定。惟两者之目的相同,皆欲一扫国家之腐败。中山乃革命元勋,冯氏夙最器重。外间所传有何同盟协定之说,概系无稽之风说。至冯、孙提携,赤化中国之传说,尤荒唐无稽。盖冯氏深愿过激主义,决不信过激主义已侵入中国。然此种风说,竟尔流布。此所以深堪浩叹也等语。

又谓关于孙氏所倡取消不平等条约运动,余虽不知孙氏如何声

明。然余在津时,亦曾访孙,惟因彼时来客甚多,未获畅谈,只闻孙氏曾以激越口调论之云:余并非以如斯意味而企取消运动。又云无条约则国际亲爱也贸易也皆不能继续矣云云。盖孙氏只向世界要求公平与正义,仅欲与平等地位上改订条约而已。此乃一般中国爱国者共同之希望,恐列强亦无反对之理由云。

(天津《大公报》1925年1月18日)

开割后之中山病状

△肝脏无几 心成朽木 西医认为绝症

孙中山之病,经各医生之劝告,遂于星期一(二十六)与其夫人入协和医院。六点由德医克礼及该院外科主任邵乐尔、院长刘瑞恒等施行手术,情形已志京中昨报,但关于病状之详细调查,尚有遗漏之处。据该医院传出消息,谓诸西医等于解剖时,发见其肝叶大半成脓,薄如竹布,肝脏则硬如朽木,敲之有声,肠化疙疸,状至不佳。随即将割口缝好。咸认为此病确已十分危险。二十七午后体温尚照常,脉搏为一二零。精神颇佳,但疲劳过甚,各方慰问者,均不得见。昨晨能吃稀饭少许,尚无发热。闻有某中医尚谓可以诊治,但西医则谓为已成绝症,不出一二日,必生变化。故汪精卫等颇主张将孙移往铁狮子胡同,改请中医治疗云。

又闻孙夫人因目睹开割情形,惊慌失措,因而得病。但现已回复原状。其子哲生(科)已由汪精卫等电召其来京,业已由沪首途,日内即可抵京云。

又据东方社二十八日北京电云:关于孙中山病危之说,尚严守秘密。故除左右亲近者外,无论何人均难确知,实有坠于五里雾中之感。今晨十时据协和医院代理院长,关于孙中山手术之经过,答复东方记者之质问。现在虽有难具体公表之事实,惟已陷非常危险之状态。然刻尚生存,确系事实。可以奉告者,仅此而已。

相传中山患部割开之结果,经发现多数癌业已化脓,手术未竣事,遂不得已而中止。尔来陷于昏睡状态,已念绝望,确系事实云。

又据明星社云:关于中山逝世谣言,本社曾于昨(二十九)午用电话询北京孙行辕,知其非确。昨晚十时本社又得北京快信,孙夫人于

(二十八)晚尚有电复沪上,告家人勿轻信谣言。可证明外传二十七晚中山逝世之说,纯系谣传。兹录其全文如左,以告关心中山病状者。

上海西摩路一百三十九号宋老太太鉴:

得电。知沪传婿凶。闻,无任悲惋。婿自去冬抵津,卧病至今,儿侍侧未离。病状迭经德医及协和医院报告,病势诚重,倘有不幸,亦无须秘密。婿为国尽瘁,自不能免有政敌,然利用此时机造作谣言,以遂其幸灾乐祸之心,实为可鄙。望慈怀勿为所挠,非得儿电,切勿轻信。儿惟尽人事以听天命而已。儿庆龄^[1]

又中美社云:关于中山先生之病状,昨日本社已有具体报告矣。兹复由协和医院觅得昨日(二十九)下午该院所发表之中山病状。原文略谓孙氏昨晚(二十八)已能安眠,并无痛苦。其体温为三十七度,脉搏为一零八。饮食亦佳。而开割之伤痕,亦安好云云。据此以观,则中山先生病危之说,当然系属谣言云。

(天津《大公报》1925年1月30日)

昨日中山之病状

△体温脉搏已复常态…病榻上之谈话

民治通信社云:中山病状,自割治后,四十八小时之危险时期渡过,已渐入佳境,体温及脉搏,已复常态。肝痛亦减,惟割治处尚偶作微痛。此为割治后应有之现状,无足为异。至硬癌则并未开割。此种硬癌目前有无危险,当视其体质之如何。倘医治得法,亦可望全愈。某外医谓中山此种病状,本极稀少,美国曾有人得此病,并未用手术治疗,仅多吃大葱及大蒜即行治愈云云。连日中外医士,均有会议,一致主张改用大葱大蒜治疗。但尚待经过一次之决定,如无变更,则不用手术治疗。现日侍孙侧者,为孙夫人、汪精卫等三四人。孙科已兼程北来,同行者有谢无量、陈新尼、陈敬修、费润生等,大约二三日内即可抵京云。

中山病况,已如上述。当开割之前,曾有人与孙谈话,孙谓予此次抱病,恰在时局艰难之际,外人观之,必谓予有遗憾。其实予并无所

[1] 即28日。

不安。盖现在时局，并不以余病，有若何影响。余若不病，势必参加国事。以余素性之急切，亦未必定能使时局转入佳境，而自心反感不安。故余对于濒之非时，亦坦然处之云。

又明星社云：据昨日（三十）早由京来津之民党某君语记者云：前晚（二十九）曾为中山病状亲赴铁狮子胡同访中山亲信某君，询以真相。据称，中山此次开割，原非其本人及其随员所敢赞同。盖因中山年已六十，而肝脏所在，又系身躯之最要部与心脏毗连，诚恐流血过多，用麻药过久，发生不幸。惟医生克莱^[1]招及狄博士等，均因在外部发现肝上有异样之处，以为非开割不得明其真相，且恐日久多变，反为难治，不如开割之为愈。故亦不得已而赞同，于二十六日下午三钟，由北京饭店移至医院，六时开割。开割后，发现肝上有若干小疮，其一较大者已开始腐溃，略敷药汁，旋即逢好。中山在开割时，不省人事者，约一小时之久。情形甚为险恶，且脉搏数剧增，最高者达一百十五六。晚间因医生之注意看护，且曾打针，故得安眠。二十七日脉搏仍未减，惟并无若何特别危险情形。二十七日晚，已渐臻佳境。今早（二十九）医生发表之病状脉搏数，已减至一百零八。昨日（二十八）下午曾与孙夫人谈话多时，进牛奶一杯，已不觉痛。其病状虽危，然并不如外间所传之甚。据医生云：两星期后，如无变更，即可出院回北京饭店云云。

（天津《大公报》1925年1月31日）

孙中山病笃声中之东论

东方社二十九日东京电云：日本朝野接得孙文危笃之报，均深痛惜之。报纸各揭载相片略传等，尚于孙氏之平愈，系一屡之望。

东京日日云：收拾此次之时局，以代表理想与实际之孙、段两氏之协力，为绝对必要条件。然孙氏与段氏尚未谋一面，而遽受最后之宣言，吾人对于此革命之大伟人，待其万一之恢复与痛苦之减轻而已。

大阪朝日谓：孙氏如有万一，深恐时局不易收拾，并于其杰出之人格大加赏扬后，又谓今东亚之形势，如孙氏之远识卓见之人物，极为必

[1] 又译克礼。

要。当此之际，突如接其病笃之报，为中国计及为东方诸民族之兴隆计，均不得不为之扼腕痛惜也。

（天津《大公报》1925年1月31日）

传人人异之孙中山先生病状

△中山之壮语…协和院长之报告

△中美稿似可征…大陆言亦有故

中美社云：中山病状，日来颇有进步。确闻中山先生三十日曾告其夫人云：

“余诚病，医者亦诚无如余此病何。但余所持以支持此身者，夙昔即不完全恃医，而恃余自身之勇气。余今信余之勇气，必终战胜此病，决无危险”云云。

由是可见中山精神之兴奋与夫自信之坚也。又昨日（三十一日）协和医院院长，亦发表报告书，证明中山身体确已渐臻健康。其文如左：

今晨（三十一日）孙中山先生体温为三十七度零四零，脉搏一百二十次。身体较昨日稍渐，神气亦清明云。

观此似中山病状大有起色矣，但又据北京大陆通信社云：段执政于昨日（三十一）下午二时，在外交大楼饗客。散座后，亲往协和医院访问孙中山，偕行者有秘书长梁鸿志。孙中山于昨晨因小解劳动之故，脉搏骤增至一百六十次，形势极为险恶。至下午经医生极力设法，始降至一百三十次。故段执政极为系念，亲往访问。当由孙夫人宋庆龄女士招待。段面询中山病况，稍座即返府中。又闻国民党旅京党员全体，昨日下午在大中公学开会，由吴敬恒主席，除报告中山病情外，对于党务颇有讨论云。

（天津《大公报》1925年2月1日）

段执政今日亲访孙中山

△由孙夫人接待

孙中山此次来京后，即卧病谢客。段合肥亦未谋一面。昨日下午三时，段特亲赴协和医院往访，中山以卧病在床，未能接待。由孙夫人

陪谈数语。段照例安慰一番，计在院约十余分钟，段即回宅。沿途军警森严，医院周围亦布满护兵，一时来往车马，均为断绝云。

(天津《大公报》1925年2月1日)

民党干部移京之原因

△仅政治委员会移京

△为应付时局之策略

△且为中山原来计划

民党政治委员会，由粤移来北京后，各方极为注意，某报竟谓遗嘱意味云云。然经查全非事实。盖该委员会移京一举，本为中山先生到京后之原来计划，与其病状无关。近日时局紧张，善后会议开会在即。为应付时局起见，特提前移京云。

(天津《大公报》1925年2月1日)

粤中民党与善后会议

△胡汉民等来电谓与国民会议两不相妨

自孙中山发出筱电，对于善后会议为有条件之赞成后，民党方面，渐行活动。闻胡汉民、许崇智及粤中将领，曾有敬(二十四)电到京，略谓善后国民两会议，各不相妨，中山与合肥，主张均能一贯，粤中各军一致赞成。望屏除浮议，积极进行云。

(天津《大公报》1925年2月1日)

补录段执政复孙中山艳电

段执政容纳中山建议，当于艳日发出通电，原文搁置某处，本社兹觅得录出于下。

北京协和医院孙中山先生赐鉴：

筱电奉到，循诵再三。伟论肫诚，钦佩无量。此次改革首在遵扬民意，欲以矫往轍而成新治。款款之愚，与来电绝无二致。祺瑞于去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所发马电，业经郑重宣言，愿与天下人相见以诚，共定国是。并谓必须集全国人之心思才力以为之，庶克有济。故以善后会

议解决时局纠纷，筹备建设方案。以国民代表会议解决一切根本问题，曾经电达，已荷查及。先生去粤宣言，距马电仅隔八日，未经奉读。但所标大义，在乎民治。咸以国民会议为指归，与鄙见早相契合。不独祺瑞个人之欣幸，实国家前途之曙光也。善后会议条例，祺瑞亦初无丝毫成见，几经讨论，未敢遽定。特以未颁布之草案，先就正于先生，适尊体违和，未有与草案中增加团体之表示。时及兼旬，始敢公布。现已匝月，幸各方一致赞成，派遣代表，及亲自到会者达十之八九，开会之期数日即到，适奉明示，提议增加会员，足征眷眷之怀。祺瑞敢不承教。惟念善后会议，与国民会议职权本不相同，分子不妨各异。且非速开善后会议，先谋各方意见之融洽，则国民会议之前途，尚多障碍。非军财各政先有解决之道，则国民会议之根本方案，更无从实施。今当举国踴望之际，忽改条例，延缓会期，恐于和平统一前途，有所窒碍。至关于国民代表会议之组织，当本先生宣言之精神，与祺瑞从来主张之意旨，力求公道，预备起草，冀得国民之代表，特为尊重先生意见，定于专门委员会中聘请各省省议会议长，教育会、商会、农会，各会长一人专门为委员会委员。但以省行政长官驻在地者为限。其各特别区与省同。至京津沪汉，四大商埠商会会长，应请加入。此项专门委员，按照条例审查大会所交议案，兼得出席报告及陈述意见。如此办法既能贯彻先生之主张，又不妨会议之成立。会议公开民意具在，想与会诸君，必能尊重真正舆论。以为可否之准据也。先生清恙未康复以前，仍请先派代表，主持一切，以树风声。患难久共，谨布腹心。伏乞亮查。

段祺瑞 艳^[1]

（天津《大公报》1925年2月1日）

国内专电

北京电（二月一日）：段执政昨日（三十一）躬往协和医院慰问孙中山病。孙举手表示谢意，旋由孙夫人招待，并述病状甚详。

（天津《大公报》1925年2月2日）

[1] 即29日。

言人人殊之中山病况

世界通讯社云：孙中山先生病状，三十日午一度稍剧后，经医生赶紧施治，旋复原状。惟前午（三十一日）又复变症。至晚始渐入佳境，脉搏每分钟由一百六十余跳，减至一百三十余跳。昨日比较昏迷，热度为三十七度零十分之一。脉搏每分钟约一百二十跳。但体温稍见增高，神经时时发炎，呼吸疑促，饮食亦少，牛奶燕粥，均不能下咽云。

世界通信社消息：中山病况，连日本社，均有详确之报告，以饷阅者。兹据协和医院消息：中山病状，昨日无甚变更。脉搏一百二十八，体温三十七度半，精神甚佳。大约最近期内，当无何等危险云。

（天津《大公报》1925年2月2日）

孙中山之病状

△每日上午轻于下午

如过立春当可减轻

孙中山之病状，连日未见减轻，亦未见加剧。昨日脉搏为一百零八，至体温三十七度余。惟每日上午比较下午为安适。故昨日上午与其连襟孔庸之^[1]为比较长时间之谈话。据克利、邵乐尔、刘瑞恒三医生云：如稍受劳动，极形软弱，脉搏亦即骤增。是以对于接见宾客，限制极严。昨日下午柏文蔚将军特往协和医院慰问，未得延见。吴敬恒亦曾往探，均未能晤。又据多数医士会诊所发表云：先生之病，如至阴历十三日无危险，以后可以日见减轻。十二日已交立春令，盖凭吾国节气而言，故立春一关，关系颇为重大也。

（天津《大公报》1925年2月3日）

孙科偕大批民党昨日抵京

△同行者三十余人

孙科已于昨日下午二时乘专车到京，同来者有李烈钧、徐绍桢、杨庶堪、徐谦、张静江、石青阳、田恒、马素等三十三人。孙科下车后，即

[1] 即孔祥熙。

偕徐、李、杨等，乘五百零六号等三辆汽车，往协和医院。随员等则在铁狮子胡同行辕云。

（天津《大公报》1925年2月3日）

国民党与善后会议

△旧派有到会者…新派则不列席

善后会议已开幕矣。国民党对于该会之态度，颇为一般人所注意。昨日各报刊有国民党启事，对于善后会议，表示拒绝加入。其实国民党内早已分为新旧两派。新者急进，旧者稳健。此次不加入善后会议者，多系受新派之鼓动，若辈虽高揭服从党魁为旗帜，而中山先生病势至此，轻易不能与人交谈，何从知其态度。故一望而知服从党魁云者，门面语也。而旧派自稳健持重者，如彭养光等，已于开幕日到会。可见该党党人对于善后会议之态度，已不一致也。

（天津《大公报》1925年2月3日）

中山病况昨闻

前日下午三时许，北上之民党重要分子及孙科均往协和医院视疾。中山初颇觉欣慰之状，但后此忽见张静江骨立形峭之状，忽泣下数行，且曰：“汝一病至此，奈何尚来视余疾”。此语甫已，脉搏即立由一二八次增至一四零次，体温亦由三十七度八升至三十九度。可见其伤感之达于极度。主治医克利见状乃立屏来人外出，并为中山注射催眠剂，为救济之计。

延至昨晨（三日晨），据协和医院之报告：中山脉搏已降为零次^[1]，体温降为三十七度，神气亦颇清明。唯身体则呈较衰弱之状。唯主治医克利将中山之实在病况，告知中山时，中山甚为安静，并不露丝毫畏惧之色。此外，民党重要人物日前对于中山之病，虽决计延请中医佐治，但被聘之中医则仅前往协和医院诊视一次，并未开列方剂。其原因盖以中山现尚在西医治疗之中，不欲遽行参加，致责任不专之

[1] 原文如此。

故。至外间所传中医已宣告不能开方之说，则完全错误云。

总之，中山病况，目下尚无大变化，而其体气之暂就衰弱，则为可忧之现象。唯中山为目下与时局最有关系之人物，若能早日恢复健康，出为国人解决时局各问题之导师，则实国家人民之大幸。故吾人今唯虔艺心香，用祝吉人之卒获天相耳。

东方社三日北京电云：今（三日）晨七时协和副院长与德医克利向孙中山宣告临终之期已迫，中山闻之泰然。

又据广东电云：孙文危急说传来，胡汉民即召集各要人，开秘密会议，讨论善后处置。闻其内容系关于大元帅之后继问题，或主张新选大元帅而依从来之独裁制，或主张改为委员制，而行使大元帅职权。二派议论纷纷。而以委员制为有力。因未接北京公电，未及表决。关于中山病状已向北京探询。邹鲁今（一日）夕代表胡汉民北上晋京，慰问中山。孙文内兄宋子文闻孙病笃已北上。又胡汉民亦拟于二月二日北上。

（天津《大公报》1925年2月4日）

孙中山昨日病状

△脉搏一零八零体温三十七

△改用“雷的母”法治

中山先生病况，据昨日医生之报告：脉搏每一分钟为一百零八次，体温为三十七度。惟据协和医院主治医生泰尔之诊断，用西医诊治，实难望痊愈。昨日上午，泰尔会见中山，谓先生之病，一时虽无危险，惟速效实无把握。现先生之亲属友人，多主张改用中医。鄙人之意，以为亦不妨一试。照例在医院中，原不能服两处药，但先生为中国特别人物，如以在医院较为安适，即在院就中医。本院亦当特别通融。孙曰：“余深信余之病可望治愈，不必改用中医，且尚有以雷的母（即铤）照治之法，尚未实行，如医院有此种设备，予极愿就此法医治。”泰尔以院中有此种设备，可以一试，即允照办。大概一二日内，即将以此种方法施治。但孙科及张静江等，于昨早在孙病榻前与孙商酌，主张在院参用中医医治云。

（天津《大公报》1925年2月5日）

试镭锭后之中山病状

△结果甚佳…体温三十七度…脉搏一百次

中山先生，今日上午十时已用镭锭治疗。计映照二十余分钟，结果甚佳，为入院后未有之好现象。体温三十七度，脉搏一百次，精神颇好。据医云：镭锭疗病，力量最强，治皮肤病颇易见效，即以治内部一部分，亦较易为力。惟中山之肝癌，不独一部分已变成硬，且已蔓延各处。是镭锭有无如此力量，殊无把握。又镭锭之为物，在化学上，列入稀少原者之内。在医学上，亦最为珍贵。据美国统计，目下在纽约仅三两。中国惟协和医院有之，为数仅二钱。惟用之治疗并不耗费，故所费尚不甚钜云。

（天津《大公报》1925年2月6日）

孙中山病象益见衰弱

△昨日脉搏一二零次

△体温三十七度零八

据医院昨日发表中山病况，大意谓：孙中山先生病象，渐见衰弱。今日脉搏每分钟一百二十次，体温三十七度零八。镭电母治疗，乃一种缓和的方法，效否殊不能断云云。

（天津《大公报》1925年2月7日）

昨日之中山病状

黎黄陂派员慰问

中山病状，闻已略见和缓。据协和医院医生言：可保无虞。惟否认孙氏言谈及任意坐卧。看护者对此事，亦甚注意。昨日曾食豌豆及番芋少许。体温为三十七度三，脉搏每分一百次。精神软弱与前日无甚出入云。

又闻黎元洪前日派黎澍代表来京，探视中山病况。昨日到协和医院谒孙，由孙夫人接见，谈十余分钟即去云。

（天津《大公报》1925年2月8日）

孙中山病有转机

△夜眠甚为安适…醒后神志清明

孙中山病状，日来尚好。昨向医院探询，仍无多大变化。体温三七，脉搏为每分钟一零四次。睡眠时间虽久，但醒后异常明白，精神亦好，绝无神昏状态。左右主张以中医调治，但中山极端反对。故更换中医一层，只好暂时作罢。至亲友赴院视疾者，因医生不允中山见客，均未晤面云。

（天津《大公报》1925年2月9日）

慰问中山代表过津晋京

上海各团体联合会公推上海科学研究社胡菊生为代表，赴京慰问中山先生病状。胡代表已于前日来津，下榻日界熙来饭店。记者特往访之。据胡君云：彼此次北来，除慰问中山外，尚负有联络京津各团体、促进国民会议之任务。兹觅得沪团体致孙先生公函如下：

中山先生钧鉴：

报载先生病危，此间各团体惊喜之下，惶急万状，特召集各团体代表开紧急会议，公推胡君菊生北上，趋前慰问起居，俾早全愈，以副民望。至敝各团体之主旨，及实行事业，当由同志胡君面陈钧座。特请公函，敬请赐察为荷。敬祝痊安。

上海各团体联合会谨启

（天津《大公报》1925年2月10日）

中山之病况

昨日此间协和医院发表中山之病况如下：

中山先生昨夕（即八日）安眠。今晨体温亦适度（三七），脉搏减至一百次。

（天津《大公报》1925年2月10日）

反复不定之中山病势

△前夜忽又增…昨日热度稍退

孙中山病况昨向协和医院探询，据闻中山病体，现更衰弱。昨夜

脉搏一百四十次，温度三十八度六。今早稍佳，热度降至三十七度四，脉搏一百二十次。似此反复，前途殊可忧虑。

昨日下午一时，张作霖代表郑谦，因受张司令，特赴院探问。此外各方探问者，亦颇不少。闻国民党中人莫不忧形于色云。

（天津《大公报》1925年2月11日）

中山病危与国民党总理

△肝部浮肿

△小肚有水分

△唐继尧将继任为国民党总理

△张雨亭来电慰问

中山病况，昨据协和医院所公布之消息，仍无重大变动。但据某方报告，谓中山先生之病，前晚确实沉重，腿部已见浮肿，小肚间用指按之，已发觉有水分之微象。西医已劝其家属筹备身后各事。此而果确，则中山之病，已绝望矣。

至国民党中人对于继任该党总理之人选，前晚在东城某处开会，以所拟之唐绍仪、蔡元培均有人反对。闻已决定推唐继尧云。又奉天张雨亭因念中山久病在院，特于前日电致郑谦，嘱其就近代表慰问，已志昨报。兹觅录其原电如次：

奉天会馆郑鸣之兄鉴：

现中山先生卧病居院，远念良殷。近日病情如何？是否日有起色？尤深怀虑。霖远在沈阳，不克亲问起居，深以为歉。即烦兄代表诣院问候。病中如有所需，并请询明电告，即可代备奉上。此电并希转陈为要。

张作霖 佳^[1]印

（天津《大公报》1925年2月12日）

孙中山病体益趋衰弱

协和医院昨日发表报告谓：本日（十三日）孙中山先生之体温，一

[1] 即9日。

如恒人，脉搏为一百二十次，但其体气则益趋衰弱云。

(天津《大公报》1925年2月14日)

民党未选继任总理

△唐继尧继任说绝对不确

日前此间一部分人虽宣传民党因中山病笃曾开会选举唐继尧为继任总理，但实际上民党对于病状，虽甚悬虑，并未开会讨论继任总理问题。虽接近唐继尧者，现甚欲为唐继尧运动总理一席。然多数民党，则认为不容讨论之问题。盖民党今尚信中山吉人必有天相。同时对于唐继尧亦认为接近民党之一新军人，绝不承认其有代中山总理党务之资望及才力也。

(天津《大公报》1925年2月14日)

两通信社之孙中山病况

△段执政对孙之殷勤

△孙有移出医院说

北京大陆通信社云：孙中山之病，昨日体热为三十七度，脉搏为一百二十次。仍无变化。段执政前日派萧方骏前往诊视。昨日又派叶交长、蔡督办^[1]等前往问候云。

民治通讯社云：昨日中山病况，据协和医院公布云：孙博士本日病况，仍无变动，温度如常。

(天津《大公报》1925年2月16日)

民党宣传员在陕被捕

民党中之屈武，前奉孙中山委任，前往陕、豫一带宣传。屈武日前由豫到陕，因沿途有激烈之言论，为陕当道所悉，亟电知长安县知事，注意屈氏行动。及屈氏行抵长安，即被该县驻军捕去，日内由长安送往省城，听候当道处分云。

(天津《大公报》1925年2月16日)

[1] 即叶恭绰、蔡廷干。

国民会议运动之热闹

△国民会议后援会之成立

△国民会议促成会二次大会

举国属望之国民会议，朝野上下，均有急切之进行。政府（临时法制院）方面，拟之国民会议草案，业已脱稿。将由临时执政提交善后会议第二次大会，详情已志前报。而人民团体对于促进会议之运动，亦极热烈。前后继起者，有“国民会议促成会”及国民会议协进会等团体之组织。主张虽微有不同，而目标则终归一致。昨日下午又有“国民会议后援会”在中央公园水榭开成立大会。到会者有邵瑞彭、沈钧儒等六十余人。由陈去病主席大会。次由筹备员报告筹备经过情形。旋讨论会章，及修正对外之宣言者，并请来宾讲演。选举职员毕，茶会而散。时已四时半云。

又闻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亦于昨日下午二时半，在北大第三院第一教室，开第二次会员大会。到者有北京教育会、农务总会及全国国立大学联合会等团体代表八十余人。首由主席朱仁源报告成立后之经过情形，及将该会第一次出版之周刊分散会员毕，遂讨论今后之进行。大体决定：

（一）作通俗演讲，发传单及小册子，努力作民众宣传。以期由国民会议作解放的第一阶级之议论而起来作我们强有力之后援。

（二）迅速联络各地促成会速派代表来京，早日完成全国统一联合的组织。

（三）联络十一种人民团体，除中山所拟之外，再加妇女界新闻界团体。最后选举该会对外总代表。结果顾孟余、雷殷、胡鄂公等七人当选。五时散会云。

（天津《大公报》1925年2月16日）

孙中山昨日之病况

△腿肿已消略进饮食

孙中山病状，据昨日医院消息，脉搏为一百二十次，体热为三十七度。仍无甚变化云云。

又闻孙中山之腿肿，刻已消平，饮食亦能略进。据医生之表示，谓为镭电母疗治，须三星期后，方能见效。刻下仍无镭电母疗治云。

（天津《大公报》1925年2月17日）

关于中山病况之沪讯

△周君常博士之谈话

周君常博士偕张君谋博士，附轮南下，于昨晚八时登岸。午后有人在访，所言中山病状如下：

病史：中山先生夙称强健，七八年前曾患痢疾。十年来早有胃病，每一食肉即觉疼痛。因自民国五年始，断除肉食。中山先生发病之日（十三年十二月四号）与汪精卫共饭。精卫以胃痛不食米饭，先生亦不进米饭，谓亦有胃痛也。是日见客绝多。迁延至三十一日，复延许米德。许君意病已加剧，不如多延名医共商，乃毅然入都门求医。既抵京，招德医俄医及协和医院医生共五人商酌之结果，发表如下：

（一）肝病颇重，然无危险。（二）短时间里可望全愈。（三）必要时当用手术。尔时中山先生不欲用手术，且专嘱克利医生用药。克利乃为注射爱米丁。自一月一号至十号颇著效验。十号以后渐次见重，至二十号而加剧，黄疸症状渐著，热度最高时至三十九度八，白血球之数为一万七千。医家始决开腹。因先为验血。盖先生律己谨严，未尝有梅毒也。协和医院剖腹，始知确为肝癌。盖由病理检查，而显微镜中见有癌质。君常博士所述之经过如此。

病状：君常博士又谓孙先生病状，确系肝癌。以其热度为三十九度八，白血球增加至一万七千。德人麦旦氏写一病者症状，与孙先生病绝似，亦剖腹后始知为肝癌。迨身后解剖，则竟有极小之病灶在胃部。按肝癌什九为继发性。克利博士确谓剖腹时未觅得胃癌。然胃癌若极小，未必易于发见也。孙先生胃病之症已经历十余载，想为胃溃疡。由是转成胃癌，再延及肝部，极为可能之事也。前报界已摘录予家函中关于孙先生病情者，公诸社会。心脏之弱，早有见端。今日报载先生腿部浮肿，则心脏更弱矣。

（天津《大公报》1925年2月18日）

孙中山已迁出医院矣

△昨午搬入铁狮子胡同行轍

△汪精卫电告出院原因

中山先生病状，日来仍无大变动，迁地治疗之义，宣传已久，迄未实行者，系因中山本人不表同意之故。昨日午刻十二时出协和医院，由升降机下楼，乘红十字睡车，送铁狮子胡同行轍。沿途协和医生与德医克礼、民党各要人、孙夫人均护送。行轍结彩欢迎，并有军警多人在彼照料。临时遮断交通，恐途中颠簸，故驾驶者开车甚缓。抵顾宅^[1]后，用床抬入大客厅内。出院时体温如常，脉搏一百次。抵顾宅后复加试验，体温如常，脉搏一百十次，惟精神衰弱。至出院原因，闻系因在医院方面，施治技穷。左右主张改用中医，惟中山本人仍信西医。故现在仍主由西医诊治。非待至西医束手时，断不至改用中医。今日到行馆慰问者甚多，段执政代表蔡廷干、郑洪年亲到慰问。均由民党代表招待。又行馆秘书处今日发出通告，报告此事，并请访客勿谈国事。兹将原文录左：

奉孙先生面谕：

此次搬入行馆，专为疗病，一切宾客，概未能接见。凡到访者，派人招待。惟以询问病情为限。关于军国大事，暂行停止谈话。特此通告，诸希谅解。

秘书处二月十八日

又闻汪精卫已将中山出院情形，随即电告粤胡汉民，兹照录如次：

（上略）总理受镭锭母治疗，已历四十余小时。协和医生，谓此病用镭锭母亦未必有效，且用四十八小时，即当停止。而连日总理体气日弱，医生屡告绝望，故总理决意出院，迁入行馆疗养。家属及同志皆同意，即于今午迁入，沿途平安。特闻。兆铭。巧（18日）

（天津《大公报》1925年2月19日）

[1] 即顾维钧宅，乃孙中山下榻之铁狮子胡同行轍。

中山迁居之第一日

△病势略有起色

据主治中山先生之德医云：孙中山先生之病状，已因迁移疗养地点而稍有进步。前夕为孙氏移居之第一夕。是晚孙氏能安眠，病情既较前稍佳，浮肿亦已消退。现仍用注射法使其兴奋云。

又续得葛利^[1]之报告，据云中山先生昨日（十九）极安适，体温如恒人，脉搏一百零四次，饮食亦略有增进，其情形甚佳云。

（天津《大公报》1925年2月20日）

孙中山已服中药

△昨服陆仲安方

孙中山病状，昨日（二十）铁狮子胡同行轶消息：自陆仲安、唐尧卿诊脉开方后，左右以唐所见过于轻视，乃决定试服陆方。闻唐系上海聘来，陆则在京延请。并闻中山因在协和医院常打咖啡针，现在一时不能掷去，仍由克理^[2]按日到馆打针。现在饮食如常。昨日上午又延陆医复诊，因仍无大变化，故决定仍用中医药方云。

（天津《大公报》1925年2月21日）

中山病榻前之民党会议

中山病状，昨日无大变化，体温三十七度，脉搏一百十次。据闻除服陆医方外，唐继尧，李石曾送来鹿茸，亦饮少许，故精神颇佳，前晚即睡八小时。

又闻民党要人，以中山之病在危险部分外，无可讳言。故民党拟趁中山精神康健时，即在中山病榻前开一会议，决定今后民党遵行办法。万一不讳，亦可请孙签字于遗嘱上，以为今后民党之信条。民党前途计，不能不有孙身后之计划云。

（天津《大公报》1925年2月22日）

[1] 又译克礼。

[2] 又译克礼。

孙中山昨日之病状

△新患腹泻

中山病状，日来仍无变化，体温脉搏均如前。陆仲安医士昨日下午四时，又奉命至行馆复诊一次。药方略有更改，大体仍旧。克礼昨日仍到行馆一次，打咖啡针，并检验身体。据克礼医生公布病况如下：

孙先生状况稍弱，胃口略减，且微患腹泻。惟睡眠、温度、脉搏均如常云云。

（天津《大公报》1925年2月23日）

孙中山益趋衰弱

昨日克利医生所发表之中山病状如左：

病者益趋衰弱，饮食日见减少，但所患腹泻，业已停止。昨晚睡眠甚多。脉搏一百零十次，体温三十七度。克利报告，二十三日。

（天津《大公报》1925年2月24日）

汪精卫与马素之共产战

△在帅府园之国民党联席会

昨有某报载国民党各委员、顾问等，在帅府园联席会议为共党与非共党问题争辩甚烈一节，兹据该党某委员所述尤为详细。据言是日会议初由王秉谦发言，谓本党因共产非共产问题而起极大之纠纷。一切党务皆无从进行。本党宜即设法将此种嫌疑详细解释，免外间发生误会等语。汪精卫答称：本党之民生主义，其性质与共产主义本无大异。故国民党之有共产嫌疑自不能免。此层可无庸解释云云。马素起而驳之，略谓：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完全不同，何能并为一谈。孙先生曾在代表大会演讲，只有共产主义包括在民生主义之内，故决不得谓民生主义即是共产主义。譬如光学电学乃格致学之一部，必不能硬指格致学即光学电学。其理相关云云。汪闻言乃谓：我此言乃亲闻诸孙先生者，且手持在广州新印刷之孙中山民生主义演讲为证。因内中注解图说有民生主义一名共产主义，又名世界主义之一段。马素复引用英文意义以驳之，且谓中山先生之演讲，对于马克思之学说详加驳斥。

可知并不如汪先生所说之苏俄共产主义云云。汪无辞以答，乃谓我与你同往面见中山先生问之，遂不欢而散。亦趣闻也。

(天津《大公报》1925年2月24日)

中医疗治中之孙文

△出医院之时孙氏…连日服用十两黄耆^[1]之现状

△孙病中之汪精卫及党员态度

兹于可靠方面，探得中山出医院之医治经过情形如次：

当中山自协和医院迁至铁狮子胡同时，该党党员之访问病状，而窥得中山神色者，莫不喜形于色。盖中山自出院以至铁狮子胡同行辕，均谈笑自若，并要求于室内散步也。唯党员见此情形后于乐观中对其一二左右平时所布之恐怖消息，则均引以为奇。及次日见各报所载汪精卫电达广州大本营报告病状绝望之一电，尤为骇愕。因之该党及共产派，有称汪等此种举动，显系根据某党加入国民党之议决案中所载：“须努力打破国民党在军事上和政治上之妥洽”。而故意为此恐怖宣传，以图解体该党党军之军心者。及二十一日各报又载汪精卫所聘之陆仲安医士医案甚重要党员乃纷往铁狮子胡同探询服用中药后之情形。据汪等谓，并非服用报载之药方，系专服陆医士所开之黄耆党参云云。某重要党员为郑重起见，即于某处连日邀集各同志延聘到京之名医，及京内名医考虑用黄耆之作用结果咸不审陆医士所以连用黄耆之理由。后探得每日所用黄耆竟达十两，党参达八两。各医士尤为惊骇。始由某党员诘问汪精卫。汪谓系张静江主张请陆医士云。后医生方面除陆外，经数次讨论之后，该党党员唐尧钦医士，力谓如此服食黄耆，前途必有危险之变化。但汪氏个人，百计打销异己者，所聘之名医。故唐医由各要人再三设法，始得诊脉一次。而结果汪对唐医所开之脉案，仍行搁置。按唐之诊断，在中山出院之日，恐为脉势尚调。其脉案中主张肝经之病宜养血。使肝得血而和顺。唐并谓医治尚有把握。陆医则谓脉已无根，其无把握。故用参耆以大补其气。及至

[1] 一种中药，又名黄芪。

二十一日,陆医忽有喜色,谓经余治后,脉已变为有根,可无危险。遂仍续用重量之黄耆(所传唐医士送服鹿茸之说,完全不确)。然延至前昨两日,闻中山胸部、肝部,已渐觉高肿,病势大起变化。因之,其他党人,遂又延上海各医同志等往诊,冀挽回于万一。然不料周^[1]往诊时,陆医竟劝周医士即开一试用方案,速行离京。因之党员益信其作用,乃召集各留京医士研究。因研究之结果,均认孙病之现状,系与服黄耆所致。多数遂主将陆、唐两医士方案公布,以唤起多数党人之注意云。

(天津《大公报》1925年2月25日)

可虑之孙中山病状

昨日克利医士发表中山病状云:孙中山之衰弱情形,逐时增加,饮食睡眠均减少。因之体气乃益衰颓,唯其心中仍属清醒。其脉搏为一百二十五次,体温三十七度六云。

另据民党方面消息:中山自前夕起,已停止服黄耆、党参。昨日中山胸部肿胀益甚,时患气喘,睡眠颇不安。入眠久,即感痛苦而醒。依此状态而论,似其恢复健康之希望,颇为薄弱云。

(天津《大公报》1925年2月26日)

中山病危

△精神益衰…食眠俱减

前晚狂泻不止…而又大便不通

孙中山先生病状,昨日形势,益觉危险。据西医克利公布单为:体温三十八度,脉搏一百三十次,精神益衰,饮眠俱减云云。

又据招待处某要人云:中山左右多主张服唐、周两中医合拟之药方。合拟之方主泻,中山气虚不能承受。故前昨大泻不止。后自十二时迄今,又大便不通。现在面部青黄,腹胸肿胀,渐渐向上,不能言语,精神极衰。今日牛奶一杯未食完。势甚危险云。

(天津《大公报》1925年2月27日)

[1] 即周树芬医生。

中山病状之昨讯

△稍有转机…尚难乐观

中山先生之病状,前日下午起略有转机。前日胸部肿胀逐刻消退,胃纳甚佳,计共进鸡汤一碗、汤面两碗。而昨晨甫醒即能进薄粥两碗。前夕睡眠状态亦良好,曾熟睡达九小时。昨日医者谓其脉搏和平,舌苔润泽,肿胀渐消,小便亦由短赤化流利,已达清导之力。前此误服过量之黄耆、党参,所致之各病,今确有解除之希望云。

又新由上海来京之医士计有二:一为葛君心慈,系由德国新归者,擅长精神治疗法。一为王君,均系上海民党推荐前来为中山治疗者。前夕葛君曾施安眠术,虽以手按中山之胸,似无他妙巧。然按后约二十分钟,中山即沉沉睡去。直至昨晨始醒,不可谓非有神技也。现葛、王、唐、周四医士,决定每日开一讨论会,讨论治疗之方法。昨日下午四时已在中央饭店十七号开第一次讨论会。结果,决定一面由葛心慈君继续施行精神疗法,一面更由唐尧卿、周树芬二君,继续先将由黄耆,党参而致之外病,设法祛除,俟恢复未服参耆前之原状,再谋治标方法。兹并录唐、周两医士昨日会拟之药方及克利医士之报告如左:

△唐周两医士之脉案及药方

总理病状:前日已进补血养肝清热利湿之剂,冀图滋阴和阳。第肺气阻滞,肝阴不能上升,气化失司,因之小便短赤,胀淋未消。本日复诊,脉象左关略见弦缓,右寸脉已见平。肌肤之热,已经退尽。眠食俱佳。小便亦觉稍和,舌苔逐日渐润,似有转机之象。仍照前方加减之,即希高明裁酌:

土炒秦当归八钱

川玉金二钱

白茯苓四钱

白杭芍六钱

小川芎三钱

制香附米三钱

生甘草一钱

右药水三杯，煎一杯，分二次温服。

唐尧卿、周树芬 同拟

二月二十七日

△克利医士之报告

病者前晚颇属安适，但因腹部感受压力，微觉不愉快。现更进营养物少许，脉搏一百二十次，体温三十七度三。

克利医士

二月二十七日

(天津《大公报》1925年2月28日)

昨日中山之病况

△衰弱仍继续增加

昨日中山病况，据克礼医生所公布者如左：

病者心脏动作虽极良好，惟衰弱仍继续增加。小便较少，胃口略减，脉搏一百二十，体温三十七度三，呼吸二十八。

此外，闻葛心慈之精神治疗，今早又已施术一次，经过甚佳云。又据克理^[1]公布单云：体温为三十七度三，脉搏一百二十次云云。又闻陆医自今日起实行谢绝诊治。行馆今日多次去电数次延请，陆医均未应命前往云。

(天津《大公报》1925年3月1日)

华侨慰问孙中山代表来京

△并将谒见段执政

南洋群岛英、荷两属之华侨，因闻孙中山先生病笃，特举前南洋同盟会正会长陈君楚楠来京慰问，并贺段合肥执政。陈君于民国元年回国时，曾与回国之各埠华侨代表，在沪组织华侨联合会。陈君维持之力居多。是以各方面与陈君有故者，亦不乏人。兹经于昨晚到京，现寓东方饭店。

(天津《大公报》1925年3月1日)

[1] 又译克礼。

全国国民会议促成总会成立

△顾孟余主席…各省团体代表六十余人

△汪精卫、徐谦等有演说

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总会，昨日上午十时在北大三院大礼堂开成立大会。该院门前结有彩楼一座。会场点缀亦极辉煌。到会代表六十余人，与会人数约千余人。各省团体代表，除云南、贵州、青海、西藏外，均有代表与会。来宾有汪精卫、徐季龙、李大钊、林子超等数十人。当推顾孟余为临时主席。次由筹备员朱仁源报告筹备经过情形，大致谓：该会在筹备时间内，因各地促成会之大多数意见，咸以尊重中山之筱电为主旨。于是乃致书段执政，表示赞成中山主张。内容计分三项：

（一）解释中山复段执政电之意义。

（二）督促政府容纳中山意见，善后会议加入人民团体。

（三）若当局不加以容纳，则由人民自动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

来宾演说，有汪精卫之“从帝国主义军阀中夺来”，徐季龙之演题为“国民会议与国民代表会议之区别”。团体代表演说者，有白云梯之“打倒蒙古王公的压迫”。最后有广州青年军人联合会、及黄埔军官学校代表萧人鹄，当众解释“扶植三民主义之丘八，与帮助帝国主义的军阀之不同”。演词甚为淋漓尽致。听者颇为动容。演毕，众皆起立高唱国民革命歌。奏军乐，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口号后，遂摄影而散。时已下午十二点半云。

（天津《大公报》1925年3月2日）

国内专电

北京电：孙文令汪精卫电阻胡汉民北上。大意以本人病况，渐有起色，毋劳探视，幸勿轻离职守。

北京电：民党消息：孙文命卢师谛返粤，料理军事。卢定日内南下。

北京电：孙中山病状，据德医报告，一日夜一夜安眠。脉搏一百十八次，体温三十七度。照大体情形观察，似较前益形衰弱。

（天津《大公报》1925年3月3日）

中山病状之昨讯

△食量稍有增加

克利医士，昨日发表中山之病情云：今日中山病况未有变化。昨晚病状颇佳，人甚舒适，体温如恒，脉搏一百二十，食量亦稍有增加云。

（天津《大公报》1925年3月5日）

中山病状之昨讯

△腹部微患水肿

据克利医士之报告：中山先生昨日病况，无甚变动，水分虽稍集于腹部，然并不感觉痛苦。其脉搏为一百十八，体温如恒云。

另据可靠方面消息：最近一星期以来，中山体中之水分，在排泄上颇感困难。故四肢时呈浮肿之状。而以最近三日间为稍剧。最近三日间，四肢浮肿虽无加增，然腹部之水肿，刻显而易见。据医者今仍须设法健胃，使血液之循环，状态较有进步，然后此由于消化不良，及血液循环状态不佳所致之水肿，方能逐渐消退云。

（天津《大公报》1925年3月6日）

中山衰弱日益显著

克利医士昨日发表中山之病状云：孙中山衰弱之现象，今日似益显著。因浮肿之关系，致中山甚觉不适，食量亦因以减少。脉搏为一百十次，体温如常。三月六日克利医士。

另据可靠之报告：中山腹部之水肿，刻仍续有增加，胸腹均感受极不愉快之压迫，呼吸亦略感窒碍。惟神志尚清明，睡眠时亦无异状。故中山之家属及左右，虽甚为忧虑，仍未呈绝望之状云。又据前夕亲往视疾者云：中山受腹部水肿之压迫，动作颇觉不活泼，转侧亦须人动。其贴褥之部及手臂之皮肤，已因动作不良之故，受轻微之摩擦伤显焦皱之状。医者并谓其腹部之水肿亦不能早日消退。刻由饮食中所吸收之水分将益成为肿胀之原因。而其恢复健康之希望，亦将益形薄弱云。

（天津《大公报》1925年3月7日）

中山腹部水肿益甚

昨日克利医士发表中山先生之病状云：

病者病情无变化。唯腹部水分有增加。脉搏一百十六次，体温三十七度三。克利医士三月八日。

又据可靠消息：中山腹部之水肿，在最近数日内皆有增无减。惟每日所增者略不同，有增加在二分以上者，亦有增加在一分以下者。中山眷属虽希望医者能设法消肿，但医者则谓此乃血液循环机能及胃肠消化力同时减退之结果。一时殊无法足以令其消退。现中山甚苦此水肿之压迫，动作极形困难，睡眠亦不甚安。虽能获安眠之机会尚不少，但有时则仅有睡眠之状态而不能睡眠之实际。因之中西医皆束手无策。其左右虽有主张仍试进中药者，唯结果因中医多自云无大把握。且中山病状，亦似非更进中药所得立告痊愈者，故仍决计照五日前预定之办法，察其成效如何，再定办法云（按针治法现已施用五日）。

（天津《大公报》1925年3月9日）

国民党同志俱乐部昨开成立大会

国民党前以多数老党员，不满意于共产分子之行为，特由章太炎、马君武、田桐、周震麟、冯自由、谢良牧、刘成禺、居正、茅祖权等发起，以旧日同盟会精神，维持党务，以竟往日未伸之志。前曾在中央公园开恳亲大会。近以各党员赞成此种主张者，已占大半，乃决定组织国民党同志俱乐部由发起人等积极筹备，遂于昨日（八日）午后一时，假北京大学第三院大礼堂开成立大会，并通过章程、选举职员。此盖鉴于近来党中不免有不良分子，致惹起外间疑虑。特抱廓清内部，共同对外发展，冀以当年同盟会之牺牲为国之精神，为尽悴国事之准备矣。

（天津《大公报》1925年3月9日）

淹缠不起之中山病势

△针灸无灵 药石罔效

中山病况，今日克利医生公布如左：

病者因腹部所积水分增加，日渐衰弱。呼吸每分钟在二十次至

三十次之间，脉搏一一五，体温如常。并闻另延王姓医生，用日药卡而门注射，每日打二三针。昨今计已打过针，病势无甚影响。孙日食稀粥、牛肉汁、牛乳、鸡子等滋养品，由孙科、汪精卫轮流侍疾云。

（天津《大公报》1925年3月10日）

国民党俱乐部章程

国民党俱乐部之章程现业于八日通过，其章程如下：

中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总章

第一章 名称 第一条、本俱乐部定名为中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

第二章 宗旨 第二条、本俱乐部以联络感情，拥护三民主义为宗旨。

第三章 会员 第三条、凡具左列资格之一，由本部会员二人以上会员之介绍，总部理事会认可者，得为本俱乐部会员：（一）前清同盟会会员。（二）民国国民党党员。（三）民三以后中华革命党党员。（四）民九以后中国国民党党员。第四条、凡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得为本俱乐部会员：（一）有跨党行为者。（二）有违反三民主义情形者。（三）有前条（一）（二）（三）（四）项资格之一，而曾中途变节为国人所知者。（四）有叛党事实者。

第四章 组织 一、总理，第五条，本俱乐部以创行三民主义之孙中山先生为总理。二、总部，第六条，本俱乐部设总部于北京。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六十人为总理事，组织总部理事会，辅助总理执行总部一切事务。前项理事在各支部未组织及代表未派出以前，得由总部所在地会员大会选举之。第七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总部理事时，须同时选举四十人为候补理事。前项候补理事可参加总部理事会会议，但只有发言权。第八条，总部理事会选常务理事若干人组织秘书处，执行日常事务。但遇理事会不能成会，认为必要时，得代行理事会职务。前项常务理事之人数由理事会定之。第九条，总部理事会，开会时主席临时互推。第十条，总部理事会得组织总部机关。各部其组织及职权由总部理事会定之。第十一条，总部理事会之职权如下：（一）代表本俱乐部对外关系。（二）组织总部机关各部。（三）组织各省及等于

省支部并指挥之。(四)选派代表。(五)支配本俱乐部财政。(六)决定对于时事应取之政策及政略。

(天津《大公报》1925年3月10日)

中山病笃矣

中山之病,迭经中外医生诊治,均无效验,且腹部水分日增,精神日渐衰弱。据行馆消息:昨晚形势大变,神志昏迷,精神不振,饮食大减,情形颇为危险。即现在施针之王医生,亦有束手之势。而克理^[1]公布单云:

病者形状危笃,脉搏一百二十五次,体温如常云。

(天津《大公报》1925年3月11日)

孙中山先生病益笃

△昨日病势愈恶

△孙科挽留王医

孙中山先生病状自日前陡变后,昨日(十一日)益见危笃,脉搏增至一百六十。惟孙科、汪兆铭等除致急电通知粤沪等处民党要人北上外,并函挽留西医王纶,继续注射驱癌药液,尽人事之挽救。兹录克理报告单与孙、汪等致王医函如左;

△克理公布之病状单:

病者状况较昨日更衰弱。腹中水分增加,不能取出以减少压迫与呕吐。昨夜颇安静,惟已渐不愿进食,温度如常,脉搏一百五十至六十,呼吸十一。

△孙科、汪兆铭致王纶函

纬宇先生台鉴:

此次先生远道来视总理疾病,同人深为感激。先生所用之驱癌药液,诚为对症之药。自第一次注射以至五次,经过良好。第六次以后,病势依然进行。此显为药力不敌病势之所致。非药不对症也。今总理病势日趋沉笃,惟信任先生之念始终如一,时时谆属先生诊察。故

[1] 即克利。

弟等，于此时间，坚留先生勿遽离开。先生虽对于病者已告失望，然倚藉先生者，仍甚殷也。

（天津《大公报》1925年3月12日）

呜呼建造民国之元勋逝世矣

北京特约通信云：奔走寰宇，首造民国之中山先生，竟于今晨（十二日）九时半与病魔不敌，而长逝矣。回忆数十载之惨淡经营，缔造非易之革命运动，始克推翻四千余年专制政府，而建成民主国家，东亚半球一人而已。记者深为民国前途叹息不置也。兹将中山逝世之经过节录于次：

孙文先生自十一日起已不进饮食。惟精神尚清，令他日前准备之遗嘱，手自签字，并嘱咐家人。午后精神仍清，惟间有模糊语。入夜呼吸更漫，至一百五十，脉搏增至一百六十。医生射强心剂，旋沉睡。十二日晨一时二十五分，痰上涌，不能言，脉搏骤至一百八十。家人及同志环伺，至九时半钟逝世矣。

逝世前一日之遗嘱：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孙文 三月十一日 补签

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中山之丧仪，昨已由行辕酌定。大致遵从中山遗嘱，一切从俭。细节由治丧处，从群商讨。闻入殓衣服决定用民国大礼服，请孔庸之筹办最上棺木，并有主张保存孙之遗体者，已请孔庸之与协和医院接洽永久保贮之法。停灵之地，暂在铁狮子胡同行辕，然后再择妥当地址，均须与丧仪一并向广州、北京当局商酌。将来葬地，闻遗嘱在南京紫金山云。

昨日阁议席上，各阁员开会后，即将中山噩耗当场报告，临时宣告停会一次，用表哀悼。其议定治丧办法，大体如下：

(一) 财政部速拨三万元，以备治丧。

(二) 中山治丧仪式，由内务部今日(十二)下午开会讨论。

(三) 由执政府电柏文蔚、王赓等来京，为政府代表，主持中山丧务。

(四) 各机关停止办公一日，并下半旗，以表示哀悼云。

又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与中央执行委员，于昨晚开联席讨论会，议商善后，并用委员会名义，通告孙氏噩耗于全国。此外各方代表与欧美日俄各国名流，昨晚均赴行辕吊唁云。(三月十二日)

(天津《大公报》1925年3月13日)

孙中山先生逝世

△昨晨九点三十分

手造民国之孙中山先生，业于十二日上午九时三十分逝世。兹将本社昨日所得之消息，汇录如左：

△执行委员会之通告

中山先生逝世后，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即遍发通启，告知同志，其文云：

敬启者：本党总理孙中山先生，客冬北上，本求贯彻主义，倡导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以谋民族之独立与民权之确定，乃自抵津京，肝疾日剧，医疗无效，于本月十二日上午九时三十分，在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轍逝世。革命尚未成功，同志遽失导师。曷胜痛悼，哀此奉闻。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启

三月十二日

△遗嘱以外之特嘱

中山先生于十一日下午九时宣示遗嘱之际，特令人请廖仲恺之夫人入室，既至，中山以手指夫人宋庆龄氏曰：彼亦同志一分子，吾死后望善视之，不可因其为基督教中人而歧视之。中山之有此特嘱，盖因廖仲恺为反基督教运动之一人也。

△遗体已移至协和医院

中山先生没后经一小时三十分即昨日上午十一时,其左右及家属即将尸体移至协和医院,俟医院施以香料及防腐料之后,将再移至中央公园及先农坛等公共场所,俾民众得最后之瞻拜。

△中山预知死期

据民党传出消息云:中山遗嘱签字之后,约三十分钟,忽呈喜色,告左右及家属曰:“吾久为恶魔所扰,然今者吾已悉驱而去之矣。吾明晨将行,行时当有天使来迎也。”时左右及家属,闻此皆为之悚然。

△使团亦准备吊唁

据使团方面消息:使团对于中山先生,因其为中华民国之首创者,且曾为中华民国之临时总统,认为有为其下半旗并吊唁之必要。唯因惯例,须得驻在国政府之通知,方能举行。今因中国政府未发正式通知,故拟俟得到正式通知,再为举行云。

△中山先生之棺

中山先生之棺,系用玻璃制成者。盖仿列宁之式也。棺长六尺有奇,宽三尺有奇。系其左右及家属在一月前所定制。盖其左右等实早虞中山先生之一病不起也。

△段派治丧专员

段祺瑞闻中山逝世,特派民党要人柏文蔚及内务次长王赓为治丧专员,专办中山之丧。

(天津《大公报》1925年3月13日)

(辑录者为天津市孙中山研究会秘书长)

《申报》载宋母倪珪贞葬仪史料汇编*

朱玖琳 辑录

宋母倪太夫人讣告

哀启者，先妣倪太夫人痛于民国二十年七月二十三日下午二时，寿终青岛寓庐正寝，距生于逊清同治己巳年四月二十三日吉时，享寿六十三岁。即在青岛成殓，择期扶柩回沪安葬。忝在亲世学党教寅友族谊，哀此讣闻。

孤哀子宋子文、子良、子安泣叩

孤哀女蔼龄适孔、庆龄适孙、美龄适蒋泣叩

孙女曼颐、琼颐、瑞颐泣叩

(《申报》1931年7月26日)

宋太夫人治丧处启事

敬启者，宋母倪太夫人于七月二十三日下午二时四十分，寿终于青岛别墅正寝，择期迎柩回沪安葬，除由在沪筹备治丧处外，因谕知太夫人笃信耶教，恤老怜贫，毕生勤劳，自奉俭约，平日节衣减食，向系分赠教会中同道各友，及捐助各处学堂医院与临时赈济各费，并不自居名义。缅怀遗教，自应仰体先意如荷。各界惠赐隆仪，应请径行捐助各慈善公益团体，以收据送交本处，代为登入礼簿，补发谢帖，其愿特表敬意者，俟灵柩到沪时，酌送鲜花，此外如香烛锭箔，及经忏酒筵等，尊奉遗命，概不收受。恐未周知，特此敬闻。

治丧处设西摩路一百三十九号宋宅。

(《申报》1931年7月26日)

* 本篇利用1931年《申报》所载之宋母倪珪贞葬仪的史料辑录成篇，内容包括宋氏家族成员、社会各界团体和要人，以及国民政府围绕宋母倪珪贞葬仪的种种活动。标点为辑录者所加。

各要人赴青岛吊宋母丧

青岛 中委邵力子、总参议蒋伯诚、省委张钺、韩复榘夫人二十五晨七时半由济来青，下车后直入宋府吊唁。午十二时一刻，奉天丸由沪进口，宋子文、宋子安、江海关监督唐海安等，押运棺木到青，宋等由前海登岸，棺由大港卸，舁往宋府。（二十五日专电）

济南 今晚蒋伯诚、邵力子夫妇、韩夫人、省府代表省委张钺，及盐运司袁励宸、烟酒印花局长项介人、中央行长徐继庄^[1]等，同赴青岛为宋母吊丧。（二十四日）

济南 韩派省委张钺偕蒋伯诚今晚赴青岛吊宋母丧。（二十四日专电）
（《申报》1931年7月26日）

宋子文电海部派舰运母灵柩

青岛 宋母殓仪二十六午十二时举行，到吊唁者各机关团体要人约四五百人。宋子文电沪海军部，派舰一艘，来青运灵。该舰二十七晨可到，宋子安、宋子良随舰扶柩返沪，宋子文二十七午乘大连丸赴沪。来青吊唁要人蒋伯诚夫妇二十六午返济，邵力子等俟送丧后再行。（二十五日专电）
（《申报》1931年7月27日）

宋子文扶母柩来沪

▲今晨六时半可望抵埠

宋母倪太夫人在青岛别墅逝世，财政部长宋子文偕乃弟子良、子安，扶柩乘海关巡舰海琛号，于廿七日上午十一时南下，今晨六时半可望抵埠。海琛号巡舰原预备停泊招商局中栈码头，惟现已变更，市公安局局长陈希曾得悉，即通知租界当局，届时妥为保护。

（《申报》1931年7月29日）

慈幼会鸣谢铁路局

▲议决为宋母办理纪念

中华慈幼协会昨接京沪、沪杭甬铁路管理局来函云：径启者，查宋

[1] 时任中央银行徐州分行长。

太夫人治丧处启事内载，如荷各界惠赐隆仪，应请径行捐助各慈善公益团体，以收据送交本处，代为登入礼簿等语。本局现拟将送宋太夫人奠仪二十元，捐入贵会，作为协助经费之用，相应检同钞币二十元，备函附送，至希查照，掣给收据，以便转送宋宅为荷。此致本埠博物院路二十号五楼中华慈幼协会云云。除由该会掣给收据，并鸣谢铁路管理局外，闻该会执行委员会提议，以宋太夫人生前热心慈幼事业，该会迭荷资助与指道，生后又有此项遗嘱，对于该会之关系，至深密切，该会决议将结束收到奠敬之成数，为宋太夫人办理纪念，以志永久不忘，如此庶不负宋太夫人热心慈善之一片婆心也。

（《申报》1931年7月29日）

国民政府褒扬宋太夫人

（南京）国民政府三日令：宋母倪太夫人，为革命先进宋耀如淑配，当总理提倡改革之时，夙与先进契合，太夫人同心赞助，患难相从，废知兴，夙笥明识。兹闻于七月二十三日在青岛逝世，缅述徽音，允资仪范，女宗云歧，感怆同深，着派上海市市长张群，前往助理丧葬事宜，并代表致祭，以示褒崇懿德之至意。此令。（三日中央社电）

（《申报》1931年8月4日）

提倡儿童幸福之热烈

中华慈幼协济会自经执行委员会议决，为宋母倪太夫人筹办纪念后，又见宋太夫人治丧处启事，移奠敬为善举，乃登报启事，移并办理。一般与宋府交谊素笃之人士，均仰体遗意，纷纷以奠敬捐助该会。兹悉昨日收到捐款，有福煦路成和邨李广身先生念元、华商纱布交易所一百元、西人爱明特先生二十五元、江海关监督署唐海安先生二百元、黄汉梁先生二百元、罗福德先生二十五元、唐北狮先生二十元、黄楚炜先生十元、梁步先生十元、外交部王部长二百元、西人康福德先生十元、国货银行陈一麟先生二十元、纱布交易所穆湘玥先生四十元、实业部郑洪年先生一百元、极司非而路谭海秋先生十元等，该处收款鸣谢，颇形忙碌，足见社会人士对于提倡儿童幸

福颇形热烈云。

(《申报》1931年8月5日)

宋庆龄昨过哈

自大连乘轮船来沪

哈尔滨 今早宋庆龄抵哈，因车误点，八时五分到站，哈各要人均赴站欢迎。下车休息贵宾室半时，转八时五十五分哈长车南下，过辽停六时，径赴大连，搭海轮来沪，十四可到。宋精神甚好，惟对人仍缄口不多谈，随行有女友前江西省府委员胡兰畦、男友章民彝，记者登车求见，宋谓体倦避他车内，令胡兰畦代见云，孙夫人回国，纯为奔母丧，七月十三日由德起身，沿途未停，过莫斯科驻六小时，十一日由大连乘轮往沪，夫人在欧居二年，历游法德瑞士，不问国内政事，京粤虽不绝电文，但夫人悉不答复，此次归国，是否再出游，无定。胡在德据云系奉江西省府命考察经济。宋车过满站时，黑省府派农矿厅长马景桂随车护行至哈，又过俄时，一俄记者误登宋车，同行到哈。(十日专电)

◎大连 宋庆龄夫人本日抵连，将搭明日自大连开行之大连丸赴沪，十三日可抵沪。(十日电通社电)

南京 铁部以孙夫人不日回国，电北宁津浦两路局，预为准备车辆，并派员招待。(十日专电)

(《申报》1931年8月11日)

国府颁赠宋母匾额

南京 国府顷颁题宋太夫人“教忠报国”四字，已电治丧处将额字代制匾额。(十日)

(《申报》1931年8月11日)

孔祥熙续假一星期

南京 孔祥熙前请假一星期，现已届满，因十五为宋太夫人治丧之期，须留沪照料，特再续假一星期，定十七返京。(十一日专电)

(《申报》1931年8月12日)

于凤至暂缓南下

北平 张夫人于凤至本拟赴沪吊奠宋母，刻暂缓启程。（十一日专电）

（《申报》1931年8月12日）

于凤至南下吊宋母

天津 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女士十三晚平浦车南下，祭宋母，于有卫士廿余人，均穿白色西服。（十三日专电）

（《申报》1931年8月14日）

宋庆龄昨抵沪

▲径赴西摩路宋宅奔丧

▲葬仪毕后再决定行止

孙夫人宋庆龄女士，偕同秘书胡兰畦女士，由柏林奔丧返国。昨晚六时二十分，乘大连丸抵埠，在黄浦码头登陆，径乘汽车至西摩路宋宅休息，与孙夫人同轮来沪者，有蒋主席派往辽宁迎候之总部行营秘书周象贤，及励志社石孝峰，一行共四人。

▲码头欢迎 昨往黄浦码头欢迎者，有新任驻日公使蒋作宾、市长张群、实业部次长郑洪年、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江海关监督唐海安、铁道部次长连声海之夫人、宋子良，及孔祥熙二女公子等数十人。警备部副官处长蒋毅率同侦查队队员亲在码头照料，市公安局派武装水上警察，及便衣警察约二十余名，捕房亦派中西探捕多名，警戒一切。

▲匆匆登陆 大连丸因中途遇风，行程稍缓，原定昨日下午三时可抵埠，竟延至六时二十分始靠码头，欢迎人员均纷纷登轮迎接。时孙夫人已步出舱室，与蒋作宾、连声海夫人等一一握手，略事寒暄，即匆匆下轮，步行极速，与各报记者未作一语，出码头栅门后，乘孔宅所备之汽车，径赴西摩路宋宅奔丧。孔祥熙之二女公子，及宋子良等，均与孙夫人同车。

▲夫人容色 孙夫人昨服鼻烟色西式大衣，西式女帽，深压眉际，革履丝袜，均与外衣同一色泽，精神焕发，容色亦较前次来沪时稍为丰

腴。孙夫人抵宋宅后，即在礼堂中宋母灵柩前，行静默祈祷礼，宋蔼龄、宋美龄、宋子文、子良、子安等均在旁行礼如仪。

▲在沪稍留 各报记者昨晚均至宋宅请谒，孙夫人因风尘劳顿，未暇接见，当派代表深致歉意。据其左右消息，孙夫人此来，专为奔丧，俟宋母葬仪毕后，拟在沪稍事勾留，再定行止，现在西摩路暂住，暂不移往莫利爱路寓次。又外传与孙夫人同来者，尚有章民彝君，实属不确，章为工程师已在青岛登陆云。

▲秘书谈话 新声社记者昨与孙夫人同来之随行秘书，前江西省政府委员胡兰畦女士谈话云，孙夫人等于上月卅一日由柏林起程返国，此来专为奔丧，将来回德与否，余不得而知，在德国每日常在图书馆内研究学问，及研究总理之遗著。大约孙夫人将对总理遗著，尚有搜集补充之发表云。

（《申报》1931年8月14日）

宋母定期发引

▲公推张群为治丧主任

▲普通仪仗均屏除勿用

昨据宋母倪太夫人治丧处消息，现已择定八月十七日领帖，十八日发引，蒋主席因剿共军事紧急，届时不能来沪，领帖自十七日上午八时起至下午六时止，由个人随到随时致敬礼。治丧处现公推张市长^[1]为治丧主任，公安局长陈希曾为总指挥，财政部次长李调生为招待主任。其发引路线，拟自西摩路，经南阳路，转小沙渡路，至静安寺路，经大西路，及中山大道，入虹桥路，至万国公墓。自是日五时半起，至八时止。一律严行警备，并于灵輶经过时，暂停车辆交通，禁止闲人。普通仪仗一律不用，以军队军乐队为灵輶前导。凡执紼送葬者，一律臂缠黑纱，襟挂纪念章，由治丧处指定集合地点，八时集合，俟灵輶经过时随行或以汽车随行，或径赴地点，届时行礼而散。除内部职员另备徽章外，凡拟执紼送葬者，除亲友向丧主处领取外，务于八月十六日

[1] 即张群，时任上海特别市市长。

以前，由各团体各机关主干开列名单，函送治丧处先期领取。

(《申报》1931年8月14日)

于凤至昨抵沪

▲下榻江海关监督公署

▲宋母葬仪毕后即返平

张副司令^[1]夫人于凤至女士，代表张副司令，由平来沪，吊奠宋母倪太夫人之丧，昨日下午四时五十分，乘车抵埠。同来者有北平财政部印刷局长沈能毅、北平市政府顾问徐通海夫妇，及副官侍卫佣仆等十余人。路局特备花车一辆，附挂于特别快车之后，昨晨十时，由京开行，准时抵北站，毫未延误。车站附近及站台满布宪兵警察，荷枪实弹，戒备异常严重。车进站时，临时断绝交通，警备司令部及公安局军乐队均到站奏乐。昨到车站欢迎者，计有张市长夫妇、江海关监督唐海安、总部行营秘书周象贤、两路局长郭承恩、公安局长陈希曾、警备部副官处长蒋毅，及宋宅治丧处职员多人。于凤至女士下车后，即携同张市长夫人，在严密保护下步出站台，乘市府所备之九二二八号汽车，径赴新闻路江海关监督公署内院休息。此系宋宅治丧处事先特为预备，饮食住居，当较舒适。于女士昨□下榻于斯，至随员等则寓沧洲饭店，亦由治丧处辟室十间，妥为供应。据于女士左右消息，此来专为吊丧，俟宋太夫人葬仪毕后，即行返平。昨日于女士下车时，御深蓝色小花纱旗袍，薄施脂粉，容光焕发。步出站台时，沿途与张市长夫人谈笑至乐，对欢迎者亦一一点首，表示谢忱。于女士抵江海关监督公署后，稍事休息，即往西摩路宋宅，会晤蒋夫人宋美龄女士等，并在宋母亲前行礼如仪，谈半小时始行辞出。

(《申报》1931年8月16日)

国府派员主祭宋母

行政院宋副院长之太夫人，定于今日开吊，兹录其祭吊消息如下：

[1] 即张学良，时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

▲国府派员主祭 国民政府派参军杨啸天、田沛卿二人代表主祭，田参军已于昨晚专车来沪，当即赴法租界会晤杨参军，筹商主祭事宜云。

▲纳税会之祭文 上海租界纳税华人会之祭文云：维大中华民国二十年八月十有七日，上海租界纳税华人会主席王晓籟、徐寄顾等，代表界内全市民，谨以香花致祭于宋母倪太夫人之灵曰，天地毓秀，锺于名门；景义相教，盛德令闻；服务典型，与世无争；牺牲为怀，泽被群生；勇往无畏，耶稣亲兵；协创民国，功垂丹青；桂兰奋发，拨乱反正；灵安天堂，鉴兹微忱。

（《申报》1931年8月16日）

莫德惠电唁宋母

▲由钱芥尘代表吊奠

中苏会议全权代表中东铁路督办莫德惠氏，十三日自俄京电上海东铁商务所主任钱芥尘君云：宋太夫人灵柩到沪时，请备花圈，并代往奠为盼。莫德惠元印。是电昨晚始投递到沪，钱君定今日前往宋宅代表莫氏吊奠宋母。

（《申报》1931年8月17日）

宋母开吊纪

▲各界往奠者数百人

▲张群代表国府致祭

昨日为宋母倪太夫人开吊之期，灵堂即设在西摩路宋宅外客厅中，厅外悬国民政府颁给之“敦忠报国”四字横匾一方，灵堂内满置花圈挽联，备极庄严。昨日上午八时起至六时止，中外宾客往吊者，络绎于途，计有赵晋卿、张群、王晓籟、王一亭、杜月笙、日使重光葵，及各国领事等共约数百人。下午十二时三十分起，开始公祭。公祭仪式：（一）主祭者就位；（二）与祭者就位；（三）肃立；（四）奏哀乐；（五）主祭者献花；（六）读祭文；（七）行三鞠躬礼；（八）孝子谢；（九）礼成；（十）奏乐。公祭秩序：（一）国民政府代表张市长；（二）张副司令代

表沈能毅；(三)立法院代表陈长蘅监察院代表郑螺生；(五)行政院代表；(六)外交部代表外部驻沪办事处处长杨念祖；(七)内政军政财政等各部代表；(八)韩复榘代表唐襄；(九)鲁涤平代表粟显扬；(十)国府参军处代表杨啸天；(十一)孙连仲代表李汉辉；(十二)莫德惠代表钱芥尘；(十三)上海市政府代表陈希曾；(十四)熊希龄代表张树贤；(十五)上海银行公会商会纳税华人会代表；(十六)交易所联合会纱厂面粉公会等团体代表。至七时许，来宾始陆续散去。宋母灵柩定今晨五时出殡，沿途所经临时断绝交通三小时警备，异常森严。

国府特派张市长主祭，其祭文云，中华民国二十年八月，国民政府谨派上海市市长张群用荐馨香，代表致祭于宋母倪太夫人之灵曰：呜呼！猗惟贤母，系出汉儒，毓灵珠浦，钟秀罗浮，幼著柔嘉，长称淑慎，刈葛知勤，采苹识敬，相其夫子，经营四方，比翼万里，联璧一堂，教有义方，既周且至，封鲜敦廉，丸熊励志，令仪令誉，遐迩无间，鱼轩就养，鸠杖看山，九点烟青，二崂峰碧，一旦仙游，遽归真宅，人怀懿范，国褒女宗，陇冈纪德，彤史扬风，一代哀荣，絺终有则，酹酒嗽词，灵其歆格。尚享。

（《申报》1931年8月18日）

昨晨五时蒋主席莅沪

▲亲送宋母灵柩安葬

▲与孙夫人相谈颇欢

▲今日晋京转返江西

国府蒋主席，昨晨五时三十分，由京乘专车抵沪，随行者仅侍卫长王世和，及卫士四十余人。蒋氏下车后，即乘汽车驶往西摩路宋宅，亲送其岳母宋太夫人灵柩至万国公墓安窆。在沪休息一宵，定今日专车返京，转返江西，指挥剿共军事。

▲兵舰抵京 蒋主席系于十六晚由赣乘楚有舰启节，前晚八时四十五分抵京，即在总部稍事休息，旋于当晚十一时零五分专车来沪，昨晨五时三十一分安抵北站，专车共计四辆，事前曾传其乘飞机来沪，后因时间尚早，遂改乘专车，故外间颇多误会。本报南

京及本埠均有蒋主席乘车来沪消息，因临时被检查员删去，致未克登载。

▲戒备森严 昨晨四时许，北车站密布军警，戒备异常森严，且以此讯事前颇为秘密，故往车站欢迎者，仅张市长、警备司令部参谋长许金源、副官处长蒋毅、两路局长郭承恩、国府参军杨虎等寥寥数人。

▲致祭宋母 蒋主席下车后，即偕张市长同乘熊式辉之钢板保险汽车，于五时四十分，驶抵西摩路宋宅，即在灵堂中，向宋母灵柩行耶教祭礼。蒋下车时，服夏布长衫，御草帽，戴墨镜，虽风尘仆仆，面色黧黑，但精神极为饱满。抵宋宅后，换服黑布袍，黑袜黑鞋。六时十五分，宋宅大门出发，六时三十分送殡队出动，蒋孔车随灵輶直赴虹桥路万国公墓。

▲孔宅午餐 九十三十分葬仪告终，蒋主席夫妇、孔祥熙夫妇、宋庆龄、宋子文、子良、子安等于十时许，返抵西爱咸斯路孔宅，即在该处午餐。

▲蒋宋晤谈 蒋主席与孙夫人宋庆龄女士阔别二载，昨午晤谈，相见颇欢，对各事均有提及，而于和平救国，意旨尤为一致。至下午四时十分，孙夫人始返莫利爱路私邸休息。

▲接见宾客 蒋主席昨午一时后，在孔宅接见海军部次长陈绍宽、国府参谋长朱培德、张市长等数人，王外长及新任驻日公使蒋作宾均未往谒。昨晚十时许，蒋夫妇始返贾尔业爱路寓所。

▲今日返京 蒋主席原定昨晚夜车返京，卫士四十余名本已先往北站布置，至下午五时许，临时将卫士撤回，决在沪勾留一宵，改今日返京，转返江西坐镇。

（《申报》1931年8月19日）

宋母殡仪志

▲执紼亲友千数百人

▲蒋主席等哀痛逾恒

宋母倪太夫人灵柩，昨晨九时三十分，下葬于虹桥路万国公墓。灵輶原定清晨五时，由西摩路宋宅出发，故参加部队，及执紼亲友，均

于晨光熹微中，在宋宅集合，但因昨晨蒋主席来沪奔丧，五时四十分始行抵宅，故改迟至六时三十分出发。仪仗不用旗帜，及各种迷信物品，执绋者达千数百人，素车白马，盛极一时。

▲参加部队 昨日海陆军警方面参加之部队，计警备司令部步兵宪兵共一营，军乐队全队，海军部海军陆战队一连，军乐全队，公安局警察第一大队全队，机车队，军乐队，以及英法两租界中西巡捕，各军警机关侦缉员等，总数不下五六百人。

▲发引秩序 仪仗发引秩序：(一)公安局机器脚踏车队；(二)旗(宋)；(三)公安局乐队；(四)国府明令；(五)陆军部队；(六)国府代表旗；(七)匾额车；(八)警备司令部乐队；(九)遗像车；(十)海军陆战队；(十一)惠儿院乐队及学生等；(十二)海军军乐队；(十三)保安大队，自执绋人员起，至家属汽车止，两旁随护，由陈局长负责支配；(十四)执绋人员，各参加团体及亲友等，在绋内随行；(十五)灵輶；(十六)宪兵；(十七)亲属车辆；(十八)来宾车辆。

▲戒备一斑 仪仗由西摩路出发经南阳路、小沙渡路，走静安寺路，往西入大西路，经中山路、虹桥路，而至万国公墓。沿途警备特别森严，但未断绝交通。公安局机车队，及捕房探捕为先导，沿途巡视捕房由捕头亲自指挥，行列方面，由江海关监督唐海安、励志社黄仁霖为指挥，公安局长陈希曾为总指挥。

▲执绋来宾 执绋来宾，计有何成浚、张找华、贺耀祖、连声海、褚辅成、杨杏佛、虞洽卿、郑毓秀、张群、马福祥、朱培德及夫人、刘尚清、黎照寰、胡孟嘉、王正廷、荣宗敬、张作宾、王一亭、杜月笙、黄金荣、欧阳驹、陈绍宽、王柏龄、蔡元培、张竹平等，及外宾如法、美、日各国使领暨各商家、工部局董事等千余人，此外若于凤至女士、于右任夫人、戴季陶夫人等，亦亲自乘车送殡。

▲礼堂祈祷 至九时十分，灵輶及部队等始抵万国公墓，各部队除乐队外，既至终点，即暂息于万国公墓前门西首，然后由执事小工，将挽幛暨国府命令、国府匾额等一一恭送万国公墓中央礼堂，并由工人等将宋老太太灵輶运至礼堂中央暂厝。当由宋氏昆仲及蔼龄、庆龄、美龄三女士(三女士均服黑布旗袍，首笼黑纱)，蒋主席、孔部长

等、恭站柩前，由江长川牧师主礼，举行祈祷，约五分钟，仪式始毕。宋氏男女昆仲并蒋主席等，至内室休憩。当祈祷时，蔼龄、庆龄、美龄三女士均泣不成声、蒋主席亦频频以巾拭目，哀毁逾恒。

▲棺前凭吊 宋氏遗属祈祷仪式既毕，国府王外长、张李两财次、陈海次、张市长，及各机关各团体来宾等，乃相率恭立棺前，成一半圆形，恭行三鞠躬礼，末由张市长致谢而退。又蒙藏会主席马福祥氏，昨亦由京来沪，特行赶至万国公墓，向宋老太太棺前，静默三分钟而退。

▲窆窆乃安 九时三十分始举行下葬典礼，墓穴在礼堂前左首，即傍宋部长尊人宋耀如西侧，穴深五英尺，上架铜栏，缚以皮带，俾安置灵棺时徐徐放下，穴内铺以水泥，四周铺以青草。灵棺由穿蓝色长衫之工人十名，徐徐由礼堂中抬出，宋氏男女昆仲、蒋主席、孔部长等尾随于后。灵棺既抵墓穴，即安置于预设之铜架上，棺上覆以青天白日党国旗两面，由万国公墓西人布置一过，先由江长川牧师祈祷，旋由一西人将铜栏机钮开启，带即徐徐放下，棺亦徐徐下降，约三分钟，宋氏男女昆仲等始退，乃由匠工将墓穴石版五方平铺于上，约五分钟，宋氏男女昆仲、蒋主席、孔部长等重至墓前，恭行三鞠躬礼，既毕，蒋主席偕宋美龄，于凤至偕宋庆龄，孔祥熙偕宋蔼龄，始驾车返西摩路宋宅，时只十时许耳。参加各部队暨执紼宾众亦即散归，宋部长昆仲则待宾客散尽后，始偕返本宅。

▲孙科挽联 总理哲嗣孙哲生近在粤中，此次宋老太太作古，孙氏为宋老太太最长外，孙故昨日特派人致赠挽联，文曰：“惟太君赞助国家，懿行永立，有诸舅克成柱石，妇节乃光。”上款署“外祖母大人千古”，下署“外孙孙科率妻暨女等鞠躬敬挽”。在此粤事重趋和平声中，殊为各界所注意也。

▲要人返京 国府参军长贺耀祖、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绥靖督办张之江、海军部次长陈绍宽、京市长魏道明、卫生署长刘瑞恒，于日前出京来沪，往祭宋太夫人后，业于昨晚偕乘京沪路夜车联袂返京。

（《申报》1931年8月19日）

蒋主席昨返京

▲在真茹车站登车

▲即转返江西剿匪

国府蒋主席，此次由赣返沪，亲送宋母倪太夫人灵柩安葬，并与孙夫人宋庆龄女士会晤，面商要公。昨晨九时四十分，蒋主席由真茹车站乘车返京，侍卫长王世和及卫士数人，随同登车，大部卫士则仍由北站出发，而各要人等，事前均未得通知。故昨晨九时许，如张市长、公安局长陈希曾、两路局长郭承恩、警备部参谋长许金源、副官处蒋毅，及王柏龄、杨啸天、杜月笙等均在北站恭候。车站四周密布军警，戒备极严，诂候至车将开时，蒋主席尚未见来，遂电蒋宅询问，始知蒋已直接赴真茹车站上车，当由两路局长派招待钱延龄随车照料，欢送者始纷纷散去。蒋主席赴真茹车站时，欢送者仅夫人宋美龄女士及宋子安等数人，于九时四十分京沪车过站，蒋氏随乘附挂花车晋京。闻蒋主席于昨日下午四时二十五分抵京，即日转赣剿匪。

（《申报》1931年8月21日）

（辑录者为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研究室副研究员）